

目 录

- 1 辛亥革命总评价 施乐伯 于之乔
樊书华译 冯钢校
- 22 论辛亥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久保田文次
张哲译
- 45 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IO. M. 加鲁什扬茨
吴永清译
- 58 资本主义的发达与辛亥革命
——以立宪派的“满洲市场论”为中心 野泽丰
张海英 李协京译
- 78 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 藤井昇三
李吉奎译 马宁校
- 98 广东辛亥革命的考察 狭间直树
齐福霖译
- 123 辛亥革命在上海 M. 埃尔文
王静 姚子照 刘学侠译
- 152 辛亥革命和内蒙古 M. 昂德唐
姚子照 王静译
- 165 乡绅与辛亥革命 市古宙三
迟云飞译
- 189 章炳麟的革命思想的形成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近藤邦康
王玉平译

- | | | |
|-----|-------------------------------------|--------------|
| 236 | 辛亥革命与日本 | 饭岛 涉 |
| | | 赵宗颇 马洪林译 |
| 254 | 苏联史学界对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略述 | 吴永清 |
| 270 | 英国殖民部档案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 | 刘蜀永译 |
| 278 |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宋庆龄 | 藤井昇三
齐福霖译 |
| 283 | 1979—1989年国外出版辛亥革命史论著
书目索引（英文部分） | 樊书华编 |
| 304 | （附）1979年以来台港有关辛亥革命论著资料索引 | 郭兴仁编 |

辛亥革命总评价·

施乐伯、于之乔

一、目前流行的观点

在详细地陈述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之前，对史学界其他学者的一般看法，尤其是现在流行的观点作一番阐述，也许是有裨益的。首先，我们将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幸运的是，中国大陆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卷帙浩繁。这是因为，一方面，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这样称呼）一直是近年人们精心研究的课题；另一方面，我们已获得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全部论文。

最初，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几乎没有意见分歧。除了极少数人外，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承认，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在领导方面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①可见，学者们是根据革命目标——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

· 本文译自《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向传统秩序的不断挑战，1850—1920》（*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 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1850—1920* (by Robert A. Scalapino and George T. Yu) Univ. of Calif. press, 1985)的第六章的一部分，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① 见吴玉章等著《辛亥革命史》第2卷；朱宗震：《辛亥革命何时结束》，《近代史研究》。亦可参见1981年武汉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有关论文；李时岳的《近代中国的改革与辛亥革命》，黎澍的《有关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探讨》，孔力、林金石、陈在政和郭梁合著的《华侨与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势力”所追求的目标——来判断革命的性质的。①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即使以上这些势力，其成员也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的政治观点亦有显著的区别。②具体地说，革命的先锋力量由以下三种势力构成：新军、秘密会党以及为数众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每一势力心怀各异，难于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此，多数学者谈得已很清楚了。此外，众多士绅（无论是在地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动员起来的）、商人—商会、农民和工人阶级，构成了以上这些有组织的团体的补充力量，他们普遍地加入了革命军队阵营。

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怎样才能进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呢？（实际上是必须怎样进行的问题）对此，这些学者也作出了解释。虽然资本主义早已在中国有所发展，但十分缓慢，且极不平衡；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广大农村相比，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资本主义企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省分，最初的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地方士绅和官员，这些人还深受“封建思想”

① 我们应该注意到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论文，她在《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不同于注①所述的中国学者的观点。白吉尔认为，虽然辛亥革命证明了资产阶级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推动作用，而且这场革命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阶级的命运，但是，这场革命仍不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她断言，即使在上海，商人的作用也是从属性的。

② 有关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演变的探讨可见黎澍《有关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一文第35—36页。黎澍对日本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横山英的观点的评论很令人感兴趣。横山英的主要观点是：在近代中国，传统制度遇到了两种类型的挑战：一是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个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经过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达到顶峰；另一挑战是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斗争，其最典型的代表是西化运动，以1898年的改革和辛亥革命为标志。横山英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先辈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的控制下缓慢产生的。

黎澍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由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劳动者组成的“旧的政治势力”是与传统的封建经济相联系的，而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新的政治势力”，则是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尽管新的政治势力还很弱小，“容易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但是，他们的地位促使他们在农民的支持下，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国家独立、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斗争”（第4—6页）。但是，黎澍最后认为，主要是同盟会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

的影响。^① 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先进分子主要集中在上海，因此，这个极端西化的城市的资产阶级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② 其他一些城市的商人和企业家虽然也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要获得资产阶级持久的、协调一致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革命一开始，分裂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各省及各大城市都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上层人士的暂时控制之下：有的由起义的新军领导；有的由秘密会党领导；还有的受政府官员领导，他们得到地方士绅和商人的支持，实际上却伺机宣布“独立”。

从以上分析来看，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太弱小，无力进行自己的革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们还不完全具备作为一个阶级应有的价值观念和行准则。他们对官员阿谀奉承；为渴求法制和秩序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避免冲突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一切都说明，封建意识还在影响他们，使他们不可能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历史使命。孙中山和黄兴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讨伐袁世凯，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却拒绝给予支持，这不仅表明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且也是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最好例证。^③

然而，中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问题比较复杂，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遭到失败，还有其他的原因。吴玉章等认为，虽然新军充分地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接受了革命思想，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是革命最初

^① 参见孔力等著《华侨与辛亥革命》第4页。这些作者对华侨与土生土长的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明确的对比，前者由于其所处环境而受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反面影响则来自种族歧视。后者的上层主要来自“大地主、大商人、官僚和政府官员”。曾友清的《在美华侨与国家革命，1894—1912》一文也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② 有关武汉和广东商会作用的论述，可参见皮明麻的《武昌起义时的商会与企业组织》和乔茹的《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

^③ 例如赵矢元的《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便持此论。

取得成功的主要力量；但它显然不是由革命者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① 它的指挥大权仍然掌握在满清军官手里，因此，即使在华南，最终也未能把它改造成一支革命队伍。由于北洋军队仍然是袁世凯政权的工具，因此，随之而来的军事和政治对峙也就不可避免。

可以想象得到，在谈到中国革命未来的进程时，中国有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总是一贯强调乡村阶级，尤其是农民的作用。他们认为，在中国，有发动农民的基础，1911年以前自发的“群众斗争”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冲突，但是，它们有助于削弱满清政府的统治。② 发动农民的组织是秘密会党。蔡尚清认为，这些秘密会党是由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组成。③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同。这些会党作为互助社活动，普遍地存在着反满情绪。

孙中山本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秘密会党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已与它们密切合作。但是当革命最终爆发时，经过最初的一些合作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转而反对秘密会党，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屠杀会党首领、放弃有益于贫苦农民阶级的政策。④ 因此，学者们认为革命者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他们的支持。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在以后一个时期史学界中很有影响的观点，即在中国有必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既不具备强大的革命力量，也没有坚定的信心来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那么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必然落在另一个阶级的肩上。不用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条件，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成功地发动农民，无产阶级第

① 吴玉章等著《辛亥革命史》第2卷，第292—295页。

② 如前所述，关于这些起义的详细论述见吴玉章等著《辛亥革命史》第2卷，第341—317页。

③ 蔡尚清：《论辛亥革命与秘密会党的关系》。

④ 同上，第12页。

一次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它不久就注定要成为革命的先锋力量，承担起完成产业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使命。

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分析更加充分、论述更加灵活、结论更加客观，他们不断地努力，但是，仍然克服不了源于西方的简单化的阶级结构分析模式的局限。例如，就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历程和它当时的要求而言，有人认为它能够或者应该具备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价值观；这种假设只是人们企图运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时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之一。

在我们对辛亥革命作出评价，对其内涵作出界定之前，对西方学者西达·斯科克波爾的新作^①进行分析研究，将是很有必要的。斯科克波爾在她的研究中，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她一开头就表明，她的目的不在于提供新的资料，而在于以新的方法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因此，我们要评论斯科克波爾的著作，首先必须分析她是如何选用资料的；其次，也是最终目标，就是对她的方法论的前提和理论前提作出评价。

正如斯科克波爾自己所述，她在进行这项研究时，知识上主要受惠于巴林頓·穆爾；同时也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伊曼紐尔·沃勒斯坦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简化论的影响，尽管这两种理论都受到了批判。马克斯·韦伯对斯科克波爾的影响也清晰可辨，尤其是她论述国家建设时。

斯科克波爾运用以上这些大家的理论，提出了下面几个命题来论证她的观点：第一，在所有实际上获得成功的社会革命中，农民起义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阶级斗争是任何一场革命的中心；第三，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局势，对革命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催化剂，对革命的成败起着很重要的影响；

① 西达·斯科克波爾：《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第四，革命的结果完全可以通过革命后新出现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而作出评估。

尽管我们曾建议对中国、日本、俄国和法国作某些比较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革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在这里将主要限于讨论斯科克波尔对1911年以前的中国所做的分析；然后我们还将以同样的方式把我们得出的某些结论与斯科克波尔的结论进行比较。

斯科克波尔的主要论点是：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传统社会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这三个古老的政权都出现了政治危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引起了逐渐升级的国际性军事竞争，而这三个社会中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却阻碍或者束缚着君主政权采取有效的对付措施，从而威胁并冲击着原始的专制国家机器和官僚国家组织”。斯科克波尔认为，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缺乏一个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上层阶级。^②

我们研究的这三个传统社会，它们之间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又存在多大的差异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似和差异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存在着意见分歧。当然，在这三个社会里，结构上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其实，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都存在着这些相似性。但是，这三个传统社会之间又存在着差异，而且大都不是结构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这些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国革命各阶段的起始、原因、领导权和结局，使中国革命有别于俄国革命，其差异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大，也使中国革命在性质上不同于法国革命。斯科克波尔强调指

① 西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9页。

② 见斯科克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101页。她认为：武士领导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他们在长州和萨摩的采邑有着独立的经济收入，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地主，或者与地主无密切的联系，“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这些人在政治上采取中央集权的方针来拯救国家”（第102页）。

出，一个社会发生革命时，在特定时间里，与内部环境相关的外部环境（地区性的与全球性的）的变化，对于革命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但是，斯科克波尔只是关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国在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侵略这种外部威胁对革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忽视了外部环境的积极因素对革命所产生的同等重要的影响；中国国内力求改变现状的知识分子却认识到了这一点。

斯科克波尔认为，“土地所有制结构”使中国君主政权在国内不能进行改革，又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付外国的挑战。她的这种主张对于阐述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障碍和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毫无帮助的。如前所述，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困境主要是心理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问题。心理上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所有社会杰出人物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政治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反抗精神，受封建传统国家的束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第二，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象西方教会那样的对立组织所代表的政治上的抗衡力量；第三，在现有的西方模式中，难于找到一种有效的模式来代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而为一的制度，这种合而为一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特征。经济上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在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体制下，生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连年和平使人口持续增长。

除上述因素外，还存在其它一些原因：第一，满族的君主统治并没有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此产生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三，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阶层迟迟没有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上三点基本上包括了最根本的方面，这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初所发生的革命是很有帮助的。虽然斯科克波尔附带提到了其中一些因素，但在以农民起义为基础的阶级结构分析中，她不

可能对以上这些因素进行充分的论述。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19世纪中日两国的本质差异，我们已在别处进行了分析。中日两国的这些差异并不在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缺乏一个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阶级。明治维新时期，不管富裕的平民如何侵占土地，绝大多数土地仍然控制在军人阶层手中，虽然这些军人自己并不耕种这些土地，许多中国士绅的情况亦是如此。政府通过巧妙地采取养老金制度剥夺了军队上层人士手中的封建权力。但是，除了某些例外，前军人阶层对土地所有权仍恋恋不舍，明治初期的情况即是例证。

应该记住，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个遗产对以后日本社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日本的起义者们最初为了保留这个遗产，驱逐蛮夷，决定团结在天皇的旗帜之下。这是适应日本历史环境的政治选择，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初期的一些领袖和支持者们后来发现他们的运动正在改变方向，便以地方主义或“自由”为名举兵反叛，这与1911年前夕中国士绅的行动类似。但是，运动发展到此时，东京的主要领导人看问题的观点与他们作为有采邑的起义者刚刚要求政治权力时的观点不大相同。他们开始奉行的路线，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政界名流与土地所有权之间关系的产物。在他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关键的因素在于他们没有从政的经验，对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抉择该作何理解；另外还有一些使日本有别于中国的因素，如国家的面积和人口的多少、政治结构以及借鉴他民族文化的悠久遗产，也是影响他们制定政策的重要因素。

斯科克波尔把辛亥革命看作“上层阶级”反对清政府的起义。她没有把它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或农民起义，这是很正确的；她认为，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尽管一直存在着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但是，只是在1911年以后才开始了农民起义。不过，斯科克波尔的阶级分析方法仍不能令人满意。辛亥革命既超出了“上层阶级”起义的范围，又够不上“上层阶级”的起义。从阶级的

角度而言，反清运动包括了各个不同的阶级，涉及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同时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各阶级内部的尖锐分裂上，尤其是传统型的社会名流内部。事实上，阶级内部的分裂较之阶级之间的分裂，对辛亥革命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

阶级结构分析所揭示的一个结论就是：革命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既定事实造成的必然结果。所以，斯科克波尔屡次指出，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绝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重演。这就是说，偶然事件、机遇运气、人的决定对革命毫无影响。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包括革命在内，以上这些因素却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巨大难题之一，就是要分析、判断领袖的决定在什么时候会使革命局势完全改观，评价偶然事件或机遇运气到底有多重要。他们的任务是要说明：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革命有可能发生，或者比较有可能发生，或者极有可能发生，或者不可避免；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环境下，这种高度可能性、较大可能性或者可能性又会减小。

二、对辛亥革命的解释

在本章开头，我们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社会革命通常是一种进程，其间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政治革命；第二，尽管辛亥革命最初结果是消极性大于积极性，但是，它仍是中国蓬勃开展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

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有一个复杂的酝酿期和其后的条件成熟期；在这个过程中，导致革命发生的诸多的关系仍明显地起着作用，同时出现更为复杂变化的机会也在逐渐增多。^①在许多情况

^① 在论述革命的各种专著中，我们发现克兰·布林顿早在40年前首次出版的经典性作品和查默斯·约翰逊的近作（1982年修订本）极富启发性。虽然我们也提出了某些新的、完全不同于他们的观点的结论，但我们的某些观点深受这两位同仁的影响。

下，革命都有可能流产：第一，革命者出现失误；第二，企图维持现状的势力有所加强；第三，形势发展的步伐比较缓慢。而且下面这种情况也是可能（或者很有可能）存在的：革命目标不能在其所要变革的社会内部实现，至少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是如此，或者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选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并不能为上述目标服务。此外，在非常重要的各个战略关头，某种完全未曾料到的情况或偶然事变可能发生，从而改变革命的整体进程，即使革命仍向前推进。最后，外界的干涉对革命也有影响，或者使革命遭到失败，或者援助革命。

在试图辩明日益成熟的革命条件时，我们应看到正反两个方面的迹象。在反面的迹象中，我们将列举五种特别突出的情况：第一，平息不满的各种程序和方法原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却遭到失败，逐渐失去了效力。而且以前能消除冲突、产生凝聚力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今也摇摇欲坠。第二，对于国家赖以合法存在的价值体系或思想理论，重要的社会团体表示怀疑，并拒绝服膺。第三，对于君主、独裁者、总统或寡头的个人专制，人们已越来越淡漠，或者公开表示反对。第四，社会名流内部日益产生的分裂已初露端倪，而他们本来是现有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这样，现有的政治制度就愈来愈容易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夹攻。第五，军队警察保安力量和知识分子团体这两大社会集团内部的分裂尤其引人注目，前者对国家实行强制性的权力来说，举足轻重，后者则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支柱。

当然，这些反面迹象受该国家或该社会所面临的内外力量的影响。譬如，在经济领域，如果在普遍的持久的发展之后出现衰退，政府常常就会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因为衰退使人们产生一种相对的失落感或挫折感。（这是事件的转折点，至少它可以影响“群众”，同样也会影响社会名流，尤其是其中虽然地位较低，但很容易跻身上层的部分。在政治方面，由于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一种有吸引力的新政治模式的出现为新思想的产生和新制度的建立

提供了可能性，从而消除了人们心理上的禁锢，这种禁锢源于因环境的异常恶劣，人们觉得无路可走。事实上，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通常必须具有外部力量的推动。

革命条件的正面迹象包括哪些呢？毫无疑问，领袖人物是一个可变因素。要想做出高度的概括，对各类重要的革命领袖都进行分析，就好像是研究一个变化莫测的事物，因为他们各自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所选择的特定的时机以及所领导的特定的事件，对于革命的成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大多数革命领袖又有着某些共同的品质，这是很明显的。他们都热烈地、坚定地追求所选定的目标，怀着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用通常所说的“领袖人物超凡的感人魅力”来吸引和驾驭大批追随者。这种对他人的驾驭靠的是情感的、迷人的感召力，而非理性或理智原则。以上这些并没有完全包括革命领袖通常所具有的品质，甚至并没有触及到某些领袖所特有的独异性格。但是，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在分析一场革命时，我们不能只探讨非人力因素，不管这些因素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政治结构。领袖人物能力的差异能使革命的面貌完全改观，即使每位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时代的产物”，即使有时事实上并没有“伟大”领袖出现这样一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

组织问题是影响革命成败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可变因素。没有长期的艰苦的组织工作，任何一场革命几乎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组织工作通常是指建立强制性的机构和舆论宣传组织，虽然某些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血缘关系、共同语言或老乡观念。如果认为革命的组织工作仅仅靠热情献身和理智服从的“真正信仰者”的努力，这就大错特错了。^①“真正信仰者”只是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坚强核心，但还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影响范围更广的软核心。他们参加革命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出于

^① 埃里克·霍弗在其名为《真正的信仰者》这部出色的论文集中，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任何一场运动的核心支持者所具有的各种特征。

个人忠心，有的是投机取巧，有的则是听人劝诱。事实上，即使在坚强的核心中，这些动机并非不存在。此外，这个软核心必须向外扩展，争取使社会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或持消极观望态度，拒绝给当权者以支持。革命与所有形式的政治一样，需要政治联盟。通过建立一个较其对手的联盟更为强大的联盟（尽管没有必要更大），革命就会取得成功。毫无疑问，这个联盟将包括显赫的旧时社会上流人物和容纳其他不同的势力。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剥夺了权力或受到了压迫，会参加革命的。

上述这些论述丝毫没有否认革命纲领和思想理论的重要作用，相反，这也是影响革命成败的又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那些还未取得政权的领袖和团体，他们从前还没有妥协、失败或成功的经历，因此，他们不会因以前的妥协而后悔，因失败而灰心，因胜利而忘乎所以，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去制定自己的一套新政策，确立一套完善的价值观念，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他们发誓清除昏庸、腐败、无能等陈旧恶劣的作风，提出新的目标，并建立起实现这个目标——诸如使全体人民富裕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等——的一套新机构，这样他们就会获得许多团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支持，因为年轻人怀着美好的理想，尚未经历生活的磨炼。

有了强有力的领导、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和一整套吸引人的新纲领，革命运动就有了成功的最大可能。尽管如此，如果当权者清楚地意识到了革命者的挑战，如果他们有能力采取有效的对策，或靠自身力量，或通过外部势力的援助，那么，他们仍有可能将革命镇压下去，即使这场革命运动具有雄厚的财力资源。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能性存在。一种就是相对弱小的革命势力，可能会暂时战胜一个更为软弱的政府，但最后革命仍会遭到失败。结果，或者很快就会引起革命后的倒退，造成持久的混乱，或者带来某种新的停滞。

无论出现哪种可能性，当政治革命达到高潮时，它通常循着

一种可以预知的模式向前发展。首先，新的领导者夺取了军队、警察、行政机构等政府的主要权力机关，并对它们进行重新调整，尽可能地垄断一切权力。反对派或潜在的反对派这时被迫保持沉默；其后，为了建立起稳定的新制度，阻止反革命的进攻，通常会造成人才的浪费，这种浪费有时甚至非常巨大。但是，即使在最激进的革命中，一部分旧的社会上层人士已表示支持新建立的制度（他们有些人在革命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或者事实证明他们愿意承认新制度，从而使新旧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不是完全决裂。

其次，革命者制定出新的政策，这些政策与最初的革命纲领大体相符。在革命的初期阶段，他们将对其中一些政策作出巨大的改变，以至完全放弃。另一部分政策将成为新制度的基础；这些新机构和新制度最终会领导社会革命（如果社会革命来临的话）。但是，不管政治革命是否发生，社会革命通过至少三种基本因素的综合仍会继续向前发展。这三种因素是：第一，经济上发生转变；第二，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内外宣传机构，进行灌输和教育，同时，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老百姓的生活经历也发生了变化，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教育；第三，新的政治制度随着自身对社会变革抵制或者适应的程度，而对社会变革起着阻碍或促进的作用。

如果我们有选择地运用以上这些结论来分析中国辛亥革命，在分析中重视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第一，把辛亥革命等同于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18世纪与19世纪的欧洲革命是无益的，美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都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尽管准确程度不一。在中国，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商人——制造业协会的某些成员确实参加了要求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主张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赞同采用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联盟；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力量还太弱小，且他们大多数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可能在当

时发挥重要作用。除了某些例外（这些例外通常在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才出现），他们甚至没有为革命提供财力；如前所述，革命事业所需的资金主要由海外华侨团体提供。人们可能会认为，华侨团体比土生土长的中国商人更能代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准确地说，即使在华侨中，传统的行会和家族血缘关系也是与反满的秘密会社结合在一起的，它形成的政治风气和价值观念既体现了现代色彩，又体现了传统色彩，二者至少是相等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日益增长的西化思想的影响。西化思想常常是通过日本经验而传入中国的。在其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人物在还不具备迅速建立他们所向往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条件，能够接受西方的自由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在国际交往逐渐频繁的时代，一个社会就可能借鉴其他革命的政治观念或政治制度，尽管这些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不必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或政治条件有任何密切的联系，价值观与阶级之间也不必有同一关系，这种同一关系在其它时代的其它社会里曾非常普遍。例如，有人认为，在中国或日本，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在这几年中信奉自由主义，或者宣传自由主义，这是不正确的。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将面临困境。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末，皇帝、改良派和革命派至少在一点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这就是：中国必须尽快地实行宪政，建立议会制度，扩大政治参与，依靠科学和技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但是，可以肯定，这三大政治集团在实质问题上并不统一，不仅他们对国家事务的重要性和时机的选择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而且其动机和价值观也大相径庭。就皇室方面而言，它接受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现代化二者的主要观点，其目的是求得幸存，是在江山日下时被迫采取的一种策略。对以袁世凯和康梁集团为首的改良派来说，他们主张改革是为了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保护人们免遭外国的入侵。对于革命者来说，他们认为改革是将中

国交还给中国人民管理的过程的开端，是使一个软弱衰败的中国向现代世界敞开大门，从而跻于现代世界之列的过程的开端。在理论上，如同日本一样，这些不同的动机和观念本来可以达成充分的妥协，形成一个有效的政治联盟。皇室与改良派之间，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甚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皇室和革命派之间都存在着建立联盟的潜在条件。

但是，这种联盟却没有建立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责任无疑出在皇室。第一，满族人系外族血统，满族君主制不可能轻易地就成为蓓蕾初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这与日本和西欧大多数国家的主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皇室长期卷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使它无法保护自己，而日本君主制在成为民族象征的政治变革中却获得了保护。第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皇室权力衰颓，软弱无能；小皇帝和管理无方的摄政者并不能有效地承担重任。此外，满清末年轻形势混乱，选拔官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事实证明了整个统治阶级的败落。有威信的强有力的皇室人物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下层官员弄不清中央政府指令的意图，对其在强硬立场和投降举动之间变来变去感到莫明其妙；对采取什么样的正确行动也各持己见，久而久之，他们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或者统一的力量了。许多学者出身的传统型官员对现代派深感痛恨，因为后者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能力进行诋毁。但是，新选拔的官员却具有至少是同样的不满情绪，因为要求他们显示出“现代”知识水平。这样，君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支柱和全面政治稳定的必要基础就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削弱。

如果不对乡村阶级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我们就很难充分理解君主制和官员阶层的问题，因为君主制的统治最终还是来自乡村阶级的支持。君主制与乡村阶级之间联系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与士绅的关系。如前所述，地方对中央政府表示效忠服从，同时又对其权力范围提出了某些能为中央政府所接受的限制，中国

的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之上的。在政治结构中下层所精心维护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二元论，差不多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实现这个二元论的级阶正是士绅。许多学者出身的官员大都来自士绅阶层，他们是中央政府的支柱。但是，士绅中还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人士，他们并不是中央政府官员，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本省和当地的威望，在乡村社会中行使着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比中央官员的权力小，甚至还要大些；由于他们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与在政府中任职的同僚相比，他们可以超越正规的政治结构的范围，采取更令人亲切、更为有效的措施，因为前者在任职期限上受到限制，对该地区又缺乏了解。

1911年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结合在一起，削弱了士绅阶层内部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士绅阶层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如前所述，士绅阶层中较为保守的部分，无论是出身学者的官员，还是地方掌权者，对于中央政府“轻率地卷入”蓬勃开展的改革运动，感到非常恼火。他们对北京的统治阶级及其地方上的某些代表人物的“软弱无力”感到痛惜。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识到，许多改革措施使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原有的平衡改变了，对中央政府很有利。于是，愈来愈多的士绅便团结在地方主义的旗帜之下，有时利用“自治”之类的口号，于是他们与现代革命者在某些方面结成了联盟。

如前所述，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联系存在。曾在日本和其他地方成长起来的革命学生，有的来自士绅家庭。因此，常常会出现子女对抗家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革命者便根据自己所受过的教育而非阶级关系来选择政治道路。事实上，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领导人的家庭都是有背景的，这使他们与官员阶层和士绅阶层联系在一起。

广大农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历史上，君主政治将他们视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保护者”。如果说辛亥革

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它同样也不是农民起义。当然，在1911年前夕的短暂几年中，农民骚乱确实此伏彼起，遍布全国。但是，正如《字林周报》所言，从整个中国来说，并不能确定1910—1911年间经济形势事实上比前几年要恶劣得多。从所获资料来看，当时发生了一系列天灾，但这并不罕见。在前几年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出现饥馑的情况下，人口持续增长，可能给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大多数灾难深重的农民要么移居城市，谋求新的生路，不再卷入任何形式的乡村政治运动，要么退出农村的政治运动，居家过日子，默默地生，默默地死。通过对1911年10月前三年情况的调查表明，大多数抗粮暴动和其他自发的起义都是发生在城镇，而不是农村。

这并不等于说，农民不可能动员起来参加政治运动，只是他们还未曾被动员起来罢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表明，可以吸收大批农民参加政治运动。但是，在1911年之前的几年中，应该如何发动农民呢？什么对农民才是最有希望、最吸引人的口号呢？正如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所证明的，农民是可以动员起来支持或反对统治王朝的。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华南盛行秘密会社的组织，表明公开宣传反满和排外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具有最大的鼓动性。其他任何口号都不可能超越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个人效忠体系或对抗体系。这个口号既包括了迷信的一面，又包括了明智的一面；既有情感的内容，又有理性的内容，正是这些内涵支配着农民的思想和行动。而其他口号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则令人怀疑。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权利有着相当清楚的概念。如果他们的权利被人肆无忌惮地剥夺，他们会全力以赴去寻求正义或要求补偿。但是，要动员他们起来反对某一阶级或某种经济制度，确实非常困难，后来共产党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肯定，在1911年要发动农民起来反对满清的统治是不可能的。

农民所关心的主要是在经济上能够生存，除此之外，还有衣、

食、住等方面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并不主张废除婚礼和其他传统仪式的铺张浪费来换取这些要求。农民对自己使用土地的权利和为习俗所认可的劳动报酬的权利有着强烈的意识，但是，如果地主执行其权利符合传统的规定也为他们所承认。另一方面，农民希望自己的利益不受到干涉；他们不满意任何形式的侵扰，不管是政府的、士兵的、外来移民的，还是外国人的。一般来说，就他们而言，任何一种局外人都只意味着麻烦。

农民除了关心这些基本的事情以外，还要履行下面几方面的义务：第一，尊敬长者和村塾教师，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正规教育是不可企及的奢侈享受。第二，要对家庭、族人和故乡承担重要的义务，而且与集体的这些联系基本上还没有被“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玷污和破坏。一般来说，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只有在代表了他所在的更大的社会团体时，才能被认为是正义的。第三，照管祖坟、生儿育女（按世俗观念，应生几个儿子）以享天伦之乐；渴望正义、讲求孝忠；总的说来，按等级制度和世袭财产水平生活。这些乡规习俗已经盛行并延续了几个世纪，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人要反对它，都会面临重重困难，如果他是“局外人”，情况更是如此。

因此，在这个时期农村发生骚乱，上述两个因素中肯定有一个正在起作用。生活方面某种迫在眉睫的困难，或者对正义的强烈要求，常常是引起起义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有些时候，尤其是秘密会党卷入时，更为深广的社会问题或政治要求，也是起义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针对帝国主义或清王朝的。但是，即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更为深广的原因，也很难形成某种组织，建立联系，使农民起义能够团结起来，开展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运动，并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一般来讲，农民被吸引参加起义，是为了保护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而不是要改变它。因此，必须教育农民：他们及其先辈所生活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万恶的，应该推翻。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为农民所接

受。其实，当时持这种观点的教师很少见。如前所述，即使孙中山追随者中最革命的成员也没有这种认识。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无论他们如何下定义——只不过是预防西方社会弊端的灵丹，而非医治中国社会现有痼疾的妙药。正如在俄国那样，农民最终被发动起来之前所表现的消极惰性和保守落后，曾瓦解了许多革命者的斗志。

但是，还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他们的家庭或整个乡村都陷入了绝望，那么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迁徙，要么等待死亡，要么揭竿而起，要么成为不法之徒。在农村处于极度贫困的时期，边远地区的人数迅速增加，这些地方到处都是盗匪横行、拦路抢劫、偷运走私以及各种“反社会”的活动，危害匪浅。政府对这些地区却鞭长莫及。虽然这些地区并不一定就是革命者的乐园，但所发生的情况表明，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秩序已经被败坏，甚至已经瓦解。

总而言之，为了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农民还是可以发动起来的。但是，显而易见，除了以极其有限的方式将部分农民吸收到各省的武装部队之外，君主政权并没有能将农民发动起来。这种情况很普遍，因此，农民的消极惰性，或者无法无天的行为，对北京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好处。

另一方面，君主制也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困境。在中国新建立了一些现代化的武装部队，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对付国内外一切敌人，然而现在，这些军队却变成了推翻清王朝的工具。新军长官，尤其是那些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军官，已经接受了各种意在推翻清朝的具有“颠覆性”的思想，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信仰孙中山和黄兴所号召的民族主义。其他许多人对军队管理中出现的低效率、混乱和腐败也私下表示过不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到了最后，皇室不得不下诏要那些较为保守的省武装部队来镇压新军的起义；而且最后走向了极端，召回了袁世凯。绝大多数朝廷官员都不喜欢袁世凯，也不相信他，但是他现在却大权在握，

力图保持平衡，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皇室都不敢轻举妄动。

袁世凯在这个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象征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位河南人是1911年中国最有实权的人物。另一方面，他个人又非常赞成改造中国。尽管某些人曾指责他背叛了1898年的改革——这也许言之成理，但直到他被赶下台为止，他既是保皇派，又是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的信徒。他与康梁一样，非常明白改革的重要性，他个人非常尊敬康梁，并打算再次与他们合作。但是，袁世凯并不希望看到君主制被推翻，因为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怀疑共和制能否在中国存在下去。他和梁启超等人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君主制的事业仍然是朝不保夕，摇摇欲坠。在这一点上，他们只好在不过多地放弃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袁世凯在革命形势高涨的年头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所述，1911年的事件可以理解为清王朝垮台的最后一个阶段，此刻其统治基础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终于坍塌。我们前面概括的预示革命到来的所有反面迹象都出现了。这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机器不能有效地运转，官员士气非常低沉。第二，价值观念日益混乱；儒教思想受到愈来愈猛烈的冲击，汉民族主义战胜了传统的效忠思想。第三，清政府已失去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事实上，由于互相猜忌、意见分歧，所有老一代社会上层人士都发生了分裂，而且裂痕越来越大，甚至在士绅阶层内部情况亦是如此。第四，革命者已深入到军队中，形势对中央政府相当危险，它只好让袁世凯独自承担重任，尽管他并不真心拥护清王朝的统治。

另一方面，当我们转而分析革命成功应具备的正面条件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管孙中山作为一位领袖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毫无疑问，他有吸引人的超凡魅力、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却缺乏充分的领导能力，不仅

领导军队的能力有限，而且政治组织能力也不强，并且他好象还没有能力吸引和驾驭一批能弥补上述缺陷的才人志士。这样，新政府的军权就软弱无力，本来可以结成很有潜力的革命联盟的各个团体之间的合作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实际上革命者就失去了“群众基础”。

此外，运动的革命纲领和思想主张含糊不清，就连孙中山的思想也是如此。最具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简单的团结反满，但是，不可能指望这个口号会将革命深入下去、引向未来。学生和知识分子相信，通过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国家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尽管他们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符情理的，但这要求制定出某种具体的政策，就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致力制定的政策。但是，即使在辛亥革命已经开始时，仍有迹象表明，无论就中国的实力而言，还是就统一的程度而言，或者就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中国都不具备制定和执行这一政策的条件。

总之，各种势力的联盟逐渐汇合起来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但是，在清王朝垮台以后，这个联盟无法充分进行有效的和协调的治理，其作用非常有限。无论是在领导权问题上，还是在价值观念、政策制定方面，各派之间都缺乏一致的意见。这是由于参加起义的势力千差万别，很不容易达到共识。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推翻了人类历史上延续最长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讲，1911年的事件推动着中国坚定地朝着伟大的社会革命迈进，尽管这场社会革命在本世纪以后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在其他各个方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混乱的时期。但是，这以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不管新制度有何缺点与不足，要想复辟旧制度却是异常困难的。

樊书华译 冯 钢校

论辛亥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久保田文次

一、引言

今天，普遍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变革的基本课题是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专制君主权力，这个变革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众所周知，19世纪末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处于被压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课题。^①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为出发点，于1911年（辛亥年）开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在短时期内失败了，但是，在世界史上，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资产阶级变革。如果必须从1789年、1868年发生的事件来考虑的话，那么也必须在辛亥革命发展前后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去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中国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长期持续下来的。但是从

① 作为辛亥革命的概述，有菊池贵晴的《现代中国革命的起源——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严南堂，1960年）；野泽丰的《辛亥革命》（岩波新书，1973年）；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23卷及《现代中国讲座Ⅱ——中国革命》（大修馆1969年）；狭间直树的《辛亥革命》等文。最近的研究动向请参照清水稔的《辛亥革命研究に关する覚え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1973年第2期）。以上诸文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另有认为这是受了毛泽东影响而对之进行批判的观点，参见横山英的《辛亥革命研究序说》（新历史研究会，1977年）。美国的研究动向请参见周锡瑞的《1911年评论》（1976年4月2日《近代中国》第2卷第2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足40年。很有必要把这样一个大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变革放在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的大视野内摆正其位置。下面试就革命的课题及其解决的方法对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

众所周知，指导辛亥革命的理论纲领是孙文首倡的“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把这个在当时中国革命派的种种理论中更加系统、更加急进的“三民主义”放在革命进程中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验证，可以说对弄清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的本质、成果和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首先概观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①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揭示的“民族主义”直接以打倒满清政府、建立中国人（汉人）的民族国家为目标，满洲人的清王朝作为“洋人的朝廷”，只要它具有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作用，只要它从根本上否认异民族的统治，那么，这个“反满”革命论就具有反帝意义。事实上，孙文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对立。他构想，再建民族国家后，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独立。这个以“反满”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在当时很容易为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这是推翻清王朝成功的重大原因。

可是当时的革命派认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主要是异民族王朝的存在；只要“反满”成功，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所以，无论是宣传还是行动，都倾向于“反满”，未能提出向清廷的主子帝国主义宣战的口号。这一点反映了构成革命派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根本上与帝国主义尖锐对立，却又不得不从属、妥协于帝国主义。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还不是自觉地

^①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参见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写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筑摩书房，1968年）；西顺藏编写的《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3册《辛亥革命》（岩波书店，1977年）；野村浩一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筑摩书房，1964年第1版）；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みすず书房，1969年）及近藤邦康的《辛亥革命》（纪伊国屋新书，1972年）。

“反对帝国主义”的独立的课题，它致使多数革命派在异民族王朝灭亡后丧失了革命的目标。

孙文具有直接向民主制发展的志向，他提出“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但他只停留在公式般地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上。尽管如此，因为要与两千年来的专制君主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从而真正揭示了这一纲领的革命性和急进性。不过，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分析汉族人内部的阶级矛盾，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对汉族官僚、地主，只要其放弃清朝，就赋予其政治上的权力和利益。这一点与革命的失败紧密相关。

“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打算以收买的手段使封建土地国有化，因而具有反封建意义。^①在孙文的主观上，这就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这样做为农业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保证条件，是建设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平均地权”是资产阶级革命更急进的纲领。不过，“平均地权”的实施，促使工商业和交通发达，进而导致地价上升。地价上升部分又作为财政资源为国家吸收。这原不是革命或革命后要解决的问题。“平均地权”论具有从根本观念上否定地主制和地主私有制的急进性；也同时具有上述方法上的及这一时期的妥协性。这一矛盾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即学习了先进国家的现实、经验和理论的中国急进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和封建的地主制不可分的。“平均地权”虽然构想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没能立即回答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上述三民主义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孙文等人主张“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平行”（朱执信），也就是说，在实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同时，要实施“民生主义”（他们主观上的社会主义）。但是，革命派中大多数人热衷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

^① 关于民生主义，参见狭间直树著《辛亥革命期に於ける中国の社会主义》（《思想》第503期、507期，1986年）及《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岩波新书，1978年）；安藤久美子著《孙文一派の土地国有論と辛亥革命》（《史草》第9期，1967年）。笔者也正在筹写《孙文的民生主义》（暂定题目）。

义”，对于“民生主义”却不关心。因为革命派组织——同盟会的成员多数来自中小地主以上阶层。另外，实际上孙文等人也把“民生主义”的实施放在革命后工商业发达起来以后。这样一来，“民生主义”作为反封建的纲领，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三民主义整体中却被摆在了从属地位。这是革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革命派主张依据中国民众的“民气”、“民情”进行“国民革命”。朱执信更主张进行“细民”打倒“豪右”的革命。对于大唱革命招致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瓜分中国的反革命论调的改良派，革命派自有革命派的理论根据。他们反驳道：经历过义和团民族抵抗运动的列强，不会干涉革命。即使干涉，中华民族也能够抵抗，也应该抵抗，革命一定会成功。于是，确立了利用列强的内部矛盾，继续依靠中国民众的力量，抵抗干涉、瓜分，完成革命的理论。^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派未能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为侵略、干涉只是一部分军国主义者所为，过大估计了列强间相互的对立，采取了期待列强的好意和援助的方针。虽然有这么严重的缺点和局限，但“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智力”的革命理论，仍然可以说是当时革命派理论的最高目标。以下，按革命的实际发展，研究这一革命理论的实践过程。

二、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列强

帝国主义列强对爆发以推翻“洋人的朝廷”的清朝为宗旨的

^① 参见拙稿，《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孙文·宫崎滔天的反帝国主义思想について》。

辛亥革命,是高兴不起来的。^①于是列强开始考虑策划对清朝给予政治上、财政上、军事上的援助。帝国主义者嘲笑建设共和国的革命派,大肆宣传中国人不具备实施民主共和制的资格和能力。尤其是对革命领袖孙中山集中进行非难和嘲讽。孙文是理想主义者而不是实干家啦,“孙文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不具备保全国土,恢复和平的能力”等等。这“无能力”、“无经验”之说,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单方面强调的。^②列强并发表诸如孙文思想的急进性会带来中国的强大和对欧洲进行种族主义报复;“平均地权”是过激思想及孙文思想是集马克思的错误观点和孔子思想之大成,它会抬致中国的混乱和被分瓜分等等见解。^③

法国记者法尔约内尔(Farjanel)在其关于孙文的“若干社会主义观念”一文中说:“正是他们的这些社会主义的观念,给予居住在中国的白人实业家和外交官以恶劣的印象。”^④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在一封信中表述了对孙文思想及为人的嫌恶感。他在信中大骂孙文是不能容忍的讨厌家伙,是混蛋、疯子。他写道:请允许我这样激愤,一想到这个狂信者在这个不开化的国家散布排外主义、社会主义等不下—打这个那个主义,一想到孙逸仙相信世界上的银行家会解开钱袋,掏出钱来乱撒在中国的焦土上,我心

① 参见前列菊池贵晴文章及余绳武著《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李时岳著《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以上三篇收于北京出版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册,1962年);苏寿桐著《试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吴乾兑著《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与破坏》;别罗夫著《1911—1913年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以上3篇收于香港存萃学社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一集,1971年)。

② 参见《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八集)。

③ 参见张馥蕊原著、何珍惠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1961年)。

④ 参见法尔约内尔著,石川涌、石川布美译《辛亥革命见闻记》(平凡社,1970年)。

中就如煎如焚。^①

这些对孙文的非难和警戒，源自“中国革命将给帝国主义带来灾难”的预测。当时，法国舆论界中有对“革命是否是义和团的再现”的忧虑；有对革命会促使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进而会大大激励周围的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忧虑；也有“黄祸论”——中国强大后对欧美进行报复的叫喊。总之，中国革命激励了周围各国的民族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体制。一份英文杂志清楚地表明了列强这一忧虑：

“中华共和国的建立和被承认，将会激化印度的不稳定。印度人希望自己的政府取得更大权益的要求，迟早会使他们爆发公然叛乱。而且，由于英国政府在中国采取优柔寡断的政策，必将在印度付出血和财产的代价……换言之，如果承认中国的共和政体，将在菲律宾播下不稳定的种子，导致印度为获得更广泛的政治上的自由而爆发骚乱。中国建设共和制对日本也将产生影响——强化大众反对军阀统治日益高涨的斗争，强化社会主义运动。俄国一贯憎恶共和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中国建立安定的共和国，将会引起西伯利亚、中亚的广泛混乱。”^②

孙文认识到，以中国的独立富强和社会改革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矛盾，中国革命与欧美“资本家世界整体”的“利害”相对立，是“最终”要给欧美资本家的“利益以损害的事业”。^③列宁赞同孙文的观点，于革命爆发后，“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并怀着“深切的热情和衷心的同

^① 参见骆惠敏编《莫理循通信集》第1卷（1895—1912），（剑桥1976年版），第811—814页。

^② 参见C. B. 雷亚：《革命金融史》，《远东评论》，1912年4月，第8卷，第11期。

^③ 参见前列拙稿：《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

情”注视着革命的成功。^① 帝国主义者也预测，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是给他们的“利益带来损害的事”，并对此怀有深深的警戒之心。

帝国主义从这种态度出发，在革命来临之际应该采取的最好方针是援助清朝、镇压革命，于是，列强策划了武力干涉革命、对清朝（及袁世凯）进行供给武器的军事援助和提供借款的财政援助。在革命急速发展和清政府暴露出无能，加之列强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不真正实施这种援助，就不可能镇压革命。于是，列强筹划向由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主导下的君主立宪制过渡，即所谓的促进“南北议和”。这个清朝最大的实权派袁世凯通过镇压义和团和“门户开放”，倍受列强信赖。普特南·威尔(Weale, Putnam)称之为“列强精选的执行官(Selected bailiff of the powers)”。^② “他(袁世凯)若不能镇革命，那首先会使欧洲受到损害”，^③ 所以，有必要给有解决这一事态实力的袁提供财政援助。美国公使嘉乐恒说：“这时，列强如协力给袁贷款，势必打击中国南方领袖的气势，使之放弃过分要求，从而达成南北双方和议。”^④ 帝国主义从革命爆发之初就帮助袁世凯掌权(组阁)，向其主导下的君主立宪制过渡。如不能维持君主制统治，就极力促使向以袁为大总统的共和制过渡，其中也包括大量的物质援助。

在辛亥革命中，帝国主义列强自始至终采取援助清朝(袁世凯)、反对革命发展的态度。可是，这期间列强给予的物质援助规模并不象清朝统治者所期待，改良派、革命派所忧虑及帝国主义者所筹划的那么大。尽管日本策动了从正面扼杀革命、瓜分中国的武力干涉，但却未能实现。众所周知，列强中在中国具有最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

^② 参见B. L. 普特南·韦尔：《为中国的共和而战》(纽约，1917年版)第20页。

^③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上海，1960年)第3卷，第213页。

^④ 参见《美国的对外关系》，1912年，第54页。

大势力的是英国，其权益的3/4在革命军控制下的华中、华南。英国害怕动乱延续、扩大而使通商中止，使权益受侵害，因而反对日本急剧入侵。英国也反对既刺激革命派和中国人民的反抗，又威胁日本国经济利益的武装干涉和借款。因此，日、俄虽在幕后进行种种策划，但在整体上不得不与英国同一步调。美、德等国是英国的追随者。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列强在表面上持“严守中立”的态度。^①

但是，英国主导下的列强的中立，既非孙文曾经期待的“好意的中立”，亦非欧美舆论屡屡宣扬的完全的中立。事实上，列强虽未大规模援助和武装干涉，但部分地实行了财政上、军事上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列强为了援助袁世凯复归政界掌握全权、促进讲和并向袁世凯为总统的共和制过渡，在政治上、舆论上给以极大的支持。特别是英国公使朱迺典、《泰晤士报》特派员莫里循为此四处奔走鼓噪。在革命趋向混沌不清、“实权派”袁世凯自身也没有信心的当时，比起露骨地或者说是全面地助长这种混沌局势的财政援助和武力干涉来，还是为袁掌握政权创造好条件，在政治上、外交上和舆论上进行支持更加有效。正是这个反对积极地进行干涉和提供借款的英帝国主义，才是袁世凯掌握政权的最大支持者。^②

列强一方面非难、嘲笑革命领袖孙文，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和全世界宣传袁世凯是中国民族的救世主，使袁世凯统治的共和制过渡成功。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清朝，提高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热情。无论怎么说，这对帝国主义是巨大的打击。但是，列强得到了在共和国幌子下代替“洋人的朝廷”的

^① 参见J.G.里德：《满人退位与政权，1908—1912》，1935年，伯克利；P.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1969年，伦敦及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② 参见E.P.扬：《袁世凯当选大总统》，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黑文，1968年。

“列强执行吏”的袁大总统。这一来，帝国主义在民国成立后又创造了把中国作为半殖民地进行统制的体制。

尽管发生了辛亥革命，帝国主义却不但成功地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殖民地统治，而且乘革命之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关税收入的实质性的控制。中国的税关行政从19世纪中叶起就由在清朝为官的欧美人（特别是英国人）掌握实权。1901年以后，关税收入的大部分直接作为外债和赔款的抵押，但表面上仍由清朝的汉、满、蒙等官吏做正式的关税长（关道），关税收入暂时存入中国开设的银行，由中国当局收取利息。但是，外国税务司以在革命军控制下中国官吏逃亡、税关行政混乱为借口，为了确保债权，他们掌握了全部征税过程，关税收入也全部存入了英国所属的汇丰银行。^①正如英国公使朱迺典所说：“开港都市的行政权从清政府手中一转移到革命派手中，所征收的资金就会为后者随意支配，有用于支付反叛政府的军事作战或其他紧急费用支出的重大危险。”^②总而言之，为防止这一事态发生，就要压迫革命军的财政。而且，“总税务司是从属于帝国政府（清朝）的官吏，在政府依然控制的北方诸港……总税务司及其同僚们协助征收关税，相当大量的收入额继续流入了帝国的金库”。^③这办法不用说，是反对革命、援助清朝的。而且随后，这一办法扩大应用于全国，帝国主义完全掌握了关税收入，并通过操纵对关税的处理和控制权，左右中国的财政与内政。^④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继丧失关税主权之后，又丧失了巨大的

① 参见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01—404页）及S.F.赖特和J.卡本：《1911年革命以来中国的关税》，第3版，1935年，上海。

② 参见《中国事务通讯》，1912年，第1期，第107页。

③ 参见前列马士文章第402页及前列小野等译《中国近代史》（第185—186页）。

④ 参见藤井昇三著《孙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义理论の发展を中心として》（劲草书房，1966年）。

主权——在俄国操纵下外蒙古宣告“独立”。英国也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日本借口援助革命，搞了个汉冶萍日中合资公司，致力于在华中获得权益；又以援助清朝为口实，进行“满蒙”独立活动。^①这些在当时虽未成功，却在袁世凯掌握独裁政权后，通过二十一条实现了。

在辛亥革命之际，帝国主义列强虽未露骨地、大规模地进行军事上、财政上的援助与干涉，但在“中立”的伪装下，对决定中国政体和选出国家元首问题上进行了明目张胆的政治干涉。^②就这样，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起“列强的执行吏”的政权，加强了关税支配权，把中国的疆土从中国主权中分割出去。到1913年革命低潮期，列强按计划给袁世凯政权以大量的财政援助，以后又为其复辟君主制给予一般的支持，以此来维持、继续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的结合。

三、“列国之均势”与“国民之意力”

如前所述，在辛亥革命之际，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对中国革命进行为改良派（包括革命派）所担心的干涉，表面上采取了中立的态度。革命派关于在革命期间列强大概不会进行武力干涉的预测大体符合实际。而且，英国等国避免这个意义上的干涉，原因之一是害怕日本趁机侵入，之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英、俄、法、德帝国主义诸国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帝国主义诸国之间的相互矛盾，制约了其对中国革命的干涉，革命派的这一预见也大体正确。“外乘各国之均势”这一国际环境，就这样大体形成了。

关于革命的主体条件“内恃国民之意力”的情况是这样的：

^① 参见前列藤井文章及臼井胜美著《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

^② 英国对袁世凯早有约定，“我们只能给予外交上的援助”，（见前列《中国事务通讯》，第1期，第40页）他们虽然没有大规模地进行军事上、财政上的援助，但最大限度地给袁世凯以政治上、外交上的援助。

以四川省反对铁道“国有”为革命导火线的斗争，越过幻想清朝向立宪制过渡的立宪派乡绅的领导，在民众中发展起来。而且，以清朝统治当局逮捕运动的领袖为契机，发展为全省规模的武装斗争。越乡绅的领导，在没有领导的状态下，使运动得以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① 1911年10月10日的南昌起义亦是佳例，在指挥部人员被逮捕、处刑、逃亡而失去指挥的情况下，洋溢着革命精神的士兵们死里求生，奋起战斗。起义的革命军得到民众狂热的支持，民众积极地加入了革命军。

关于革命军和支持他们的民众的英勇战斗，中国和日本做了许多报导，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人和外交官也不得不关注中国人民的勇敢战斗精神。法尔约内尔从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等人处听到了“起义的士兵们、武装起来的苦力们”英勇战斗的情况，他写道：“群众蜂拥参加战斗。普通的百姓，象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投身到战斗中去。”清军在反攻汉口时，“保皇派有计划地占领一所所房屋，并放火烧房，驱赶敌人。敌人要想不被火焰包围，必须放弃这些房子”。^② 在反攻汉阳时，苦力们面对清军强大的火力，在狭窄的迷宫般的街道上，执拗地继续抵抗。^③ 英国一名军人也目睹了这一情景：“革命的原理使它的军队兴奋，他们为了革命大义，处于狂热状态。……爱国精神在中国光大之日，为期不远了。”^④

革命派正是依靠了这个确实存在的“民气”、“民情”和“国民之意力”，才得以避免干涉、抵抗干涉。实际上，真正阻止帝国主义干涉的也正是这个“国民之意力”。在法国，对革命是否会使

① 参见西川正夫著《辛亥革命与民族斗争——四川保路运动与哥老会》及拙稿，《辛亥革命与民族运动》（1974年，历史学研究报告会大会报告别册特集《世界史にねける民族と民主主义》）。

② 参见前列日译法尔约内尔文章第170—180页。

③ 参见芮玛丽著《变革高潮序》（《革命中的中国》第51页）。

④ 同上，第36页。

义和团再度出现的忧虑，也表明了这一点。于是，产生了应出兵干涉的主张。但正是这种干涉，反而使反对干涉一方取得了优势。① 英国不赞同日本积极干涉的政策，认为“英国政府可以不顾在中国中部和南部贸易上之重大关系，冒受到攻击之危险，轻易地采取无视南部中国人的主张和感情，强行君主立宪之方针”，② “但应尽力避免挑起诸如排外运动之事端”。③ 法国未借口援助清朝、保护侨民而出兵，实际上也是因为害怕“唤起中国人的狂热”，害怕中国人的“排外”情绪。④ 英国反对在革命时向清朝提供借款。1911年11月，这一主张的赞同者莫里循写道：诸国在借款问题上处于神经质状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革命派。现时借款给中国政府，哪个国家都会受到联合抵制的威胁。⑤

列强对义和团运动、清末的收复权利及联合抵制等中国人民的斗争记忆犹新。在革命高涨的当时，放弃了援助清朝、干涉革命的做法。⑥ 经历过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列强不会对中国革命进行武力干涉——革命派言中了。也就是说，义和团民族抵抗的实绩

① 参见前列张荫桓原著、何珍惠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1961年）。

② 参见1911年12月21日伊集院公使致内田外相的报告。（《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清国事变》第438—439页）。

③ 参见1911年12月2日驻英代理大使山座致内田外相的报告。（前列《清国事变》第388页）。

④ 参见M.巴斯蒂著《法国外交与中国1911年革命》，载《现代与近代历史评论》，1969年第16卷。

⑤ 参见前列骆惠敏编文第671页。

⑥ “东三省”的革命运动及全国的革命运动使日本没能实现其策动的“满蒙独立”。参见西村成州著《东三省たねける辛亥革命》（《历史学研究》1970年，第358期）。另外，俄国公使库尔本斯基认为，中国混乱、分裂局面对俄国是件好事，但这时苛刻的借款条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D.J.达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纽黑文，1949年第111页。俄国和日本没有能力给袁世凯以财政援助，它们认为应该干涉和镇压存在并扩大的抵抗运动。中国的混乱局面——革命和抵抗使本国可以趁机侵入以取得利益。这“没有自知之明”的愿望根本不能与老谋深算的英国在考虑了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强弱后所采取的现实外交政策相提并论。

和当时革命高昂的气势，使得反对革命、支持清朝（袁世凯）的帝国主义列强未能下决心对革命进行真正干涉。

不只是中国的民族抵抗力量抑制了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干涉。如前所述，中国革命的成功及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激励了印度、菲律宾的民族运动；此外还有俄国领属的中亚的民族运动及日本的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这一状况，帝国主义深表忧虑。未能镇压这具有危险意义的中国革命，是因为担心这种干涉本身会动摇其对殖民地的统治。对此，英国公使朱迹典向首相格雷作了报告，主要内容是：“香港、新加坡的居民支持革命，他们完全兴奋起来了。英国政府任何压制的行动，都会使这些重要的英国殖民地发生严重的治安问题。”^① 法国本欲命印支的法军出兵云南，后也因这支部队大部分是越南士兵，顾虑其有感染“和中国人共同的主义”的危险而搁置下来。^② 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和台湾的总督也忧虑中国革命给殖民地统治带来坏影响。^③ 虽然列强有应出兵干涉的打算，但辛亥革命之际亚洲各国民族运动的兴起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政策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另外，也不能忽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反对干涉论和不干涉论。当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不干涉论有许多属于为保存本国的帝国主义权益的成份，但这些人和本国专制的冒险主义者相对立，矛盾激化，这也动摇了列强的干涉政策。关于“绝不能低估”“清朝实现共和制”“带给我国国民思想上的影响”这样的忧虑，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干涉策划发生了作用。^④ 不久，爆发了确立民主主义的国民运动

① 参见前列扬著作第403页及前列洛著作第68—69页。

② 参见前列巴斯蒂著作第232页及前列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八册第503页。

③ 明石元二郎、石塚英藏、佐久间佐马太致寺内正毅的书信表明了这一忧虑。

④ 参见1911年12月21日和12月23日伊集院致内田的报告（《清国事变》第444、451页）。

的“大正政变”，结果是强制西园寺内阁不干涉革命。^①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之际，帝国主义列强未能按其所愿，真正实现援助清朝、镇压与干涉革命的企图，这是由于帝国主义诸国的矛盾激化、列强感受到和预测到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强大、殖民地民族运动高涨及列强国内存在着政府运动等诸因素的制约。孙文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对立，他们也预测并期待中国革命激励亚、非各国的民族运动，动摇帝国主义体制及推动帝国主义大本营的反帝民主势力去制约帝国主义实施其政策。如前所分析，这时帝国主义反而有所畏惧，它们虽有干涉论为论据，但整体上是前述因素对干涉起了制约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地实现了推翻清朝的目标，这得力于中国的民族抵抗、亚洲的民族运动及欧、美、日的反帝乃至民主主义力量的强大，从而制约了列强去大规模援助反革命。而这一点正符合孙文等中国革命派的期待和预测。

四、对革命的反应（一）

革命期间，中国存在着被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瓜分的危险。但英国根据对现实的判断——中国民族抵抗力量强大，认为这个危险大体上得以避免。形成了革命派所希望的革命——建国的国际环境。只要没有外来干涉，革命派就能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革命。中国民众爆发革命、发展革命的力量充分证明，即使遭到干涉，他们也能够抵抗。这一点极好地证实了“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意力”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中国以加强国内建设、充实国力为背景，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

^① 关于辛亥革命与日本舆论和政策的关联，参见野泽丰著《辛亥革命与大正政变》（东京教育大学アジア史研究会《中国近代化的社会创造》1960年）及《孙文与中国革命》（岩波新书，1966年）。

事实上，民族主义支持了革命的发展，革命发扬了民族主义精神。革命领袖孙文也发表了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和租界的意见。1912年1月，福建省革命政权号召国外的中国实业家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准备和研究。^①因革命引起民族主义抬头，致使孙文等人为解决革命政权的财政困难而决定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计划也因之葬送了。南北统一后在以同盟会为中心，全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袁世凯等未能缔结条件苛刻的大借款协议。外蒙古的独立及1913年的所谓善后借款也同样激起国民的民族主义。这期间，各地革命政权以保护民族产业的发展为由，在民间掀起了“实业救国”风潮。

尽管存在着革命的构想和民族主义高涨，但辛亥革命却未能解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课题。革命派提出了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朝的反满口号，却未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把中国从半殖民地中解放出来的道路只走了推翻清朝这一步。他们幻想，只要推翻异民族的专制王朝，就可以自行开辟通往独立之路。革命前所准备的“革命方略——对外宣言”，承认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部继续有效；革命政权继续负担赔款和外债，并保护外国人的既得权益和革命占领地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革命后革命政权的宣言和通告也贯穿了与革命方略相同的方针，希望这样能得到列强对革命的援助和对新国家的承认。于是，无论是革命之际还是革命大体成功后，革命派都尽力避免刺激列强，不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设想，反而竭力压制民众的“排外”举动。轻易接受了英帝国主义推行的由袁世凯主导的“南北议和”，向“列强的执行吏”袁世凯妥协，甚至连对袁世凯进行民主主义监督的条件也轻易放弃了。

革命派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关税控制权也加以反对，只要自己领地内的关税收入不上交清政府就十分满足了。当时的革命政

^① 参见李时岳著《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第669页）。

权曾尝试推行急进的社会改革，但招致国内保守派、改良派的反感；孙文家乡的广东省革命政权招致了在香港等地的帝国主义者的反感。^① 革命政权的首领——广东都督胡汉民回忆道：根据顾问何启（改良派）、都督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旧官僚）等人的意见，对关税收入的处理问题，“无暇深议”，悉依他省先例，“余示不复坚持初见，遂取同一步调”。并反思这个“致开民国以来之恶例，此当时最大失策”。^② 可以看出，胡汉民是反对外国官吏（也就是列强）加强关税控制权及在外国银行存款的，但他以时间关系为理由，未多加研究便追随其党派部下的意见，这表明胡汉民自身并不太重视这个问题。

关于革命派的这种态度，总税务司安格联叙述：“革命的领袖们在这时虽然是极需要钱以从事战争的时候，却并没有对于关税的征收作什么干涉，这很可以说明革命领袖们的爱国心和他们对国际债务的认识。”他说，清朝政府轻易地同意在全国实行这一体制，表现了清朝当局“并不落后于革命领袖们”的优良旨趣。帝国主义者一面赞美革命领袖，一面赞美清朝当局，“对于革命的中国人民的侮辱可说是莫过于此了”。^③

在其他领域，革命派也在反帝问题上遭到重大失败。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承认中国最伟大的铁矿、制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日中合营方案；与经营江苏省铁路和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的“招商局”进行使日资侵人的借款干涉。^④ 不用说，这是为了解决革命政权窘迫的财政困难。但孙文这个利用列强中最积极策划干涉中国革命的日本的资金来完成革命的战略，不仅不被觉醒的中国人民所理解，而且受到英国等

① 参路康乐著《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1913年广东实况》（1975年）及狄间直树著《广东辛亥革命的考察》（《鹰陵史学》1977年，第3、4期）。

② 参见《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2辑）。

③ 参见前列胡绳论文日译文第186页。

④ 参见前列藤井、白井论文。

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猛烈反对。于是，黎元洪、张謇等为扼杀革命政权而反对日中合资的举动，披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因为抵抗日本干涉被日本人嫌恶，而对欧美人极具信用的袁世凯被大肆渲染成拥护中国统一的唯一最大的政治家。为确保中国对“满蒙”的统治，北京继续作为中国的首都。在中国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革命派当中具有最强烈的亚洲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感情及主张的孙文被搁置一边，而奉“列强选拔的执行吏”为救世主，并把他推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北一辉著《支那革命外史》，特别是其中第十一章暗示了这一点）。

在这段历史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失败了。孙文等人虽然已经具有了反帝设想——依靠中国民众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未深化、发展这一设想。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仅仅是固执地利用一个帝国主义的力量来与其他帝国主义对抗的战略战术，可以说是革命失败的必然原因。所以，如果不明确提出反帝目标，也不明示将来的设想，只强调当前与列强的友好和平关系，那么还是让深得英国等列强信任，拥有兵权，给人以能与日本、俄国对抗的印象的实权人物袁世凯来当大总统更为合适。

不只是保守派和改良派，就连革命派也卷入推戴袁世凯的潮流中。后者一方面幻想利用国会和宪法来约束袁，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害怕革命持续发展下去会诱发列强干涉。当时虽可避免真正的干涉，但日、俄已在暗中进行策动，而伪装“中立”的其他列强又对革命的持续发展表示恐惧，袁世凯和改良派也在大喊干涉、瓜分危险，要求革命派妥协。在革命过程中，同盟会的最高领袖宋教仁也在考虑，为避免列强干涉，应尽早结束革命。^①这样一来，孙文的中国民族能够抵抗帝国主义干涉、完成革命的正确观点，未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发展。其结果，孙文也不得不赞

^① 参见拙稿：《辛亥革命与孙文、宋教仁》（《历史学研究》，1974年，第408期）。

同这一妥协倾向。实际上，这说明孙文本人也非常担心列强干涉，他缺少能够指导中国民众抵抗的方略和自信。

孙文等人虽说“历史明示，练兵（正规军）不能征服国民军”，但实际上却没能组织起这个“国民军”。大家都很清楚，“自发的暴动无益于国家”，革命派的“当务之急”是“结束自发暴动，把自发暴动加以改良而发展”。可是，这种“改良”是从上面和外部灌输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在使“自发暴动向有秩序的革命”发展方面，却没有任何对策。创立有主义、有纪律的革命军队是重要的历史课题，但革命派却害怕民众自然而然的能量爆发。强行“有秩序的”“文明的”行动方式，不尊重大众的自发行动，轻视大众的感情和愿望，就不可能成立“国民军”。而革命派和革命政府竟亲手解散、镇压了集结在革命派周围的大众和大众组成的军队。

在革命达到顶峰、实现目标指日可待之时，能够抵抗帝国主干涉的“国民军”在革命派的眼中却毫无存在的位置。在验证“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意力”这一革命派理论的正确性的条件具备之时，革命派却未能贯彻“内恃国民之意力”的思想。于是“尽管有干涉、瓜分的危险，也能完成革命”这个革命派重要的论据终成泡影。而且，革命派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与改良派发生了明显的差别，只剩下了与列强协调、与袁世凯妥协这一条路。

五、对革命的反应（二）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埋葬了在我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①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年来的专制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说有许多局限和欠缺，但它毕竟是亚洲第一部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

^① 参见196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

在这以后，民主共和制在中国被视为正当的政治观念，连军阀也多在共和制的幌子下争夺政权，所以袁世凯复辟清朝帝制的企图，在短日内就归于失败。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失掉了专制君主制的机制，没能确立可随意控制中国的政治体制。

资产阶级革命派成功地推翻了专制王朝后，遇到了在民主主义政治指导下实施其所标榜的社会改革——“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最好条件的机会。但是，如前所述，按孙文的“平均地权”的理论设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化的工作，要在革命促进工商业发达、地价上升后才能实行。所以在革命期间没有实行，革命以后也没能立即实行。而且，多数革命派认为这不切实际，只停留在观念上宣传、拥护“平均地权”论。革命以后，革命派的实权人物宋教仁等反而视民生主义为危险。1912年夏，同盟会向国民党改组之际，“平均地权”连同“男女同权”的主张一起，从国民党的纲领中消失了。^①

从另一方面看，华中、华南一带发展较快的地区的农民与地主的对立日益尖锐，他们以“朝代已换，此田已非故主所有”，“皇上没有了，可以不交地租了”等为理由，用实力拒绝交纳地租。并且提出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时，自诩为“社会主义”“均产主义”，要求减免地租的“均产自由党”、“农林党”、“抗粮抗租保民会”、“农夫持平军”等农民斗争组织在各地不断出现。^②这清楚地表明，农民期待辛亥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革命本身就成为发展农民运动的论据和契机。此外还可以看到为与地主团体“田业会”进行对等交涉而结

① 参见前列拙稿：《辛亥革命与孙文、宋教仁》。

② 参见山下（石田）米子著《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众运动——江浙地区的农民运动を中心とレテ》（《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65年，第37期）；小岛淑男著《辛亥革命前后たねける苏州府の农村社会与农民斗争》（《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大安1967年、汲古书院1973年）；《清末民国初期江南的农民运动》（《历史教育》1968年，16—1、2、）等。

成的“佃户会”的活动及在“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影响下设立的“中华民国农党”等组织。这些“工党”和“农党”多为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和投机政客用以“取悦于人”的，可以说不是真正工人、农民的组织。^①但是，这“取悦于人”和欺瞒对策，在宣称为了农民利益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很好地反映了农民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求得在精神上、政治上解放的氛围。这也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应该依“恃”的“国民意力”确实存在。

显然，孙文的“平均地权”论没能立即回答急进的农民的要求。但可以说，“平均地权”的精神有可能由农民自身发展下去。这一切实际观念上的“平均地权”论，在是坚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目标，还是坚持将来以有偿收买的方式实施问题是矛盾的。当然可以通过克服这个矛盾使“平均地权”论作为真正的反封建纲领发展下去，但革命政权连这个观念上的“平均地权”论也视为危险，自然就不会回答农民的要求了。退一步说，也不会视其为将来的理想。革命派幻想，推翻了异民族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制，一切就都解决了。他们“领导”农民运动从“自发的暴动”转向“有秩序的革命”。为维持共和国秩序，有的地方的革命政权甚至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站起来的农民。以改朝换代为依据、要求废除地主占有土地制、升起了红旗、坚守营寨的农民使用“宣统三年”的年号，而要维护“文明”秩序的革命政权却镇压了他们，这种状况是与辛亥革命的理论相矛盾的。^②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具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设想，但在实际革命过程中既不实行也不宣传，辜负了革命农民的期待和要求。这样一来，革命派也挖毁了自己的基础，未能解决反封

^① 参见小島淑男著《辛亥革命时期江南的农民运动与中华民国农党》（《历史研究》1971年，第372期）；《辛亥革命期的学农运动与中国社会党》（1971年历史学研究会大会报告别册特集《世界史认识与人民斗争史研究的课题》）；《辛亥革命期にねける工党与农党》（《历史评论》1971年，第256期）。

^② 关于吴江县同里镇抗租斗争的事例，参见1912年1月12日《时报》及前列《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中小島淑男的论文。

建的基本课题。

从另一方面看，革命派早就集中攻击清末的重税，宣传减免税赋。在实际革命过程中也宣传、实行了减免工商业税与消费税的要求。不用说，这是发展工商业、安定民心的措施，连同计划在将来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厘税制一起，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再有，革命政权采取了缓和清朝产业规制、保护民族产业的态度，使民间的企业得以革命为契机大力发展起来。但是，各地革命政权因财政困难而增加税收，恢复旧税，使这一成果变得极不完全。不久，在袁世凯政权统治下，一切又都复归旧制。

辛亥革命在反封建的基本课题中，成功地完成了推翻专制君主制的任务。打倒二千年来的专制王朝，动摇了支撑长期专制统治的正统观念，人们讴歌精神上的空前解放。人们从封建禁锢下解放出来，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大胆思考，积极发言，努力行动。孙文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推行了一套诸如禁止蓄发辫、缠足、贱民差别的改良风俗的政策。在孙文派占优势的广东省革命政权下，人们公然议论并部分实行了把儒教祭祀和学校教育分离开来的工作。孔子像被破坏的事件不断发生。出现了男女同权的主张，在广东省议会出现了女议员。这些情势，特别是广东省的情势导致了儒教这一“名教”的危机，^①动摇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儒教观念。革命后民众精神上的解放，不久就在袁世凯独裁政权下窒息了，但随着共和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培育出反抗军阀统治的精神土壤。革命时的精神解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成为继续发展革命的原动力。

六、继续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君主制、建设民族国家、广泛进行社会改

^① 关于这一状态的危机感，〈民国经世文编〉所载诸文，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论文均有表述。

革（包括“平均地权”）的计划虽然含糊不清，但一经提出，就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而且革命派通过与农民、小市民、贫民阶层在民众斗争中达成的初步的合作，取得了革命大体上的成功。民众斗争也通过革命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但是，在反封建的基本课题中，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一项没有实现。最大的反封建成果——推翻专制君主制，也因袁世凯掌握政权而未能完全成功。当然，也就没能实现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中国的目标。在辛亥年开始的革命，到1913年过早地以失败结束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没有使“农村发生大的变动”，这是失败的最大原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不懂得镇压反革命”，^①也没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并进”，注定了革命要失败。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辛亥年开始的革命完全终结。辛亥革命告诉中国从民众到统治者的一切阶级、阶层的人们，要为实现这个被迫选择的理想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而起来行动。民众和革命派也初步认识到、提出并部分地实行了反帝、反封建这个基本课题，取得了废除专制王朝的巨大成果。但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没能最终完成这些课题而失败了。只要推翻清朝，一切就会解决——革命派的这个幻想破灭了。然而中国民众和革命派由此正确地认识了问题的真正所在。这个认识的发展也只有通过推翻清朝的革命实践才成为可能。只有继续革命，才能实现辛亥革命提出而未能实现的理想。中国的现实是，只要存在理想和课题，就应该变革，就要为完成“辛亥未竟之业”而继续努力。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只要承认失败，它就能成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

^① 参见《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中国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从远处说，是鸦片战争以来进行的斗争。但是，“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了开始了这个革命”。^①“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1925年，孙文在他的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所说的“现在，革命尚未成功”的这个“革命”，是从辛亥以前开始，到辛亥以后仍然继续的同一革命。

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念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③列宁的这一期待和预测实现了，在高举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纲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译自《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3集，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2月。

张 哲译

① 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② 参见《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③ 参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

辛亥革命中 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Ю. М. 加鲁什扬茨

马克思列宁主义高度评价各国人民生活中的各个革命时期，是因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①正是在这种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不遗余力地发挥了直接作用”，^②各个战斗的阶级显示了真正的本质。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著作中，中国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列宁所倡导的方法论对解决中国1911年革命的诸多重要问题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方法论的实际内容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列宁提出了关于导致辛亥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冲突问题。但他所指的不单单是基本的阶级对抗。各个社会阶级，包括统治阶级，通常并非是一清一色的。这些阶级的成员往往分属于不同的派别，因而产生了其他种种矛盾，使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变幻莫测。

第二，辛亥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国际帝国主义矛盾极端复杂这一情势下展开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派别分别与帝国主义统治体系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列宁在论述辛亥革命的著作中考虑到了这些内外因素。他指出，辛亥革命时期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卷第24页。

② 同上，第23—24页。

的国际形势具有独特的意义，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之一。

第三，列宁巧妙地运用关于阶级和党派在革命中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状况，分析各个社会阶级在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中的活动，揭露各党派内部极其复杂的阶级之间的勾结。根据列宁的分析即可弄清任何一个社会派别在革命中所采取的立场与其经济地位之间的表面矛盾，弄清有时财产状况相等而政治利益不一致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遵照列宁的论述，始终根据一定的史料来研究辛亥革命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中国和苏联学者通过共同的努力，终于揭示了导致辛亥革命的三类矛盾：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满汉民族矛盾。中苏学者全面地分析了上述三种矛盾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了主要的阶级冲突，并论述了阶级力量配置的根本变化。^①但对某一个阶级内部次要的、特殊的矛盾仍然缺乏研究，直到最近才揭示出中国资产阶级各个派别之间的次要矛盾。这些矛盾并不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成分的分析发现的，而是直接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推断的。所以，苏联和中国历史学家往往热衷于运用“自由主义派”、“革命派”、“温和派”和“急进派”等政治术语，而对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斗争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加以剖析。这种分析阶级斗争的方法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公式。

长期以来，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掌握基本史料，连有关辛亥革命史最重要问题的文献资料都难以解决。但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挖掘并公布了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大量史料，从而有可能论据更为充足地批驳在资产阶级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论调，以及有可能认为1911年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和明显反映。^②

^① 参见Ю.М.加鲁什扬茨：《有关中国1911年革命的苏联历史文献》，载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62年第2期，第169—183页。

^② Ю.М.加鲁什扬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有关1911年革命史的史料》，载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61年第4期，第106—121页。

我们仔细研究了辛亥革命史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冯自由、邹鲁、陈恭禄、李剑农的著作，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他们极力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包括辛亥革命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中的独特作用。首先，中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的显著特点是，无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问题，把辛亥革命描绘成主要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意识斗争。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是个例外，它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作了简略的评述。^①但是，这种评述是根据历史进程多因素论作出的，根本不考虑阶级斗争。革命，用陈恭禄的话讲，是粮食供需平衡因对外贸易逆差和人口增长而被破坏的结果。^②总的说来，陈恭禄和李剑农一样，认为辛亥革命的原因是社会政治体制不完善和中华民族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结果。^③另一些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特别是贝华，闭眼不看导致辛亥革命的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竟然宣称辛亥革命仅仅是满汉民族矛盾和中西矛盾促成的。^④

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及随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这种阶级局限性，注定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动力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反科学的方法论（在分析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时，不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是根据人们的职业特征，如大学生、官吏、军人等等来划分“阶级”的）必定会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实际上反对鉴别革命中各党派的阶级属性及其复杂的社会成分。^⑤他们认为，导致这些政党四分五裂的争斗不是阶级分化现象，而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执。

上述情况对苏联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进一步研究

①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海1936年版。

② 同上，第685—686页。

③ 同上，第657—703页；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1930年版，第2—20页。

④ 贝华：《中国革命史》，上海1936年版，第1—2页。

⑤ 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1924年版。

辛亥革命的动力和革命时期各党派的阶级属性，并遵循列宁的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所取得的成果和中国史科学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来揭露反动的资产阶级论点。

* * *

中国是在国内政治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步入20世纪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资本主义关系比以前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出现，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开始深入中国农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渐发展起来。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外国资本的猖狂入侵，在颇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是无地农民。

阻碍中国民族进步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极端霸道的外国垄断势力，它竭力支持清朝封建专制势力，即封建地主、买办所组成的阶级集团。而清政府恰恰是反动势力和政治专制的直接体现者，所以，它首先引起中国广大人民阶层的愤懑和憎恨。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人民起义期间，清政府的反民族政策异常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必然使国内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压迫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买办专政。

政治危机的成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对中国统治阶级的政策产生了影响，使各个派别之间的摩擦激烈起来。而这种摩擦也必然会在经济还是政治占主导地位问题上，在维护既存制度和国内统治地位的方式方法问题上引起分歧。临近20世纪初时，在清帝国统治阶级中已相当明显地呈现出三大社会派别。

首先是清廷实权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慈禧统治集团。

这一派与中国最顽固的封建主体戚相关，其社会基础是反动的满汉土地贵族。这个实权派对内实行反动的方针，对外实行传统的保守政策。但是，它在实施上述方针政策时往往摇摆不停，在反帝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更是如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慈禧实权派已成为外国资本推行扩张政策的工具。层出不穷的捐税（用于支付巨额赔款）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抗，对此，营私舞弊的国家机关和陈腐不堪的军队束手无策。慈禧统治集团处于民众攻击的地位，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于1900年试图把国内民众的不满引上对外斗争的轨道。这一集团已经不完全符合西方列强的心意，但仍得到它们的支持。

另一个是以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及各省督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汉人当权派，他们极力在政治舞台上压倒慈禧集团。这一派的社会基础是那些从事大规模买办活动、与资本主义投机勾当关系密切的汉族土地贵族。他们与满人发生冲突，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还因为在如何挽救和继续维护既存制度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有分歧。他们残酷地镇压人民运动，难怪人们称袁世凯为“刽子手”。这一派与帝国主义不存在矛盾，恰恰相反，他们得到外国列强的全力支持和财政援助。不过，这一派看到国内不同社会势力对满清制度越来越反对，准备对国家制度实行某些改革，但遭到满族集团的坚决反对。袁世凯派与慈禧派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似乎是满汉民族矛盾的反映。

在封建帝制发生社会政治危机情况下，有产阶级中出现了一个不满清朝君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即第三大社会派别，它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事件中已崭露头角。^①这个派别的出现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进程的特点。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地主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开

^① 参见С.Л. 齐赫文斯基：《19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与康有为》，莫斯科1959年版。

始掌握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阶层。这些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经营农产品加工业，他们与日渐崛起的民族资产阶级血肉相连，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均来自地主阶级。在当时的中国，有的人通常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大地主往往占有工业企业、矿场，等等。比如，无锡的棉纺厂老板杨宗濂拥有1,000多亩土地，筹组洋灰公司的实业家周学熙则拥有2,000多亩土地。^①外国资本几乎在中国的所有经济部门占据垄断地位，这势必会动摇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然而，清政府所推行的是与外国资产阶级相勾结的政策，限制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对清朝君主制度极端不满。^②

此外，中国资产阶级—地主代表人物认为，清政府的反动政策可能再次引起不是像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那样的“金田起义”，就是类似义和团那样的什么起义。自由派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害怕人民革命，因而要求改革，甚至要求以其他更为灵活的统治形式替代慈禧集团的专政。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宪。这个反对派主张以和平方式同清朝君主制度展开斗争，提出了“为逐步实行君主立宪和争取各省地方自治而斗争”的口号。^③在自由派联盟与清政府的立宪冲突中包含着自由派联盟与实权派的经济矛盾。

一般拥有地产的绅士、汉族国家官吏、买办（顽固保守的满族大臣集团妨碍他们行使中介职能）以及受封建帝制残酷压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清政府也都持反对态度。在这个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内部可以分为若干社会政治派系，而这些派系是由于土地贵族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农业企业或工业企业）的收益状况及其享有统治阶级特权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形成的。康有为、梁启超派系和张謇派系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的右翼，

① 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1959年版，第14页。

② 有关自由主义温和反对派的经济斗争和经济要求部分，参见B.库丘莫夫：《中国革命史纲》，莫斯科1934年版，第44—51页。

③ B.库丘莫夫：《中国革命史纲》，第43页。

而各种各样的工商团体则代表政治上不太有组织的左翼。^①

在所有反清的派系和团体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可谓是最团结最有组织的派别，他们已完全作好充当革命首领角色的准备。他们奔波策划于各省谘议局，为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领导全民族的反帝运动（抵制美、日货，要求“恢复主权”，反对铁路国有化，等等）。

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地主的所有这些派别相抗衡的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革命政党“同盟会”，它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制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纲领。

“同盟会”极力扩大政治影响，扩充会员，努力争取信徒。它想方设法把一切不满清朝君主制度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寻找与他们共同战斗的基础，而不去注意会员的阶级属性。对于这一点，孙中山所创立的、业已成为革命旗帜的举世闻名的“三民主义”使我们确信不疑。

推翻满清王朝这一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个口号把那些持反清态度的地主以及认为满族统治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的农民吸引到了党内。“民族主义”这一口号意味着建立共和政体，是从狭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角度提出的，所以总的说，也被温和的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特别是它的左翼所接受。众所周知，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炽热捍卫君主立宪的人，在他们的政治变革的各个阶段，也从不否定中国人民对建立共和政体的民主权利，尽管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人民“政治觉悟低”，建立共和政体为时过早。

“平均地权”口号的实现将能最大限度地清除农业（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基础）向资本主义演变道路上的障碍，而这样一

^① 康梁派和张謇派总的讲都代表同一社会派别的利益，但它们在政治斗争的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主要由于前者（与后者不同）处于秘密状态，并基本上不得不作为一个流亡政党进行活动。

个口号就只能为那些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毫无联系的资产阶级中最急进的阶层所接受，当然其中也包括农民在内。然而从史料看，至今还未发现一个能够实行这个口号，并在中国社会上多少有点分量的社会派别。因此，很明显，随着革命的到来，“同盟会”把全体会员的共同要求提到首位，而把有可能引起内部分歧的那些社会要求置于次要地位。^①

在当时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演变速度十分缓慢，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极其有限和阶级分化因此而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提出像孙中山的最初纲领那样急进的土地纲领，很大程度上说明革命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家跑得太远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孙中山，在认真思考西方国家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之后，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因为西方国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世界的社会危机业已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1911年革命也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重复一句，“平均地权”这一口号在辛亥革命前夕已被取消。

在中国，仍然存在着能够积极推动资产阶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真正革命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是农民，其次是城市贫民无产者。但恰恰在他们身上反映了中国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空洞无物的政治自由的口号，资产阶级上层的土地纲领，都不可能吸引农民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此外，我们不要忘记，所有党派乃至最急进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非常害怕义和团运动以后会再度出现。资产阶级革命领袖自己忧心忡忡，担心新的人民起义会再次引起帝国主义侵略，致使革命运动一蹶不振。“同盟会”纲领也未能使城市行动起来。与封建主义密切联系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跟孙中山所倡导的社会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人士和贫民无产者，以及吃尽外货竞争之苦的一般工商业资

^① “平均地权”这一口号已从《中部“同盟会”纲领》中删掉，而中部“同盟会”是在1911年7月成立的。参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集，1957年武汉版，第217—219页。

产阶级，都没有追随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积极的反帝纲领。小资产阶级，甚至连当时政治觉悟较高的贫民无产阶级阶层，都非常欢迎温和的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所提出的抵制外货的口号；他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所领导的全民族的反帝运动。

可见，通过对各个社会派别的经济要求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孙中山于辛亥革命前夕所提出的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民主纲领没有得到革命“下层群众”支持的真正原因，同时还可能使我们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基础的狭隘性，尽管参加“同盟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代表着广大民众阶层。这说明，“同盟会”采取的是革命军事策反的革命策略，而这个策略在它刚一成立时就遭到了失败。策反策略大体上建立在利用袁世凯组建的“新军”的部分力量基础上。“新军”的高级指挥官通常是袁世凯的亲信，中下级指挥官和基本士兵群众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家庭和富裕农民家庭，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与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态度一样。“新军”的各个部队，尤其是布防在湖南、湖北两省的部队被系统的革命宣传所吸引，真正成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但是，从整体上看，“新军”在革命过程中已经蜕化，成了北洋军阀军队的骨干。

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实行军事策反策略时，已经考虑到民众普遍对清朝君主制度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几乎在所有武装发动中都企图利用群众的自发斗争。它通过特殊的组织形式——反满的秘密会党，对人民群众实行组织领导。但是，这些基本上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通常由地主领导的团体，准备随时支持那些慷慨解囊的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人所共知的现象。

军事策反策略也会从精神上和体力上消耗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力量，引起失败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尖锐的派别纷争，损害革命阵营的团结。1911年前夕，资产阶级革命家及其政党“同盟会”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形。

但是，如果根据上述情况就否定“同盟会”所做的工作的巨大革命意义，或者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步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多年来，在困难的秘密条件下，“同盟会”作出了重大牺牲，表现了无比的英雄主义，始终站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前列，从政治上教育、启发民众，促使国内革命危机早日成熟。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孙中山、章太炎、黄兴、邹容、陈天华、徐锡麟，陶成章、秋瑾，以及其他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名。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真正能够切实进行民主变革的革命力量是千百万农民和城市贫民无产者。在1895年中日战争后开始的整个社会政治危机阶段，清朝君主制度的主要威胁正是来自农民一贫民运动。但是，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况是：革命的“下层民众”不可能影响政治斗争的口号和进程，更不可能制定自己的“铲除”封建主义的农民一贫民纲领。出于对旧制度的共同憎恨而与革命资产阶级团结一致的人民群众，也分成各种各样的社会派别，他们在革命进程中的行动极不一致。在中日战争至辛亥革命这一阶段，很难，也许不可能划清这一社会阶层与另一社会阶层的界限。但有一点很清楚，阶级分化在城市中已相当明显，而商品货币关系的急剧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农业的变革，给农村带来了社会分化的因素，加速了农民的财产分化。在农村，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根本对抗外，还出现了自耕农与佃农之间的尖锐矛盾。当时，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受压迫阶层，很难区分是农民运动还是与众不同的贫民运动。这些运动，即便归根结底其主要目的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完全一致，但就其起因和要求而论，是独立的，与资产阶级革命毫不相干。所以，分析辛亥革命前夕人民起义的形式及其与其他社会运动的相互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年，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并不突出。可是史料表明，地方性起义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甚至到20世纪初，（比如广西省）农民在“反清复明”口号下也接连不断地举行起义。

但农民的这种既反清王朝又“亲帝制”的情绪，很快就被地主反对派所利用，因为地主反对派极力主张在封建阶级内部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亲慈禧集团的佛教和尚，甚至反动地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群众反对传教的浪潮。农民反对苛捐杂税（清政府为支付赔款、清偿外债和推行所谓新政策方针而大抽捐税）的无数次起义，时而得到自由派地主的支持，时而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时而也得到那些通常反对国家局部性改革的反动地主的支持。换言之，农民起义远没有被革命派用来造福农民。当然，凡是农民起义开始威胁国家制度的地方，那里的起义很快就会遭到在当地地主武装积极配合下政府军的镇压。总之，尽管农民在义和团起义后元气大伤，在地方性起义中耗尽了力量，但农民的革命斗争仍然动摇了封建君主制的基础，加速了君主制的崩溃。但是，农民运动和城市“下层民众”运动的悲剧在于，绅士和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操纵了运动，诱使民众离开推翻封建主义的这一基本任务。

任何研究1911年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人，都必须了解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的真正复杂性。

辛亥革命的发展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912年春，即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12春—1913年秋，即袁世凯取得反革命的胜利时期。

揭示这两个革命阶段中阶级斗争的实质，哪怕非常概括地，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辛亥革命这一说法，是无可辩驳的论断。但必须明确，到底是哪个资产阶级派别领导了革命并从中取得了利益。

武昌起义本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策划、发动的。但是，起义后，特别是在“各省”的革命进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

级地主温和派之间立即展开了争当首领的斗争。^① 各省谘议局成了阻拦革命洪流的大坝。随着冲突的加深，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便丧失了其原有的团结，被各个社会派别所孤立；反对革命的地主离它而去；本来与社会民主义口号格格不入的“新军”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紧相勾结。到1911年末，也就是武装革命时期刚一结束，即形成两个“势均力敌”的反清派。但是，这种均势只是表面的，因为革命政权机关已落入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资产阶级地主温和派（温和的资产阶级反清派）对这种均势是支持的。他们还没有看清袁世凯与清廷争夺政权中所玩的那套把戏的意图，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摊牌。1912年初形势开始明朗化。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反对派清楚地认识到：镇压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利用既成局面，以便迫使清帝退位，并依仗外国列强业已允诺的援助和支持，积极夺取政权。

在袁世凯和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的基础面临崩溃的情况下，这两股势力结合了起来，形成了袁世凯封建买办集团与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的联盟。软弱无力的、在政治斗争中被击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孙中山于1912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竟把1911年末仅存的夺取政权的微小希望也丧失殆尽。

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的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呢？在革命进程中，人民群众本来本能地追随资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领导权为时不长，人民群众很快便被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操纵。国内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及其向外国列强求援，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人民群众结成了必要的联盟。但在辛亥革命前夕，这样的联盟并不存在，再说也不可能形成，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已分崩离析，参加政治斗争的只是一些对以往事件并不产生重大影响的派别和人士。

^① 参见E.A.别洛夫：《武昌起义和各省推翻满清政权》，载《中国的革命》（论文集）（莫斯科1962年版）。

但是，在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颁布了第一部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宪法，这个事实对中国历史以后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①

在第二革命阶段，即1912年春—1913年夏秋，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比较简单。

袁世凯与自由派结成了联盟。他上台后，一开始只是排挤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当第一次革命浪潮衰退后，即公开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泛发展的人民运动。这时，帝国主义以支持反革命势力有功要求新的特权；当年帮助过袁世凯的自由派，提出了分享权力的要求；“新军”中开始出现骚动，袁世凯对“新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撤换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军官；革命时期所特有的群众自发斗争更加发展。袁世凯把一切反动的社会阶层，包括慈禧集团的骨干，统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撕毁了与自由派的联盟，转而公开镇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把革命阵营中保存下来的队伍，主要是零星的军队联合起来，于1913年夏（仍旧没有人民群众参加）企图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冒险而无效的讨伐。^②

译自《中国的革命》(论文集)

莫斯科1962年版

吴永清译

^①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7页。

^② 在资产阶级的文献中，此次讨伐被称作“二次革命”。但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因为1913年事件的特征并不是改变革命的阶级任务，而仅仅是毫无成效地试图把政权从袁世凯手中夺过来。

资本主义的发达与辛亥革命

——以立宪派的“满洲市场论”为中心

野泽丰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名和理论

日中战争前夕，名和统一系统地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再生产结构的特殊性，提出了有名的日本贸易三环节理论，并强调指出作为第三环节的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二次大战时，名和的中国研究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采取了日中对比的形式。他认为在既不是纯粹的殖民地，又不是完全意义的近代国家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走一条单一的道路，其再生产的结构要由许多互相对立的契机交织而成，这就抓住了分析研究中国这个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着眼点。^①

(一)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工业的代表是纺织业，关于其特征，名和强调它既具有半封建性所决定的脆弱性，又具有半殖民地条件所带来的发展和萎缩两个方面。同时，名和认为中国的纺织业在国内持有原棉生产的基地这一点是其发展的有利因素。他还指出，一般来说，中国农业以分散经营为特征，而过剩劳动力的存在把一些分散经营的农民与单位面积劳动量大、利用集约度高的棉花生产结合在一起，因此，“半封建的不平等的土地制

^① 名和统一：《支那的纺织业和棉花——关于支那工业与农业关系之一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东亚经济研究》（一），有斐阁1941年3月）。

度，不仅使从事零散耕作的农民成为半封建统治下的奴隶，极端的贫困又使他们成为商品经济，并通过商品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奴隶”。他继而指出，另一方面，棉花耕作的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及现金支出很高，使得这种耕作与富农经营亦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以上两种形态的出现，是“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决定的”，但究其原因，“根本问题还在于土地问题”。^①

另外，名和还列举了几个事例：①把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作为中国纺织业的一个具体例子；②张謇等人在江苏省北部创办的盐垦业，这是一个具备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的条件，但其创办者却始终充当收租地主的饶有兴趣的例子；③日本这个同中国纺织业及棉花耕作对立、抗争的因素，其“在华的纺织业投资同满铁一起构成了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两大途径”。

（二）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如何把握它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名和把战前国际上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分为：①自由工业资本主义化说——城市大工业推进说；②与前者相反的学说。后者同前者一样，视中国工业化为必然，但不同于前者重视城市大工业，它的特点是把着眼点放在农民式的工业或者中小规模的工业上。关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名和对亚瑟·索尔多所作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亚瑟·索尔多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化应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的扩大、农民所得的增加为杠杆，根据它们的变化幅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小工业、中小规模工业的发展应该先于大规模工业。”名和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如把着眼点放在后者（即农民式的工业乃至中小规模工业）上面，则工业化的实现“存在着较大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指出，对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①“对外贸易或向海外移民，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移植、成立的事实上的条件”；②

① 同上页注①。

“政府依靠保护关税及其它政策措施，率先扶植、助长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却不具备以上条件，因为①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仅仅为国内市场服务”；②中国的国内市场被外国工业产品所占领；③中国的农业又不具备实行俄国式资本制大农业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工业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①

（三）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必要探讨一下它的对外贸易所具有的意义。通过对外贸易，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进一步加深了。也许有人会问，应怎样看待对外贸易中的榨取和等价交换等问题？对此，名和考察了孙文、何干之、马吉尔等人的观点，指出“由价值交换向生产价值交换的转化”，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进行的，而“落后的国家则构成了这个圈子的外围”，前者所具有的生产价格，“作为一种世界价格，对于它的外围亦具有制约力和支配性”，其结果就是“作为外围的后进国，在输入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业部门的产品时，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支付，而对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产业部门的产品输出，又只能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来实现，所以价值量是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作单向转移的”。其流出的价值量“如果保留在国内，则有助于国民资本构成的高度化”，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进一步说，在中国存在着下列问题：①以前保留下来的劳动量交换原则以及产品交换比率持续所带来的问题；②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问题；③普遍的低生活水准及低劳动报酬所带来的问题；等等。由此形成了国际上的等价交换。可以说，“亚洲式的中国农业及经济结构的顽固存在，一方面显示了它作为外国商品市场的局限性和抵抗性，同时也成为对外贸易不等价交换的土壤”。中国要想摆脱这种状态，在政治上必须从不平等条约

① 名和统一：《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问题》（《东亚经济论丛》二一四，1942年12月）。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要消除各种封建关系，推进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发展。^①

名和立足于上述战前的学术研究，指出，战后落后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具有两种形态，即对外贸易型和农业革命型。日本和中国的不同发展形态就可以作为这两种类型的代表来进行对比。就中国而言，必须开辟国内市场，为此，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增强农民的购买力。^②另外，对于名和提出的这一问题，还有一种见解，就是用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型（外贸型）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型（土地改革型）这两种类型来进行考察。^③

以上述可称为名和理论的观点来考察问题时，首先有必要注意名和是以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提出问题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国内市场以何种形式存在，很难确定。然而，1931年由于满洲事变带来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沦丧，1934年红军长征时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中国本土的统一，以及以1937年抗日战争为契机的向占领地、解放区和大后方的领土分化，等等，这些过程却是众所周知的。在此，让我们来看一看名和列举的南通棉业在满洲事变后东北市场的丧失中遭到沉重打击这一事实，同时，讨论一下由立宪派张謇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提倡的“满洲市场论”所具有的意义，因为这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和辛亥革命的关系问题的一个线索。

二、南通棉业和东北市场

我认为，30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的危机，在产业方面表现为民族工业的极度衰微和农村的破产，在贸易方面表现为对外贸易

① 名和统一：《后进国支那的对外贸易问题》（《大陆》1941年10月号）。

② 名和统一：《日本资本主义和贸易问题》（黄土社，1947年）。

③ 小川雄平：《后进国家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经济学杂志》66—4，1972年4月）。

的急剧减少和国内商业的衰退。而中国国内贸易衰退的自身原因有以下几点：①中国东北地区的沦丧使中国国内市场缩减了1/3；②交通事业的落后和各地捐税负担过重，造成了国内市场的割据局面；③法令不统一；等等。①由此可见，由于交通、捐税及法令等因素，在中国，国内市场一般带有很强的割据性，而中国东北地区的市场相对占有很大的比重，因而1931年满洲事变带来东北市场的丧失，使中国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而构成中国民族工业中最重要部门的棉纺织业的危机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①日本在华纺织业的扩张；②和依存于海外市场的生丝、绢织业不同，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棉纺织业，由于占其市场1/3的东北市场的丧失，蒙受了极大的打击。②因此谈到东北市场的丧失，中国纺织业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满洲事变以后，由中国内地向中国东北地区输送的商品，例如西北诸省的特产和江苏省产的土布等等，大大减少。③据《民国宝山县续志》第六卷“实业志”记载：“自沙船（中国帆船）衰落，土布之利益为日本人所攘，产额亦因而缩减。”不过，沙船衰落的现象早已出现，据《光绪松江府志》第五卷“风俗”等记载，鸦片战争前，被雇佣的船有3,000多艘，而鸦片战争后急剧减少到二、三百艘。在江苏省的土布业中，南通的土布业占有很大的比重，据1932年6月刊行的《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1期的报道：“沪埠经营国产纱布之商号的40余家，纱布来源全由南通、海门两县运来。每年销售于东三省者，20余万匹。近自九一八事变发生，运销东北三省的纱布，骤自20余万匹减至3、4万匹，几如绝迹。”关于南通土布业的状况，幸好在满洲事变前的1930年11月刊行的《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2期上载有《南通土布业调查，附海门土布状况》一文，从中可以了解南通

① 《中国国内贸易的衰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1集，贸易、生活书店，1934年）

② 石风涛：《中国棉纱业之危机》（同注①，“工业”）。

③ 同注①。

土布业的发展变化。根据这个调查可以得知，在清朝末年，南通土布南面销售到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北面销售到营口（牛庄）、大连、沈阳（奉天）、哈尔滨以及省内各县，每年营业额可达数百万元。然而民国以后，营口受到日本机织棉布竞争的影响，加上南方受到国产品的抑制，省内治安又混乱，销路大大地减少了。

南通布庄，根据销路分为关庄、京庄、县庄。在东北各地及南方诸省拥有销路的关庄在百数十家布庄中，不过占16%，但其资本规模却是最大的。南通关庄由上海的“掮客”从中周旋，同东北布商派往上海的庄客进行间接交易，这是因为东北布庄在3、6、9、12四个月里分别向上海“掮客”付款，而上海的“掮客”在交易决定20天后（后来是10天）就向南通的关庄支付现金，这对南通关庄是很有利的。所谓关庄大布被包装以后，在商会领取“免税单”，同时缴纳若干地方捐，用轮船公司的汽船运到上海，由“掮客”出售。东北布商向常关报告以后，雇帆船将货运到营口，再从这里运到东北各地，靠帆船运输不仅花费时间长，且有风浪和海盗的威胁。但用汽船运输，则要被课以海关税，所以仍要使用帆船。

如上所述，满洲事变以前，在南通农村，无论男人还是妇女，只要有一点点空间，就要架起织机来织布，或是坐下来用纺车纺线。即使在农忙时期，也要从早到晚不停地织布，顺利的话，3天就能织出通州大布2匹，赚到19余元钱作为一个月的额外收入。然而满洲事变以后，农村再也听不到织布机器的声音，城里的布庄也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了。①结果，一般妇女也不得不放弃纺织工作，推上独轮车，或是挑起很重的货物，从事不亚于男人的体力劳动。②在南通、海门两县，靠纺织业谋生的据说有60多万人，而满洲事变的第2年，由于停机，约10万劳动者失

① 镜升：《南通棉花和通州大布》（《申报月刊》4—8，1935年8月）。

② 郑康伯：《南通的妇女生活写真》（同上，4—7，1935年7月）。

业，民众的生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①

东北市场占中国国内市场的1/3的说法是否准确不能确定，但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众所周知，中国东北部是清朝的发祥地，一直采取封闭政策，但却阻挡不住内地由于人口众多和灾害频发而大批难民流入东北的势头。尤其是1897年中东铁路修筑、1903年开始运行以后，汉民族开始大规模地向东北移居。1900年前后，南满约有人口300万，北满约有150万。到1926年前后，南满的人口达到约1000万—1300万，北满人口达到1300万。南满总共增加人口5倍，北满增加了8倍。这些移居者大多是河北、山东人。1927—1929年，由于战争、匪患加上天灾，从这些地区流向东北的移民急剧增加。^②然而，1931年满州事变的爆发一度抑制了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尽管这些移民当中包括铁路、矿山及其它行业的工人，但大部分人依然是从事农垦业的，他们的定居地从辽河下游开始，逆流北上，遍及东满和北满以及“塞外的蒙古地区”。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内地的杂货商也来到东北地区，开始贩卖锄、锹及棉布、鞋子等手工业产品。后来，烧锅也被传到这里，从而兴起了高粱酒酿造业。同时，商人和业主开始向农民发放高利贷。此后，山西的钱庄、山东的油房及粮栈等也相继打入。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东北地区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开始解体，一方面，“轻而易举地为诸生产手段集中在商人资本和信贷资本手中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东北提供农产品，内地提供各种手工业生产手段和生活必需品，从而实现了“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③

如果按照大上末广的见解，那就是以“把封建性的零散经营作为支配体制的农村社会”为基础，在制铁、采矿等重工业部门和烧酒等特殊的粮食生产部门，来考察制造工业的形成，“尽

① 《工商半月刊》4—11所收的报导：“东北国产纱布销路减少”。

② 朱俊：《满州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25—12，1928年6月）。

③ 大上末广：《满洲社会经济史诸问题》上（《东亚》1934年10月）。

管农村已在可能的程度上实现了阶级分化，工业也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国内市场也即将形成，但是作为初期制造业生产形成的唯一标志的纺织业，却终究没有达到工厂经营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满洲的社会生产分工的形成使它趋向于专门为国内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加工，从而隶属于当时在中国社会占有支配地位的批发制乃至工厂制工业产品的贩卖市场”。中国东北地区对于内地来说，“在向早熟的封建殖民地化倾斜时，是沿着畸形的方面发展的”。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营口开港，中国东北地区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环，然而大上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那种畸形性没有得到改变，而是得到了强化和固定。^①

关于东北的棉纺业是否果真停留在大上先生所讲的那种状态，有必要讨论一下。第一，如大上先生所说，清朝嘉庆年间（1696—1820），“满洲和内地社会生产分工”关系形成过程中，中国内地的棉织业压倒了“还停留在农村家庭劳动领域”的东北棉织业，而它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第二，营口开港后，中国的东北地区在受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洗礼的情况下，同内地的社会生产分工呈现什么样的变化形态？关于这两点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因此，关于南通棉织业的发展，有必要以外国棉纱（洋纱）或是张謇的大生纱厂的棉丝（机纱）混织的新土布生产为界限分两个阶段来加以考察。

第一阶段，“通布故以粗原行于奉天且百年”，^②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直隶通洲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家有机杼，户多篝火，用一人劳作织成的布、带、手巾等换回粮食，足以养活三口人。若有三人劳作，则足以养八口之家。”*虽然这是副业性质的，但毕竟包含了一定的商品生产。第二阶段，进入1880年代以后，外国机织棉纱布大量流入东

① 同上页注③。

② 《致沈敬夫旧牍跋》（《张季子九录》文录卷八之一二）。

* 未查到原文，此处为译者直接译自日文原稿。

北市场，“东三省销行之布，通为大宗，受害之方面，视占利之方面为比例也”。^①因而，“近来外洋纺织机器盛行，洋纱洋布销路广，本纱土布去路滞减，乡人穷极思变，购用洋纱纺织大小布疋线带，以及洋纱倒灌内地日甚一日”。^②这里所说的“销路滞减”主要是由于东北市场的变动造成的。东北市场的这种变动，促使南通土布业使用外国机制棉纱。外国棉纱的流入，“现在通海两境每日可销棉纱二十大包，已合机器一万锭之数”。^③这一项开支“每年消耗四十余万两金”。^④由此可以看出，张謇设立大生纱厂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阻止外来棉纱的流入，换言之，即“杜塞外洋漏卮”。^⑤在此，“以本地所出之花，用本地习纺之工，即以纺成之纱销行本地及邻近洲县”，^⑥从而考虑到确保原料、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无论如何，以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各项事业与南通土布密切相关，且与作为南通土布销售市场的东北地区密不可分。

三、清末立宪派的“满洲市场论”

日本正式向中国东北出口棉花，是以1906年棉布出口工会的成立为契机，经过激烈的降价竞争，到1910年日本产粗布凌驾于英美产品之上时才得以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东北部出口增长的势头，这一点从附表所反映的日本对中国棉布出口的价格变化中即可以作出判断。据1915年12月发行的《农商公报》第17期上所登载的“准税务处改定土布进口税

① 《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书》（同上页注②）

② 《十二月初八日商董潘、郭、樊、沈、刘、陈遵办通海纱丝厂禀》〔《通洲兴办实业章程》上“商办本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

③ 同上。

④ 《十二月二十八日南洋张奏片》（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注②。

率通常遵照由”可知，由于1914向安东出口的日本棉布的数量是往年的10倍，而靠汽船、民船运到营口的中国土布却逐年减少，因而，江苏省的通、海、崇、泰总商会一面停止民船运输而改用汽船，一面谋求改变税则以减免税收，并对各布厂进行改良，使用机器织布以降低成本。由此可以看出日、美、中三国于1911—1912年间围绕对东北地区的棉布销售所展开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来考察与棉布贸易有很大利害关系的张謇等立宪派提出的“满洲市场论”以及他们采取的一些相应的政治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同属立宪派的熊希龄和张謇的观点。

熊、张二人，前者于1892年，后者于1894年作为进士进入翰林院，进而又都官居高位，但后来两人却又分别回到了湖南、江苏老家，投身清末政治变革的浪潮中去。两人与戊戌变法的关系，熊希龄较深，张謇稍逊，但亦有瓜葛。戊戌政变后，熊希龄在日本避难数年，张謇则埋头于在1896年起开始筹划，于1898年开工的大纱厂的经营之中。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熊、张二人作为立宪派的核心人物重新活跃起来。熊希龄当时正在日本避难，因而属于保皇会后身在海外发起的帝国宪政会（以及新闻社），张謇则属于国内声势最大的预备立宪

附表 对中国棉布输出价格
(单位：元)

年 度	价 格
1908年 (明治41)	4,534,201
1909年	6,727,632
1910年	10,078,043
1911年	35,422,564
1912年 (大正元)	45,757,948
1913年	60,095,834
1914年	58,508,201
1915年	50,119,777
1916 (大正5)	56,146,918

注：据《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
222—293所载“年度输出棉布
国别3年对照表”的表12—21。

会并在该会中居于领导地位。^①后来两会联合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于1909年展开了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该会与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一起，成为当时的两大政治势力。同志会和联合会在组织及人员构成上互相重合，但联合会包含了各行各业的团体和个人，因而组织范围比较广泛。1910年，国会请愿活动遭到禁止，同志会名存实亡，联合会则把目标转向辛亥革命，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同时，联合会内部分化成激进派和稳健派，熊、张二人均属稳健派。他们在辛亥革命中采取共同行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一个月之后的11月13日，汤寿潜等人联名打电报赞成外蒙古共和，明确地表示了要实现共和的意向。另外，11月5日，苏州宣布独立，程德全任都督。11月13日改组江苏省谘议局，开设临时省议会，张謇被推举为议长，熊希龄则就任都督府的财政司长。^③接着，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张謇任实业部长。而后，他以对革命派排挤、攻击熊希龄等立宪派人物不满为由，辞掉了这一职务。袁世凯政权在北京成立时，熊希龄就任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部长。继而，二次革命之后，熊希龄内阁成立，张謇就任农工商部长。由上可以看出熊、张两人的密切关系。

1905年，熊希龄以端方随员的身分赴欧美考察，归国后参与了各省的农工商务及财务治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手下管理财务。他在自己编辑的《满洲实业案》（三册四卷）中，以前奉天农工商局局长的身分撰写了序文，赵尔巽以盛京将军身份撰写的文章也被收入该书。赵尔巽从1905年起作了七年的盛京将军，这期间，熊希龄任奉天农工商局局长，《满洲实业案》集中反映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政绩。该书

^①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4月），第320—321页。

^② 同上，第468页。

^③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10月），第226页。

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为“满洲实业案”一卷，中册为“日本工业调查录”一卷，下册为“美洲农务调查录”及“旅大商务调查录”二卷。中、下册分别包括①人工开发满洲物产；②以新法开拓满洲沃野；③有关满洲商务诸问题等内容，颇有参考价值。上册除汇集、收录了欲开设农工商局、农会、农业学堂、农业实验场、商品陈列所等机构的上奏文、规则、预算表以外，还收录了有关开垦、村改、河流改造、商务调查等方面的文献。下面主要就这些文献进行考察。从总体上说，这些文献所体现的主导思想，正如赵尔巽在“奉省设立农工商局折”中所强调的，在于“以实业而挽利权”。而提出这种主导思想的背景是，当时，欧美列强采取“以实业同盟行其武装平和之政策”，眼光紧盯东亚，而中国则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尤其是东三省在日、俄战争后，“以条约开为商埠”，这样一来，各国列强都虎视眈眈地盯住这个地方。因此可以说，以上主导思想的提出完全是基于对现状的认识；同时，也是基于危机感的存在。^①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当然需要政府制定政策，以促进实业的振兴和主权的回收。在此，①地方当局的作用；②开垦、移民；③国内贸易的推进这三点成为关键性的问题。第一，“奉天农工商局呈军督都堂公文”指出：“奉省风气未开，民智幼稚，一切庶政非官为提倡，则皆裹足不前。”且“无论东西各国，凡初兴实业之时，未有不由其政府之诱导奖励以致今日之富强也”。因此，有必要采取下列措施：①改进行政，以增加人民的福利，在这方面可采取制定关税政策、奖励补助、建立模范工厂等办法；②分别优劣、改良实业，可采取振兴民业、举办国内博览会等措施；③规定限制，以防投机；④广招人才，以备官民咨询之用；⑤充实经费，以谋求机构的完备；⑥联络各局，以利事务上的协

^① 对这一点，还有一种见解，就是从与权利回收及抵制外贸运动的关系来考察1905—1908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李时岳：《论1905—1908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人文杂志》双月刊，1959—1）。作为全国性波动的一环，无疑有必要对中国东北部的动向也进行考察。

调配合；⑦规划交通，以促进各业的发达；⑧订立制度，明确权限。

值得注意的是，日俄战争以后，在日本把满蒙战略作为战后经营的重要一环开始实施的时候，清朝的一些高级地方官也已开始对上述措施的实施加以探索。熊希龄在“东三省善后意见书”中指出：“是列国对峙之中，断无一国可以孤立图存矣。”作为联合的对象，“由日，而英而美，其一定之顺序也”。但是“联日”的方式从根本上讲是“人民之亲睦，攻守之同盟，关税之协定”，而“不能于土地人民统治权有丝毫之让步也”。因此，制定了在外交政策上打破势力范围之说，在对内政策上完善地方自主权，在实业政策上发展经济行政力量的三大政策，以求得各国保持对东三省的势力均衡和永久中立。

第二，熊希龄在游历欧美过程中，注意考察各国的开垦政策，他在“致金还叶景葵论东三省开垦书”中指出：“凡未庶之国，道在移民，如俄罗斯、墨西哥、美利坚是也。既庶之国，道在殖民，如英吉利、德意志、意大利是也。”也就是说，前者“则以本国为挹注”，后者“则以他国为尾闾”。那么东三省的情况如何呢？与每一万平方公里人口四、五百万的河北省不同，东三省每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万，“地广人稀”，因而，在那里组织团体比较困难，地方自治制度亦难建立。而当时它又正处在日、俄迫近的情况下，这好比是一盘围棋，如果没有棋子把守四角，那么，对手必定会进入你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于东三省的开垦，必须注意“似宜统筹全局，预定政策”，并应以“移民之制其最先务也”。大致说来，各国移民方法有二：一是官方主导，日本北海道开拓使实行顿田兵制度就是一例；二是民办官督，例如在美国、墨西哥等国，中央政府设移民局，奖励国民移住开垦。在土地面积10倍于北海道的东三省“振兴农业，以求富庶实为最要政策”。然而，①“惟闻奉天工人多属山东土著，春至冬归，习以为常，致使该地永无繁殖之望”；②“又闻目前马

贼未靖，人民必须有自卫之能力”，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必须利用移民或屯田兵等制度来加以解决的。

第三，关于在国内进行贸易的问题，“奉天出入商货皆以上海为转运枢纽，实与华产销场有密切之关系”，为了采取与之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必要通过调查，全面掌握有关情况。为此，熊希龄委托在商业学堂任教的日本人同上海商务总会商议了调查方法等问题。由于没有统计报告以及当时实行保密主义，历尽周折，总算了解了大致情况，而且反映在熊希龄的两次“调查营、沪商务禀”中。在上海与营口的交易中，从奉天输出的物品，以豆油、豆粕为主；输入奉天的货物则以沙布、纸和小麦粉为主。这些物品大多靠沙船运，30年前沙船数量为3,000艘，而到此时只剩下50余艘，日俄战争前后中国商业的疲软现象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华商们被招集起来，共同商议善后之策，遂一致主张采取在大连设关以制约洋货商、在市场减税以扶持土货商的措施。而在“振兴商务，抵制外贸”上有补助和保护两种办法。“补助在贴息以扶其成立，保护在减其税以轻其成本”，总之，在当时，“救急之法，惟有于沿海六省华货竭力招徕，使之进口之多，价值日廉，以抵御外货之输入”。为此，应采取补助和保护并用的政策。

在奉天与上海之间的商业关系上，有五大障碍亟待消除：①由于大连被日本占有，未设海关之前，日本商人将无税货物带入中国，从而排挤了上海的有税货物，掠夺了市场。②日本人使用东三省的原料，开设了各种工厂，使华商失去了营业的机会。另外，日本人还将美国的商品从横浜运到大连，从而使上海、营口的商人以及横浜的华侨因此失业。③日本人仿照以布匹为主的各种商品的规格和商标，并把从食品到玩具等国内需要的各种物品，统统搬到中国，以供日本人购买。④由于度量衡不统一、纸币种类杂多而带来的损害。⑤各国政府都对本国商人进行鼓励和保护，而中国商人却既得不到国家的保护，亦不能从同行业的各

种组织、团体中获得任何利益。为了消除以上障碍，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减轻厘金；迅速开办模范工厂，并“利用机器取代人力”；在各埠设立劳工局，为移民提供方便。

以上介绍了1906—1907年前后立宪派中提出“满洲市场论”的代表人物熊希龄的见解。在赵尔巽之前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于1910年11月17日上奏的“遵旨密陈东三省大局应行分别筹办情形折”，^①不外乎是对熊希龄见解的一种敷衍。其奏文由四项内容构成：①将东三省既设之各津关一律裁撤，变为无税口岸；②修改东三省的通商条约，允许各国商人杂居；③东三省的矿产、森林同样允许各国商人设立公司，招股承办；④举借外债，用于移民开垦。以上措施大体上沿袭了熊希龄在1906—1907年前后的观点，但也有新的因素，即强调吸收外资的紧迫性这一点。熊希龄还曾呼吁：“朝鲜已遭吞并，满洲更加危急，非大变政策则无以救亡图存。”随后兴起的东三省各界绅民万余人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即与熊希龄的呼吁有关。^②

下面再来看一下张謇的观点，1906年日俄媾和后，张謇亦感到中国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于是，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注重立宪，提出了“中日较近，宜法日”和“试行宜即从东三省始”的令人瞩目的主张。^③而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张謇的一般感受有关：④1882年爆发了壬午军乱，在吴长庆的部队即将出兵朝鲜之际，张謇曾向吴的幕下提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当时他的建议如果被采纳，也许就不会有日俄战争、立韩、废韩之议，以及东三省所出现的危机了。同时，张謇的这一主张也与熊希龄对满洲加以赞誉的见解相一致。熊希龄在《满洲实业案》序文中写道：“乙

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所收。

② “奉天全省各界绅民因时局迫不及待呈请代奏明年即开国会以救危亡折”，旧历11月6日（同上）。

③ “为时政致铁尚书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④ “为东三省事复韩子石函”，1911年（同上）。

末奉调赴沈，深察满洲幅员之所辖，吾向所称为天府之国者，良不为虚。”1911年张謇在韩国钧的信中^①还写到“今日除大借兴垦实边，宁有他种奇策！”在政策上，张与熊的见解是大致相同的。在同一封信里还有这样的记述：“秉三昨已入都，大约非得东三省借款事成，将不复去。”对熊的这一行动，张謇表示支持。在这封信里，张謇还预告他将于旧历4月上京，大约是特意将此行安排在熊希龄在京期间吧。

张謇次次上京，名义上主要是受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处总商会之托，向政府陈请聘请美国考察团一事，以及禀陈中美间曾商定的银行及航运之事，但实际上他的这次行动在其后不久爆发的辛亥革命的进程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①张謇于6月8日（旧历5月12日）进京，途中与在彰德隐居的袁世凯讨论了时局。^②受到摄政王载沣、庆王奕劻的召见，在外交方面，分析了因修改伊犁条约而引起的对俄关系的紧张问题以及1913年日英同盟的改订和1915年巴拿马运河开通前夜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强化；在内政方面，强调应促进立宪和振兴实业，并阐述了建立与美国的联盟是外交上最重要的政策的观点。^③③奔赴东三省，远至哈尔滨乃至齐齐哈尔，就林业、开垦、航运等各项事业进行了考察。关于张謇等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动向，拙作《辛亥革命》（岩波新书）中另有记述，这里暂不涉及。但作为立宪派活动的背景，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围绕东三省问题，日、美、中三国之间的瓜葛所带来的影响，再就是与辛亥革命前夜中国东北部安奉线改建问题上的排斥日货运动相关联。张謇强调应实行棉铁政策，认为产业基础的扩大自然会消除硬性的“抵制”，因此可以说，张謇等立宪派的活动反映了寻求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向。

^① 同上页注④。

^② 《辛亥5月17日召见拟对》，1911年（同上）。

四、民国初期“满洲市场论”的展开

在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浪潮中，受袁世凯组阁之托的张謇推举熊希龄组阁，在9月成立的熊希龄内阁里任农林、工商总长。翌年2月，该内阁倒台后，他继续任其职。1915年3月，袁世凯复辟帝制逐渐明朗化，他遂辞职，回到南通，专心致力于乡村自营企业。在此期间，张謇以“农商部之责任，首在增订法律”^①的观点，除了公布以工商保息法为首的很多法令之外，还建起棉、糖、林、牧等各种实验场所，并试图进行度量衡及盐政的改革。此外还主张兴修水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垦植计划等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面介绍了60年代围绕对张謇的评价在中国展开的争论。^②在这里，人们认为张謇参加过袁世凯政权，表明他已转变为官僚资本家，因而他所具有的一定的开明性、进步性逐渐地消失了。^③此外，张謇在清末提倡并在就任农商部长时一度坚持实行的棉铁政策，在客观上符合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被认为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④张謇任农商部长时期制定的各项法令具有一定的体系性，而这种体系性是以棉铁主义为基础的。所谓棉铁主义就是对在中国外贸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棉和铁问题上“则惟有并力注重输入额最高之物，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铁厂是”。^⑤

在这些法令中，特别是垦荒和植棉条例的制定，掀起了民国

① 《为公司条例商人通例飭法制局提前审查以策令公布呈》，1914年（同前，政闻录卷七）。

② 拙稿：《中国企业史研究的特质》（《商业论纂》12—3、4合并号《中央大学商学部60周年纪念论集》第2分册）。

③ 章开沅：《论张謇的矛盾》（《历史研究》1963—3）。

④ 谢本书：《论张謇实业活动的目的》（《经济研究》1966—1）。

⑤ 《实业政见宣言书》，1913年（《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初年的开垦热潮，长江周围200英里地带，盐垦公司相继成立。^①民初张謇等提出的“满洲市场论”，即可作为促成这个开垦运动的一环来进行探讨。清末张謇主张进行开垦，强调^①“垦种以有关于纺织之棉花为最要，杂粮次之”；^②“而土无旷废，民有事业，又自治之首务矣”，^③如前所述，强调在中国东北部进行“兴垦实边”的边境防卫。民国初年以后，这种观点继续得到强调。

关于中国东北部，如张謇所述：“东北、西北边陲荒地，迤邐绵亘四、五千里。格于前清苛禁，废而不殖，为左右强邻凝视久矣。近则风云变幻，且有乘欧战未定之时机百计以图我者。”^④因此，民国初期，张謇对日俄继续持对抗态度，对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另外，^①“吉黑荒地，非大农不足以收宏效”；^②然大农法，必有一金融机关，为之后援”。^⑤这两种看法也同他在清末时的观点相同。由此观点出发，张謇对黑龙江省汤原县地主蒋汝藻、郑润昌的做法表示赞赏。蒋、郑二人采用大农法进行土地开垦，同美国人做经理的东益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以中国为地主，以美国人为代垦人，二者纯系雇佣关系。”正如60年代围绕对张謇的评价展开的争论中所提及的，张謇从清末时期开始就一直坚持亲美抗日的态度，这也表现在和外国资本较少发生关系的大生资本集团的变化当中。^⑥还有一点，就是关系到国内贸易的问题。清末时期就有人提出了土布免税问题，而有关建议到1914年才被提出，其内容就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推销土产品的极好机会”。由此看来，“满洲市场论”的观点，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并没有本质性的变

① 日棉资第7辑《江北盐垦植棉事情》，1939年。

② 《上度支部苇荡营开垦后说》（《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③ 《为时政致度支部尚书泽公函》，1909年（同前）。

④ 《条陈开放蒙地破除旧例另布新规呈》，1914年（同注②，政闻录卷八）。

⑤ 《为东三省垦务致朱省长函》，1914年（同注②）。

⑥ 章开沅：《论张謇的矛盾》（《历史研究》1963—3）。

化。这与民初北洋政权的性质及辛亥革命时中国东北部的政治变动的结果有关，但是，象清末时熊希龄和张謇那样的关系，到了民国初期却找不出直接与之相应的事例来。

张謇在民国初期的土地问题上主张应“先行整理官荒”，^①并提倡仿效各国不向边远地区的承垦者收取地价的“无偿主义”的作法。^②在辛亥革命的激烈震荡中，在土地所有问题上存在着发生大变动的可能性，尤其是官有土地的归属成为令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大上末广认为“土地整顿和地租改革是市民进行社会变革的基础”，他把中国东北部发生的变化作为问题来探讨，^③认为这里的变化“仅仅停留在各种封建关系的单纯的形态推移即变化上”，因此，旧东三省的政权同清朝一样，其本质仍停留在“封建的绝对专制主义”上。对张謇等人所进行的开垦事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④但对其在东北所起的作用却没有明确的结论。

五、结 束 语

在中国围绕着对张謇的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中，人们一般认为，张謇的一生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他的爱国心尤其强烈地表现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展开的市场争夺上。^⑤当然，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后对美国抱有幻想，对于这一点应给予批判。但是，他最初的企业活动的出发点以及后来的政治活动的落脚点毕竟是在棉纺织业上，因此，把“满洲市场论”看成是包含着一定的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倾向的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辛亥革命的发

① 《请先就淮北苇荡淮南场垦荒并分简专员呈》，1914年（《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八）。

② 《致东三省民政长会商林垦事宜要旨函》，1914年（同上）。

③ 大上末广：《满洲社会经济史的诸问题》下（《东亚》1934年11月号）。

④ 《1962年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的“对张謇的企业活动应该如何估计”）。

⑤ 章开沅：《论张謇的矛盾》（《历史研究》1963—3）。

展过程中，在日本，尽管朝野上下都很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但令人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张謇等立宪派的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矢野仁一等鼓吹的“满洲不属于支那”的论调在作怪；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日本很早就存在一种不全面的观点，即如战后岩村三千夫所著《民国革命》（社会构成史体系）那样以恶人袁世凯、善人孙文这种对立关系来考察辛亥革命的观点。

尽管中国东北部在中国革命中占有相对重要的位置，但是它无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划分），在认识上所占的比重都是较轻的，例如孙文就曾提出“满洲放弃论”，抗日战争前夕又出现过“北方落后论”，等等。在这一点上，张謇等立宪派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出发对中国东北部的系统认识，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译自《中国近现代史讲座》，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8年8月版。

张海英 李协京译

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

藤井昇三

前言

- 一、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与“亚细亚主义”
 - 二、辛亥革命以后至1918年
 - 三、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之质变
 - 四、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讲演
- 结束语

前 言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1/4世纪里，在中国革命中孙中山所担任的角色，可以说，辛亥革命以前，是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以后，是为建设民主共和的中国而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领导者或积极参加者。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开展过程中，经常对中国革命与列强的关系持强烈的关心，尤其是持续不断地摸索对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列强侵略亚洲的对策。这里就存在着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得以产生的原因。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试图阐明孙中山初期的“亚细亚主义”有哪些内容，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哪些变化，晚年的所谓《大亚洲主义》讲演时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是怎么一种

情况。

“亚细亚主义”（以及“大亚洲主义”）的概念有着极多的含义，根据论者的见解，此概念的内容颇为不同。^①我想对“亚细亚主义”概念规范一下，即亚洲各民族、各国家团结起来对抗欧美列强压迫与侵略的思想或运动。这是“亚细亚主义”最广泛的定义。在日本论述“亚细亚主义”时，每每含有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各民族的团结，或者日本侵略等膨胀主义行动的意思，这种情况下的“亚细亚主义”多被称为“大亚洲主义”。

一、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 与“亚细亚主义”

孙中山革命运动初期的“亚细亚主义”主张，在他于1897年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初次与宫崎滔天见面时所叙述的下列言论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孙中山说：“拯救中国四亿的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②其后孙中山也曾数次谈到，为防“西势东渐”，复兴亚洲对抗欧美列强，要矫正世界人道之不平等之类意思的话。

此外，1899年菲律宾独立运动时，孙中山与犬养毅、宫崎滔天、平山周等一起，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很明显这一援助行动是以“亚细亚主义”为基础的。还有，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约定支援越南独立运动也值得注意。^④

① 关于“亚细亚主义”概念的定义，可参考下列各例：野原四郎的《大亚洲主义》（《亚洲历史事典》，第6卷，平凡社，1971年第7版）第6—7页；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筑摩书房，1963年），第7—63页；初濑龙平的《内田良平研究的视角——右翼·法西斯主义·亚细亚主义》（《北九州大学法政论集》，5卷2号，1977年12月），第119—127页；初濑龙平的《传统的右翼内田良平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19—28页；拙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讲演与日本》（《海外事情》，26卷8号，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1978年8月），第41页。

②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福永书店，1926年），第130页。

③ 拙著：《孙文研究》（劲草书房，1983年），第19—21页。

④ 久保田文次：《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野泽丰、田中正俊、久保田文次、姬田光义、吉泽南、高桥孝助合编《中国近代史讲座》第3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245页。

这样，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及其一派已经对亚洲诸民族解放与独立有了强烈的联合思想，而且已经开始步入实际行动的阶段。

二、辛亥革命以后至1918年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仍然坚持“亚细亚主义”思想。

从1913年2月至3月，孙中山首次以宾客身份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时，孙中山与首相桂太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①桂谈到，为了排除英国强加给亚洲的压力，“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②关于此类“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③孙中山与桂太郎相互有深刻理解。

又，在此次访日期间的3月1日，在大阪土佐堀青年会馆举行的基督教团体主持的讲演会上，孙中山提出，亚洲各国应加强国力抵御欧美野蛮的文明主义、帝国主义，中日两国提携以保卫亚洲的和平，他说：“让亚洲人治理亚洲！为实现大亚洲主义吾等有赖于各青年会力量之处甚多。”^④这里孙中山所谈到的“大

① 与孙中山同行的戴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1890—1949）担任翻译。据戴氏的著作《日本论》所说，“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后，那时他（按指桂太郎。——译者）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他故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戴传贤《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第93—94页。〕

② 同上，第97页。

③ 同上，第94页。

④ 孙中山讲演的要旨如下：“本来日本的文明系统与民国同基础，然而近数十年来乃借弥漫欧美大陆的帝国主义，尽全力扩张武力，非爱国心之结果，现今为保全其国于东亚，事实上它不得不受其帝国主义之压迫，然而东亚各国的国力如达到完全增进的地步，则欧美的帝国主义不足畏。若中日两国能提携保卫东亚和平，则欧美应该称之为野蛮的帝国主义也无法施加帝国主义压力，得以维持其和平，使东亚能进步是防备东亚的最好方法。所谓东亚的进步就是世界的进步，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青年会负有重大使命。让亚洲人治理亚洲！要实现大亚洲主义我们有赖于青年会之处甚多。”（《大阪朝日新闻》，1913年3月12日）

亚洲主义”的内容，表达得未必十分明白，但可以认为大体上包括排除欧美帝国主义、日中提携、亚洲人的亚洲等内容。

1913年7月，为了打倒袁世凯政府的专制政治，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由于占压倒优势的政府军的武力的迅速镇压，孙中山于8月流亡日本。至1916年4月为止将近三年的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重新建立革命派组织，与日本的政治家、军人、实业家等频频接触，发动他们援助革命。其间，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加强了“亚细亚主义”的主张。例如，在1914年7月8日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谈到“将来世界的战争最终是黄白人种之争，我是期待中国与日本如同一国之和平以筹东亚之和平者”。^①又，孙中山在8月24日与犬养毅会晤时说：“东亚问题之解决方法最终只能是人种问题，故黄色人种必须团结一致来对付白色人种。”^②这些言论都显示出，以“黄白人种斗争观”为思想基础的“亚细亚主义”强烈地植根于孙中山的对外思想之中。但必须同时指出，在孙中山对国际关系的见解中，对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的国际政治动向的批判也占有重要位置。即对当时的孙中山来说，当前最大的课题是通过打倒袁世凯政权来建立革命派的政权，为此，孙中山在这个时期的战略目标，是排除支持袁世凯政权的列强的中心——英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势力。作为此事的证明，可以举出的事实是，1914年7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8月作为协约国一员参战，对此孙中山表示反对，他屡次对犬养说：“日本必须与德国联合。日本要推行大陆政策必须与德国结合将英美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③

还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4至5月写的《中国

① 《支那革命党员会合的追报》〔1914年7月9日，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的“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流亡者）”（以下略称《革命党关系》）第12卷。

② 《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件》，1914年8月27日。同上。

③ 犬养的回顾谈，《东京朝日新闻》，1930年7月21日。

存亡问题》中论述道：

“中国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于美日以外，日本与中国之关系，实为存亡安危两相关联者。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为两国谋百年之安，必不可于其间稍设芥蒂。次之则为美国，美国之地虽与我隔，而以其地势，当然不侵我而友我。况两国皆民国，义尤可以相扶。中国而无发展之望则已，苟有其机会，必当借资于美国与日本。无论人才资本材料，皆当求之于此两友邦，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故，其能助我开发之力尤多。必使两国能相调和，中国始蒙其福，两国亦赖其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将因以大昌。中国于日本，以种族论为弟兄之国，于美国，以政治论又为师弟之邦。故中国实有调和日美之地位，且有其义务者也。妄人乖忤之计，詎可信耶？夫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其门罗主义，统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而于将来，更可以此三国之协力，销兵解仇，谋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国蒙其福也，中国若循此道以为外交，庶乎外交上召亡之因，可悉绝去也。”^①

这篇《中国存亡问题》所论主旨，从整体上看，是对照中国利害关系主张中国不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还评论了列强尤其是日英美三国的对华政策，其中有这样的看法，即英国对华最富侵略野心，与其相反，日美两国对中国友好，中国应与日美两国结成亲善关系。尽管如此，孙中山在这里还直接谈到了“亚细亚主义”，并且主张这个“亚细亚主义”与日中美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可以并存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其后，孙中山决心反对将北京政府置于自己支配下的段祺瑞

^①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第1001—1002页。

等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恢复旧国会，并于7月从上海赴广州，9月成立广东军政府，与北方派之间开始了护法之争。

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不久，驻美国华盛顿记者河上清持犬养毅介绍信于1917年9月15日来访，孙中山接见并与之会谈。^①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首先严厉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并谴责日本支持这些列强。^②随后，谈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德国、日本的想法，其中关于日本，明确表示如下的“亚细亚主义”构想：

“这次欧战，将以德国决定性的失败而告终，也即协约国在英国支配下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不是亚洲的利益，尤其不是中国与日本的利益，因而，如果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则必加强英国对整个广大亚洲的支配力，尤其会加强对中国的支配力。^③

“不用说，我们跟对英国一样，对德国，也并无好意。但是，从国家利益观点考虑，我们不希望看到德国在远东对英国支配抑制性的影响力丧失到完全败北的地步。为此，我们是在不知道这场战争究竟为何物的情况下而宣布与德国宣战的，现在我们正在与北京握有实权的一派进行战斗。^④

“贵国（按指日本。——引者）完全象英国操纵的傀儡一样在行动着。你们没有必要为了英日同盟而宣布与德国作战。若你们不援助北京的协约国宠儿，而是向华南的我们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不久之后，就会获

① 河上清：《孙逸仙的大亚洲主义》，载《当代日本》（日本外事协会出版）第4卷第2期，1935年9月，第210—245页。河上清（1873—1949），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1901年赴美，居华盛顿，有多篇论文寄往英美两国的杂志发表；同时又作为《时事新报》、《每日新闻》的特派员进行活动。到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止，一直在美国居留。

② 同上，第242页。

③ 同上，第242页。

④ 同上，第242页。

得良机。因为华南之我辈乃中国唯一的真正爱国者，理解世界政治，而且，衷心切望贵我两国能为亚洲之复活 (resurgence of Asia) 共同合作，使两国之间做到友好的理解。

“贵国政府应做之事，是向我辈提供武器弹药，而且，为我辈向长江流域进军、使我们的政府能转移到华中的战略要地，并进而推进到北京，提供大量的借款。”^①

孙中山还继续说，他的计划是广东军政府如能到达北京，则将与日本结盟，并宣布以不仅要中国而且要将西南近邻各国完全解放出来为目的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Asia for the Asiatics”^②) 的原则。

接着孙中山又说，一旦他掌握权力，他乐于将满洲交给日本支配。（“……once he was in power, he would gladly leave Manchuria in Japan's control.”^③）“当然，我们仍想将满洲保持在自己手中。但我们不象你们日本人那样对满洲势在必得，因为我们认识到，你们中的多数人为容纳持续增加的人口而急需自由行动的范围。”^④ 中国在南亚有容纳人口膨胀的许多余地。几千万中国人前往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等地，现在仍继续前往，这些中国人一富裕起来，每年有几百万元寄回家中。“这些广大的地区，当然是亚洲人的，而且对中国来说，是远比满洲有更多希望和前途的土地。”^⑤

河上清日后回忆这次会谈时说，孙中山热情并且诚实，其说话方式稳重，态度谨慎，“交谈时他绝不故作姿态，声音沉静，

① 同上，第242—243页。

② 同上，第243页。

③ 同上，第24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并不高声”。①

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一方面使用了“亚洲的复活”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词句，另一方面在阐述“亚细亚主义”主张的同时也提出了将来欲将“满洲”交给日本支配的想法。这表明这个时期的孙中山既持有颇为强烈的“亚细亚主义”志向，同时对已经达到成熟期的日本帝国主义还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对日本对华政策的现状与未来仍然持乐观见解。

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11月3日，联系到即将召开的南北和平会议，孙中山对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有吉明提出希望：大战结束后，因“预期盎格鲁撒克逊的活动及日中提携之急务”，所以“切望日本能勇敢地决断”，向孙中山等南方革命派提供援助。②并在11月26日对有吉表示：南北和平会议中如果南北两派之间达成妥协，日本的势力将被逐出东亚，由英美两国取代日本，“希望日本由现在默然坐视英美之跋扈转而采取果断措施坚持东亚联盟的理想以援助本人，以资实现将来之大计”，③并希望将上述意图迅速转达日本政府。有吉接受了这个要求，当日即向内田外相发出如下内容的意见书：“历来被视为理想家的此人之所述，颇值得重视，而从东亚之将来计议，亦有必要持日支联盟之信念，且如该人者在支那政治家中实为罕见，对于中外关系说来，利用该人实为得策，关于此事机会不多，其所述或然或否，请予考虑，谨此转述。”④（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由上可见，1918年前的孙中山，其对外观及亚洲观的中心乃为“亚细亚主义”思想。与此“亚细亚主义”密切联系，他还一并提出了黄白人种斗争观与中日提携论。孙中山的这种“亚细亚主义”是他立志要与鸦片战争以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侵略亚

① 同上页注③。

② 有吉总领事致内田外相，1918年11月4日上海发，外务省记录〈支那南北调停一件〉。

③ 有吉总领事致内田外相，1918年11月26日发，同上。

④ 同上。

洲相对抗的产物。而且，孙中山的这种“亚细亚主义”也期待经历过明治维新、修改条约、日俄战争等而成功地完成建立近代统一国家大业，并获得对外的国际平等地位的日本，能援助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尤其是要求援助中国的革命。因此，直至1918年孙中山仍然继续采取依靠日本的政策，这也与他对形成过程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估计过低有关。这样，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因为与依靠日本相结合，从而使他在对外态度与革命路线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向。

三、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之质变

1919年6月以后，孙中山开始基本上改变了依靠日本的态度，并公开批判日本帝国主义。^①这意味着孙中山对日观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的质变。

在过去，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是以中国与日本的提携作为必要前提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当然就得发生质变。

1923年5月，在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形成过程中，在广东军政府大本营会见来访的鹤见祐辅时，孙中山作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谈话：

“日本过去二十年间的对华外交都是失败的”，
“革命以后的援助北京政策，完全是与中国人民的期待相背离的近视政策。正是这个原因，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失败。”

“到最近，才了解到苏俄是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中俄两国若结成攻守同盟，则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足以畏惧。又，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德国等都是中国的

^① 《东京朝日新闻》，1919年6月21、22日。

朋友。但是，我们对日本还是没有绝望。为什么呢？因为我爱日本，感谢流亡时期庇护过我的日本人。此外，作为东洋的拥护者，需要日本。跟与苏俄结成同盟相比，我们更希望以日本为盟主的东洋民族复兴。因此，日本应当抛弃对华的西方模式的侵略政策，停止援助北京政府，从满洲撤退。否则，不论日本实施何种政策，也不能赢得中国人的感谢，中国人将继续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日本。”^①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已大致确定将与苏俄提携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此外，孙中山还彻底批评日本援助北京政府，并指责其为“西方模式的侵略政策”，要求日本从满洲撤退。但尽管如此，他迄今为止并未完全抛弃从流亡日本时期以来对日本人的亲近感以及以日本为拥护者的亚洲民族团结的梦想。孙中山对日本还抱着一线希望，对此有必要加以注意。

又，1923年7月，孙中山在与美国友人布罗克曼（Fletcher S. Brockman）谈话中指出：“日本是独裁国家”，并说，“我们对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所有列强的援助已不抱希望。对我们华南表示援助意图的，只有苏俄政府。”^②

从这两次谈话可以明显看出，如果日本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政策，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复兴亚洲的愿望就不得不逐渐归于破灭。

同年11月16日，孙中山给新成立的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递信大臣的犬养毅发出一函，函中写道：

^① 鹤见祐辅：《广东大本营的孙中山》（《改造》1923年7月号），第122—123页。鹤见（1885—1973）当时系铁道省高级官员。

^② 《纽约时报》，1923年7月22日。布罗克曼是孙中山的友人，又是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高级秘书。韦慕庭：《孙中山——屡经挫折的爱国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337页。

“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说者多谓必为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而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①

“今亚洲人民之受屈者比欧洲人民尤甚，故其望救亦尤切，本洲既无济弱扶倾、仗义执言之国，故不得不望于赤露。”^②

此外，1924年1月23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对外政策的第一部分，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同年1月27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第一讲中说到，将来的国际间的大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③

欧洲受压迫的国家，是苏俄和德国。在亚洲，除日本之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在强暴的压制之下遭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拚命一战。推到全世界，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④

这样，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在1919年以后随着孙中山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批判不是逐渐加强，而是逐渐减弱，直

^① 人民出版社编《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8—469页。

^② 同上，第468页。

^③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10页。

^④ 同上，第11页。

至“黄白人种斗争观”的影子消失。1923年以后，他不再区别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而是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与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为其解放而进行斗争，并为此特别强调与苏俄提携。孙中山用上述思想代替“亚细亚主义”，使之成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

四、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讲演

从1924年的江浙战争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10月冯玉祥的政变而确定大局，以直系的败北而告终。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决定北上的孙中山，在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表明北上目的是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并决定经由日本，经天津赴北京。11月23日至12月1日孙中山在日本停留期间，于11月24日至30日在神户逗留了一个星期。

在神户逗留期间，孙中山于11月28日作了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讲演。^①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在对日本国民怀有亲近感与期待感的同时，委婉地表达了对日感情的微妙变化。对这一点必须从前章所述的背景和文脉来加以理解。

贯穿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讲演全文的中心论点是：第一，对比王道与霸道；第二，主张“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道为基础；第三，希望日本选择王道。具体说来，孙中山在讲演中，第一，反复强调亚洲的王道文化对比欧美的霸道文化的优越性；第二，为实现“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道为基础，主张“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在于打破作为被压迫民族一环的亚洲各民族的不平等地位，恢复平等的地位；第三，用委婉的语言，劝告日本放弃霸道政策，回到王道上来。我认为，孙中山在这个讲演中是想通过呼吁日本国民选择王道并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来获得国民的理解与同情，唤起民间舆论，从而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其霸道

^① 同上，第二集，第539—549页。《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8日。

政策以及施加压力使之放弃此政策。孙中山借日本主持人有意安排“大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问题”这一讲演题目之机，利用当时国际关系中日本国内反美、反英的舆论，把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即为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打破不平等的思想和行动，变成日本的要求。应该看到，当时孙中山对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或者“大亚洲主义”几乎已不抱任何期待或幻想。实际上，当时孙中山是借儒教的说教，把自己的思想灌入其中，通过三民主义讲演来向民众进行启蒙宣传活动。

但遗憾的是，这个以《大亚洲主义》为题的讲演并未能将孙中山的本意十分明确地传达给日本国民。其理由之一是，这个讲演中对日要求部分是委婉的、抽象的。正象他将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描述为给予亚洲各民族解放与独立以极大的希望那样，孙中山竟将日本高度评价为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原动力之一。此外，讲演之后，日本各报在刊载讲演内容时，还删去了下面最后一节：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①

结果没有向日本报纸的读者传达孙中山对日主张的最重要部分。但其后不久，1925年1月号的《改造》杂志却刊载了包含最后一节在内的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讲演的日文本。^②随后在日本刊行的杂志、著作等，也都刊载了包括最后一节在内的

^① 例如，《神户又新日报》，1924年11月29、30日，12月1日。《大阪每日新闻》，12月3、4、5、6日。《神户新闻》，11月29日。《大阪朝日新闻》，11月29日。《日本年鉴》，神户，1924年11月30日。

^②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意义与日中亲善之唯一政策》（《改造》1925年1月号），第213—223页。

《大亚洲主义》讲演全文。

最早发表在中国报纸上的《大亚细亚主义》讲演全文，是1924年1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由黄昌谷^①记录的《孙先生“大亚洲主义”演说辞》。《民国日报》发表的由在孙中山访日期间担任“大元帅英文秘书”职务而与孙中山同行的黄昌谷署名的这篇讲演全文，含有日本人正面临是做“欧洲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亚洲王道的干城”的选择这最后一段。其后，在中国发行的孙中山资料集或各种文献所收录的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讲演，一般都含有这最后一段文字。

由此可见，在日中两国报纸及其他资料文献中，缺少最后一段文字的，则是讲演后不久日本出版的各种报纸。如只从这些日本报纸作为“讲演速记”而刊载的讲演内容来判断，则必然会产生孙中山实际上没有讲这最后一段的疑问。

那么，孙中山在这个讲演中真的讲了这最后一段吗？尚须作些探讨。关于这一点，最初提出疑问的是安井三吉。^②安井对当时日本发行的报纸（《神户新闻》、《神户又新日报》、《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日本年鉴》、《改造》杂志）所刊载的孙中山讲演内容作了比较与探讨，指出了其中的不同点，认为“孙中山没有讲‘日本民族既……’部分，《改造》杂志刊登的时候，可能‘加’了这一段”。^③安井的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孙中山是否真的讲了，还没有足以断定的资料。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下述几种可能性：

①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8日。

在12月5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上附记说：“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译自大阪每日英文新闻”，是根据《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报纸《大阪每日》（The Osaka Mainichi）日报译载的《大亚洲主义》讲演要旨重译成汉文刊载的。在其末尾附记：“以上的演说系从大阪每日英文新闻翻译的。原文非常长，此报导不过记其大意。待其演说原文收到后，再重行发表。”

② 安井三吉：《关于孙中山的最后访日》（《中国研究》，1975年9月号），第11—16页。

③ 同上，第16页。

1. 讲演的原稿上有最后一段，孙中山讲演时实际上也讲了，戴传贤也将它译成了日语，可能报纸没有发表，其原因是：①速记时遗漏了；②出于某种原因报社删去了；③当时审查时删去了。估计有这几种可能性。

2. 讲演原稿写上了，孙中山实际也讲了，可能戴传贤没有将它译成日语。

3. 讲演原稿已经写上，但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孙中山实际上没有讲。

4. 讲演原稿本来并未写上，可能在讲演以后孙中山在原稿上加写的。

在上述几种可能性中，“4.”不可能存在，理由是：第一，如没有最后一段，则讲演就缺少结论部分，而这样长篇的讲演，难免会使人有结尾非常不适宜之感。第二，从11月28日讲演至1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前后相距时间很短，加写如此重要的一段结论，而对此订正、加笔又不作任何说明，虽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可能性实在很小。根据上述第一个理由，“1.”或“2.”的可能性比“3.”更大些。

以上是对孙中山作《大亚洲主义》讲演意图的考察。下面再就日本报纸刊载讲演内容时少了一部分这个问题从资料角度来加以检讨。日本报纸漏载部分讲演内容，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但对大多数日本国民来说，很可能会因此而对孙中山的真实意图产生一些误解。其后，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激化，并扩大为全面的日中战争，日本及汪精卫等对日妥协派为使日本的侵略战争合理化，对孙中山的言辞与思想进行了种种歪曲，这也是严重妨碍日本国民正确地理解《大亚洲主义》讲演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中山在北上途中顺访日本，在神户停留期间与日本官民频繁接触、出席会议、会见记者等一系列活动确曾给人以孙中山的态度已从批判日本转变为接近日本的印象。

在孙中山作《大亚洲主义》讲演后的第二天，即11月29日，在神户发行的由英国人经营的英文日报《日本年鉴》^①的代表访问孙中山时，尽管孙中山已决定此次访日期间拒绝英美两国新闻记者采访的方针，但他还是特意就中国要求恢复独立问题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②

在这次采访中，《日本年鉴》的代表英国人布雷尔思·福特^③提了许多问题，对于其中有关“孙中山对日本态度发生急变”以及孙中山乃至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等问题，孙中山在回答时除了强烈要求收回国权外，还分别作了论述。

在“满洲”问题上，记者福特说，根据最近的报道，孙中山已进一步承认日本在“满洲”持有领土的问题可暂时维持现状，他问这个报道是否正确？对此，孙中山承认报道正确，但补充说，“这并非应将日本列进与其他列强不同范畴之中”。孙中山还谈到，在要求恢复中国的独立运动中，目前以两点为限，即废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与收回关税自主权。日本在“满洲”拥有的领土，其地位与香港、澳门相同，现在都不要要求归还它们。当福特提出日本在“满洲”的租界是否与上海、汉口、天津的各租界相当时，孙中山答称，“现在不为这些租界耽心。我首先要求的只有两件事。如果不许中国管理自己的关税，废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则中国将不成为国家。中国将堕落到殖民地以下的地位。我没有考虑对日本采取跟其他列强不同的处理办法。我希望所有列强都应学习苏俄的样子将主权归还中国。”^④

^① 1892年发刊的英文日报，是1924年在日本发行的外文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总社设在神户，分社设在伦敦，编辑兼发行人为扬格（A. Morgan Young）

^② 《日本年鉴》，1924年12月2日。

^③ 《日本年鉴》的采访报导中仅有《年鉴》的代表（“a Chronicle representative”）字样，没有注明名字。外务省记录的“孙文会见者”人员中，11月29日午后一栏上有头山满、饶平名智太郎（《大阪每日》记者），楠木武夫（海军少佐）、和田长史、名村太郎（山口银行职员），以及“神户《日本年鉴》记者英国人布雷尔思·福特”等人的名字。

^④ 《日本年鉴》，1924年12月2日。

此外，孙中山在强调中国必须从列强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之后断言，“假如欧美列强现在继续压制，那么，中国也许将与苏俄及印度联合起来，对抗欧美”。针对孙中山要求将中国从欧美列强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问题，福特问道：“你是否有理由相信，在这方面日本会给其他列强起示范作用？”孙中山答道：“我确信日本国民是一致赞同我的。尽管我没有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支持我的保证，但我仍然确信若日本政府官僚不愿采取行动，日本国民会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的。”^①

如果原原本本地理解孙中山在这次会见记者时的讲话的意思，那么，孙中山已将日本包括在压迫中国的列强之中，否定了对日本采取特别处理的主张。而且，孙中山还考虑到为了对抗列强的压迫而试图进行中俄印三国合作。关于消除列强压迫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对日本已不抱希望，另一方面却又自信会得到日本全体国民的支持。在此基础上，他期待并确信日本国民能设法促使日本政府承认孙中山收回国权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孙中山1924年11月访日时的态度并未改变他自1919年以来对日本的批判；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的对外主张，批判日本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决不能认为是“对日态度的急变”。^②

结 束 语

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从革命运动初期流亡日本期间就已显示了轮廓。构成这个思想的基本要素，一个是为抵抗欧美列强的压迫与侵略，亚洲黄色人种应团结起来对抗欧美白色人种的所谓“黄白人种斗争观”或“黄白人种对立观”；另一个是重视作为这种亚洲黄色人种团结中心势力的日中提携的日中提携论。

① 同上。

② 同上。

作为第一个要素的“黄白人种斗争观”，经过辛亥革命到1918年，对孙中山来说已成颇为明确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1914年达到了最高峰。作为第二要素的日中提携论，其基本点是期待和依靠日本援助亚洲各民族解放与独立，尤其是期待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对日依存方针。孙中山的这种日中提携论乃至对日依存方针，从革命运动初期到1918年前后只表现在对日本政府、军部、财界等的接近上。

因此，在1918年前后，以“黄白人种斗争观”与日中提携论为基轴的“亚细亚主义”就成了孙中山对外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直至1919年6月孙中山开始公开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时，他首先从根本上修改了日中提携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日依存方针。在1918年，孙中山对日本政治领导层的期待已逐步消失，代之以重视动员日本的国民舆论。此外，1919年以后，孙中山的“黄白人种斗争观”几乎已消声匿迹，在1923年致犬养毅信中他完全否定了将来黄白人种战争的预测，明确表示他已不再期待日本，而是期待苏俄了。这样一来，1923年以后，随着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联俄政策的形成，除日本以外，亚洲的中国、土耳其及其他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白色人种中被压迫的国家苏俄、德国的联合，亦即世界规模的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提携，就成了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在1918年前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中，日本是构成其两个基本要素——“黄白人种斗争观”与日中提携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1919年以后，它则从其“亚细亚主义”中被排除了，代替日本的苏俄被赋予新的意义。^①

^① 与这点相关联，蒋翰廷、赵矢元在论述中正确地指出，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讲演中讲到了东西文化论，而“欧洲的苏俄与亚洲的日本，从孙中山的东西文化论中交换了位置，孙中山极力赞扬苏俄，批判恣意在亚洲推行霸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见蒋翰廷、赵矢元：《略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1982年11月），第13页。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在1919年以后应该说已开始了基本的质变。或者说，孙中山过去的“亚细亚主义”已开始实质性的崩溃。1919年以后孙中山新的“亚细亚主义”以打破压迫、民族解放为前提，旨在实现亚洲各民族的团结。这与1919年2月李大钊在学生救国会机关杂志《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①一文中“新亚细亚主义”所指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孙中山最后公开发表其“亚细亚主义”，及最后向日本国民呼吁，是在1924年11月的《大亚洲主义》讲演之中，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来龙去脉去理解。在这个讲演中，孙中山以委婉的语言要求日本选择王道，舍弃霸道，并决心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尤其希望通过这个讲演得到日本国民对选择王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理解和支持，并唤起舆论，以抑制乃至改变日本政府的霸道政策。讲演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与英文报记者会见时的谈话表明，他在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特别重视日本国民舆论的动向，对它寄予很大的期望。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讲演中对日本的态度并不象部分人所说的那样，已从批判转向接近，而是将日本置于与其他列强同等的地位，进行严厉的批判。

这样，孙中山在革命运动初期以抵抗欧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重压的“黄白人种斗争观”与日中提携论为中心要素的“亚细亚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压迫的加强，在1919年以后已开始发生基本的质变，而1923年以后几乎已完全质变，从而形

^① 李大钊在论文中断言，日本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除了吞并中国的大日本主义外没有别的。他严厉地批判了“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并且提出以“新亚细亚主义”代替“大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以经过三个阶段最终实现世界联邦为目标：第一阶段，是实行“以民族解放为基础的根本改造”，“应解放亚洲所有被其他民族吞并的民族，并实行民族自决主义”为第二阶段；已经取得解放的亚洲各民族“组成一个大的联合”，与欧洲联合、美洲联合相鼎立为第三阶段。这样的亚洲、欧洲、美洲的三大联合，“共同结成世界联邦，增进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他的远大构想。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人民出版社编《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7—129页。

成1924年的《大亚洲主义》讲演等言论。换言之，孙中山自1919年以后开始形成了以将亚洲各民族从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恢复民族平等地位为最重要内容的亚洲观，它与李大钊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共同之处，并与所谓的民主主义的新的“亚细亚主义”相呼应。孙中山在作《大亚洲主义》讲演前一个半月发给当时奉派到东京的李烈钧的电报中，曾谈到“我们的大亚洲主义”^①的含义正是这种民主的新的“亚细亚主义”。因此，孙中山企图在《大亚洲主义》讲演中传达给日本国民的亚洲观与对外主张，尤其是对日的要求，与当时在日本喧嚣一时的“大亚洲主义”^②论调，即完全不谈应当以亚洲各民族联合为前提、消除民族压迫、恢复民族平等等民主主义的初步理念，应该说是根本不同的。

译自《中国近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
1985年9月，辛亥革命研究会编，汲古书院
刊印，第413—438页。

李百奎译 马 宁校

^① 1924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李烈钧电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国父全集》第三册，台北，1973年）第966页。

^② 拙著：《孙文研究》，第212—222页。

广东辛亥革命的考察

狭间直树

前 言

人所共知，广东省城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从秦始皇设置番禺县开始的，到了唐宋、明清时代又作为贸易港口而繁荣起来。广州成为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根据地，却是从1895年孙中山未及发难的广州起义开始的。此后直至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后，中国同盟会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坚决实行了九次起义。人们常常说，失败了的黄花岗起义几乎是武昌起义的直接准备，而广州这个革命运动的先进地区到11月9日才光复，这在各省光复过程中除了南京以外的华中、华南各地，要算最晚一个。为什么革命运动的组织工作最先进的地方反而光复得最晚？这是因为革命派在激烈的斗争中失败时，反革命派集结了强大的力量。例如，黄花岗起义后，为了镇压民众，新设立了清乡善后总公所。要推翻这种压迫，取得革命成功，广东的革命就比其他省更为激烈。革命结果，优秀的革命派在军政府成立时掌握了领导权。本文主要考察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前广东的革命经过与军政府的状况。

最近发表了许多有关各地辛亥革命的论文，但据我了解，关于广东辛亥革命的论文在日本尚未见到。在美国，有路康乐写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1913年广东实况》论文，^①使用了

^① 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1913年广东实况》，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

许多地方报纸的资料，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有份量的论文。虽然对该文的分析与观点不敢赞同，但从中却得到许多启发，特此提上一笔。

一、武昌起义与广东的政治形势

全世界人民看到，武昌起义爆发把全中国的政治生活卷进了激烈的漩涡中去。中国的一切政治势力突然开始向以革命为重心的方向转移，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追逐各自的利益。当然，在广东省，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一下子变得更加紧张了。中国同盟会的主流派在香港设立机关，坚决地在华南一带不断发动起义。不言而喻，他们是要响应湖北武昌起义，实现广东光复，为此他们开始在对旧制度不满、对革命充满希望的下层民众及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工作。而地主、商人、买办资产阶级等有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先是镇压革命，但行不通，于是便以改良主义者为核心，用两面派手法对付革命。

首先看看广东的统治状况。最上层的统治者是直属皇帝的地方官总督。总督是该地区的民政、军政的最高负责人，也是封建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的首脑。总督之下，在民政方面设有布政使、按察使其下官吏，几乎只是为了收租才设置的；在军政方面，有新军、巡防营等，专门为了镇压反叛而设置的。辛亥革命时两广总督是张鸣岐，他是一位年轻、精明的官僚。

值得注意的是咨议局的存在。这个代议制机构同原来的统治体制未必协调，它成了清末改良主义派中立宪派政治势力的蓄水池。立宪派由商绅即有势力的商人与开明地主组成，革命前夕又是统治阶级中的反主流派。他们窥视改良主义的另一派保皇派，抢先登上政治舞台，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但与革命派水火不相容，在思想、政策等方面却与保皇派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军队作为暴力机器，在辛亥革命时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清末的军队制度，在地方，是由总督统帅下的巡防等与将军统帅下的八旗两支力量组成的。广东两广总督指挥下有新军、巡防营、水师营等，另外广州将军统帅下有八旗兵。

先说新军，^①它是西太后新政中建立36镇（镇相当于师）计划的一项，也是在广东建立起来的。起初准备在广东建立两镇。1903年开始建军，张之洞全力进行此项工作。到1905年建成了一个混成协（混成协即混成旅团），但直至1911年也依然只有一个混成协。建军迟缓的原因，一般归结于财政等问题，但在广东则必须考虑到革命派的活动因素。因为发生1910年初的庚戌新军事事件，决定对广东新军重新编练；此外，黄花岗起义后，龙济光为了建立归自己掌握的军队，在新军之外单独编成了军队。

清末新军平时的编制是：镇由步兵两协、骑兵一标（标即联队），炮兵一标、工兵一营（营即大队）、轻重兵一营等组成。步兵一协由两标组成。各标有三营，各营有四队（队即中队），各队有三排（排即小队），各排有三棚（棚即分队）。棚由正目一名、副一名、正兵四名、副兵八名，计14名组成。所以，一镇的官兵定员为10,436名。广东的混成协由三标组成，即步兵一协、骑兵一队、炮兵一标、工兵一营、轻重一营等组成。据《中国年鉴》记载，广东新军有6,025名。^②

新军混成协协统为蒋尊簋。协统本部设在省城东北约50公里的燕塘，在省内以下各地驻扎军队：^③燕塘有步兵第一标、炮兵标、工兵营、轻重营、骑兵队等；北较场有步兵第二标等；高州有步兵第三标。

高州是广东省西部要冲，北较场与省城北面邻接，只是在武

^① 莫雄，《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广东辛亥革命资料》第80页。

^② 同第98页注^①

^③ 莫雄，《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广东辛亥革命资料》第80页。

吕起义时，驻北较场的第二标中有一营驻扎在可以控制澳门的香山县（今中山县）的前山寨，另一营驻扎在省城北面的花县及从化县。

震撼全国的黄花岗起义被镇压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把其任广西巡抚时的部下龙济光调到广东，担任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然而如前所述，广东新军还处于混成协阶段，所以龙济光被准许提出申请补充缺额。他以补缺为借口重新建立其统治体制，但他深知必须使有许多命革党人和同情者的原新军不起作用，要建立一支如钟德贻所说的“有可靠心腹的部队”。^①

龙济光主要在云南募兵。兵额有2,000余名。这个军队以士兵的出生地说称为滇军，还有龙济光从前任地带来的那部分称为桂军，总之都是反革命首领龙济光手下直接指挥的士兵。张鸣岐的最可靠的军队驻扎在可以控制广州城的要地及城北的观音山。据说，观音山别名越秀山，顶上有镇海楼，这个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也是要塞地区，禁止游览。

巡防营与水师是所谓的旧军，其兵额据《中国年鉴》记载有31,300名。^②巡防营有32营，陆路提督署设在惠州，分驻在海丰、陆丰、潮州、汕头、香山等县。提督是秦炳直。巡防营的武器与新军差不多，步枪也是单发毛瑟化村田枪，以及稍有改进的德国式七九步枪。

水师有20营，拥有30余艘海防江防舰船。水师督署设在珠江口的虎门，提督李准主要在省城南的长堤水师行营指挥水师。李准是反革命中第一个有本领的人，在镇压革命党上立了大“功”。所以革命者对李准的仇恨超过对张鸣岐，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成立的中国暗杀团将李列为判处死刑的第一个目标。当年8月，李准被林冠慈、陈敬岳袭击负伤，治疗了两个月，因此武昌

① 钟德贻：《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00页。

② 《中国年鉴》，第256页。《清国行政法》第4卷（大安影印版）第346页。

起义爆发时，他以养病为借口静观形势。

八旗是原来清朝统治的基础。驻防广州的八旗定员为4,741名，^①而莫雄的回忆录则认为大约是8,000。八旗的兵器也是最新式的，但辛亥革命时几乎没有战斗力。八旗的腐化堕落已经在太平天国时暴露出来，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更加严重。

加上广州情况特殊：1911年以来连续发生刺杀事件，即有两位广州将军因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而死亡。广州将军副都统孚琦被温生才刺死。那一天举行中国第一次飞行表演，温生才实际上是计划刺杀李准的。因此，孚琦事件也是对八旗的很大冲击。接着，发生了针对凤山的恐怖活动。孚琦被杀后由张鸣岐署理广州将军。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为了重新巩固统治体制，派有威望的凤山到广州去。10月25日，凤山到达广州当日即被李沛基炸死。而且这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暗杀事件，暗杀者一个也没有被抓到。这事件对广东的统治阶级与八旗产生了恐怖活动者所预期的效果。莫雄回忆说：“两广总督张鸣岐惊慌失措，水师提督李准屡次向革命党人接洽投降的事，陆军总镇龙济光态度暧昧，广州绅商主张独立，新军协统蒋尊簋积极主张独立。”

广州光复是距武昌起义以后很晚的11月9日的事。在这一个月时间里，省内各地有无民军起义以10月29日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广东革命派得知武昌起义成功，即用两种方式进行革命。一种是朱执信等人用组织民军的方式，他们率领在农村组织起来的民军攻打省城，这将在后面叙述。另一种是潘达微、邓慕韩、邓警亚等人进行上层工作，^②即追求所谓“和平革命”。潘等要通过在籍的翰林江孔殷做张鸣岐的工作。江孔殷在黄花岗起义后为张鸣岐维持地方秩序，成立了清乡善后总公所，^③并就任督办，在

① 《清国行政法》第4卷第297页。

② 邓警亚：《辛亥广东独立传信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334页。

③ 前引路康乐文，第214页。

省内也是最有势力的乡绅，是重要人物。江孔殷作为清乡督办，他的反革命活动似乎极为残暴，据说顺德县民众告诫说：“江朱邓，生人勿近。”^①朱是知县朱为潮，邓是防营协台邓瑶光，都是江的“清乡”助手。所以，江孔殷看到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高涨，首先用第一种手法策划并进行全面的镇压，接着用第二种手法，即认识到镇压行不通后策划两面派的对策。

潘达微等劝说江孔殷：“用武力不能使革命党屈服”，^②并说明在湖北前线陆军大臣率领的讨伐军完全失败，形势确是与以前的各次起义不同，等等。广东的统治阶级一方面动摇，另一方面在寻找新的对策。10月25日，“广东的绅士们”听到继湖北之后湖南、陕西也为革命军光复，便在文澜书院集会商议。^③根据与会者的多数意见，推选80多岁的邓官保华熙为议长，梁廉访鼎芬为副议长。会议的基调，根据梁鼎芬发言的记录是“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这个方针的缺点是，对内部的革命起义来源，强调只有有产阶级自己才是“广东人”的实体，而且为了避免来自外省的革命的影响，它可起护身符的作用。接着江孔殷说：“鄂变起事，数日内数省响应，土崩之势已成……今日救亡，只有二策：一速行联邦政策，开放22省分治，以御革命风潮。督抚未必敢言，言之政府亦未必听。二政府假权督抚，使之便宜行事，改良政治，以阻国民独立。”^④只要这二策能阻止革命风潮、阻止国民独立便可。但不管怎样它们不能替代有产阶级的反革命对策，而只要利用原来督抚的权力就可看清这个对策的软弱无力。他们之所以必须依靠督抚，当然是因为惧怕下层民众觉起。江孔殷继续说：“但一省有一省情势，他省防营少，广东防营多，他省无土匪，广东

① 李玉奇、张磊：《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7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314页。

③ 大汉热心人辑：《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36—437页。但是，郭孝成的《广东光复记》（《辛亥革命》第7卷第228页）记载，当日会议“宣布独立”，可能有误。

④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36页。

有土匪，一有不慎，国民未举事，而土匪已乘之，外人从而干涉，殊费收拾矣。故日前鄙人往港，与各报界论及广东提倡独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①总之，他的主导思想是，要阻止革命，就必须让其独立，因为独立后会出现权力真空，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江孔殷的发言对后来的革命派邓慕韩等人有所推动。而有产阶级却要维护其剥削体系，企图在和平的掩护下避免革命发生；革命派则认为，只要摆脱清朝统治，就能前进。因此，有产阶级与革命派共同推进这个和平独立的办法。

在当天的会议上没有宣告广东独立，大致是立誓推进和平独立。会议结果立即用书面方式向总督张鸣岐报告，并得到其赞同。虽然张鸣岐忠于北京皇帝与赞同广东绅民这两种态度是不可理解的，但他肯定并没有作出最后决断。如不赞同独立就不可能保全乡土，因此赞成这一决议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然而，凤山将军很快到达广州，但在就任前即被谋杀，那么八旗的满洲士兵对此抱什么态度呢？人们知道，清末的旗人与贫民是同义语，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谁也不会为皇室而斗争，他们也支持文澜书院会议的决议。^②

但是，形势总是波动的。在广州纷传国民军某日将到粤，特别是煽动复仇心的“旗人杀汉人”的谣言更使人们感到恐怖，而人们对暗杀事件又记忆犹新。结果，相继有人逃到香港，逃往澳门，省城陷入恐慌、混乱之中。避免省城卷进战斗危险的唯一办法，只能是省政权用各种各样手段伪装同情革命。

形势紧张的10月29日上午8时，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各团体，齐赴爱育堂集议。总商会是七十二行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同业组织，善堂是救济贫民等所谓慈善团体。那时善堂在有势力的商人统治下，保持“与商会名义不同，步骤一致”

^①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36页。

^② 同上，第438页。

的关系。所以，九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各自都作为广东舆论的代表，反正前诽谤革命，反正后称颂革命，后来胡汉民批评这是“市井小人的根性”。^①当然辛亥革命时还没有达到这种认识。当日的会议是继25日以后有产阶级商讨方针的会议，继续上一次会议的基本路线，探讨拥护张鸣岐的独立路线。所谓拥戴总督的独立，对立宪派来说就是避免革命，而对革命派来说也是最容易完成“革命”的方法。两者各自想法不同，由于没有进入会场的与会者以压倒多数赞成共和制，故只能走独立的道路。当日发出的传单写了以下四项：

1. 承认新政府；
2. 承认满汉一体；
3. 用正式公文呈报总督；
4. 已续派代表赴港表示意见，商议进行方法。

第一项说的新政府是指在广东新组织的政府。第二、三项无须说明。第四项在香港同中国同盟会南方分会商议。第四项清楚表明，潘达微不是个人单独行动，而是始终按照同盟会主流派（香港的总负责人为胡汉民）的方针行事的。

当日下午，在文澜书院商讨今后应进行的办法后，各团体选出9人组织广东满汉民团独立会。决定建立新政府与在文澜书院挂出白色的独立旗之后，从傍晚到夜里以爆竹庆祝之声不绝于耳。工人温车扛着书有“广东独立”四字大旗，攘臂大呼“广东独立万岁”，先行走出书院，群众尾随其后，以为拥护，当民众到达督署时，已聚集至2万余人。^②

事态的发展似乎挺顺利。然而，阶级敌人却在采取措施，不使形势自然发展。是日沙面和各国领事闻讯，皆“电询张鸣岐是否承认人民的举动，并令兵船戒严，如临大敌”。^③他们以并非想

① 《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50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335页。

③ 《辛亥革命》第7卷第229页。

象为借口，以恐吓的态度进行询问，向张鸣岐施加大的压力。加上两日前张鸣岐肯定听到汉口失守的消息，即革命军在湖北前线蒙受第一个大失败。张鸣岐也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吃惊，停止了数日前考虑的是否承认独立的问题，不再采取两面派的态度，而是鲜明地表现出反革命的立场。应该说，这个封建王朝体系下的年轻、精明的官僚，仍然毫不慌张，充分运用智慧与经验使自己平安地逃避革命激流的冲击。

总督张鸣岐背叛了商绅们的愿望与预想，竟然发出告示：“独立是叛逆的事”，命令他们“改过自新”。张认为清朝大概已恢复原状，要镇压革命了；同时也不承认正在进行的新军改编为国民军的计划。^①于是，为了防卫总督衙门，在街头到处设立路障，并架设了大炮。前一天庆祝独立充满热闹的街市，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炮台的世界”。当然也禁止在文澜书院开会。不久，在省城内外布置了6,000名左右的士兵，他们均有刀鞘弦矢之势。和平“革命”的途径因当局的翻脸而行不通了，局势迅速转化，整个省城充满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

二、民军的起义与省城光复

总督张鸣岐树起鲜明的反革命旗帜之后，广州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张反对国民独立，所以拥张独立的道路已走不通了。这时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组成的改良派应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的政治立场通过咨议局的传单作了雄辩的回答。题为《劝告居民安业》的布告是这样写的：

“连日谣言蜂起，居民迁徙，商店闭户，推其原因，全谓初九日（10月30日）革命党祭黄花岗后，入城竖旗各风说。今初九日已过，并无其事。旋往本局切实

^①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00页。

调查，现革党在鄂，方全力与官军相距，不暇兼顾，决无来粤之事。在政界连日戒严，亦因鄂乱影响，不得不豫为防备。吾粤商民，即可安心，切勿轻听谣言，自相惊扰。此布。”^①

这表明完全向张鸣岐的武断政策屈服。但改良派至少犯了两个大的估计错误：一是过于相信总督拥有的武力；二是正如布告所明言的，认为湖北的革命党不会攻击广东。这种完全错误的想法立即为民军起义所证实。

11月2日，省城南面的香山县爆发起义，不到数日间起义浪潮便波及全省。如前所述，江孔殷认为广东“匪”多。实际上武昌起义前几个月张鸣岐在分析省内各地情况时也说：不仅“各属土匪同时蜂起”，而且“加以革党到处煽诱，乱民乘间窃发”。惠州、廉州、钦州略称安靖，此外各属无不匪踪遍境，尤以高州、韶州及广州等地为甚。其中“广州则顺德、香山、新会、新宁等县，匪势皆极盛”。理于“匪”势最大的香山诸县，以及理应安靖的惠州也大致同时开始起义，所以在和平独立路线破产之后，革命派的武装革命路线公开化了。

广东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是孙中山，而此时直接进行指挥的是香港的同盟会南方分会。广州省城有朱执信与胡汉民，东江方面有陈炯明，北江方面有徐维扬，西江方面有苏慎初，韩江方面有姚雨平——他们各自负责自己主管的地区，而且也对新旧军、会党进行了工作。^②例如，在东江方面的惠州，据说10月下旬陈炯明将“农民、手工业者”等百余人组织起来，30日编成了七个大队计3,000人的队伍（循军）。^③此外在同一地区，王和顺独力组织革命军起义，经过七昼夜的激战，于11月9日完全光复设有陆

①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47页。

② 《辛亥革命》第7卷第256页。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56页。

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343页。

路提督衙门的惠州。西江方面的钦州、防城，韩江方面的汕头、潮州等地的事态，基本上也如东江方面一样发展着。^①

朱执信等人负责的省城周围地区形势更加紧急。南海县西樵乡的陆兰清，番禺县禺南与禺东的李福林等，顺德县的陆领与周康及张炳等，新会县的谭义等，香山县的林义顺等都发动了起义。以上这些起义军均是以会党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起义大致是11月以后发动的，在这以前接近省城顺德的起义队伍，被清乡督办江孔殷打败。冯自由说：“党军的声势因此而受到挫折”，大概在组织过程中就已遭到镇压。

香山县的情况^②只是一个例外，在此作详细介绍。这个县的革命活动总机关部设在位于县南面的葡萄牙领地澳门，机关部设在县城石岐。对会党及新旧军队的发动导致了起义，香山县首先发动起义的是县城西北部小榄地方会党李就成、伍顺添等人的约200人的队伍。这是11月2日的情况。

当时香山县清军的部署情况，除前山寨有一个新军营外，县城还驻有副将马德新率领的人数数百的巡防营。清末巡防营的战斗力的低下是有名的，据说“头脑顽固”的马德新率领的湖南兵，是“号称善战”的部队。团练与巡防营不同，不是正规军。一般在县城组织有战斗力的、人数百余名的团练。

马德新接到起义的报告后，立即带领巡防营百余人与团练80余名到小榄去镇压。他以为，凭借多数互相配合，并从正面攻击，起义军也许会失败。但由于革命党人已事先对团练做了工作，他们在紧要关头与起义军合流攻击巡防营，结果巡防营失败了，死亡十余名，马德新本人逃回县城。后来，马又以要求派遣援兵为借口，逃到省城。

在小榄地区的民军获胜之后，西部隆都地区的民军也接着起

①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7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55页。

②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13—219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338—342页。

义。这是由华侨、学生即革命党人和“绿林豪杰”(担任领导)、固勇为主体组成的起义军，是一支“没有经过训练，充满革命热情”的队伍。巡防营没有指挥官，本来就丧失战斗力，而刚到任只有一个月的知县覃寿堃，是“具有新思想”的日本留学生，他“看到大势已去，不进行抵抗”。隆都的起义军逼近县城时，队伍已扩大到二、三千人，胜败结局已经很明显了。民军只经过七天的战斗就占领了县城。入城后，立即从覃知县手中接收了公章，同时任命覃为临时县长，建立了县军政府。

在此期间，前山寨的新军也于5日发动起义。已经得知新军不稳的指挥官，立即逃到澳门，革命党遂由革命党人的士官任鹤年、何振出任正、副司令，重新编排新军。所以，县军政府于7日成立时，革命党已掌握了县城的巡防营和前山寨的新军，乡村各地的民军也起义了。

但是，只要县城以外的敌人未被打败，香山军政府就不巩固。省当局很快，于8日上午便派出了军队，他们分乘几艘军舰逼近石岐县城。^①但在堤防上守卫的民军力量强大，官军无法登陆。下午，任鹤年率领前山寨新军也赶到县城，官军不敢镇压便退却了。这时香山的民军以新军为中心整编队伍向省城进军。9日，香山民军开始向广州进军，如后所述，广东于当天傍晚宣告独立。

省城附近的顺德、南海、番禺、花县，以及东面的东莞、西面的三水等地，与香山一样，几乎都发生了起义，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起义民军先是使当地的权力机关瘫痪，接着向省城进军。10日，进入省城的起义民军已有1万余人，而且个个精神奋发，“所持枪械多半新式，子弹充足异常”。^②由此可见，民军是有实力的。

^① 郑彼岸说，江孔殷乘江大兵舰去讨伐时，省城内正在进行向“和平转移”的工作，例如11月8日会议前江与潘达微的秘密联络。

^②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52页。

各地起义军总数无法知道，但广东独立后集中省城的主要队伍，根据李朗如、陆满回忆^①有下面一些：（左方为领导者，括号内为军队的名称，往右是人数，最后是最早起义地。）

陈炯明	（循军）	万余名	惠州
王和顺	（惠军）	3,000余名	惠州
黄明堂	（明字顺军）	2,000余名	钦州防城
关仁甫	（仁字营）	数千名	海丰？
陆兰清	（兰字营）	3,000余名	南海县西樵乡
陆 领	（领字营）	2,000余名	顺德县乐从圩
李福林	（福字营）	2,000余名 ^下	番禺县禺南乡
张 炳	（炳字营）	900余名	顺德县龙江
黎炳球	（黎字营）	1,000余名	南海县西樵乡
何 江	（江字营）	700余名	顺德县乐从圩
何 梦	（梦字营）	600余名	顺德县乐从圩
邓 江	（邓字营）	500余名	顺德县龙江
黎志荣	（荣字营）	400余名	南海县西樵乡
林义顺	（香字顺军）	3,000余名	香山县
谭 义	（谭字营）	1,000余名	新会县天河乡
李 就	（就字营）	600余名	香山县小榄
周 康	（康字营）	2,000余名	顺德县陈村镇
石锦泉	（石字营）	1,000余名	海丰

以上总兵数约为5万；而《国民报》记载有34营，兵数合计约4.5万。其他只举营名的有30营，总兵数大约5万。李玉奇在文章中写道：“全省民军兵数很多，光复后云集省城的达10万人以上。”^②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410—416页。这里举的数字与其他资料上的数字是一致的。例如《国民报》（外务省文书MT161. 502126—2131）的记事认为，王和顺的惠军有4,000名。石锦泉的石字营有1,000余名，但《国民报》认为是2,000余名，台湾银行的报告书认为约有4,000名。

②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7页。钟德贻的回忆也是10万余人。

那么，民军起义的根本动力在哪里呢？据回忆录记载，有一个地主婆称赞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的功绩说：“天下总不会大乱了。”一位老佃农答道：“大奶呀，我怕更乱得凶呢！天下乱不是乱在洪秀全，而是乱在肚子饿呀！”据说，那个香山县的小榄起义队伍就曾提出“打倒满清，吃便宜米！”的口号。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将这种民众的根本不满引向起义，并加以组织。革命后的广州一带“仇杀风日盛，联军结党四出骚扰”；在顺德“连日拆毁绅屋，更声言寻东”。统治阶级的政治领导层九善堂、总商会鉴于这种情况，上书大都督称：“各处乡人尚持复仇之说，专与前日绅士为难”，要求“一律严禁”。^①由此可见，贫农等在革命以后所提出的希望是什么。

同盟会的领导人胡汉民等认为，“赤贫的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土匪”，他们是民军的来源。他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贫农、雇农”、“小手工业者、工人、归国华侨”的情况。当时，广东军政府委员在发言中也强调认真保护原来的正业者。^②民军士兵月饷10元，民军中有一部分是由会党组成的。会党首领张禄在光复后说：“我们虽系绿林出身，而迫于不得已之所为，非本心所愿也。嗣后改过自新，保卫桑梓。”^③张禄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其间的关系。

前面说过，民军装备充实，回忆录中确实有这样的记载，但也有装备极差的情况。步枪是旧式的，而且不是人人都有，有人身上带着刀矛。士气高涨，训练不好的民军能够取得胜利，终究是军官在起作用。首先是新军军官。如前所述，革命党在新军中进行了工作。武昌起义时，总督张鸣岐也想象过去出现危机时那样找个借口，从士兵手中收缴子弹，但这一切行不通了。强制收缴怕激起不满。10月底，新军内部响应民军的一切工作业已就

①③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62、463页。

② 《胡汉民自传》第51页。

绪，它号称“国民军”。^① 官府的恐惧是建立在充分了解这一现实的基础上的。于8月负伤的李准在观望形势，而龙济光募集的滇军这支特别受到信任的军队也出现了“军心不稳”。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军队在起义开始后几乎完全不能依靠了。

四面八方的民军开始起义，省城几乎陷入孤立状态。正在这时，11月5日贴出了“军政府南部都督布告书”，向九大善堂、七十二行、三千万同胞宣布，能否“和平独立”取决于粤省官吏的态度。与此同时，据说张鸣岐闻京师失守，驻守观音山控制城内的龙济光似乎数次被人谋刺。在前山等地的新军倾向革命，“四乡从前之著盗，改去前非，转而为国民军，四处响应”的形势下，“张鸣岐、龙济光辈，至此知大事已去，乃思反正”。^②

11月9日，全省各团体在咨议局召开会议，作出“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等十项决议。告示发出时，城厢内外均高揭三色国旗，爆竹如雷，欢声响动，剪发者尤众。“入夜四城大开，各安其业，五羊城中焕然一新世界矣。”^③ 是日会议决定成立的共和政府，与10月29日会议决定基本上一样，要推总督张鸣岐为临时都督，但张不仅固辞，而且是日夜逃亡香港。张不干谁来干呢？在四面八方民军蜂起的形势下，只有由革命党人当都督了。人们推选在香港指挥的胡汉民为“粤军都督”，胡到任前由蒋尊簋任“代理临时都督”。于是，在广东依靠民军的力量建立了革命党政权。

三、广东军政府成立与财政问题

11月19日，即宣布独立次日，胡汉民就任都督。胡汉民就任后立即照会龙济光、李准，他们照旧统辖“从前所统”部队，龙

①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00页。

②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49页。

③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51、454页。

负责城内、李负责城外的治安维持工作，“餉项由军政府担任发给”。^①这个照会是对以前最敌视革命的李准与龙济光的暧昧的答复。李准在叙述广东独立前的想法时说：“准默察天心，俯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藉消兵祸”。^②总之，龙济光与李准都成了“新朝人物”。后来胡汉民回忆说，广东光复“以李直绳（准）军之功为最”。^③如果是那样的话，胡认为，李是看到大势所趋，即民军起义把革命推向了高潮，才不得不这样做的。任用龙、李之后，都督发出告示：“所有防营反正后同民军一样”，进而严禁民军强行收缴营勇的武器。

也有人反对任用龙济光和李准，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势力。革命派的目的在于能够“容易”地脱离清朝统治，所以完全同意利用改良派走和平光复的道路，同时也毫不吝惜地与反革命的旧当权派分享省的最高权力。革命派要保证全社会成员的幸福，他们认为自已采取妥协办法，对方会与自已合作的。

胡都督要组织军政府，想召开大会任命各行政官，但“众以此事应归都督委任，不必由会场推举”，^④结果决定了下列名单：

副都督	陈炯明	三都督	黄士龙
军政部长	蒋尊簋	次 长	魏邦平
财政部长	李煜堂	次 长	廖仲愷
民政部长	黎国廉	次 长	伍藉槃
司法部长	王宠惠	次 长	汪祖泽
外交部长	伍廷芳	次 长	陈少白
交通部长	梁如浩	次 长	(未定)
实业部长	王宠祐	次 长	利 寅
教育部长	丘仓海		
总顾问官	何 启、韦 玉		

① 同上页③

②③④ 《辛亥革命》第7卷第245—246、247、232页。

枢密处（不设长）：朱执信、李君佩、李纪堂、廖仲恺、黄世仲、陈少白、李茂之、杜应坤、陈协之、李海云、刘古香、胡毅生、谢鲁倩、姚雨平、谢良牧、谢适群、毛文明

从这个人员组成看，它是由革命派陈少白、朱执信、廖仲恺等，改良派何启、伍廷芳、丘仓海等，军人蒋尊簋、黄士龙等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名单于11月17日在讨论行政纲要的会议上通过，于是广东军政府宣告成立。此外，稍后，陈景华就任警察部长，以前中法战争的英雄刘永福就任民团总长。

作为军政府的重要问题、革命时令革命党人烦恼的财政问题怎么样呢？从结算情况看，广东的财政还比较富裕，据1913年2月7日从广东发出的东亚同文会特别报告称：总收入为1743万余元，总支出为1199万元。^①余额有相当多的黑字。这包含着预计收入的数值等，很难说是完全正确的数值，但大致反映军政府成立以来到1月下旬的约3个月的概况。只从支出看，民军及新军经费530万元，有关北伐军费390万元，军费约占80%，余下的行政费35万元、杂费180万元。这种情况值得注意。还有，据说明记载，原来士兵饷钱每月6元，革命军10元，计每月22.8230万元；民军月饷也是10元，每月约70万元；北伐军每人每月200元的费用，而龙济光的桂军的费用列在杂费中。即使这样，也如报告者指出的：

“此经费是在时局多难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哪些是财源，又不能点滴的弥补办法，加上还得考虑外债的需要，能维持到今天，应该佩服财政当局的手腕。”^②

在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的财政报告册中看到的情况，大概也是这种倾向。^③财政报告册的起止日期是11月9日至12月19日，

^{①②} 《清国事变特别报告》（甲）第15回，〈外务省文书〉161.45。

^③ 财政报告册共有4册，〈广东财政部自阴历九月十九日起至十月二十九日止收入报告册〉、〈广东财政部自阴历九月十九日起至十月二十九日止支出报告册〉、〈广东财政部自阴历十一月初一起至十二月止收入报告册〉、〈广东财政部自阴历十一月初一起至十二月止支出报告册〉。

即从光复到胡汉民离开广州、临时省议会成立止；12月20日至31日，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财政报告册记载的日期是广东军政府独立存在的50余日，在此期间分款、项、日登记每日的收入与支出。财政报告册没有考虑到全面罗列，但无疑是研究这一时期广东军政府状况的重要资料。

先看收支概况。下面的表格是根据报告册作成的简表，表1作为总表，只表现为绝对的黑字。数字决不仅表明财政有富裕，正如前面引用的报告所说的，而且，不可否认，它还应令人佩服财政当局的手腕。

再看收入，简表表示各项收款的绝对比重。其中大宗的有11月22日官银钱局81万余，11月23日、12月18日、12月27日藩库93万、100万、494万等。后两项在“摘要”栏注记“纸币”，大概是清末发行的官银钱局的兑换纸币。因为兑换券有准备金，所以没有问题，关键是这个准备金不足时，如前所述，假如支出项目没有记载，余额留存的很大的黑字额，也决不是说明富裕。

光复次日，军政府派员到大清银行检查并收下存款，其数额只有2.6万余元，而且一半是纸币。据说11月24日派人到藩库点检时，有79.4万余元，几乎都是纸币。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自然的事。武昌起义一个月之后广东光复，现银全被提走了。例如，度支部广州造币分厂的“100万两铸本”被北京当局提走。军政府押收的“银铜各物总共只有83万余两”，这个收款在报告册中为81万余元。不仅“提走”，也有“拿走”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先是总督张鸣岐“先期电汇50万”。仿效这种手法，不仅盐运使、学政以下直到知府的出逃文官都各自拿走，而且各地的关税厘务委员以“忠于满清”为借口，纷纷携银潜逃。因此，广东军政府必须从极为不利的财政出发点开始。从报告册看，官银钱局共有81万，最初十天没有收入，但连日支出却达十数万元。这期间，在财政上支持军政府的，是广东人民进行小额政治捐款和支持革命派的香港商人提供若干贷款。仅从报告册捐款项目看，最

初十天本部的政治捐款收入共计5,000元,但没有经过财政部的支出大概也很多,我想数字不会小。至11月11日,香港商人已提供四、五万余元贷款,应该说,是很及时的支援了。

香港商人较早提供贷款,这大概是后来任财政部长的李煜堂工作的结果。①据说李煜堂是四邑公司总理,该公司多年来一直给当地的革命党机关报以财政援助。他同时是四邑轮船公司总理,而且是个热心的排日人士。所谓四邑,指开平、恩平、新宁、新会四县。在数百万华侨中,广东人最多;广东人中,四邑人最多。有一种说法:“四邑公所的势力不可侮。”李的智囊团由陈少白等人组成,因此他们向刚成立的军政府贷款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广东总商会向军政府贷款,第一次是11月17日的3,600元。他们赞同革命派的和平独立的建议,始终拥护张鸣岐的“独立”,不推戴胡汉民。他们的构想后来公开写在广东全省水陆军务处的公文中,认为应走江苏省的道路,即“独立以后,文武官员不变动,整然有序,容易整顿”。②所以,他们在张逃亡而没有实现他们的构想之后,虽然没有阻止胡汉民就任都督,但也不积极予以合作。商绅阶级直至17日才提供一点贷款,这是因为当天建立了

表1 总收支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余 额
一期(11.9—12.19)	641	572	69
二期(12.20—12.31)	583	154	429
计	1,224	726	498

① 香港代理总领事船津给外相内田的报告,1911年12月6日,外务省文书MT 161.501915—1916。

② 《北京日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屈服于改良派的行政机构。然而，广州商绅的第一、二期借款总额只有28万余元，仅及香港商团的1/3左右。

表2 收入细目

	一 期	二 期	计 %
捐 款	67	17	84 (6.8)
贷 款	168	23	192 (15.7)
各项收款	405	543	947 (77.5)
计	640	583	1223

表3 支出细目

	一 期	二 期	计 %
各部行政费	28	13	41 (5.7)
各军薪饷	204	43	247 (31.0)
水陆各营	173	61	235 (32.3)
其 他	167	37	204 (28.0)
计	572	154	727

再看支出情况。如表3所列，“各军薪饷”与“水陆各营”两项占全部支出的2/3。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民军经费即各军薪饷，共247万余元，这是50天的支出，以每月10元计算，大致是16万人的薪饷。民军各部队按什么标准支付，从这个报告册中无法判断。例如，李福林的福字营，从12月3日至31日间饷银、抚恤金等名目的七次支付共计5万余元。李福林的部队在番禺县起义，一定是

很早就开到省城的。我想，他们在12月3日以前不会从财政部领款，但具体情况不清楚。只要不是为其他部队代领，对于2,000人的部队来说，这5万元是足够多的了。此外，张禄的禄字营军，从12月5日至30日先后四次共支付了约10万元，以人数计算可以说是相当优厚的。大概最为优待的是副都督陈炯明的循军，仅第一期就领款20万元以上；第二期时陈自己任代理都督，可以想像，领款就更加方便了。陈后来成为军阀，其基础就是这时打下的。相反，光复惠州有大功的王和顺的惠军只领到近3万，而石锦泉的石字营才拿到1.6万元。从给各部队的支付额极不平衡的做法可以看出民军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便发生了如瀛字敢死队统领谭瀛向胡汉民逼款的事。谭说：“我今无款不能回去，横直是死，不如我两人一齐死了罢。”说罢掏出手枪啪地一声放在茶几上，胡见势随即说：“我签字照发给你到军需课去领。有款无款我不敢决。”像这样强逼要款的事，其他民军统领不见得不会干。^①

旧清军的费用列入水陆各营项目内，也有列入各军薪饷项目内的。北伐经费，第一期为54万余元，第二期为15万余元。第一期，新军32万，巡防16万余，高州三督黄士龙5万余，李准8万余，龙济光23万余，帐目是比较清楚的。在第二期引人注目的是，龙济光又支取了16万，旗营于阴历11月支取了5.8万余（刚光复时旗营已支取3万余元）。总之，广东军政府必须负担包括旧清军在内的全部给养，几乎全部财政收入都用在士兵的伙食等支出上了。

1911年的财政收支大概如上所述。从掌握军政府实权的革命派对待财政问题即处理士兵的待遇问题的态度，便可了解其革命的性质。

11月15日召开有关财政问题的会议，讨论发行500万元纸币问题。而实际上重要的会议是21日各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军政府都督胡汉民与枢密员——财政部次长廖仲恺出席，议题一为北

^①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卷第102页。

伐，二为裁厘，三为安置民团。

北伐、裁厘、安置民团这三件事相互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方便起见先叙述裁厘问题。所谓裁厘，就是废除厘金。厘金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一种制度化的真正手段，它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立即予以废除的。胡汉民与廖仲恺依据革命方略提议立即废除，但有人却以确保财源与避免外国干涉为理由主张慎重行事，结果决定自“明年正月初一”（1912年2月18日）起废除。于是，在临近期限的2月6日召开了省临时议会，慎重论者获得了胜利，决定“民国成立后，俟各省裁厘时广东也同时裁撤”。^①

这次省临时议会的召开是后来与胡汉民对立的旧立宪派势力大力推进的，而革命派轻易妥协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事端。对于废除厘金是这样的胆怯，而诸如畜生捐、粪捐、糖捐、鱼捐等28种苛捐杂税，却在军政府成立后两周内废除了。至于28种以外的，只要民众提出和政府调查认为确属于苛捐杂税的，也陆续免除了，^②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从财源观点出发的。

革命派在裁厘问题上屈服于旧立宪派、商业资产阶级，那么在其他问题上采取什么态度呢？北伐与安置民团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但从广东需要保持一定的武装力量这一点看，却有共同的性质。提案时计划在4个月内派遣1万民军，需经费100万，这均得到了认可，而实际上报告册上记载的数额为60万元。12月5日，姚雨平率领第一队混成标约3,000名从广州出发，他们确实等到了预算外的钱。不过，北伐队的派遣有的也成了当地当权者，特别是旧统治阶级免除麻烦的简单手段，具体事例是：由于富商的策划，位于省东部的大埔县的光复部队奉胡汉民之命开赴北伐前线。

北伐有正大的理由，随之需要大的开支。但过多的民军不能用开赴北伐前线的办法处理，所以必须以安置民团的名义加以整

① 《北京日报》1912年2月24、29日。

② 《北京日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顿。本来没有民军起义，广东的光复是不可能的，而安置民团大概是超过预想之外的10万多民军使革命派感到不好办的结果吧。胡汉民就任都督次日就发出通知控制民军开赴省城，并进而提出遣散民军。11月17日会议决定“安置现有民军，不准继续招募民军”，^①21日会议又决定了对民军的具体处理办法。军政府委员苏稜谏根据胡汉民的提议，提出了处理民军的三项办法：甲、编入军队（分驻省与北伐两种）；乙、编入巡警（分乡镇与省内两种）；丙、参加垦荒和修建工程。这些措施都是针对不愿退伍的民军，对于要求遣散的民军当然论功行赏。丙策姑且不说，很明显，甲、乙两策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如果不是要求更多地遣散民军，那提案便毫无结果。但是，当时的民军领导者多数在清帝退位以后已自行遣散了人员。在民军代表会议上，陆领、黎炳求、何江、陆兰清至少在口头上表示要早些遣散民军，周康等也明确表示：“我们起义只是为同胞谋幸福，现在愿望已经达到了，立即遣散全部队回乡务农。”还有，张祿也说：“我原来支持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的，现在有幸汉、满、藏、蒙、回合为一家，民族已经融合，虏廷已经崩溃。消灭专制，也就可以逐渐发展民权。但民生主义是政府官员的事，我们没有责任。然而，要做到根本解决，应该从两个方面努力。为什么呢？财政是养兵的源泉。若财力困难，则大局危险。到那时候，不仅没有军事，民生也会有障碍，所以我从民生考虑，愿意遣散所部。”^②这些话很坦率，但自己有什么要求、采取什么行动却没有说。如果自己是忠实奉行三大主义，那么也要象孙中山一样，在实现民族、民权两个主义之后，考虑的只是要求民生，而越是关心人民的生活，领导层就越应该从统筹安排的立场出发，对遣散民军采取宽容的政策。当然，民军的所有领导者不可能都这样做。刚刚光复的番禺县河南镇发生了这样的事：一部分民军遭到军政府派去的部队

① 《北京日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

② 《北京日报》1912年4月20日。

的镇压。在那里，议员（大概是旧咨议局议员）及该镇士绅巨贾以振华社等民军（他们称之为国军）扰乱治安为名，要求加以遣散。胡汉民为此下达了命令：“振华社及张承德的军队均不是本军政府招募收编的，不遵守军纪，扰乱地方，按规定加以区别，应该遣散，以贵局（民团总局）调查处理。”后来派李福林部前去遣散振华社民军。从报告册的记载看，振华社于11月12日以“伙会”名目支取了300元，就这样被遣散了。

总之，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解决财政问题为借口，对反对派进行镇压，对服从的民军予以遣散，实际上是对旧的统治阶级妥协。换言之，这种做法暴露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打着为了全民的阶级利益的旗号，而之后便抛弃下层人民。

结 束 语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出于对清朝统治的不满，组织人民进行辛亥革命。在广东，之所以能光复省城，是依靠了革命派领导下奋起的民军力量。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勾结李准、龙济光等“新朝人物”，不仅保存了地主买办阶级的武装力量，而且与立宪派、商绅妥协，分享权力。结果，他们反对变革旧的剥削统治体制，相反，对把他们推向权力宝座的民军进行整顿。

根据以后的资料记载，仅在省城被遣散的民军就达“9万余人”。^①民军几乎都被遣散，当然也有只遣散别人的民军而不遣散自己的民军的领导者，其中最大的就是陈炯明。陈炯明在胡汉民跟随孙中山北上以后以代理都督名义掌握实权，煞费苦心维持并扩大自己的军队，接着撤销石锦泉的民军，用武力镇压王和顺的民军，一步步地巩固其地方军阀的地位。

但是，革命派对旧的统治阶级调和与妥协，是否能永远得到觉悟的人民的宽容呢？共和国幻想破灭之后，革命派的命运最主

^①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0页。

要表现在第二次革命时的失败上。鲁迅说，一瞬间光明之后就是黑暗的军阀统治。然而，中国人民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新的领导集体及其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新的征途。

齐福霖译

辛亥革命在上海

M·埃尔文

所谓辛亥革命，是一次由许多事件组成的革命大合唱。^①本文所研究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导致满清统治在上海垮台的有关事件。其主要论点是，在1911年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月，当地已经发生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权更迭，而革命的主要进程则是当地新的掌权者与同盟会和光复会中的活跃分子暂时合作的过程。确定这些掌权者是否是某种程度上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关键问题。证明这种划分的有力根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近代或半近代的商业、金融、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并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从新、旧两方面的结合中赢得实力；他们既有传统的绅士身份和地位，也参与了现代的社会福利事业，比如医院和自来水工程；他们不但在传统的行会和帮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掌握着现代的商会。

一、1910年后期到1911年初期的权力更替

由民选的领导者控制的自治机关在1905年最早出现其萌芽，到1911年春末在上海的县级行政管理中，这一政权形式就盛极一

^① M·埃尔文：《辛亥革命研究述评》，见《近代中国》（《辛亥革命专辑》）第2卷第2期（1976），第193—197页。

时了。①在周围的乡村也发生了同样的权力转移。

这种情况在龙华修道院表现得尤其明显，它座落在上海稍南的漕河泾乡自治公所辖区之内。1911年4月17日夜，龙华的警长发现一个26岁的修女和4个乡下人住在修道院院长的房间里，修道院院长因此声名狼藉。此案本应立即禀报知县，但并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公断人伍绍基进行了干预，他是自治公所董事之一。他自作主张地决定修道院院长付150元的罚金，交给当地的一所学校。如果不是自治公所的其他董事想利用这件丑闻作为没收寺院土地的借口，这事也就了结了。他们向监护人和知县告发了修道院院长，并要求首先查封修道院。监护人要求知县对此采取一些措施，知县在给漕泾区董事的非同寻常的公文中声称他无能为力：

“不能不说修道士们有伤风化。而且恶习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近来人民的权力已有稳定的提高。舆论已失去控制，大部分人对于修道院的是非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两个人甚至提出相反的意见。少数人主张煽动大众采取行动。秘密会党在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各地一片混乱。当地官员手足无措，无力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即使他们说些什么，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不免成为流言蜚语的受害者。这就是创立一个新制度的真正含义吗？自治的精神就在于此吗？”

“我仍没有得到警察局逮捕龙华修道院修女的报告。此事的棘手之处在于：如果我仅仅依靠你们这些绅士提交的请愿书，就让我的手下人去查封修道院，甚至可能的话，要它自我改造，那么我的一切公告、调查、禁令、行政管理或者驱逐令只不过是满足手下人的

① M. 埃尔文：《1905—1914年的上海行政管理》，见埃尔文与G. W. 斯金纳合编《东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第239—262页。

敲榨勒索。那将会使他们阳奉阴违，并为在各级自治机构中无赖之徒的敲榨和无理庇护大开方便之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仍免不了政敌的诽谤，成为他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我的循矩蹈矩只会引起人们的嘲讽，并无益于我们的社会。显然形势在一步步变得使我束手无策。”①*

为了摆脱困境，知县请示自治议会他应如何行动，并希望“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合作”。但是上海议长拒绝了，可能是他不愿意卷入其辖区之外的这场肮脏冲突中。②当监护人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予以协助时，考虑到“县长那恼人的话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于是他们寸步不让。他们说他们只“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行事，并且援引法律条文来为他们这样做辩护。③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他们首次直接拒绝来自帝国官方的明确要求。

当时江苏巡抚程德全的文件中有许多证实龙华案件影响的资料。1910年他走马上任不久，就向他的上司作了如下报告：

“这个省的官员在处理公众事务时常常和绅士们发生争执。当他们在所有问题上融洽一致时，官员们总是按绅士的要求去做。人们几乎忘记权力归于哪一方了。”④**

1911年4月，上海川沙地区爆发了一场反对当地自治机构的骚乱。这可能是衙门里的官吏由于痛恨自治机构逐渐削弱他们的

① 《上海自治志》，下简称《自治志》（上海，私家刻印，1915），文献B，第58页ab。《字林周报》，1911. 9. 30第837页和1911. 10. 7第14—15页，载文指出这种指控只不过是“别有用心地占领修道院的漂亮借口”。

② 《自治志》文献B，第58b—59a页。

③ 同上，第59ab页。

④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第17页。

• 此引文本应用文言体，此处采用了编译。——译者

• • 此处系编译。——译者

地位而插手挑起的，也可能是当地的流氓妄图混水摸鱼。而且肯定有一种普遍的迷信想法，担心庙宇一旦因为自治目的而被占据，可能会发生什么灾祸。此外，新税法的施行也使他们不得人心。①程这样训诫他的下属：

“这次骚乱的起因在于自治……这个被牵涉的官员闭目塞听。他没有深入体察民情制止这场骚乱。太平无事时，他事事听命于绅士头头；麻烦来了，就把一切推给下属……我想问一下，是谁批准把刘公的神殿改作学校的？谁同意把愚公的庙宇用作办公衙门的？又是谁想做自治的监管？……昨天我接到苏一淞一泰地区监护人的一份请愿书，其中他说道：‘被那些机构强征的税收确实有些沉重，而且已在人民中间引起怨愤。’……为什么该官员在那些绅士头头起草的有关征税决议和税收规则上放弃了他的权力？他为什么不仔细审查一番？”②*

关于乡村自治组织的力量和不得人心的最后一个例证是，当自治领导者与南汇、浦东等地的革命者合作时，一般民众同帝国官吏站在一道反对他们。③

1909年12月，《字林周报》曾预言：“专制政府可能仍以为，无论是秘密团体还是外国‘入侵’都不会危害其权威，这一权威就象由其产生的符合法律的力量一样经常被有效地滥用。”④1911年夏，这一预言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变成了现实。就控制地方民事

① 寺木：《清末民国上海的地方自治》，见《御茶水史学》第5卷（1962）；《民立报》（1911）3—5月报上到处可见；《自治志》文献B第61a页。

②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1—12页。

③ 《字林周报》，1911. 11. 11第352、370页；1911. 11. 18第436页。

④ 同上，1909. 12. 18第646页。

• 编译。——译者

管理这一点来说,革命的关键问题不是摧毁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而是争取市自治议事会站在他们一边。(使当地的武装保持中立是一个琐碎的任务,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一点上市自治议事会的影响是很关键的。)宋教仁和陈其美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是同盟会在上海的领导人。这年夏天他们创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协调整个扬子流域的革命活动。^①正如他们指出的:“上海起义的中心问题是与商团建立联系,并获得知识界和绅上阶层的好感。”^②

控制上海为共和派提供了必要的财源、给养和武器。没有这些,南京方面是不可能倒台的;甚至在最初的起义中心武汉起义者初次受挫后,政府军队的初胜转化为满清王朝的决定性胜利是很可能的。^③

因此,如果我们想弄清上海革命的直接原因以及1911年其他一些地方革命爆发的更深刻的根源,阐明市自治议事会成员,即握有当地相当实权的掌权者的转化进程是很重要的,他们逐渐疏远而积极反对帝国统治。

二、立宪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

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看到满清政府的明显无能,以及它对外国利益的屈从,都感到震惊。这种关心在地方绅士和商人中间引起了两次相互关联的运动。首先是在清政府颁布九年立宪大纲之前掀起的促使召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的运动;第二次是被称之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其中主要是收回矿

^① 沈云龙:《现代政治人物述评》(台北,1966)(上),第81页。《中国革命记》(上海,1911)第三卷,纪事,第9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1962)第三集,第48页。《各省光复》(台北,正中书局,1963),第一卷第374页。

^③ 《字林周报》,1911.11.11第362、363页;1911.12.2第585页。F. O. 228/1806,法磊斯致朱迓典电,1911.11.23。沈云龙书,(下)第74—75页。

权和铁路修筑权。^①这两次运动都促使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这些组织一开始便支持清政府，但后来却不同程度地转而反对它。这些运动都已经被深入研究过了，本文的目的只是表明上海地方自治机构的一些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些运动。

著名的学者和实业家张謇是江苏立宪运动的领导人，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中国立宪运动的领导人。^②1906年，他在上海创立了预备立宪公会，一部分同事与他合作，其中有李钟珏（平书）和李厚佑（云书），这时李钟珏已是自治议事会的执行委员，后来不久李云书也担任了此职。^③1909年张当选为江苏谘议局的议长，他领导当时已有的14个省的谘议局要求尽快召开国会。^④代表们来到北京；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摄政王拒绝时，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组织进一步给清政府施加压力。^⑤1910年间又有许多代表涌入北京递交请愿书。来自上海商务总会的代表是沈绶云（懋昭），他是一个银行家，也是市自治议事会的成员。^⑥10月3日，资政院或称众议院首次召开会议。^⑦建立这一机构只是用以敷衍

① 关于立宪运动，参阅《字林周报》1910.7.15第134—137页的文章《立宪运动的兴起》；以及本报1910.7.29第268—270页；1910.8.5第312—314页；1910.8.12第363页；1910.8.18第417页；1910.8.26第469—470页；1910.9.23第714—715页；1910.10.14第87—89页；1910.11.10第336页；1910.11.25第465—499页；1911.1.6第19—21页的连载。张玉发：《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京华印书馆，1971）；张鹏远：《立宪派》，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黑文，耶鲁大学，1968）；J.H.芬彻：《1900—1912的中国自治运动》，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69；关于收回利权运动，见藤井正夫：《清末铁路国有问题与资产势力一侧面》，《历史学研究》第183卷（1955）第22—30页，以及李恩翰：《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台北，京华印书馆，1963）。

② 宋希尚：《张謇的生平》（香港，纪生图书公司，1963）第401—498页。朱昌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65）。

③ 宋希尚书，第456页。沈云龙书，（下）第76页。《字林周报》1906.12.21第661页（这里误称为《上海当地的自治组织》）。

④ 沈云龙书，第76—77页。宋希尚书，第460页。《字林周报》，1909.12.18第645—646页；1910.1.21第144页；1910.1.28第183、206页。

⑤ 《字林周报》，1910.2.4第242页；1910.2.11第362页。

⑥ 同上，1910.5.27第509页；1910.7.1第40页；1910.7.8第103—104页；1910.7.22第205页。

⑦ 同上，1910.10.7第10、43页。

立宪派。其中半数成员是委任的，另一半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出来的；但是他们实际上一致要求一个真正的国会和负责的内阁。①清政府对《字林周报》所说的资政院的“不妥协对抗”感到震惊。犹豫了几周之后，清政府拒绝了它的要求，解散了资政院，并请愿团的国会议员回家。②由于建立了一个完全由皇亲贵戚组成的内阁，进一步激怒了公众舆论。③在张謇看来，这是致命的错误。“当时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他后来写道：“在各地他们对这一政府的疏远又何止一百倍。”④12月24日措辞温和的《申报》也以同样的论调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君主如此无情地牺牲国家的利益，而这么粗暴无礼地拒绝了……召开国会的要求？如此残暴的作法让我们难以理解……我们的政府把爱国者看成了敌人……我们遗憾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正在临近……从历史上我们了解到，一旦人民离心离德，国家的命运就注定到头了。”⑤张本人继续忠于他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理想，但是许多理想破灭的立宪派现在已站到了革命派一边。⑥其中最著名的是沈缙云，他很快成为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人物——一个革命的银行家，这使他在筹集资金和上海起义的组织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伴随收回利权运动而来的也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士绅和商人开始是攻击外国人霸占中国的矿山和铁路特权，然而当清政府拒绝废除合同时，他们很快发现已同清政府发生了冲突。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安徽士绅为铜山矿曾展开了两方面的斗争：他们既反对英华公司，也反对清政府的外务部。这一系列事件使地方团

① 同上，1910.5.13第360—361页；1910.10.21第189页；1910.10.28第230页，1910.11.4第270页；1911.1.6第10页。

② 同上，1910.11.11第325页；1910.12.2第524页；1910.12.16第659、660页；1910.12.23第692、719页；1910.12.30第789页；1911.1.6第9—11页；1911.1.13第64页。

③ 宋希尚书，第463页；沈缙龙书，第77页。

④ 宋希尚书，第463页。

⑤ 译自《字林周报》1911.1.6第16页。

⑥ 沈缙龙书，第77页。

体的领袖们支持反对专制当局的立场。①

1907年和1908年间，地方绅士发动了从中英公司手中收回江苏和浙江铁路修筑权的斗争，上海市自治议事会的成员李钟珏和李厚佑在这一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关于浙江铁路，由于发起人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专制政府被迫废除了曾与这个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同意几乎全部由地方控制。《字林周报》这样评论道：“这次对人为骚乱的完全妥协对清王朝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是凶多吉少。”②

这些活动只是当时遍布华中和华南大部地区的运动的一部分。③因此可以理解，当1915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并为此向外国大使借款时，上海的绅士们与正在用暴力保护路权的湖南和四川的士绅们有一种共命运的感觉，特别是当浙江铁路已受到被接管的间接威胁时。④

三、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专制政府与地方团体领导人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地方议院试图对政府官更加以指责。上海也不例外。早在1910年夏，上海的士绅就向江苏谘议局指控了道员蔡乃煌，他们抱怨蔡过于屈从外国人的特权。他的上司对他是很清楚的。⑤不管这些指责是否正当，他对夏末开始出现的金

① 李恩翰书，第163—174页。

② 《字林周报》，1907.11.11第407—408页；1908.7.18。相比之下，江苏铁路只吸收少数中国股东。亦见任以都（E. T. Z. Sun）：《中国铁路与英国利益（1898—1911）》（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

③ 见藤井正夫文，第22—24页。

④ 见藤井正夫文，第26页。关于士绅的反映，见《字林周报》1911.6.24第801页。关于四川问题，见周开庆：《四川与辛亥革命》（台北，东欣印刷厂，1964）第43—51页和《字林周报》1911.6.10第659页；1911.7.22第227—228页；1911.9.4第653页；1911.9.16第677页。

⑤ 《时报》，1910.5.3，见F.O.228/1768，第31页，译文见228/1763。另见228/1763，朱迺典致麻木勒电，1910.8.9。

融危机的错误处理，可能是上海商界对满清统治产生敌对情绪的主要原因。

1909年末和1910年初，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对橡胶的要求量急剧增加，这使一些新的橡胶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商业中心陆续建立起来。^① 在上海，中国共同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一个名叫瓦特的外国人，利用这个机会促成了橡胶股份在股票市场的繁荣。他和弗雷泽公司的麦克迈克尔以及其他一些同事一起创办了盎格鲁一爪哇房地产有限公司，这些同事中最重要的是戴维·兰代尔，他既是上海贾丁一马西森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西部商业总会的负责人。当他们以稳定上升的价格买卖股份时，他们放出风声说，为这家公司贮存股票前景是美好的。这些股票被一点点地抛售给公众，而公司的董事们只要愿意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去按票面价格去购买。到1910年3月30日，盎格鲁一爪哇公司股票半股的市价由4两上升到48两白银。^② 其他橡胶公司股票的价格也比票面价格上涨了三、四倍。^③

所有橡胶股份的大约70%最终落入中国投机商手中。^④ 其中最大的来自天津的买办陈逸卿、弗雷泽公司的买办戴嘉宝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严彭龄。^⑤ 陈和戴是中国三家银行的合伙人，它仍是正元、谦余和兆康，而严氏则是德源银行的合股者。^⑥ 陈逸卿通过中国共同保险公司同瓦特有直接交往，但他及其同伙仍通过

① 菊池土原：《上海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发生》，载《东京史学论集》第6卷《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问题》（东京，1960），第75页。《字林周报》1909.11.13第341页；1912.6.8第672—673页。

② F.O.228/2508，法磊斯致兰利电，1912.11.15；J.道格拉斯备忘录，见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2.11.20。

③ 《字林周报》，1910.5.6第334页。

④ 菊池土原文，第76页。《字林周报》，1910.10.14第81—82页。

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以下称《钱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76页。F.O.228/2508，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3.1，见1912.11.20法磊斯致朱迹典电；228/2507，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4.21。

⑥ 《钱庄》，第75—76页。菊池土原文，第75页。F.O.228/2506，霍必兰致麻木勒电，1910.8.29；麻木勒致葛雷电，1910.9.6；霍必兰致朱迹典电，1910.12.9，附件。《字林周报》，1911.1.6第37页。

向自己的银行吸收汇票以及通过低折扣兑换现金，为他们从事橡胶股票投机筹集了一大笔必要的资金。他们还通过外商和西方银行这一途径来躲避中国银行协会例行的检查制度和它经手办理的一些手续。① 英国总领事埃弗拉德·法磊斯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大投机商们迫切需要一笔钱来维持其经营，他们喜欢以银行的名义轻率地发放一些汇票，由于他们已成为这些银行的合伙人，他们可以盖上银行的公章。按正常的办事程序，这些中国人不可能从外国或者本国银行中获得现金，因为这些汇票每天要在行会中结清，而且外国银行只有得到他们的买办的担保以后才发放本国的汇票；但是这些人由于腰缠万贯，有着生意人的名声，某些外国银行允许他们大量交接这些汇票，并且相应地低折扣收回他们的信用帐。这样筹集到的资金用来进行股票投机。”②

不久出现的麻烦不象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由该城传统的金融业务中的一些缺陷引起的，③ 而是由于忽视了常规和保证条款。卷入的主要的西方银行，香港和上海银行集团，华俄道胜银

① F.O.228/2506，霍必兰致朱述典电，1910.12.9，关于中国共同人寿保险公司的附件；228/2507，法磊斯致朱述典电，1911.2.28。

② F.O.228/2508，法磊斯致朱述典，1911.3.1，附于法磊斯致朱述典电中，1912.11.20。

③ 例如，见菊池土原文，第77页和M.C.白吉尔：《上海的金融危机》（巴黎，蒙顿，1964）第4—5页。很容易找到根据来证明当时中国银行体制中有一些缺陷，如严重亏损。这可从F.O.228/2506，霍必兰致朱述典电中（1910.12.21）找到例证。考虑到以下因素，这类根据并不充分：①只要外国银行在其买办的担保下贷款；②只要买办每天报告经营额，并把它交给银行协会；③只要银行协会晚上清帐时能掌握当时情况，就不应对精明的银行家大惊小怪。见F.O.228/2507，法磊斯致朱述典电，1911.2.28。陈和戴打破了这一惯例。银行协会抱怨的基本点是它失去了以前的对汇票的全面检查和其下属各银行提供的透支额（F.O.228/2507，法磊斯致朱述典电，1911.3.6）。

行，特许银行和国际银行，都同中国银行一样负有责任。^①

陈和戴另有一个资金来源，这是由于上海道员蔡乃煌把政府的基金投入了他们的银行。蔡这样做仅仅是遵循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而这一规矩至少给他的一个前任带来了好运。^②四川保路同志会也有125万两白银投放在这两个股票投机者或他们的银行中。^③尽管如此，卖出的股票的较大部分不是立刻付清，而是在后来一个预定的日期内付清，这一日期或者在4月的某个时间，或者在通常季节性结帐时的6月底。合同的履行要由股票经纪人作出保证，如果其中一个客户拖欠，他们个人则须承担责任。^④这样，持有正元、兆康和谦余银行汇票的外国商人和银行、道员、四川士绅以及股票交易所许多成员的命运就和这两个投机商联系在一起了。

4月中旬，盎格鲁一爪哇公司的半股价格跌到28两。4月底又跌为大约7两。^⑤橡胶市场的其他股票也同时下跌，尽管幅度较小。^⑥这就给投机者带来了巨大损失，尤其是那些涉足盎格鲁一爪哇公司的人。这样，他们及其经纪人显然要走向破产，于是，他们没有顾及瓦特利用中国共同人寿保险公司赢得的利润，便离他而去。^⑦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快的结果，盎格鲁一爪哇公司的经理创办了一个新的公司，并为它取了个气派宏大的名字：中国托拉斯。中国共同人寿保险公司为它提供了80万两白银的资

① F.O.228/2507，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1.2.28。

② 《钱庄》，第68、69、70页。F.O.228/2508，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1.3.1。见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2.11.20；228/2506，香港和上海银行致朱迺典电，1910.9.9。

③ 《字林周报》1910.8.19第438页。

④ F.O.228/2508，法磊斯致兰利电，1912.11.15，见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2.11.20。

⑤ 《字林周报》，1910.6.24第749页。F.O.228/2508，法磊斯致兰利电，1912.11.15，白吉尔夸大其辞地说，股票暴跌后，橡胶公司的股票一钱不值。其实盎格鲁一爪哇公司继续付股息给股东。见《字林周报》，1912.6.8第672页。

⑥ 从100%下跌到300%，见《字林周报》，1910.6.24第749页。

⑦ F.O.228/2508，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1.3.1和法磊斯致兰利电，1912.11.15。皆见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2.11.20。

金,还有一些公众捐助的资金;它计划每年以9%的利息贷款150万两给股票交易所,以便使股票经纪人能够偿还其股东的欠债。①用英国总领事的话说,6月结帐的受害者是怀着“恐怖的”心理去偿还债务的。②

橡胶股票的下跌引起了一场金融危机。7月22,与陈逸卿和戴嘉宝有合作关系的3家银行被迫关闭。接着,又有5家银行随之关闭,其他银行也被迫暂时停止营业。③对此有着共同利益的蔡乃煌和一些外国银行这时达成一项协议:由中国政府担保,银行贷款350万两给道员,年息4%,他要用这笔钱偿还他们在3家倒闭的中国银行中拥有的汇票。④这次与外国银行的结帐一下用去了140万两,其中包括付给兰德奥的10万两,他为此付了10%的回扣,⑤而利息一直由道员如数偿付。蔡还答应让这3家中国银行偿还他们其他的债主,然而他给了他以前的两个生意伙伴陈和戴充裕的时间,使他们把仍然十分可观的财产转移到法律可及的范围之外,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从他们身上得到钱财。⑥中国银行协会感到奇怪的是,蔡控制着这些银行的大部分现金和抵押品,却不让它们停止营业。他们推说他是利用外国银行贷款的余额和另一笔从中国各界中筹集来的150万两白银来结清自己的帐单的;在

① 《字林周报》,1911.6.6第329页;1912.1.20第161页。贷款给股票交易所看起来好象是亏损,怀疑其正确性的中国托拉斯的股东们只是当瓦特和盎格鲁一爪哇公司的其他董事们提供担保时,情绪才稳定下来。见《字林周报》,1911.3.10第565、566页。

② F.O.228/2508,法磊斯致兰利电,1912.11.15。

③ 《字林周报》,1910.7.29第267、268页。F.O.228/2506,霍必兰致麻木勒电,1910.7.24。《钱庄》第74页。陈还在外国的股票投机中蒙受了巨大损失。见F.O.228/2507,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3.6。

④ F.O.228/2506,霍必兰致麻木勒电,1910.7.24;霍必兰致麻木勒电,1910.8.4。《钱庄》第76—77页。中国政府赋予了道台这样做的权力。见F.O.228/2506,参议院致总督电,约在1910.7.27。

⑤ F.O.228/2508,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3.1,见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2.11.20。《字林周报》,1912.4.13第83页。《钱庄》第78页。

⑥ F.O.228/2507,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2.27和法磊斯致刘道台电,1911.2.22。均见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4.21。

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是对的。^①

他没有成功。当9月份庚子赔款的分期偿付到期时，他拿不出以此作为担保的120万两白银的海关收入。^②9月底，中央撤销了他的职务，并指控他以虚假欺诈的手段与外国签订了贷款合同来掩饰他在橡胶股票投机中的损失。中央政府给他两个月的时间用硬通货解决好财政赤字问题。^③

这是一个失算。通过强迫蔡交出现款，而不是交出他的前任们离任时曾被允许移交的存款信用卡，中央政府迫使他立即收回他借贷给一些重要机构或个人的官府的大笔基金。结果导致了欠上海道衙门300万两白银的源丰润银行的破产，并使当地许多富裕的商人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之中。^④在外地的源丰润银行的17家分行也倒闭了；这使其他一些银行和公司也随之破产。^⑤只允许两江总督张人骏用另一笔借自外国银行的贷款来防止蔡在其中拥有资产的两家官方银行破产和稳定经济形势。^⑥1911年初，另一个大的银行义善源银行，连同它在全国的27家分行也因为它在这次事件中所遭受的损失而破产。^⑦蔡逃往新加坡。

袁世凯认为是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上海的商人反对满清政府，^⑧并认为上海的商业界在财政问题上明显地对官府怀有怨恨情绪。上海橡胶股票下跌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直接损失大约是350

① F.O.228/2507，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3.6。1912年，当外国领事利用道员的担保付清仍欠外国商人的120万两白银时，瓦特所得款项最多。见《字林周报》，1912.10.20第186页。

② F.O.228/2506，兰德奥关于霍必兰致麻木勒电备忘录，1910.10.21。菊池土原文第78页说是200万两，《钱庄》（第68页）说是190万两。

③ F.O.228/2506，麻木勒致多恩电，1910.10.12。《字林周报》，1910.10.7第41—42页。

④ F.O.228/2506，霍必兰致麻木勒电，1910.10.7；麻木勒致多恩电，1910.10.12。菊池土原文，第78—79页。《字林周报》，1910.10.28第228页。《钱庄》第80页。

⑤ 《钱庄》，第81页。菊池土原文，第79、96—97页。F.O.228/2506，麻木勒致多恩电，1910.10.12。

⑥ F.O.228/2506，禧在明致朱迹典电，1920.12.19。

⑦ 《字林周报》，1911.4.1第43页。《钱庄》第88页。

⑧ 《字林周报》，1913.5.13第551页。

万两到450万两。①而由于外国银行不再信任中国银行的汇兑制度，从中抽回了它们的资金，剥夺了许多行业的经营资本，所有这些给中方带来的间接损失恐怕要多得多。②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损失导致了大量行业破产。③张人骏与香港和上海银行协商后，用一笔200万两的贷款来补偿源丰润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但是中国商业总会为了偿付这笔贷款，不得不发行公债。④经手向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商人发放公债的是邵琴涛（廷松）、沈缙云和王一亭（震），后两人不久成为上海最热衷革命的商人。⑤革命期间，沈缙云和李钟珏都对道台衙门负有沉重的债务；李钟珏的生意伙伴刘学勋，在危机时期曾遭受两家银行倒闭的打击；香港和上海银行集团的一个高级职员甚至把李钟珏描述成“破产者”。⑥虞洽卿（和德），可能是这次国际结算中的主要华商，也对道台蔡乃煌负有沉重的债务。⑦最后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革命爆发不久，上海的许多商人和银行都贷款给革命党人，条件是废除他们所欠前道台衙门的债务。⑧

上海的银行家在北京鼓动反对蔡，认为他在陈逸卿事件中损

① F.O.228/2506，霍必兰致朱迺典电，1910.12.21；228/2507，刘致总领事电，1911.3.25。见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1.4.21。

② 菊池土原文，第77页。外国和中国的银行与上海的商业和工业在财政利益上紧密相联。见F.O.228/2506，麻木勒致葛雷电，1910.9.6；《字林周报》，1911.8.19第437页；1912.2.17第429页；1912.3.23第762页；1912.9.7第702页；1912.9.7第702页；菊池土原文，第91—92页。

③ F.O.228/1768，霍必兰致蔡电，1910.8.13，附件39。

④ 《钱庄》第81页。F.O.228/2506，禧在明致麻木勒电，1910.11.3和下一信件。

⑤ 《钱庄》第82页。

⑥ F.O.228/1806，朱迺典对法磊斯电文的批注，1911.11.8；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1.11.13。李钟珏欠40万两，刘欠20万两。见《自治志》文献C，第51a页。关于他的银行，见228/2507，法磊斯致朱迺典电，1911.4.21（45条）；《钱庄》第69页。关于他与李钟珏的联系，见李钟珏的《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上海，1923），第1736页；《自治志》，文献A，第140b页。

⑦ F.O.228/2506，香港和上海银行致英国公使馆电，1910.9.9，出处见上注。

⑧ F.O.228/2508，1912年6月30日。

害了他们的利益，这使蔡因此声名狼藉，尽管他的倒台最终对他们是有利的。①无独有偶，四川铁路公司在这些倒闭的银行中所蒙受的损失，使四川的士绅们也指控蔡曾经贪污他们的金钱。后来，当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并对这些亏损的资金拒付任何赔偿时，他们被迫采取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的对抗。②1910年危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因此对1911年的事件产生了双重影响。

四、上海自治议事会与革命者之间联系的确立

上海自治议事会领导人与革命党人的首次秘密合作是以1911年4月成立中国国民会开始的。③沈缙云是主要组织者和会长。富商和自治议事会成员叶增铭（惠钧）任坐办。商团领导人朱绍伊充当编辑。④4月26日，沈缙云和王一亭会见了两位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英士）和朱少屏，同意国民会组织军事训练，对外声称是为了自卫。这一计划是“在我们所能做的中最安全的，既不招政府之干涉，又可免外人之嫉妒”。⑤王一亭一开始就“到处”宣传陈其美；同时沈缙云可能沟通了陈与伶界领袖潘月樵和夏月润的联系，而沈和市自治议事会的两个其他成员此前曾与他们组织过振狮剧院公司。⑥5、6月份国民会召开群众集会，鼓励演爱

① 《字林周报》，1910.10.7第9页。F.O.228/2506，兰德奥关于霍必兰致麻木勒电备忘录，1910.10.11。

② 菊池士原文，第104—105页。《字林周报》，1910.10.7第9页。《周开庆》第46、73—74页。

③ 小岛良雄：《辛亥革命时上海的独立与觉醒》载《中国现代化社会构造问题》（东京，1960）第113—133页，特别是第126页。《字林周报》1911.4.28第299页；1911.5.20第499页。

④ 《字林周报》，1911.4.29第299页；1911.5.20第499页；1911.6.17第754页；1911.7.15第169页。

⑤ 小岛良雄文，第126页。

⑥ 《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4卷第11页。图书平：《上海史大观》（上海，1947）下册第50页。《各省光复》第1卷，第343、367页。

闹戏。^①沈成为陈其美和李钟珏联系的中间人，直到上海起义前他们两人可能没有见过面。^②

来自李钟珏及其同伙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参加了斗争，且决心在这发生前加强他们的地位。早在3月份，李钟珏控制下的商团联合会就鼓动中国新闻界呼吁召开群众大会，“目的是讨论当前的严峻形势和采取一些措施组织民军”。^③在叶增铭坐办的领导下，一千多商人和一些绅士举行集会，讨论“可以使中国领土主权免遭威胁的措施”。^④3月14日，沈缙云写信给公共租界的义勇军中国支队，谈到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在中国实现全民皆兵，否则，要挽救祖国是困难的”。^⑤

4月11日在上海建立了民族义勇队。李钟珏被选为总司令，沈缙云和叶增铭是副总司令，而公共租界义勇军中国支队的队长虞洽卿当选为候补副总司令。^⑥后来，上海自治议事会的两名成员王一亭和张嘉年（乐君）代替了沈。^⑦这样，拥有大约350人的前商团武装得到迅速扩大。刚革命后他们的总力量见下表：

1912年初的上海商团

名称	领导人	自治政府领导人	人数
1. 商团公会	李钟珏 (平书)	✓	600
2. 商余学会	郁怀智 (屏翰)	✓	300
3. 商学补习会	苏本炎 (筠尚)	✓	320

① 《字林周报》，1911. 4. 29第299页。

② 《李钟珏》，第187页。

③ 《字林周报》，1911. 3. 10第579页。

④ 同上，1911. 3. 17第624页。

⑤ 《字林周报》，1911. 3. 17第637页。

⑥ 同上，1911. 4. 15第164页。

⑦ 《字林周报》，1911. 7. 15第169页。

4. 救火联合会	毛经仇 (紫见)	✓	80
5. 闸北商团	钱允利 (归三)	✓	120
6. 清真(回教)商团	沙善宇		70
7. 温怀(珠玉业)商团	杨东升		80
8. 洋布业商团	于保卿		100
9. 水果业商团	姜义 (荣斋)	✓	40
10. 豆米业商团	张嘉年 (乐君)	✓	120
11. 商务印书馆 体育部	张国杰(亭归)	✓	80
12. 沪西商团	朱炯(建堂)	✓	100
13. 书业商团	陈润夫		100
14. 参药业商团	苏本炎	✓	100
15. 市中区商团	莫锡纶 (子经)	✓	60
16. 志成(杂粮业)商团	叶增铭(惠钧)	✓	40
17. 技艺商团	张嘉年	✓	60
18. 四铺商团	毛经仇	✓	40
19. 十铺商团	龚莫(子凡)	✓	40
20. 十五铺商团	凌几壮(伯华)	✓	40
21. 十九、二十铺和平 维护商团	莫锡纶	✓	50
22. 二十二铺商团	姚文栋(子梁)	✓	(?)
23. 二、七铺商团	张焕斗(一差)	✓	40
24. 沪北第三十商团	杨维阴		20
25. 九铺商团	顾学谦(一直)	✓	40
26. 西区商团	张交元	✓	20
27. 南市商团	张?		20
总 数			2,690

材料出处：《上海史自治志》，文献C，第70ab页。

这些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商团武装在多大程度上自觉支持革命，是不清楚的。谈到穆斯林商团，只知道其领导人给他们作形势报告，向他们灌输推翻满清的思想热情。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可能是维护当地的法律和秩序。^①他们在第二次成功地攻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任何记载说明后来他们前去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

市自治议事会和革命党人合作的第二阶段发生在10月底，也就是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之后。对此李钟珏在自传中有如下描述：

“十月*武昌起义，风声所播，感动于中。南市信成银行主任沈缙云君与陈君同志，与余为莫逆之交，介绍陈君定期相见。余约沈君信卿（恩孚）、吴君怀玖（馨）、莫君子经（锡纶），相与密商。余谓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乃约陈君（其美）于贞吉里寓楼。”^{②**}

从10月24日起，李钟珏、陈其美、叶增铭和沈缙云每天都在信成银行或《民立报》馆聚会，制订计划，《民立报》是租界内主要的革命报纸。^③作为本报股东的沈缙云还提供了地下活动必需的经费。^④李钟珏说服处于他控制下的南市巡警保持中立，他还帮助陈其美去劝说本城巡警局局长姚捷勋中立。^⑤革命党人因此能够到处活动，而没有被捕的威胁。

外国人对这种权力均势是很清楚的。10月18日，总领事法磊

① 柴德庠等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7卷第90—92页。《李钟珏》第187b页。对商团持积极肯定态度的，见《各省光复》第1卷第386页；持否定态度的，见第1卷第380页。

② 《李钟珏》第187a页。

③ 《回忆录》第4卷第43页。《各省光复》第1卷第374—375页。

④ 《回忆录》第4卷第48页。

⑤ 《李钟珏》第187b页，《回忆录》第4卷第27页。

* 原文八月。——译者

** 此处用自传原文，与英文略有出入。——译者

斯对英国公使朱迺典说，道台刘燕翼自信他能维持秩序。^① 10月22日，他写道，“全面防止叛乱”是人之常情，但同时他也认为，任何“明目张胆的行动”都是不大可能的。^② 10月28日他报告说，道台的观点是，“一旦形势对他们有利，这儿的革命党人准备实行占领”。^③ 《字林周报》也谈到最近出现的支持革命的深厚感情。^④

商团逐步完全控制了上海。9月，他们的巡逻队配备了大量左轮手枪，并进入戒备状态，以防当时长期困扰着这个城市的大米缺乏所引起的骚动。^⑤ 武昌起义后不久，李钟珏和莫锡纶建立起上海商团筹备联合公所，以便协同指挥。^⑥ 10月26日，道台呼吁上海自治议事会阻止革命爆发，议长则派出额外的商团和警察巡逻队作为响应。^⑦ 11月1日，在南市九亩地检阅了由2,000多人组成的商团，确定了防区，李英石被任命为临时总司令，^⑧ 他是李钟珏的亲戚，并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训。直接接管政权仅有一个障碍，这就是在江南制造局和城郊驻扎着大约二、三千人的官方部队。

为摧垮这些部队曾使用了几种办法。11月1日或2日后，商团极力想赢得他们的同情，他们还劝说制造局的工人卸下一些枪炮的炮闩。商团很可能赢得了停泊在黄浦的海军舰队司令林舰长的支持。^⑨ 李钟珏利用他在江南制造局任提调的地位，试图用不暴露其真实身份的暗示手段引导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与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张的忠诚使他对李的游说毫不动心，但李钟珏成功地争

① F.O. 228/1806，法赫斯致朱迺典电，1911. 10. 18。

② 同上，1911. 10. 22。

③ 同上，1911. 10. 28。

④ 《字林周报》，1911. 10. 28第213页；1911. 11. 4日第273页。

⑤ 同上，1911. 9. 16第690页。

⑥ 小島良雄文，第123页。

⑦ 《自治志》，“事件概论”，文献B，第17a页。

⑧ 《民国上海县志》，第1卷第49ab页。《李钟珏》，第188b—189a页。

⑨ 《各省光复》，第1卷第388—389页。

取到吴淞要塞指挥官姜国樑和主管城围防务的梁敦焯的支持，他们都是先前李在武昌武备学堂任提调时的学生。①

五、革命党人内部的分裂

上海革命党人的力量由于同盟会和光复会间的宗派之争而大受损害。②武昌起义后，那儿的革命力量领导人黎元洪派李燮和为上海总司令。燮和是久经考验的湖南籍革命党人，他曾鼓吹“铁血哲学”，并抛弃家庭，追求自己真诚和英雄主义的理想。③在和他同道而来且多是湘籍的几个同志的帮助下，他开始着手推翻政府的军事武装。他们是如此地成功，以致于引起了陈其美的嫉妒，因为他感到他在革命运动中的地方优势会因此受到威胁。④陈告诉他的代理，“李燮和及其同伙不是我们的人，不应信任”。甚至必要时，他们试图用贿赂手段使李阵营中至少一位动摇的军官加入到陈这一边。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燮和信任陈。他知道上海的同志正在向武昌运送武器和资金。⑥他因此让他们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据说他后来声称：“我们一直视陈其美为我们的同志……又有谁怀疑他的同情心会转向别处去呢？”⑦

陈对李燮和的态度还有一个历史背景。他们各自属于革命运

① 《李钟珏》，第188a页。参看《回忆录》，第4卷第45页。

② 上海革命的背景综述和1911年的一系列事件，见M. B. 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党人：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第3、4、5章和第203—214页。

③ 商炳和，《新人春秋》（台北，文星书店，1962）第12卷第1期。《革命记》第4期；《传记》第2—3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226页。

④ 张国淦书，第226—227页。

⑤ 《回忆录》，第4卷第43—45页。

⑥ 张国淦书，第226页。《字林周报》，1912. 1. 13第120页声称上海各银行“调度所有可利用的白银”支持武昌斗争。

⑦ 《回忆录》第4卷第32页；另见第4卷第20和第35页，第4卷第29页记载略有出入。

动两个不同的分支：同盟会和光复会，而两会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合作。最初的光复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其成员来自当时的爱国者、革命党人和教育界人士。其领导人是蔡元培，也包括它的成员徐锡麟和陶成章。^①同盟会1905年成立于东京，由孙逸仙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联合组成。^②光复会的大多数成员也加入了同盟会，但并不是全部。^③陶成章曾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馆工作。^④然而，1908年，陶与孙逸仙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回到以前曾从事革命工作的新加坡和东印度，在那里，在政论家章炳麟的指导下，他重振光复会为独立的政党。^⑤

正是在这一新党中李燮和开始崭露头角；但他是个完全摆脱宗派主义观念的人，1911年4月在最终失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他曾在黄兴手下工作。^⑥陈其美与李燮和并无个人争执，只有组织上的分歧；但与陶则有个人意见之争。以前陶和陈在日本时，陶好象曾在孙逸仙面前劝陈起誓放弃使他臭名昭著的嫖赌恶习。陈从未原谅陶对其声誉的非议。^⑦1911年夏，陶和他的锐进学社在上海积极活动。但他并没有呆在那儿，只是在武昌起义后才返回上海。很明显，陈急于想阻止陶影响的扩大，因为他知道，武昌的大多数老革命党人都与光复会有联系。^⑧一般认为，革命后是他安排人在法租界的一所医院里刺杀陶的。^⑨

革命阵营的这次分裂几乎造成灾难。陈是如此地想抢在李燮

① 小岛良雄文，第124—125页。《辛亥革命》第1卷第515页。图西平书，上，第45—46页。

② 小岛良雄文，第125页。薛君度：《黄兴和辛亥革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

③ 小岛良雄文，第125页。

④ 《辛亥革命》，第1卷第517页。

⑤ 《辛亥革命》，第1卷第517—518页。

⑥ 同上，《革命记》第4期；《传记》第2期。

⑦ 《回忆录》第4卷第9页。另见《辛亥革命》第1卷第520页。

⑧ 小岛良雄文，第128页。张国淦书，第226—227页。《辛亥革命》，第1卷第527页。

⑨ 商炳和书，第12卷第5期；《回忆录》第4卷第9和第10页。《辛亥革命》第1卷第520和第528页。

和的前头，以致于他和市自治议事会的盟友秘密协商后，比原计划提前两天发动了起义，即在11月3日而不是5日。^①李钟珪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

“初议上海视南京举动。既而第九镇退出城外，南京势难骤下，而汉阳有失守之信。九月十一日*，陈君改议上海先动，苏杭应之。吴君怀玖难之。时钮君惕生、叶君惠钧在座，咸主上海先动，钮君即从松江响应，遂应从多数决议。十二日夜，会于城自治公所，定翌日举事。”^②

11月2日据英国总领事报道，上海的“大批”中国人进入外国租界，尽管这表明它已为多数人所知，但关于计划更改，陈使李燮和完全蒙在了鼓里。^③这一欺骗使大批革命武装没能参加起义。陈可能更愿意冒险，因为李燮和曾告诉他，江南制造局内部的军队就象外部的一样，被争取到革命事业一边来了。^④这并不绝对可靠，且这一错误几乎导致了陈的失败。

六、上海革命

11月3日凌晨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索。陈其美以“上海军政府”的名义照会李钟珪，请他出任上海民政长。接着李劝说他的

^① 张国淦书，第227页。另见《回忆录》第4卷第32页。《李钟珪》（第187ab页）说，原计划直到南京起义时仍未更改。

^② 《李钟珪》，第187ab页。

^③ 《回忆录》第4卷第29、32、35页。F.O.228/1806，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11.2。李燮和在进攻制造局的战斗中突然出现。见商炳和书，第12卷第2期，《各省光复》第1卷第390页和《回忆录》第4卷第29页。计划的突然更改使陈其美的追随者未能全部参加战斗。见《各省光复》第1卷第380页。

^④ 《回忆录》第8卷第32页。商炳和书，第12卷第1—2期。

• “自传”如此，英文原文应译为“十一月一日”，是按公历，下亦同。
——译者

老朋友、前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负责起义者的对外联系。这一举动使革命事业比其他方面的行动更易于为上海领事们所接受。①

陈汉钦和其他中国党人已渗透到闸北警察之中，②中午时分他们发动了起义。这既是事先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自发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是由巡警总局局长姚捷勋拒绝发给他们弹药激发而成的。③下午2时，城自治议事会在沪城九亩地集结他们的商团，④与革命党人在整个夏季招募的武装举行了联合检阅式。这些武装由装备低劣的学生、伶界人士和青帮、洪帮组成。⑤其中最著名的是敢死队，它是《民立报》馆的一个人组织成立的，但很快就掌握在刘福彪手中，以前他曾在公共租界触犯过条例第7750条。⑥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分子应桂馨组织的青红帮的成员可能也参加了。⑦伶界信徒由潘月樵领导，⑧而学生大多由张承樵指挥。⑨大多数学生是由诸如公众研讨会等边沿组织招募而来的，这些边沿组织的公开目标是“密切注视当地事务和官员的

① 《李钟珏》第187b页。商炳和书（第12卷第3期）说，到11月7日伍才参加革命。

② 《回忆录》，第4卷第38—39页。

③ 《字林周报》，1911.11.11第337、369页；1911.12.23，包括《市政公报》，1911.12.21第334页。F.O.228/1806，法磊斯致朱述典电，1911.11.3和11.6。商炳和书，第12卷第1期。《回忆录》第4卷第6、39页。《李钟珏》，第188a页。

④ 《各省光复》，第1卷第379—380页。《李钟珏》（第188a页）说，他们相聚在西门外。

⑤ 《各省光复》，第1卷第365—366、371—372、374—375、380页。

⑥ 《字林周报》，1911.7.1第17页。《市政公报》，1912.2.15第39页；1912.4.25第132页。《回忆录》第4卷第4页。小岛良雄文，第128页。革命后，刘福彪领导下的敢死队变得“比著名的海盗还有过之而不及”。见《字林周报》，1912.3.30第845页；1913.8.23第601页；1913.12.13第816页和《市政公报》，1911.12.21第334页。

⑦ 《字林周报》1911.7.1第17页提到大批危险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回忆录》，第4卷第2页。关于英的背景，见《字林周报》，1906.6.8第618页；1906.12.8第603页；1913.3.29第927页；1913.11.15第516页；1914.1.24第246页；《市政公报》，1912.2.15第39页；《回忆录》，第4卷第11和第12页。

⑧ 《各省光复》第1卷第343页。图西平书，下，第56页。商炳和书，第12卷第1期记载略有不同。

⑨ 《各省光复》，第1卷第281页。

举动”，而保界协会声称它只关心中国边界的正确划分。^①陈其美率领这些部队去占领制造局，同时商团占领了上海的战略要点。^②

陈的部队到达制造局门口的时间是下午5时。工人们收工后蜂涌而出。少数革命党人利用这一时机试图闯入，因为他们自信守卫这一地区的部队已经被争取过来站到他们一边了。当他们前进受阻时，陈大声宣布他来这里是从小张楚宝手中接管制造局的，并要求见他。政府军的士兵们“见他既不是沈恩孚也不是李钟珏”，便把他当作恶棍绑了起来，而且把他扔进了马棚。

敢死队的一些成员发动了小规模进攻。起初守兵回之以空枪，接着便实弹反击。起义者没料到会遇上抵抗，于是慌忙撤退。此时李钟珏率一支商团赶到。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时，稍微有点不安，但很快便振作起来，并以其提调的身份进入制造局。一进去，他以陈仅是个记者为由向张楚宝求情释放陈。但他没能使张相信这一点，于是去找王一亭，并与其一同返回制造局。他们以城自治议事会和商务总会的名义联合提供担保：陈在将来安分守己。直至接近午夜时分，张仍不信这些游说，且虚于敷衍，坚持说，既然陈为《民立报》工作，在他获释前，此报应为他提供担保。于是李去找沈缙云，看是否能作如是安排。

李钟珏的神经极度紧张。他知道新政府的军队已经从南京和松江出发前来援救制造局。为了避免革命事业遭受损失，他主张疏散进攻力量以确保安全。王一亭提醒他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撤退是不可能，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继续前进。

最后决定由李燮和的随从，其中包括已经站到革命一边的一些正规军，连同陈汉钦的闸北巡警、商团和一些公众同情者继续攻打制造局。但面对守兵设置的强大火力，他们毫无进展。最后，当黎明的曙光微露在黄浦江上空时，一小部分人在制造局一工人亲戚的引导下踰垣而入，以汽油举火焚屋。张楚宝及其随员

① 《字林周报》，1911.7.1第12和第17页。

② 《各省光复》，第1卷第380页。《回忆录》，第4卷第40页。《李钟珏》，第188b页。

仓皇乘小轮逃往公共租界，接着制造局的士兵们宣布投降，这些投降的士兵中有许多是革命的同情者。^①

时道台刘燕翼和上海县令田春霖已逃离衙门，撤下的一些军官或投降或逃跑。城里一片安静，商团和救火联合会的成员在巡逻。革命的白旗到处飘扬，街头挤满了戴白臂章的人们。正如《字林周报》所说，这是一次“兵不血刃的成功”。^②

七、结 论

从上面的剖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对卷入1911年上海革命的社会力量作任何简单的分析都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从帝国政府中夺权的并不是单一的、能准确定义的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阶层集团，而是一个脆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偶然的联盟，这一联盟在1912和1913年间迅速分裂了。这是因为联盟中的不同分子追求互相冲突的利益。此外，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资考察个人行为的有力凭证，但这也不是完全可靠的。例如，为什么买办王震和银行家沈缦云在其阶层中的多数人不支持革命党人时，他们却仍然支持呢？

在与地方自治联系在一起或拥有正式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内部，其社会类型涉及的范围很广，既包括那些其号召力和名声主要建立在学识上的人，他们掌握着官位和地方福利事业（以传统“绅士”的方式，尽管常常也用一些现代形式），也包括那些其声望和势力完全依靠现代商业、金融和工业的人。这一范

^① 下述材料看起来似乎说法一致，但在许多细节问题上仍有差异：见商炳和文，第12卷第1—2页；《李钟珏》，第188a—189a页；《字林周报》，1911.11.1第337、349、369页；《市政公报》，1911.12.21第334页；F.O.228/1806，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11.6和11.3；《各省光复》，第1卷第343、344、366、379—380、381—383、387、388、390页；《回忆录》，第4卷第4、6、21、29、32、39、40、47页；《民国上海县志》，1.49b和13.10b；张国淦文第227页。

^② 《字林周报》，1911.11.11第351、369页。《李钟珏》，第189a页。F.O.228/1806，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1.11.4和11.6。《回忆录》，第4卷第40页。张国淦书，第227页。《各省光复》，第1卷第344页。商炳和书，第12卷第2—3期。

围可以通过上海地方领导人的小型挑选展示出来：

a. 权势主要建立在学识、教育、福利和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有：

1. 吴瞿（怀玖）
2. 沈恩孚（信卿）
3. 姚文枬（子梁）

b. 权势主要依靠警察的有：

1. 穆湘瑶（恕斋）

c. 权势依靠学识、拥有传统地位和官职，以及福利事业，并主要参与现代商业兴办的有：

1. 李钟珏（平书）
2. 沈敦和
3. 陆文麓（松侯）

d. 权势主要依靠现代商业，但主要参与福利和教育的有：

1. 郁怀智（屏翰）
2. 苏本炎（筠尚）

e. 权势显著依靠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的有：

1. 朱佩珍（蕉三）
2. 王震（一亭）
3. 沈缦云（懋昭）
4. 叶增铭（惠钧）
5. 虞洽卿（和德）

上述分类必然是有点人为的痕迹，因为缺乏明确的分界线。

在这些领导人中还有谋求个人私利者。李钟珏和虞洽卿极力争夺对闸北的控制权，最后，竞争以李的胜利而告终。^①这时还

^① 《字林周报》，1911. 11. 18第413页；1912. 3. 23第800页。F. O. 228/1844，法磊斯致朱迓典电，1912. 2. 10和4. 6。

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集团，为此，《字林周报》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地方权力”。①

革命党内部的分裂情况比绅士阶层和商人们要严得多，而且，黑社会的势力在1911年后得到迅速加强。陈其美和李钟珏之间分裂了，这导致了李在距上海北部仅有几里之遥的吴淞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军政府（即吴淞军政分府。——译者）。②另一分裂是主要对孙逸仙保持忠诚的那些人和陈其美的追随者之间的分裂。这样，对孙负责上海外交事务的闻宗尧就与徐哲江发生了冲突，徐是陈的外交部长，并得到了城自治议事会的承认。③对政敌的担心使陈其美解散了陈汉钦领导的闸北武装，④但他无力控制的独立的武装力量却得以扩编。⑤上海充斥着复员的革命军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抢劫为生。⑥到1912年，《字林周报》开始谈起了“恐怖统治”和“抵制共和”。⑦从事这种活动的主要是应桂馨，他靠绑架和勒索商业团体来充实陈其美的金库。⑧其他为陈服务的恐怖分子有刘福彪和刘兵，他们都是哥老会的地方首领。⑨

因此，在贸易受到妨害和资金面临被劫掠的危险时，那些起

① 《字林周报》，1911.12.6第665页。

② 商炳和书，第12卷第3期。《回忆录》，第4卷第29—30页；另见第4卷第21、33、35—36、47页。《各省光复》，第1卷第390页。

③ F.O.228/1844，法磊斯致朱迓典电，1912.2.10和3.27。《字林周报》，1912.1.20第153页。

④ 《回忆录》，第4卷第9卷。

⑤ 这12个人的名字已为人们所知。见商炳和书，第12卷第4期；《字林周报》，1912.3.30第845页；1912.8.31第618页；1912.9.7第653和699页；1912.9.28第911页；1912.11.16第525页；《市政公报》，1911.12.21第334页；1912.2.15第39页；《各省光复》，第1卷第368页。

⑥ F.O.228/1844，法磊斯致朱迓典电，1912.3.16和5.30。《市政公报》，1912.5.16第144页；1912.8.15 (Captin—Super—intendant's Report)。《字林周报》，1912.6.8第685页。

⑦ 《字林周报》，1912.5.4第277、285页。

⑧ 同上，1914.1.24第246页；1913.3.29第927页；1913.4.12。《市政公报》，1912.2.15第39页。《各省光复》第1卷第369页。关于英与青红帮的联系，见《字林周报》，1913.11.15第516页；1914.1.10第66页。

⑨ 《字林周报》，1912.1.6第628页。

初带着极大热情支持革命事业的商人和银行家发现，“他们不可能同时既当革命领导人又充当银行家”。^① 结果，自治政府领导人分成三派：一派支持袁世凯，认为他是最有希望的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一派支持革命党人，认为他们是真正民主共和得以生存的唯一希望；剩下的，也是大多数，倾向于保持中立，他们希望既能保证安全，又能维持上海的相对独立。尽管一些绅士崇拜陈其美，其中最出名的景慕者是李钟珏，^②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迫使他离开上海，姚文枏、沈恩孚和陆文麓（松侯）在这一活动中就特别卖力。^③

革命联盟破裂的最好明证是，当1913年中期他们面对袁一步步走向独裁时，上海地方领导人组织统一战线的计划遭到失败。

5月1日举行群众大会，本意是激起反袁的公共舆论，但当一位演说者开始颂扬总统时，会议在骚乱中匆匆结束。^④ 《字林周报》评论说，“对革命捐献金钱数额不小的商人们不可能再次提供资金。以前他们认捐时所寄予的希望证明落空了。”^⑤ 上海商务总会写信给黄兴、孙逸仙和陈其美，要求他们不要“背信弃义”。^⑥ 穆湘瑶领导下的地方警察挫败了工党对制造局的进攻。^⑦ 这时，自治政府领导人中只有王震和沈缙云全心支持革命党人。^⑧ 尽管已证实袁共谋暗杀了宋教仁，但许多天来李钟珏拒绝会见陈其美，^⑨ 而且他还僭称军务部的指示，希望在袁和革命党人的争吵中保护上海和保持中立。^⑩

① 同上，1911.12.9第650页，1912.2.8第292页。

② 《李钟珏》，第197a页。

③ 《各省光复》第1卷第410—411页。

④ 《字林周报》，1913.5.8第334—335页。F.O.228/1875，法磊斯致朱迹典电，1913.5.9。

⑤ 《字林周报》，1913.4.19第169页。

⑥ 同上，1913.6.7第748页。

⑦ 《民国上海县志》，第13卷第1a页。《字林周报》，1913.5.31第638—639页，1913.6.7第677页，1913.6.14第826页。

⑧ F.O.228/2502，禄福礼致艾斯敦电，1913.9.12，附件。

⑨ 《李钟珏》，第219b页。

⑩ 《李钟珏》，第219b—220a页。

在这里不必进一步考察1913年的上海事件^①就足以证明，个人野心和不同社会利益两方面所造成的内部冲突是多么迅速地导致了曾赢得1911年上海革命胜利的联盟的破裂。在我看来，首先是曾形成联盟，无论如何这有点让人吃惊。

译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学系编《远东史学集刊》
第29期，1984年3月号。

王静 姚子照 刘学侠译

^① 这些事件在M. 埃尔文的《1905—1914年上海绅士的民主意识》中有更为详尽的记述。博士论文，剑桥大学，1967，第252—263页。

辛亥革命和内蒙古

M. 昂德唐

芮玛丽曾提到《新中国》一书所阐述的革命民族主义的三个方面：抵制帝国主义，战胜地方主义和反对满清。^①她明确反对下面这一流行观点，即排满是这一革命理论的主要方面。^②这并不是说，当时内蒙古没有反满情绪。事实上，汉人移民、土地转卖和蒙古对中国所负的债已经引起了广泛不满，并出现了大股匪徒武装。来自鄂尔罗斯的匪徒首领陶克呼台吉和白音，在清朝末年曾名噪一时。^③

蒙古发生了社会大动荡。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死后，这一运动迅速扩展。正如乌兰巴托呼图克图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给教区居民的公开信中所揭示的，中国政府代替满清王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政策，这一旧的秩序正受到蒙古人的强烈攻击。

1911年清王朝覆亡以后，喀尔喀（外蒙古）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但列强不予承认，尽管俄国在1912年10月21日到11月3日于乌兰巴托（旧称库伦）缔结的协议上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虽然中国的干预和日本的阴谋使内蒙古的自治看起来很遥远，但内

^① 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黑文，1968），参阅她的重要“导言”，第1—63页，特别是3—23、47页。

^② 同上，第21—23页；另见J. 谢里登：《分裂中的中国》（纽约，1977），第29—31页。

^③ 参阅我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古的土匪活动和革命运动》，见即将出版的《亚洲盗匪和激进党》，P. 温瑟编。

蒙古仍处于严重的骚乱之中。

至少在12月18日的上海和平会议之前，北京的袁世凯曾主张君主立宪，而这一主张得到了日本、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支持。^① 满清皇族在是否支持袁世凯方面存有分歧。而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却认为袁世凯具有“幻想性的”威望，并对其诚意表示怀疑。这种观点可能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看法。^② 在英国和日本外交官的斡旋下，南京和北京方面达成协议：满清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

蒙古人对这些事件有两种反应。蒙古贵族和一般公众（平民或阿拉特牧民）的看法截然相反；即使在蒙古贵族内部，其态度也取决于他们与北京政府的亲密程度及其相应的地位。

据后来报道，甚至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前的1911年7月，十八蒙古王公就在库伦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内蒙古也派代表参加了，札萨阿旺（音译。——译者）就是其中之一。^③ 尽管这种会谈已进行了两年多，但这是制订蒙古独立方案的首次尝试。^④ 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决定向“白人皇帝”（亚历山大三世）求助。在此之前的1907年，他们也曾向俄国求助，但未得到任何结果，这可能是由于俄国担心这样一个行动会不利于即将举行的对日会谈。由杭达多尔济亲王、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来自喀喇沁）组成的蒙古封建主代表团于1911年8月到达圣彼得堡，递交了一封1911年7月17日起草的信件，并陈述了那次会议的宗旨。在信中，呼图克图和4个喀尔喀汗王写道：“近来，汉族官员不仅亲自掌握了国家政权，而且采取种种可能的手段插手蒙古事务，他们以‘新政’为借口，向蒙古移民，改变蒙古旧的习俗。

① 池井优：《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反响》，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1966），第219—223页；M.巴斯蒂：《法国外交与中国1911年革命》，见《近现代史研究》杂志，第16期，第238页。

② 见前引巴斯蒂书，第235页。

③ A. B.布尔杜科天：《在新、旧蒙古》（莫斯科，1969），第29—30页。

④ 例如，札萨官1909年告诉罗穆斯特德，他成功地向八十八王公解释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见罗穆斯特德：《当代激进政治家》（波尔奥，1951），第187—188页。

所有这一切大大地限制了本地人的权力，……南蒙许多人亦持类似看法，……我们很恭敬地请求，就如同在大旱的日子对雨露的渴求一样，尽快地给以援助和保护……”^①在是否向蒙古人提供他们所渴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问题上，俄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仍犹豫不决，但是，1911年10月俄国作战部长苏克霍姆利诺夫最终命令把武器运往伊尔库茨克军区，并于11月转送到蒙古人手中。^②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武昌革命爆发后，喀尔喀同中国的14个省一起宣布独立。在库伦呼图克图的领导下，建立了神权国家，内蒙古的6个盟宣布效忠于他。事实上，49个旗中的35个王（札萨）向呼图克图递交了请愿书，宣布他们的忠诚。^③考虑到此后的发展，记住这35个旗是很必要的，它们是：锡林郭勒盟中的所有10个旗，哲里木盟10个旗中的7个，昭乌达盟11个旗中的6个，伊克昭盟7个旗中的5个，乌兰察布盟6个旗中的5个和卓索图盟5个旗中的2个。而且还收到了整个察哈尔八旗和呼伦贝尔、阿拉善及其他一些地方众多王的请愿书。甚至，贡桑诺尔布这个后来成为蒙藏事务局（蒙藏院）总裁的强有力的喀喇沁王，也派了一个私人代表来到库伦。^④

同时，对满清政府继续保持忠诚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极力向蒙古人强调效忠清王朝的必要性。最后于1911年10月28日到11月1日在长春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蒙古王公的代表和汉族官员们探询了蒙古人的意见。显然，没有发布公报，但蒙古人的意见在此后的12月3日北京会议上受到重视。在这次会议上，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反对独立，因为他们担心俄国或者英国

① 绍伊热洛夫：《蒙古与沙俄》（1926），第13—14、353—354页。

② 彭楚克诺尔布：《蒙古自治史》（乌兰巴托，1955），第34页。

③ 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1850—1919》（乌兰巴托，1971），第1卷，第302—303页。

④ 约翰·哈金：《内蒙古民族主义与德穆楚克栋鲁普王（德王）》，非出版物，第37页。蒙藏院的前身是理藩院，1914年又改为蒙藏事务局。

可能进行干涉。考虑到俄、日政府间达成的秘密协议以及大英帝国和俄国在势力范围问题上达成的谅解，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俄国在巴尔喀（音译。——译者）扮演的角色，又使这些王公们对形势的估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2月3日喀喇沁王为蒙古自治向中国政府提交了6点方案，请求：

1. 东蒙不再受中国东三省总督和热河的节制；
2. 允许各旗保留它自己的武装；
3. 有权从蒙古人中收税，而且只供内蒙古一地使用；
4. 居住在内蒙古的汉人由蒙古人管理；
5. 任命两名蒙古人为理藩部的参赞大臣；^①
6. 蒙古人和汉人一样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同等权力。^②

内蒙古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选择独立还是继续和中国政府保持联合，当然，独立意味着和外蒙古联合的加强，而且还面临着未来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在同一会议上，王公贵族们表示：只要保留君主政体，他们愿意放弃独立。^③这种矛盾心态是由于一些蒙古贵族留恋清朝的恩泽：显贵的爵位、丰厚的赏赐、通婚联姻、贸易特权以及他们对满清兄弟般的感情。

12月24日，80多名蒙古领导人在北京集会，会上，建立了一个蒙古人的联合组织以维护他们的权利。而且，他们还通知当时

^① 理藩院在1907—1908成为一个部（理藩部），会谈期间，它是唯一没有高级参赞的部，见布伦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台北，重印，1971），第99页。

^② 《外务省档案》，M.T.1.6.1.46，关于辛亥革命的情报；陆军部，1544—1545，青木致ひろちよう，1911年12月9日。

^③ 《泰晤士报》，1911年12月29日。

的政府：一旦共和国建立，内蒙将追随库伦。①1912年1月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试图解决这些争执。蒙古人面临的不利局面是：一旦共和制化为泡影，他们就无力赢得独立。把共和国限定在南方，北方实行君主立宪，这一“南北两分”方案尽管可能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但支持君主立宪的主要是达尔汗宾图和博王（均係音译，——译者）。②由于蒙古人的不妥协立场，他们曾一度被排斥在这些会谈之外。

博王和达尔羌也曾试图在日本和俄国的赞助下建立独立的“满—蒙”政权。可由于上面提到的种种原因，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何况，赵尔巽是一个效忠者，他可能仍对满清抱有希望。12月，博王在昌图西和郭尔罗斯召集会议。与此同时，达尔汗探询了哲里木盟领导人的意图。1912年1月底，博王再次召开会议，与会者很少，而且由于财政问题，他建立一支武器的计划亦落空了。③

并不是所有的内蒙古领导人都参加了与满清和汉人这些旷日持久的和谈。喀尔喀宣布与新政府缔结了互助协定。早在1884年乌泰就成为旗郡王，他是排汉主义者，这可能是由于他从哥哥，即先前的郡王，和养父塔图巴扎木苏（音译。——译者）那儿承担了太多的债务。10月6日，他曾对日本驻海拉尔官员说，他最初并不是排汉的，但蒙古人的压力和中国军队的暴力使他不得不采取这一立场。④1906年间，他向俄国借了290,000卢布，并把旗地卖给了相邻的蒙古各旗。这样做的结果使他得到了270,000两白银，但仍不能偿清所欠俄国的债务。锡良和俄国人协商后，中国政府承担了这一债务，但乌泰不能再向汉人征税。至1912年5月，

① 《外务省档案》，M. T. 1.6.1.71，支那政党和结社情况调查意见，96，给军令部的报告，1912年7月。

② 《外务省档案》，M. T. 1.6.1.4—4，第108—122页，1912年2月6日，植原致内田电。

③ 同上。

④ 罗伯特·瓦廉特博士私人信件，1976年2月17日。

他仍欠中国各银行共130,000两白银。^①

所有这一切使他从感恩戴德中解脱出来。1912年8月，他同科尔沁土谢官和镇国公拉喜敏珠尔一道宣布独立，并为此向整个内蒙古发布了声明。乌泰拥有大约5,000名士兵，他开始用这些武装来破坏科尔沁的汉人定居地。约有1,600名男人，400名妇女和500名儿童被杀害。^②北京当局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便在后田军事会议之后，派遣7,000士兵分三路迎击乌泰、土谢官和拉喜敏珠尔。向已被乌泰占领的洮南展开攻势，8月底，吴俊生的3,000劲旅攻占此城。另一路中国军队沿嫩江包围了土谢官，劫掠了科尔沁牧场和大批牲畜。与此同时，第三路中国军队从吉林向安广前进以切断俄国可能提供的援助。继8月24日重创蒙古人之后，9月1日吴的军队在白河屯被打败。在穿过柳河，于9月21日占领乌泰老巢之前，中国军队又在12次战斗中失利。^③乌泰和土谢官带着成千的蒙民逃过肯干山脉，来到喀尔喀，寻求援助。

后来乌泰参加了1913年11月在长春举行的会议。在这次会上，虽然他不得不同意汉人的进一步移民，但却成功地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撤出内蒙古。^④这些冲突使科尔沁和其他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为此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作“黑色岁月”。

乌泰逃跑后，库伦政府组成一支援军来帮助内蒙古人民。这就象内蒙古军队曾积极参加了争取喀尔喀独立的斗争一样，例如，在攻击科布多的战斗中，巴尔喀官戴登苏荣（音译。——译者）曾派军队援助喀坦巴特玛苏札布，^⑤而且他们还同外蒙古军

① 同上。结果是，禁止从俄国贷款或抵押土地给俄国人。《外务省档案》，M. T. 1. 6. 1. 4—4，第229—231页，塔卡雅玛（音译）致陆军省电，1912年5月22日。

② 沃塞·海西格：《蒙古文化史》（第2卷，威斯巴登，1972），第2卷，第800页。

③ 《蒙古史》（三卷，东京，1919），第1545—1546页。

④ 《希特勒帝国主义与国际关系》（1—3卷，柏林，1931—1943），第3卷，第4、1、250页。协议还包括承认蒙古的头衔、保留对蒙古贵族的优待、选举蒙古代表参加国民议会以及承认共和国等条款。

⑤ 薇罗尼卡·维特：《阿拉特官喀坦巴特玛苏札布（1878—1927）》，（哲学博士论文集，波恩大学，1974），第32—42页。

队协同作战。库伦援军分成四路，其中两路由内蒙古领导人指挥。乌泰领导的第一路军有6,000名士兵，外加2,000名追随者。第二路是10,000名劲卒，第三路有60,000名士兵，而第四路是30,000人。^① 1912年10月，这些武装进入乌珠穆沁旗、苏尼特旗和山西地区以对抗中国军队和亲汉派蒙古贵族，如奥吉昌克珈齐罗基。

10月底，蒙古人和中国军队首次交锋。到11月中旬，10,000名士兵被派驻张家口，以防进一步的攻击。^② 很快证明，中国军队不是蒙古追随者的对手，1913年4月8日，在锡林郭勒和西苏尼特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军队由吴俊生将军指挥，他尽可能地避免公开冲突，而代之以劫掠蒙古村庄和牧场。1913年8月下旬，中国军队胜利攻占林西县城。到9月2日，几乎所有的蒙古军队都开始撤退，这部分地归因于喀喇沁王的调解。^③ 随即蒙古总理三音诺颜汗在一个照会中把蒙古已下令从内蒙古撤军这一情况通知了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并希望中国也同样从蒙古领地撤回军队。^④

这时爆发了袭击张作霖部队的进一步的革命行动，这就是大臣官布札布和图们札哈的暴动。这次反对札鲁特旗多布阶（音译。——译者）王的暴动发生在1912—1913年冬季。革命者们杀害了曾卖旗地给汉人的多布阶王，攻陷了开鲁城，使汉族官员纷纷逃离，并洗劫了昭乌达盟3个旗和东锡林郭勒盟的汉人定居地。^⑤ 第27师的官兵们经过一年的激烈战斗才最终平定了这次暴动，在战斗中，许许多多平民丧生。正象1912年在绥远发生的情况，土默特的煤矿被没收。这导致了暴力事件的进一步发生，在巴图

① 《蒙古史》，第1550—1554页。

②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19日。

③ 《蒙古史》，第1555—1558页。蒙古军队带着大量战利品返回。见欧文·拉铁摩尔：《蒙古人在满洲》（纽约，1969），第119—120页。

④ 《1913—1914的沙俄与蒙古》，见《红色档案》杂志第37期（1929），第41—42页。B·希伦杜布：《1912年蒙古民族革命史》（莫斯科，1971），第40页。

⑤ 塞钦·贾格奇德：《有关蒙匪的说明》，非正式出版物，国际阿尔泰问题常委会第19届年会，赫尔辛基，1976，第13页。

克恰尔恰，这一斗争持续达半年之久。^①

北京政府密切关注着蒙古人对建立共和国的反应，这一点并不奇怪。北京方面采取的用以遏制蒙古的措施，根据“分而治之”这一古训，就是在原来内蒙古各盟之地建立3个新的省份以防止蒙古人的种种企图。它们是察哈尔（包括锡林郭勒和察哈尔）、绥远（包括乌兰察布、伊克昭 and 土默特）和宁夏（包括阿拉善和伊德森）。剩下的蒙古领地和邻近各省合并，哲里木旗成为辽宁的一部分，昭乌达和阜索图两旗并入热河，巴尔喀则划归黑龙江。^②

博王和达尔汗延续君主制的企图已在前面提到。鉴于日本在此次尝试和其他运动中的作用，有必要对日本在蒙古独立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作一考察。

1911年革命发生后，日本陆军系统（陆军省）和日本驻满洲代办处，特别是南满铁路的一部分人，大力策划满蒙独立。而日本内阁（西园寺内阁）更愿意维持满洲现状。这意味着日本将保持中立政策，除非日本在满洲的侨民或南满铁路受到威胁，否则，关东军不会坐视。^③

日本外交决策人面临的一个困境是，面对这种纷争局面，想推行某些政策是很困难的，而完全忽视满洲当地的状况也是不可想象的。更加难以控制的是那些“大陆冒险家”（大陆派），其中之一是曾在蒙古民族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川岛浪速。他的计划是，日本支持在满洲并继之在蒙古而起的暴动，而这一暴动要由蒙古人自己领导。很明显，这一计划得到了诸如喀喇沁、巴林和奥谦等内蒙王公的支持。既然日本的援助要假道满洲，那心照不宣的中国人的支持是必要的。为此，川岛反对由南满铁路董事长

^① 见前引海西格书，第2卷，第801页。政府军所采取的应变措施使更多的内蒙古领导人逃往库伦。见《沙俄》第19期，米勒致萨佐诺夫电，1913.10.28—11.10。

^② 见前引哈金书，第37页，第2号。当然，这一政策在蒙古曾多次试行过。

^③ 《外务省档案》，第44—45卷（东京，1961），第347号，内田复小池电，1911年11月10日；第348号，石本致内田札，1911年11月12日。

中村和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直接向革命提供援助。^①

关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他的将领张作霖最初反对革命者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然而，由于财政和其他方面的限制，他们很快感到必须改变这一态度，于是寄希望于日本的干预^②和袁世凯的受贿。

在川岛的安排下，满洲肃亲王逃离北京，来到旅顺，在那里他将成为独立的满—蒙政权的中心人物。^③尽管外务省反对这一计划，但在与陆军省和海军省协商后，仍然允许他住在那儿（民政长官的官邸）。当2月传来一部分日本人计划在沈阳建立一个保皇党的消息时，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进行了直接干预。在与关东都督府都督磋商后，允许肃亲王继续留在满洲，但不再让他参与蒙古独立运动。^④由于这些纷争，使日本给予蒙古在满蒙君主立宪政体形式下所搞的独立运动的有效支持降到了最低限度。

然而，日本的支持采取了其他方式，特别是财政援助和武器走私。继1911年12月日本外务省同意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向喀喇沁王提供200,000两白银贷款后，其他蒙古王公也请求援助。参谋本部通过中间人高山公通大佐和小磯泰平军火公司的经理小磯国昭少佐同蒙古人进行了协商。作为贷款给蒙古王公的交换条件，日本享有在昭乌达盟5旗中的矿山开采权。这些贷款总额是110,000日元，其中外务省提供了80,000日元，参谋本部提供了30,000日元。^⑤向王公个人们提供的实际数额是：喀喇沁王90,000日元，

① 罗伯特·瓦廉特：《日本卷入蒙古独立运动（1912—1919）》，见《蒙古社会季刊》卷11，第2期（1972），第2—3页。

② 尽管南满铁路实际上并没有拒绝运送政府军，但却对他们的迅速布署设置了重重障碍。见《字林周报》，1917年2月2日。

③ 《外务省档案》，第11—45卷，第423号，伊集院致内田电，1912年2月3日；第288号，落合致内田电，1912年2月4日；第289号，大岛致内田电，1912年2月5日。

④ “满洲及支那各地外交方针之实例（大正二年六月，政务局调查）”见栗原健编《台满蒙政策史之一面》（东京，1960），第324—325页。

⑤ 《外务省档案》，第41—45卷，第530号，伊集院致内田电，1912年3月8日。

年息3%，为期5年；巴林王20,000日元，附以同样的条件。^①1914年，博王从南满铁路接受了两次贷款，总数达100,000日元，年息高达8%以上。^②

日本人参与向蒙古人的军火走私在1911年12月显露出来，当时赵尔巽对此提出了抗议。外务省的调查表明，关东都督对军火走私采取了宽容态度。一个走私集团在和中国人发生冲突后变得臭名昭彰。在这次冲突中有9个蒙古人，15个日本人和30名汉人丧生，数量达50辆大车的武器弹药被扣押。^③这些军火本来是送往喀喇沁和巴林旗（昭乌达盟）的，而这一切又是由高山公通大佐、松井清助大尉和木村直人大尉为喀喇沁王安排的。

对于著名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的原因，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前面提到的日本官方内部的政策分歧及在东北出现的混乱局面；同时也是由于日本外务省对此持消极的态度（蒙古方面的看法）；当然，赵尔巽和张作霖对共和国态度的转变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1912年4月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在一次演说中声称，在蒙古独立问题上，俄国将发挥调解人的作用。合并外蒙不是俄国的利益所在，而允许在俄国的边界上出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蒙古政权也不是明智之举。^④在这一发言中没有表达出来的是，他还进一步考虑了在布利亚特人中出现独立观念的前景以及日俄秘密协定所规定的种种限制。萨佐诺夫的看法遭到一些蒙古专家诸如格鲁姆·格鲁济迈洛和巴拉诺夫的反驳，他们主张支持泛蒙古运动。而官方的政策仍然是，支持外蒙古在保留中国宗主权的情况下自治。^⑤

① 瓦廉特：《日本卷入蒙古独立运动》，见前引书，第6页。

② 瓦廉特：同上书，第7页。

③ 栗原健：《第一、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和小池外务省政务局长的辞职问题》，见栗原健编《台满蒙政策史之一面》，第144页。

④ 外交部政治档案，ch. 1 Bd. 96，卷号A 515，圣彼得堡大使馆致外交部电，1912年4月27日。

⑤ 《议会辩论报》，1912年1月16日。

内外蒙古的领导人都对俄国面对前者的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感到失望。① 尽管在前一段时期中国方面曾担心俄国插手支持内蒙古，事实上在巴尔喀，俄国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它们的担心仍是没有理由的。当1912年喀喇沁王和巴林王拜访俄国驻北京代办请求援助时，他感到必须拒绝他们。内蒙古领导人从俄国获得武器以及人们所熟知的他们已从俄国借款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俄国官方共谋了这一军火交易。② 虽然沈阳报纸《国民报》报道说，俄国驻青岛领事曾建议把军火送给达赖喇嘛，③ 事实上，日本新闻界指控了德国从青岛提供武器。④ 俄国直接的一个行动仅仅是在铁路沿线地带增加了他们的军队。到1912年5月底，黑龙江的官员们报道说，已有10,000以上的俄国士兵屯扎在这一地区。⑤

1913年，土默特的领导人巴布扎布得到日本的军火供应，起来反对新政权。他的活动地区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扩展到热河和察哈尔。考虑到他正得到外蒙古的支持，中国方面甚至接近俄国人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他。⑥ 事实上，巴布扎布通过外蒙古从俄国获得了资金，显然，这是通过俄国驻海拉尔副领事安排的。他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接受两方面的援助。正象前面提到的，日本支持他，给他提供武器和顾问，并且利用他来推动他们重建满清的计划。⑦ 1916年，24个蒙古王公向袁世凯请愿要求重建满

① 《圣彼得堡先驱报》，1912年3月3日。

② 《外务省档案》，MT.1.6.1.4—4，第245—248、250—252、298—300、348—351页，落合致内田电，1921年5月21、22日；6月5、8日。

③ 外交部政治档案，ch.1 Bd.97，A 115 48，北京公使馆致外交部电，1912年6月17日。

④ 《国民报》，1912年6月11日。

⑤ 外交部政治档案，Ja.9 Bd.8，誊写A 23063，军事消息第49号，北京公使馆致外交部电，1912年12月10日。

⑥ 唐盛镐著《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31）》，（达拉谟，1959），第23页。

⑦ 《新时代》，1916年8月12日。当然，日本断然否认有官方的支持，尽管他们承认日本人个人可能和巴布札布合作。见《汉堡快闻》，1916年9月8日。

清王朝，他就是其中的一员。

继1915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巴布扎布开始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他的以“十三营”著称的强大的七千人武装在青柳胜敏等日本顾问的帮助下分成三支。当中国军队向北追击蒙古人并迫使他们撤退时，日本军队进行干预。^①1916年后期，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对巴布扎布的支持，并派川岛去劝说巴布扎布遣散他的军队。9月2日，蒙古人开始撤退。10月，巴布扎布在林西县城的战斗中阵亡，他的军队遭到中国军队的毁灭性打击。

在乌珠穆沁，巴布扎布是很不受欢迎的，他的军队在那里进行了肆意掠夺。诗人夏玛拉在他的诗“骚乱”中表达了这样的情感：

羊年伊始，贫困首次降临；

自此数年的岁月，人们得忍受一切污秽。^②

也有人把这几年描述为，外蒙古和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爆发了小冲突。1913年秋，来自库伦的军队侵入乌兰察布盟，但在多伦诺尔被桐春王打败。第二年，玛苏札布统率的外蒙古军队受命攻击了进入喀尔喀的中国军队。^③中国方面在声明中坚持，蒙古人的起义是土匪所为，从而否认他们是革命者，制订这一政策无疑是为了赢得公众对政府措施的支持（这导致了旗地的进一步被破坏）。^④高山上校在他的情况报告中准确地描述了真实情况，其中写道：把蒙古人看作一伙匪徒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汉人深入

^① 《蒙古史》，第1561页。

^② 贾姆扬：《关于莲在的诗和他的作品》，《蒙古语言文学史》第1卷，第68页。

^③ 乔巴山：《哈屯巴特勤玛赫色尔扎布之简史》（乌兰巴托，1942），第55ff页。

^④ 早在1912年就在报纸上对“蒙匪”作过系列报道，尽管提到的那些“蒙匪”都是汉人！见贾格奇德前引书，第7—8页。

的那些地区，汉人经常和二、三个蒙古人结成匪帮。①

中、俄、蒙恰克图协约有效地制止了外蒙古的独立，同时粉碎了内蒙古的抵抗，尽管巴雅官在内蒙古坚持战斗了许多年。②甚至来自明安牧群的年轻军官在几千蒙古年轻人的支持下曾一度于1917年在察哈尔举行了短暂的叛乱。③这个协约还妥善地防止了内蒙和外蒙可能进行的合作，正象前文所揭示的，它们曾在1916年试图开始会谈。

内蒙古谋求独立的企图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这不仅是因为蒙古领导者自身对其目标和方式存有分歧，也由于俄、日协定使他们从日本和俄国获得的援助受到了限制。然而，考虑到他们曾得到“宗社党”等组织和“大陆派”日本非官方的支持，蒙古人没有坚持他们的斗争，这可能是很令人吃惊的。再说，也必须承认，俄国人在恰克图曾拆过他们的台。

译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学系编
《远东史学集刊》第19期，1979年3月。

姚子照 王静译

① 《蒙古情报》，第2卷，高山公通致参谋本部电，1912年6月1日。

② J.L.范赫肯：《共产党人与来自内蒙古的蒙籍传教士》，《宗教集刊》，第8卷，第9期（1956），第650页。

③ 见贾格奇德前引书，第16—17页。

乡绅与辛亥革命

市古宙三

—

196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讲了下面的话：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给人民在精神上带来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

确实如周恩来所说，辛亥革命不单是打倒了对于汉民族来说属于异民族王朝的清政府，而且终结了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二千年以上的君主专制政治，它的历史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恐怕一千年甚至两千年的历史学家，也一定还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

但是，对于距离辛亥革命只有半个世纪的当今的历史学家，辛亥革命也同样被看成是划时代的事件吗？至少我自己，即使能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以结束专制君主政治的高度评价，也不认为它是象五四运动那样重大的划时代的事件。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怀有同感。周恩来在会上还说：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能够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这是没有把辛亥革命作为重大的、划时代的事件的原因吧。

这种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在今天是很普遍的。但实际上在正确评价辛亥革命之前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第一，是否应该把孕育了辛亥革命的孙文的革命运动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第二，孙文的理想三民主义是什么性质，可以暂且不谈，但它在辛亥革命中没有实现——周恩来所说的“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却是什么原因？下面，我想就第二个问题略作考察。

二

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总称。孙文的革命纲领，也是以他为领袖的革命团体中国革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它的内容被概括为十六个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驱逐异民族的满洲人，建立中国人的中国，即民族主义；“创立民国”是废除专制，创建民主国家，即民权主义；构成“民生主义”内容的平均地权，指让地主申报地价，以后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地价上涨，相当于上涨部分的利润，由国家以租税的形式全部征收，为的是避免比现在

更大的贫富悬殊。

以上简称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否可以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这里且不作讨论。但是除了可以叫做反满的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外，这个三民主义在辛亥革命中都没有实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答案极其简单：革命派软弱。革命派势力之弱，看以下事实就可以明了。在武汉发动革命的虽是革命派，但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却是与革命派毫无关系的驻武昌新军混成协协统黎元洪；革命派做都督的，不过是山西、贵州、浙江、广东四省；革命派虽然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孙文最终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清军统帅袁世凯。

但是，三民主义并非没有全部实行。三民主义中，反满的民族主义是实现了的，只是其他目标没有达到。因此，只用“革命派软弱”来说明革命的不彻底是不太妥当的。为什么反满的民族主义实现了，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却没有达到目标呢？

答案又比较简单，总的说来就是革命派软弱，革命阵营内部分裂。

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从日清战争爆发的1894年孙文在夏威夷组织兴中会时开始的。这个兴中会是孙文的故乡广东人的革命团体，它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不久扩大到其他地方。1903年出现了以黄兴为主的湖南的华兴会，以章炳麟为中心的江苏、浙江的光复会等革命团体。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谋求这些产生于各地的革命团体的联合，但是在地域观念强烈的中国，这些革命团体的真正的融合和统一是十分困难的。同盟会虽然成立，但其中广东的兴中会、湖南的华兴会、江浙的光复会的地域分派没有消失，而且不但没有消失，辛亥革命前夕还有光复会几乎与孙文、黄兴的同盟会主体分离、采取独立行动的情况发生。

同盟会内部有这样的分裂，地域观念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

也有革命纲领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三民主义。这是孙文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的，但并没有得到参加大会的革命派的一致赞同。孙文的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还是温和的，它肯定现有的土地制度，并不否定地主。但是反对这一主张的革命派却很多，就连创立民国的民权主义都没有获得全体一致的赞同。孙文的兴中会派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勉强把革命纲领统一为三民主义，因此，同盟会成立后，不遵守这一纲领的人为数不少，光复会一系就是代表。特别是1907年，对民生主义评价不高而又对偏重理论不重实践的孙文等同盟会主流派的做法不满的一些人，在东京组织了共进会。其革命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人权”。平均地权被改换成平均人权。平均地权之所以不被看重，也许是由于革命派中地主很多吧。

总之，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中，革命派无论何人都可以同意和领会的仅仅是反满的民族主义。同盟会可以说是以反满的民族主义为共同目标而组成的革命团体，因此，如果把辛亥革命看作是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的成果的话，那么它取得的成果只是打倒满清，就是自然的了。

同盟会内部不仅有地域的而且有思想的分裂，这当然是由于它包含了各个阶级。但是不可否认，孙文等领袖的理论也缺乏说服力。他们主张废除专制，创建民主共和国。但是，关于民主共和胜于专制的原因，仅仅说出了“国民必须平等自由”这一点。应该废除延续了二千年的专制政治，开创新的民主共和国。但要使普通人懂得这个道理是十分困难的。

平均地权的主张更是难于理解，而且这一主张究竟是为哪些人提出的呢？按孙文的说法，民生主义的主张有如下根据：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象西洋那样的贫富差别，有的只是大贫与小贫之差。所以，当时的中国没有紧迫的社

会问题，从而没有社会革命的必要。但是，经过民主革命，社会必然进步而产生的贫富差别，社会革命就是必要的了，为防患于未然，更为省却二次革命之劳，很有把社会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进行的必要。这就是民生主义。

当时的中国有无贫富差别和社会问题，在这里，我不准备对孙文的社会分析说三道四。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中国，不仅贫富悬殊加剧，而且极贫之人平时就债台高筑，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一旦遇到水旱灾害，他们必然失去土地，别妻离子，流落街头，投身所谓流民群。流民是那些不能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生存，而被抛弃到现存社会秩序之外的一群人。他们以破坏现存社会秩序来求生存，他们扰乱治安，发起暴动。19世纪中叶发生的太平天国之乱、19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之乱，可以说是这样的暴动中规模最大的。大乱刚结束，社会稍稍恢复安定，但乱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过是从“人相食”这种悲惨状态中解脱出来吧了。因此，乱后的安定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贫富差别就比乱前更加扩大，导致社会不安定。辛亥革命前，确已呈现这种状态，饥民暴动和抗捐暴动此起彼伏，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但是，在孙文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贫富差别，不存在社会问题。因此，尽管贫民流民充斥，孙文等革命派也没有伸出救援之手，对于他们发动的叛乱和暴动只是冷眼旁观，没有给予任何支持。孙文等人没有重视贫苦大众问题。

孙文等革命派不重视的不仅是贫苦民众，还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勃兴之际，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萌芽之时。义和团事变后，特别是日俄战争后艰难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收回各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种种特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沿岸贸易权、海关行政权、关税

协定权、子口半税的特权等，以及铁路、矿山利权，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或径自谋求收回利权。当政府对外态度软弱之时，他们不惜运用象抵制外货那样的强硬手段。1905年的抵制美货、1908年的抵制日货就是明显的例子。前者系指愤于美国限制中国移民而在广东、厦门、福州、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持续约半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后者系指因日本商船“二辰丸”在运送武器途中在澳门海面上被中国官方捕获，鉴于日方提出不合理的善后处置要求，以广东、香港为中心在一些地方掀起的抵制运动。

清末资产阶级收回利权的要求是如此高涨，可是在孙文等的革命纲领中却看不到与此有关的内容。民族主义开始意味着反帝国主义，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清末的民族主义，只是反满的民族主义。不用说，在清末，与帝国主义各国保持协调是孙文等革命派的主张，所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六大主义中就包含了两项这样的内容。

1. 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
2. 建设共和政体。
3. 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
4. 土地国有。
5. 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
6. 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

孙文等革命派的革命纲领不但没有反映贫苦大众的要求，而且没有表达迅速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如此看来，孙文等革命派对清末社会的分析是不够充分的，从而，三民主义除了反满的民族主义之外，它不是植根于清末社会现实之中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考虑到革命运动发生的原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孙文的革命运动不是由于国内问题——例如阶级对立——而发生的，而是由于对外问题引起的。

一般说来，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变法运动，都是由对外问题引起的，它们不是首先发现国内存在应该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发生的。着眼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为了反击、对抗而吸收西洋近代文化。革命运动也与此完全相同。中国的革命运动从1894年孙文在夏威夷创设兴中会开始，但是这以前的孙文也和康有为一样，想使清朝政府力行变法维新。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是愤于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力图抵抗；与此相同，孙文的变法运动和革命运动，也是为了扶植对抗外国的力量，而不是为了国内的急迫问题。如前所述，革命派不主张反对帝国主义，采取与帝国主义各国协调的政策，而试图以三民主义解决国内问题。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发端于对日本的复仇，却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与日本结成亲善关系；与此相同，革命运动的发端也是对列强的对抗、复仇，不是国内问题。国内问题的解决不过是解决对外问题时附带提起吧了。所以，对于中国内部的社会问题，革命派不是考虑得意外地简单了吗？这样，问题的症结就十分明晰了，如果用极端的说法，是借用国外流行的理论来进行革新，并以此扶植对抗列强的力量。

三

我在前面已说，在孙文等革命派的革命纲领中，反满的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共同点，因此，革命派应能动员非常广泛的阶层参加革命。事实上，革命派能够动员敌对的立宪派参加革命。辛亥革命因此而获得成功，但也因此而发生倾斜。

那么，这里所说的立宪派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立宪派有两种：第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一些人，所谓变法派、维新派、变法维新派即是。他们并非没有飞黄腾达的愿望，但无论如何都应说他们是爱国之士、忧国之士。他们不忍坐视中国领土和利权被列强继续侵夺。为了与列强抗衡，为了维持

独立，必须富国强兵，因此，他们主张必须采用立宪政治。与此相反，第二种立宪派是一些只顾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国家天下并不关心的人。他们参加立宪运动，除了认为这是保身的最好办法以外，没有其他考虑。与第一种立宪派不同的是，第二种立宪派没有理论，但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并直接行动。

辛亥革命时，革命派是能够使这两方面的立宪派参加到革命中来的，不过，我在这里想要着重研究的，是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后者，由于他们参加革命，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

那么，这些保身的立宪派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一言以蔽之，他们是乡村的领导者阶层——乡绅。

中国乡村市镇的领导者被称为乡绅，又称为绅士、绅衿；西方人称之为gentry（绅士），又称gentry and literati（绅士和文人学士）。严格说来，乡绅与绅士、绅衿多少有些不同。所谓“绅”，是指周代官吏系的大带，他们在“绅”上“搢”笏，因此，官吏就被称为“搢绅”、当绅上搢笏的风习不再流行之后，官吏仍被称为“搢绅”。有一本书叫做《大清搢绅全书》，是清朝政府的职员录。但是，单单说“绅”的场合，多指与现职官吏相对，曾经担任官职而现已退职的人或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即科举而获得进士资格的人。退职官吏和有进士资格但没有任职的人多半居住在乡村。这些住在乡村的退职官吏和有高等文官资格者就称为乡绅。

严格说来，“绅士”和“绅衿”比乡绅包括的范围要广一些。“衿”是青衿的意思，周代学生穿青衿制服，所以称学生为青衿。“衿”即学生，是指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具有生员、监学、举人资格的人，当然，用钱买得监生资格的人也包括在内。所谓“士”也与“衿”相同。所以，“绅士”、“绅衿”比乡绅要广，除了曾任过官吏和有进士资格的，还包括有举人、监生、生员资格的人等。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乡绅”也与“绅士”、“绅衿”一样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下面三者都是在广义上使用的。

“乡绅”、“绅士”、“绅衿”不是现任官吏，但与现任官吏同属特权阶层。他们穿着与普通百姓不同的衣服，可以坐车，能够自由出入官厅，在审判上也有一些特权，还被免除相当于徭役和人头税的丁银。

清代徭役、丁银都比较轻，所以法律上给予绅士的特权并不大，但事实上他们享有相当大的特权。虽然他们必须和一般人同样交纳税金，但19世纪中叶之后，一般征收的税额已达到规定的二倍、三倍，可绅士大多只交七、八成就可以了。绅士中更有人利用这一特权帮一般人交纳税金以获取手续费。

在19世纪，中国官吏的素质明显低下，其横征暴敛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对于有钱人来说，如何逃避这种横征暴敛，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只要成为绅士，不仅可以避免这种横征暴敛，而且还可以少交税金，做得巧妙甚至可以赚钱。所以，在19世纪，中国的有钱人也就是地主们保全自己财产的最好办法，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绅士资格。

一旦成了绅士，就有了这种特权，政府也懂得把授予这种绅士资格作为恩典。当大庆典时就临时举行科举考试，还增加合格者的定额。相反，发生了坏事的地方，就停止科举考试以示处罚。不增减官吏定额而以举行科举考试与否作为恩典和处罚，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使不做官，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得到特权。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当中，也一定有很多人并不想做官，只是想取得绅士资格以逃避官府的横征暴敛而已。

不过，给予什么样的人以事实上的特权是有问题的。第一，是不是只要有生员以上资格就都可以享有法律规定以外的事实上的特权，即少交税金的特权？第二，相反，如果没有生员以上资格，例如大财主或门第高贵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少交税金？这两点，在考察中国社会的特性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但是，我现在的解释还不能做到证据十分充分。不过，栖原陈政在他的名著《禹域通纂》（1889年刊行）中所说的乡绅，

大体上就是事实上的特权享有者。楮原是这样说的：

乡绅系一地名望、财产之兼有者。名望为当地显贵，或以父祖、子弟贵显，或有学位，或以博学德行为乡人景慕。财产则或务农而有地二千亩，或营商而经理当铺钱庄等，其所入足以自立并可贍助一族。南方同族聚居风行，如有以韩姓、何姓、杨姓同族聚居之村落。一族人口二、三万以至数万以上者甚多。若言某县某姓，不问居处，人皆知其为名族。凡事利害相伴，此乃天下常理，乡绅亦不得不然。今试举其非，恃名望财产雄据乡里，抵抗官府。其子弟犯法者，地方有司亦要斟酌宽减，不能与齐民一体处置。且地方官依托乡绅，即或稍违事理，地方官亦为情谊而不得不听从。此乡绅之非。再举其美，当有地方工程或其他异常变故之际，如地方修造桥梁、修复城垣等工程，官民之力不足，或地方有盗贼啸聚之变，官府经费不足时，乡绅率先修缮桥梁城堡，又赞助经费，又聚同族子弟为团练以补官兵之不足而为之援，实隐然政府之藩屏。此乡绅之有利国家者。

楮原所说的乡绅，与我前面确定的乡绅多少有些出入。如果从好的意义上和坏的意义上说乡绅指的是乡村的领导者、头面人物，那恐怕象楮原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定享有事实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特权。只有生员资格而无名望、财产的人，不能少交税金；相反，即使没有生员资格，但门第高贵、富有财产的人，也能免交税金。

但事实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名望、财产兼有者，就是在乡村拥有很大势力的人。所谓有名望者，最明显的一定是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也一定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可以说乡绅基本上是地主。

清代最低的行政区划称县。县的官吏，包括长官知县在内也只有四五个人。这样能治理好一个县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官吏必须做的事，仅仅是通过作为徭役的里甲、保甲组织征收税金、维持治安。其他的事，从治水、灌溉到看青、赛会，几乎听任乡村自治，官吏很少干涉。这些乡村自治的领导者、头面人物，就是有教养、有德望、有财产的乡绅。如果说官宪是政治的权威的话，那么乡绅就是社会的权威。

具有政治权威的官宪和具有社会权威的乡绅遵守自己的职分，互不侵犯。不仅如此，通常他们还有着相互扶持的关系。治水、灌溉等委托给乡村自治的事情，本来应是县政的一部分，但县里的官吏不仅人数很少，而且都是从外省来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好治水、灌溉和看青、赛会等事情。知县除了征收税金和维持治安，其他事情一概委托当地人，而且是曾经担任官吏或具有官吏资格的人，即乡绅（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委托，只是习惯上这些事不由官吏而由乡绅去做）。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知县虽被称为“亲民之官”，但实际上并不下乡直接接触百姓，民众也认为没有比一生未去过官府再幸运的了。从而官民之间极为隔绝，在这中间起中介作用的就是乡绅。乡绅在任过官吏、具有官吏资格这一点上与官相同，并通晓官场情形；但乡绅在不是现职官吏这一点上又与民相同，并且明瞭民情。乡绅恰好位于官和民中间。由于乡绅处于两者中间，能够圆满地推行县政，维持社会秩序。

乡绅的身分是经国家考试得来的，所以，与具有政治权威的官府并无冲突。官府拥有金钱和军队，因此对于乡绅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与其说不喜欢这种存在，毋宁说乡绅要依赖官府来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乡绅要取媚官府，征税、治安让县官担任，乡绅助力。相应的其他县政则由乡绅自己担任。而具有政治权威的官府把县政的一部分让乡绅担任，相应的征税、治安工作让乡绅协助自己。官府请乡绅担当一部分县政，并直接领导和控

制民众，因此乡绅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官府并不做得罪乡绅的事，因为那样的话就不能完满地搞好县政，也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这样，官府和乡绅之间就产生了相互扶持的关系，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取得平衡，天下太平。

这种相互扶持的关系，在官府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就更加明显、紧密了。如果县官横征暴敛，与一般人同样有纳税义务的乡绅，也许会率领属下民众暴动。在具有暴虐无道的天子可杀这种思想的中国，任何权威也不能保证其地位安然不变。暴动是对县官不信任的最极端表现，对于县官也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是乡绅也怕暴动，即使暴动是针对县官的，因为县官和乡绅终究属于同一社会阶层，这种祸害过不了多久就会落到自己头上。而县官在向农民横征暴敛的同时，减少乡绅的税金，那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乡绅具有事实上的特权的根据。

四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乡村来保持的官府的政治权威和乡绅的社会权威的平衡被打破了。到处都是饥民、流民，随时都发生他们的暴动，官府的力量无论如何是不行了。乡绅已不能依赖官府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们必须把自己掌握的农民组织成自卫军队，即团练，以自己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样，乡绅已无服从官府的政治权威的必要。于是，保持到现今的政治的权威和社会的权威的均衡崩溃了。

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权威更加低落，同样也使地方的政治权威低落。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太平天国之乱。清政府需要大量的兵力和军费，但是已经衰落了官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需要。所以，清政府在征集兵力和军费上就必须依赖乡绅。在此之前，乡绅在地方无论拥有多大的势力，都只限于社会的权威。只要是涉及钱和军队的事，他们的权威是无济于事的，那是属于官府的

政治权威的事，对这一点乡绅自己是不怀疑的。但太平天国之乱发生时，乡绅在钱和军队问题上得到了自由，有了权威，清朝也因此能够镇压太平天国。但是乱后这种情形仍在继续，治安的维持、新税金的征收也由乡绅担任。这样，19世纪中叶以后，作为政治权威的官府虽仍存在，但实际上它的权威已转移到作为社会权威的乡绅手中，乡绅的地位显著提高了。

立于这些不仅具有社会权威而且兼有政治权威的乡绅势力之上的，是清末称为总督、巡抚的地方长官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清末都是有威望的地方长官。他们之所以有威望，是因为他们的背后存在着乡绅的势力。

先看曾国藩吧。太平天国之乱发生时，曾国藩是中央政府的官员，1852年他的母亲去世，他为服丧而休职回到故乡湖南，可以说是成为乡绅了。但是皇帝命令他组织讨伐太平天国的军队。曾国藩首先在家乡的绅士中选拔自己信赖的人担任军官，再由被任命为军官的乡绅挑选自己信赖的人担任下级军官，下级军官也以同样办法挑选士兵。这样编成的就是称为湘军和湘勇的军队。湘是曾国藩的故乡湖南省的简称。所以湘军中从上到下贯穿着父子、师生的关系，不会产生象官军中因常常更换军官而造成的官与兵互不熟悉的情况。在湘军中，无论是统领、分统、营官，都不能单独更换。如果让统领辞职的话，因为统领和分统是君臣、父子关系，就要免掉所有的分统，免掉分统就要免掉所有的营官。免掉统领，等于解散整个军队。

湘军的费用是如何筹集的呢？在正常情况下，其费用自然由国库供给，即中央政府拨给。但此时国库已无余裕，皇帝遂给予曾国藩“就地筹饷”的权限，即在所在地任意筹措军费的权限。因此，曾国藩使用乡绅征集临时税、出卖官职，充作湘军的费用。所以，湘军是曾国藩募集、编成、训练、自筹军费的军队，虽然算是官军，但曾国藩的私人军队的性质非常浓厚。

虽然有了“就地筹饷”的权限，但并非地方民政长官的曾国

藩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筹集军费。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成为清政府的一大转折，皇帝命令曾国藩保卫上海。为了使他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给予充足的军费，因此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即安徽、江西、江苏三省的长官。就这样，他一手掌握了军民财三权。当然，在此之前总督也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军民财三权，但在中央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并不能自由处理财政问题（实际上免不了欺瞒蒙混），统率本省的军队也不过是指其中一部分，而且只是在任期间。以往总督在任时间大体五年左右，所以并不能很有效地把握军民财三权。但曾国藩就不同了，他不仅可以全权管理财政，而且在以往总督统率军队之外，还有他亲自创建的为了他而不辞水火的湘军，因此他掌握的军民财三权要比以前的总督大得多。掌握这种大权的不仅是曾国藩，讨伐太平军的将领李鸿章、左宗棠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作为地方官他们也握有军民财三权。

曾国藩考虑到个人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可能有损皇帝的权威，因此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马上果断地解散了湘军。可是其他人并没有仿效他。握有军民财三权的地方长官随处割据，加强了地方分权的性质，其中最著者为直隶总督李鸿章（1870—1895年在任）、湖广总督张之洞（1889—1907年在任）、两江总督刘坤一（1890—1902年在任）、直隶总督袁世凯（1901—1907年在任）。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长达25年，这样的事在清朝还没有先例。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李鸿章拥有他创建的淮军，并且是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尽管李鸿章只是一名地方长官，但由于据有这种武力，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的许多事都是由他一手策划和经办的。

张之洞在湖广（湖北、湖南）18年、刘坤一在两江（江西、安徽、江苏）12年连续担任总督，虽然不如李鸿章长久，但这在清朝也是罕见的。中日甲午战争时，皇帝命令这两人救援李鸿章，他们不肯出兵；义和团事变时，他们又不奉宣战上谕，相反却

讨伐义和团，保护外国人。“国内之国”状况最明显的要算袁世凯，他的住地天津简直就象一个国家的首都。

曾国藩、李鸿章势力的支柱是湘军、淮军，前面说过，湘军、淮军的创建者是乡绅。李鸿章依靠淮军盘据直隶25年，其间他虽然与直隶的乡绅有过密切的关系，但淮军的根基还是在安徽和江苏。至于张之洞和袁世凯，支持他们势力的新军大体上是得到了他们任职地——不是他们的故乡——的绅士的帮助，而由当地的农民组成的。清末地方分权的性质至此已达到极点。这种形式固然符合在清末势力有所抬头的乡绅的愿望，即“自己的地方自己管”，还因为乡绅的这种愿望与地方长官总督、巡抚的愿望一致，乡绅奉掌握军民财三权的地方官为首，在他的领导下形成国中之国。清末一省或数省自立的情况，就是出于乡绅的策划。

19世纪中叶以来，对于一直力图扩大自己势力的乡绅来说，有一个十分不利的情况，那就是西方文化的侵入。乡绅自幼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有无儒家教养的科举考试而获得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等资格，可以说他们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化身。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中国文化在西洋近代文化的进攻面前不得不一步步衰落下去。传统中国文化的衰落，也就意味着以此为基础的乡绅的衰落。洋务运动是吸收西洋近代文化的运动，但只限于机械、器具、科学、技术这些物质层面上；至于精神方面，中国的精神文化是无可非议的，问题不多。可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动的变法运动就不同了，他们认为西洋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有很好的地方，因而力图采纳，这必然对乡绅造成了威胁。特别突出的是科举问题；科举是隋唐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本来是非常好的，可是到了清末它的弊病也突出起来，也许它的害处就在于它的过于完备。题目都出自四书五经，就其中的一句加以详细说明。但四书五经的解释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以致在考生的学习上、在试卷的评点上都有困难，因此由国家规定注释书，考生必须依此来学习，依此来

答题。这样做势必使科举考试的学习不是思考经书的意义，而是整个地背诵注释书。那么文章如何呢？当然不能写自己喜欢的文体，而是写一种运用华丽辞藻的称为八股文的特殊形式的文章。这种文章极为死板，自己要说的话根本无法充分表达，然而这样的文章又必须从小就开始练习。甚至连字体也不准表达个性，要用称为小楷的工整的楷书来书写答案，任何人的答案都是同样的字体。所以，科举制度不可能求得人的智慧的发展，它创造的都是没有个性的人、不能思想的人。这在君主专制时代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康有为、梁启超要把立宪政治移植到中国，在立宪政治之下，人们必须独立思考。变法派主张，科举是立宪政治的障碍，欲行立宪政治必须先废科举。

但是乡绅的特权身分，不是因为有金钱，不是因为门第高，而恰恰是由科举得来的。科举如被废除，他们的特权就将失去，所以乡绅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而变法运动要集中权力于中央，也为乡绅所不喜。如前所述，乡绅的格言是“自己的地方自己管”，有地方分权的性质，所以变法运动对乡绅没有一点好处。戊戌新政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有各种各样，但地方实力派乡绅的反对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把戊戌新政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乡绅的反对，一定会遭到反驳。参与新政的人不也是乡绅吗？确实，变法运动是年少气锐的下级官僚和乡绅层的运动，但是这些乡绅不是我在这里论述的只知保身而不管国家天下的那些人，而是密切关心政治、国家的人，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在他们中间萌芽。他们不是在乡里过着寂静的生活，而是活跃在上海、北京等地，或留学于日本，他们已经不是仍然居住在乡村的领导者，他们从开始从事变法活动的瞬间就已经不是乡绅了。这是我的想法。革命派中也有很多乡绅，这与变法派的情形是一样的。

尽管有乡绅的反对，但内外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采纳立宪政治。1905年，清政府决意采用立宪政治。作为第一项准备，就

是废除已成悬案的科举制度，对乡绅来说，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然而乡绅巧妙地利用了这最坏的事态。乡绅是靠科举制度立足的，他们想让自己的子弟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乡绅的身分。现在科举废除了，这一途径没有了。但清政府要以学校取代科举，赠给此后从学校毕业的人以生员、举人、进士称号，给予担任官吏的资格。这样，乡绅为了不使自己的特权动摇并且传之子子孙孙，开始重视并出钱创办学校，要由此开辟一个使他们的子弟取得乡绅资格的新途径。显然，他们创办学校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头脑，因此学校教育的内容依然如故。总之，他们热心学校教育，仍然是为了保住他们自身的地位。

立宪政治在推行学校教育的同时，以地方自治为前提。而地方自治恰好与乡绅“自己的地方自己管”的主张吻合。这种主张是历代中国王朝都不能接受的。税金的征收和治安的维持，也就是财政和军队，政府是不会把它们委托给乡绅的。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这些事情逐渐落入乡绅之手，以致乡绅的势力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然而，这种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兼有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只不过是既成事实或习惯上的做法。现在，作为宪政预备的地方自治制度的确立使得乡绅在事实上已经据有的地方上的社会的、政治的权威，得到政府的公认和保障，他们在地方上的地位遂更加巩固。出于这种想法，在此前对实行宪政犹豫不决的乡绅，便积极参加立宪运动，热心于地方自治的施行。他们出面主持乡镇议会的选举，占据议长、副议长等要职，当选为镇长、乡长。可以说，地方自治的要职几乎全为乡绅所独占。

成为致力于地方自治的乡绅的据点是咨议局，它的选举资格如下：

一、本省籍贯的年满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具下列资格之一者：

1. 在本省办学务或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者。
2. 本国或外国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者。

3. 生员以上出身者。
4. 曾任七品以上文官、五品以上武官者。
5. 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二、本省以外籍贯的年满二十五岁以上之男子，在本省居住满十年以上，具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不动产者。

这样的选举资格，几乎就是乡绅的资格，咨议局可以说是乡绅的言论机关。本来咨议局仅仅是总督、巡抚的咨询机关，但事实上当选为议员的乡绅就象真正的省议会议员一样进行活动，直接参与一省的政治。

本来应该随着废科举制而失势的乡绅，经过这番巧妙的转变，反而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但他们同时受到的冲击也无可阻挡地增强了。

首先是与民众的对立。以前与民众对立的是官府。当然，乡绅与官府属于同一社会阶层，所以民众暴动的矛头也指向乡绅。不过暴动终究还是指向官府，有的暴动甚至就是乡绅煽动起来的。但是，在清末的暴动（惊人地多）中，官府和乡绅的位置变换了，民众专门攻击乡绅，甚至发生了官府同情民众的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前收取税金并加以侵吞、而且逞强霸道的是官府，但到了清末这些事却由乡绅承继下来。就是说，乡绅要经手所有的新政，创建学校，铺设铁路，设立自治公所，举行人口调查，进行地方选举，在这些名目之下向民众索取名为捐的税金。当然，创建学校、铺设铁路等确实需要钱，为此需要向人民收取税金，而资金也确曾用到这些目的上。但一般说来，担任自治职务的乡绅是保守的，并不喜欢新政，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从事新政，因此借新政之名征收的税金，有不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民众不堪忍受，到处发生抗捐暴动，袭击学校、自治公所和乡绅的住宅。官府对乡绅取代他们的地位表示不满，因此这些暴动发生时，他们就同情民众一方。

但是，不能说乡绅失去了所有他们掌握的民众。抗捐暴动虽然频繁发生，但从整体上看，乡绅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民众。

其次是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前面说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立宪运动是谋求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清末满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更是想把权力集中于中央。例如，几次行政改革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它还想把地方上总督、巡抚的权限缩小到日本县知事的范围。这项计划由于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反对而宣告失败。于是次年，即1907年朝廷提升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号称总理中央政务，所以总督张之洞、袁世凯担任军机大臣一定意味着高升。但从实力来看，当时的总督掌握军民财三权，比起军民财权都没有的军机大臣要强得多。满洲政府如此处置，完全是为了剥夺他们在地方的权势。次年，即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醇亲王载沣之子、宣统帝溥仪即位。不久，摄政王载沣借口袁世凯有足疾迫使他到河南隐居，这是因为袁世凯虽被从直隶总督位子上赶走，但在当地依然拥有势力。摄政王策划重用满洲人，特别是自己的一族，强化满洲贵族的中央集权。对于中央政府这种倾向，主张地方分权的乡绅当然不会满意。施行宪政正好可以阻止这种倾向，因此他们迫使政府立即施行宪政。这样，政府越是强化中央的权力，与乡绅的对立也就越发加深。

那么，作为中央政府分支的总督、巡抚以及其他地方官吏与乡绅的关系又如何呢？总督、巡抚、地方官吏既然是中央政府的分支，他们与乡绅之间当然会有摩擦。乡绅还具有排他性，不喜外地人，所以他们对收回被外国人所据有的利权非常热心。地方官吏也是外地人（按照回避制度，官吏不得在自己的家乡任职），因此乡绅与地方官吏未必有良好的关系。但是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吏也要确保并加强自己在乡绅之上的地方上的权力，因此不满意中央政府推行的集权政策，在朝廷和乡绅之间更靠近乡绅一边。就这一点来说，乡绅与总督、巡抚的关系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

五

乡绅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在1911年中央政府发布铁路干线国有令，借外资把民营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时达到了极点。铁路利权原来几乎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乡绅热衷于把它收回。现在政府借外资以实行国有，而乡绅认为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乃是夺民之利送给外国人，因此极度愤慨，由此发生了由他们鼓动的在四川最先兴起的暴动。

但是，无论乡绅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是多么尖锐，他们还是不会参加打倒政府的革命运动的。对于乡绅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个异民族的满洲王朝做统治者，尤其是清末那个一味集权中央以加强独裁的满洲王朝，他们更没有一点留恋，他们觉得这个王朝垮台会更好些。但是乡绅害怕革命所带来的动乱，他们深知，如果发生民众动乱，即使这动乱是他们自己领导的、鼓动的，然而因为他们与民众的阶级立场不同，过不了多久民众就会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他们自己。所以，不管他们如何不满，也还是要维持现状，更不会参加革命运动。现在乡绅在四川鼓动民众起来暴动，但又惊讶暴动超出了他们预想之外，所以企图加以镇压。

就在四川的冲突过程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燃起了革命的烽火。这时四川的暴动还是没有平定，革命蔓延到全国各地是不可避免的了。乡绅看到了这一点，就象在1905年废科举时一样，他们又来了一次巧妙的转变。他们既对清朝政府没有什么留恋，又担心革命之祸会落到他们头上，为了避免革命，他们迅速参加了革命。我先前说革命派吸收了立宪派乡绅，也许说法不恰当，说乡绅参加了革命也是一样。应该说，保守的乡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领导了革命。

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于南京为止，革命的过程有如下特点：

1. 1911年内宣布独立的省分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15个省，其中江西、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10个省在新军发动起义之前，乡绅已经站在革命方面宣布了独立。

2. 在宣布独立的15个省中，乡绅推举的革命军政府的长官即都督，主要是原来的总督、巡抚；江西、贵州、浙江、广东因为总督、巡抚固辞而没再担任都督；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都是总督、巡抚先得到了都督的地位（后来又有很多变化）。

3. 都督发生变化的情况虽多，但不是本省人担任都督的只有云南、贵州、福建、山东（其中福建、山东是原来的总督、巡抚）4省，而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四川11省都是本省人出任都督。

4. 除了江苏、广东、山东3省，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四川12省是军人出任都督。

5. 关于民政，无论哪里都是乡绅执其牛耳，即便在最初革命派势力很强的湖北、湖南、贵州，也还是立宪派乡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以上5点说明，辛亥革命虽然是由革命派发动的，但是不久立宪派乡绅就加入革命并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使辛亥革命获得了成功。正因为辛亥革命是在控制了民众的乡绅的手里成功的，所以才是几乎没有流血的革命。同时，辛亥革命既然是乡绅领导的，也就决定了革命的性质。革命派虽然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并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结果仍不得不屈服于袁世凯，让他当了临时大总统，并且把临时政府迁移到北京，这是极为显著的事实。辛亥革命既然是由乡绅之手完成的，这样的结局便是顺理成章的了。革命的巨头孙文当然不会为乡绅所欢迎，相

反，袁世凯是致使戊戌新政失败的原动力，又是坚决反对清政府中央集权政策的斗士，并且拥有武力。对于为了避免革命而加入革命的乡绅来说，没有比袁世凯更胜任的首领了。这次革命除了推翻异民族的清政府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收获，从由乡绅领导的革命来看，这也是自然的。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革命后回避制度不复存在，大多数县都是由当地人担任县长官，这也是乡绅领导的革命的必然结果。掌握县政是乡绅早已有之的理想，清末时已经相当接近这一步了，但当时由于回避制度的妨碍，他们还不能出任知县，这回革命使他们达到了目的。

（还有，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革命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解放，这点很重要。在民主共和建立之后，尽管现实上袁世凯在推行独裁，但是想再度复辟君主专制就不被容许了，并且不要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孕育之中。这也许是发动革命的革命派最大的功绩，但这功绩是革命运动带来的，不能说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由于辛亥革命，乡绅几乎把地方政治全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各省长官——都督（后为督军）由本省军人担任，他们统率的军队由当地的士兵组成。而乡绅掌握财政、民政，为都督（督军）服务，就这样建立了以省为单位的军阀政权。

但是对乡绅有利的仅仅是形势的停滞。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袁世凯一得到政权，就象一个独裁君主一样极力集权中央。众议院、参议院已经成立，但袁世凯对此完全无视，这样，形势就朝着与乡绅的要求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感到被出卖的乡绅阶层逐渐采取反袁的态度而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在1913年的国会初选中之所以获得压倒的多数，就是因为曾经拥戴袁世凯的保守的乡绅阶层加入了反袁势力占多数的国民党。

尽管遭到如此反对，袁世凯仍一意孤行推行专制独裁，并且终于复辟了帝制。但他没有达到最终目的，在一片反对帝制的呼声中，于1916年郁郁死去。以袁世凯之力尚无法恢复帝制，这表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在实际上实现民主共和，但是君主专制政治

一旦被废除就再也不能恢复，它的害处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地方上的实力派、实行革命的乡绅不允许帝制的恢复，这一点也值得考虑。

袁世凯死后，接着就是充满血腥的军阀对立抗争的时代。这些军阀与革命后的军阀一样以乡绅势力为基础，不同的是以前的军阀以省为单位，现在则发展为雄据数省的大军阀。这种倾向进入20年代以后更加突出，这是与本来主张地方分权的乡绅目睹连年军阀战争的惨祸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发展，转而要求和平和统一趋势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民党的北伐和统一就是利用乡绅要求和平和统一的机会进行的。北伐革命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而封建主义的代表是军阀和乡绅，因为上述原因，与北伐没有打倒帝国主义一样，北伐也没有粉碎乡绅的势力。乡绅的势力在国民党统治下仍然保存下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乡绅是传统中国社会地方上的领导者，每当中央政府权力衰落的王朝末期，他们的势力就会增强，从这一点来看，清末他们的势力的抬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清末的情况与其他王朝的末期不同，这就是西洋近代文化的输入。乡绅立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可以说是保守的、前近代的势力，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刚开始的清末，按道理乡绅的势力应该衰落下去。

就在这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自己的力量两种局势中间，乡绅巧妙地改变了自己。他们通过改变自己不仅几次渡过危机，而且利用危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第一次危机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乡绅与其他保守势力合流，简单地应付过去。第二次危机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此时他们转变为立宪派。第三次危机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一次他们转变为革命派。由于乡绅转变为革命派并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致使辛亥革命在反满的民族革命

之外没有任何收获。

在渡过这三次危机的过程中，乡绅都伪装成近代化的先导。在此后民国初年的数年中，乡绅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但是他们终究无法始终戴着假面具永远上升，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开始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不过他们的势力在国民党统治下依然保留，乡绅的存在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植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乡绅势力之强韧，实在是令人惊叹。伴随着近代化的过程本应消亡的乡绅，相反却增强了自己的势力，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化的特色。

译自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10月发行。

迟云飞译

章炳麟的革命思想的形成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近藤邦康

序

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中国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在这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看到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资本输出和获得利权划分势力范围，一步步地“瓜分”中国；另一方面还看到清朝统治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洋务运动、变法运动都遭到了惨败。随后，孙文等发动以“灭满兴汉”为口号的革命运动，勃然而兴。孙文等和期待着清朝施行“新政”的君主立宪改良派们展开了激烈的理论斗争。延至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前，光是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性质的军事冒险，革命派就举行了10次。每一次都因为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计划而失败。革命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可是后来却因为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的强取豪夺，不得不把成功拱手让人。这一切都是由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性质所规定的。也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妥协性和软弱性。

不过，表面上看来很单纯的“灭满兴汉”口号，被孙文等人发动的革命运动使用以后，它便有了对以前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彻底批判的内涵。同时，它还继承了清朝统治下象潜流一样从未停

止过的“反清复明”的会党传统，并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反对施行“新政”的反饥饿、抗税斗争结合起来了。除了这些中国社会的深层内容外，以留学日本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们还具有了更为近代的觉悟，即“近代进化”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整个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有哪些是真正符合革命的内容呢？

在这一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就是章炳麟。我们在他的思想中，尚且看不到这一革命与否的决然界限。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日益深重和中国接二连三的失败中，在批判康有为改良思想而产生的中国革命新局面中，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什么，由此亦可看出这一革命的历史意义。从这一角度说，本文是拙著《清末变法论与谭嗣同的思想——变法与圣人之道》一文的继续。^②本文主要考察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阶段的章炳麟，考察的内容包括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的革命思想的形成与构造、他的革命家的生活方式。至于辛亥革命以后时期的情况及与孙文路线的对比等问题，留待以后另文别述。

考察章炳麟的思想，本文想达到三个目的。

其一，作为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属于古文学派，属于与康有为等的今文学派相对立的学派。古文学派讲求“实事求是”，主张对自身及自己所处的传统世界的危机泰然处之，主张对朝廷只有议论之权，而无政治之权。^③今文学派则主张“经世致用”，批评古文学派的不实用与非政治性，要求士大夫要有“士权”。章炳麟继承了古文学派的非政治性，反对士大夫谋求“显贵务名”和“富贵利禄”，并在这点上彻底地批判今文学派。但这并不能说已经复归到传统的世界中去了，倒不如说已经起着从传统的士

^① 除这些外，这一口号还与华侨有关，还与要求收回利权和地方自治的地方乡绅有关。

^② 该文载于日本劲草书房1981年12月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书。

^③ 参见欧榘甲：《新广东》。

大夫转变为新的知识分子的否定媒介的作用。

其二，清末的思想许多都具有中体西用风格的结构。“由于西方的侵略和进攻，以及中国的失败，中体不得不舍弃皮肉，甚至骨头，只是把骨髓作为自己而保存下来。”^①在章炳麟的思想中，被作为骨髓与“近代主义发生摩擦并进行抵抗”的中国思想研究为何物？在洋务派大官僚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看来，应该固守的是三纲五常，人民毫无权力，权力与权威应由清朝皇帝掌握。在变法派谭嗣同看来，权力应由与人民一体的开明乡绅掌握。康有为在此基础上组编出一君万民体制。已经脱掉外面一层皮的章炳麟，把天子、乡绅等抛在一旁，露出了以人民为本体的端倪。

其三，列宁认为孙文的民生主义是想“防止资本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这一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②对章炳麟来说，这种“主观社会主义”的倾向比孙文更极端，不用说，他也想预防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前身”绅、商、官通过议会制度取得政治上的特权，进而压迫普通民众的理论，章炳麟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本文将探求章炳麟这种思想产生于何种立场。这种包含“主观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又和以后的新民主主义有着何种关系。

一、戊戌变法

乙未年（1895年），章炳麟读过康有为在北京创立的强学会的章程，以其有富国强兵之宗旨，加入了强学会。翌年，他作为

^① 西顺藏：《今后的儒教与中国思想》，载筑摩书房《中国思想论集》1969年版，第476页。

^②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页。

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的记者，与变法派共同活动。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1903年章炳麟因《苏报》案被作为革命家人狱后，曾对改良派报纸《新闻报》的记者回忆说：“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①同时，他还再三强调自青年时期起，“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②甚至连参加变法运动时期，他也具有强烈的排满思想。在变法运动中，他曾针对顽固派的攻击说：“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但是笔者认为，章炳麟前面所说的一段话是针对《新闻报》记者而言的，因为该报攻击他是从变法向革命变节。章炳麟要说明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贯性。光凭文字并不能完全说明他的思想的真正变化，所以有必要考察他在变法时期思想向革命转变发展的过程。

据说，章炳麟赞成变法维新，但反对创立孔教。^③在这一时期，章炳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相比较，在思想上是有分歧的。从他在《时务报》第18卷上发表的《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第19卷上发表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论文，以及1900年1月出版的《瘴书》中的各篇论文，就可看出他的观点总体上与变法派路线相近，但也有不同之处。尤其是他的思想核心与变法派根本不同。他参加变法运动可称是极为独特。

不消说，西方对中国的压迫也使变法派产生了危机感。要解除这一危机，惟有富国强兵。为此，变法派认为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是中国应该学习的范本。中国应该迎头赶上，一跃而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但是，章炳麟认为被白种人压迫的黄种人应该发愤。回击白种人的压迫在他的头脑中才是第一位的事情。就此而言，西方与中国、文明与野蛮、富强与贫弱，这些在章炳麟的标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78页。

^② 章炳麟：《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③ 参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112页。

准上，并无实质上的高低之分。在他的眼睛里只有所谓“种类”的区别，即人种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区别。

他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中，主张中国与日本结为唇齿同盟，日本当时能够“远抗泰西，近拒俄罗斯”。对欲雪甲午战争之耻、主张与俄国结盟的亲俄派，他批评说是“背叛同类而亲异族”。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中，他虽然承认康有为主张的“通三统”，认为“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但他同时还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吾一统之教”。没有比“吾教”更正确的，也没有比“吾种”更尊贵的，有“捏成”之态，但不妄自尊大，不把自己置于与众相异的地位。在章炳麟看来，中国与西方的大同和中外往来是不存在的，对于压迫者的西方，中国要树立自主性，并要强调教术与种类的觉悟，要“以教卫民，以民卫国”。这种名教与学术观点的鼓吹者，是一群不关心功名科举和利禄的知识分子。为达到目的，他们组织了学会。就学会而言，章炳麟的主张也与谭嗣同的想法不同，谭嗣同主张成立官、绅、商合作的，为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团体与地方议会。在他眼中的学会，应是追求利与权的学会。

对于议会，章炳麟的态度完全是消极的。他认为要制定“一致”的法，最重要的就是先有议院。但是如果设立议院，守旧派与变法派之间就要发生争论，进而产生“两群”，不可能产生统一的政令，进而也会给全体带来“混乱”。^①变法派像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党派一样，依据本派实力的盈缩进行全中国的改革。章炳麟全然没有这种浅见。他把自己的观点置于守旧派与变法派之间，是从中国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担心中国内部的矛盾和争论会走向极端，使白人坐收渔翁之利。他在警告统治者抑压民气将会导致中国“瓦解”的同时，还害怕自下而上的“革命”将会使中国“土崩”，进一步断言当时中国的急务是“以革

^① 章炳麟：《丛书·明群第二十三》，《章太炎全集》第三集。

政挽革命”。^①

在章炳麟的头脑中，主要矛盾是白人与黄种人的矛盾，作为异族王朝的满清王朝是被包括在中国之中的。他认为对于白人的压迫只有发愤才能解决危机，而发愤则要以种类“觉悟”为开始。这一时期，章炳麟的思想中有两个轴心，“种类”的觉悟与被压迫者汉民族的觉悟是相连的，可是这种认识又不可避免地与满汉一致的认识相冲突。这两个轴心作为一个问题，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章炳麟所写的《馗书·客帝第二十九》中被公开提出来加以解决。

“客帝”的宗旨是尊“素王空帝”的孔子的子孙为“中夏共主”，由他来主持名位高下。执掌赏罚的“霸者”、异民族的“客帝”光绪摆在其下。他把这种关系比作天子对客卿、天皇对幕府的关系。他的认识也从“逐加于满洲，而地割于白人”^②转变为必须支持清朝。可是这种认识很明显与“勿逐，则高义殆乎格配天之志乎息矣”的汉民族意识相矛盾。为使这一矛盾得到统一，他解释说，光绪皇帝是“今世则有圣明之客帝，椎匈齧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③他认为光绪皇帝的政治可“以御白人之侮”，汉民族依靠他可以得到安稳。他对光绪皇帝寄如与此之大的希望，自然使人感到勉强。议论的焦点在于他的主张并无实行的可能，连他自己也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其攘逐满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满洲也亦在今日”，再一次明确了满汉两族之间的紧张关系。^④同时也说明他的思想中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矛

① 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

② 章炳麟：《馗书·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第三集。

③ 章炳麟：《馗书·客帝第二十九》，《章太炎全集》第三集。

④ 另外，在《馗书·帝卦第三十四》中他说：“自永历丧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诸夏之常主，自非解拜，抑孰有具位者乎？”在《馗书·杂说第四十八》中说：“元定宗没，而委裘三年，未有压纽之主。是时中原之黎庶，则谁隶乎？苟曰元百年有君，三年无之，民犹隶元也。呜乎！诸夏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无君，民尤隶诸夏矣！”可供理解“客帝”之参考。

盾。

在1904年东京出版的《廋书》重订本中，章炳麟对《廋书》进行了删改修订，增添了新的论文。其中新增添的论文《客帝匡谬》中，章炳麟举例说：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际，“民称‘顺民’，朝上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①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满洲弗逐，欲土之爱国，民之敌愾，不可得也。浸微浸消，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②他回顾《廋书》刚开始写时，出于“尊崇孔教，以息内讧”的目的，写了《客帝》一文。但是以后他发觉该文“违形势远矣”，意识到“弃本崇教”是错误的，所以在重订《廋书》时删去了《客帝》一文。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章炳麟又把汉民族正面的敌人以清王朝代替了西方。这样，就把问题改为如果不排满就不能解除西方的压迫。不仅解决了变法运动时期难于解决的矛盾，而且也冲破了其自身具有的排满主义堤坝。章炳麟从变法思想走向革命思想的过程，是与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同步的，他的思想变化可以说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清楚说明。

在这里，章炳麟称满洲清朝为“满洲贱族”，把满洲视为夷狄，喻作兽类，流露出极端的华夷思想。并且他还把汉民族的中华意识作为排满革命的武器，屡屡使用。被他称之为“德慧术知之氓”的不仅有中国，也有西方人中的大秦。但在他的眼中，西方人毕竟与中国人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与欧美是“其贵同，其种族不同”。但是对于统治轩辕子孙汉民族的异民族，汉民族都应“安论其戎狄与贵种哉？其拒之一矣”。这才是他对异民族看法的真实所在。

和《客帝匡谬》并列《廋书》重订本之首的是《分镇匡谬》。在这里，章炳麟提出如果“以封建、方镇为一”的话，“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所以与其“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与他提出改革官制相同，这也是他心目中抵御白

^{①②} 章炳麟：《廋书·客帝匡谬第二十九》，《章太炎全集》第三集。

人侵略的一个策略。^①在《廛书·宅南第三十二》中，章炳麟进而提出了迁都武汉的主张。北方留与满洲人驻守，以防俄国。南方由汉民族实行宪政，避免满洲的干涉。他的这种主张，实际是对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官僚的期待。义和团运动期间，章炳麟曾致书李鸿章，劝说广东宣告独立，任用戊戌年主张变法的士大夫，实行新政，^②可以看作是《宅南第三十二》中主张的一种实践。如众所知，当时李鸿章观望形势，以后也未见有任何独立的行动。张之洞因唐才常自立军事事件屠杀志士百余人，毫无顾忌地发挥着他的反革命手段。李、张二人的作为一下子打破了章炳麟的设想，使章炳麟看清楚当时督抚表面强大，内中空，利用实权派的权力进行变革的“借权”想法完全没有可能。将来唯有出现“新圣”才能救中国。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在章炳麟当时的头脑中，抵抗白人是他的基本目的。他超然于变法派、洋务派之间，不问二者路线之不同，对二者都抱有期望，并参与了他们的活动。说到章炳麟个人的立场，可以说他实际上并不限定于某一特定的党派与路线，是十分自由的。也可以说他虽参加党派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并不站在某一党派的立场上。对章炳麟的这种情况，可以从《廛书·明独第二十四》和《廛书·播种第二十五》中看出。这两篇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章炳麟的这种思想本质。

尤其是《廛书·播种第二十五》，反映了章炳麟在戊戌变法刚一结束时的思想。当时，章炳麟认为由于白人的侵略使中国处于危机之中，即便变法成功，基本上也不存在解除危机的希望。他在该文中说：“虽君臣一德，以有成绩，固知其不能复贞观、开元也。”然而，他也同样提出，如果因为没有希望而什么也不干，则将坐视诸夏人民之灭亡。他无法默默忍受这种灭亡的肉体痛苦和感情，因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想把自己悲哀的心作为种

① 章炳麟：《廛书·分镇第三十一》，《章太炎全集》第三集。

② 章炳麟：《庚子拳变与粤督书》，《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二号。

子播于数省，通过当时尚且得到保全的数省，由后世的英雄与人民再兴中国。也就是他所说的“殖之不必获，不殖则必害其不获矣”。在章炳麟看来，出于前述的否定动机而积极行动的人都是些志士，志士因镇压而流血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志士，就应该有一些偏好这种流血的劲头，日本幕府曾因镇压井伊直弼，激怒了游侠儒生，招致明治维新。他希望中国因西太后的镇压惹起大众的愤慨，为变革提供绝好的条件。可惜当时的士大夫们对人民大众的疾苦视为与己无关，平素悠然随便而自榜为“华妙”。即便参加变革，也往往因为镇压而立刻变得动摇“脆弱”。当时的士大夫之所以这样，章炳麟认为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哀”、“不弘毅”。很明显，这样的士大夫挑不起把变革进行到底的重担，有必要产生出新的英勇不屈的抵抗者。他们应该是前述士大夫的否定者。他们应该以自己的死唤起亿兆人起来反抗，以自己的生为亿兆人而担忧。这种人可以说是章炳麟塑造出来的革命家的原型。联系谭嗣同曾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的名言来看，章炳麟与谭嗣同之间存在着否定的继承关系。

对于章炳麟心目中的革命家和志士，他在《馗书·明独第二十四》中规定应该具有“大独”的性质。这些人与“群”隔离，同时又不象鸷夫、嗇夫、旷夫之流的“独”，因为这些人的“独”并不是真正的“大独”，只是似是而非的“独”。不确立“独”，把自己合于流俗的“败群”的变法派，当然更谈不上是“大独”。章炳麟对“独”与“败群”两者都予以否定，他认为真正的“独”是指那些士大夫中不合于流俗，并且不妥协于孤立的人。若于“独”聚合在一起为人民而担忧它成为“群”，那么“大独”则是“大群之母”。

不可否认，变法派也有关心人民生命之处，“不忍之心”是他们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虽说章炳麟的观点与变法派有些相似，但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人民已不单纯是被动的生命体，因为白人的压迫而激发出种类的觉悟，使人民作为主体而存在。在章

炳麟的心目中，革命家和志士是作为“先知先觉”而存在的。志士们应该把不屈的抵抗精神当作种子向四处传播，感染人民，使人民觉醒。人民与志士之间，在压迫与反抗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同一性。

在章炳麟看来，志士见到人民而生忧患之心，并为人民普遍的要求而进行政治活动。因为代表人民利益的缘故，志士在政治方面要经常警惕不为有实权的士大夫的特殊利益服务。虽然章炳麟是站在超然的地位，不是把自己置于党派之中，可在表面上他却参加了党派并进行了政治活动。从这一点看，章炳麟的确与当时的变法派有所不同。章炳麟带着这种志士观，经历了西太后政变使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历史过程，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变法派士大夫们的软弱性。通过对这种士大夫的否定，作为结晶，出现了革命家的雏型。这也可以视为从变法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

二、从戊戌政变到《苏报》事件

从戊戌政变(1898年)至《苏报》事件(1903年)的6年间，章炳麟虽列名唐才常的“中国国会”，可是由于劝告唐才常排满未能成功，一怒之下剪辮而去。他到苏州东吴大学执教，向学生鼓吹种族大义，到东京筹画支那亡国纪念会，在上海参加蔡元培的爱国学社，为邹容所著《革命军》作序，在《苏报》上刊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终于因为这篇文章引发“苏报”事件而被捕入狱。在这6年中，章炳麟作为革命家，活跃得令人眼花缭乱，往返奔波于日本、故乡、苏州、上海之间。在这6年中，他“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①由于清政府的通辑，使他不得不在“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奋斗。在这样一条革命实践的道路上行进的章炳麟，1900年针对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写出了《正仇满论》。1903年针对康有为

^① 章炳麟：《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的《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思想上与昔日的同志康有为、梁启超决裂，阐明了自己的革命的原则立场。

康梁与章炳麟分歧的基本点就在于当时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康梁主张走“专制近代国民国家”的道路，章炳麟主张走“异民族统治汉族光复”的道路。从章炳麟的角度看，目标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也就是说一条是通过光绪皇帝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一条是通过汉民族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因此，康梁与章炳麟的分歧归根结底就是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的问题。

梁启超把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愚昧的人民对变法不关心，使大声疾呼的先觉陷于失败。梁启超把“中国与西方都放在单线进化的座标轴上进行对比”，^①他发现西方是近代国民国家，而中国是“一人君临天下，百姓皆为奴仆”的国家。但是，梁启超却不想放弃中国这种模式，同时又希望中国能紧紧地跟上西方近代社会。在中国的进化方向上，在现实历史进化之前，这些已基本由梁启超规定了。他认为应该改变数千年的学说，改变4亿人的脑筋，把愚昧的人民造就成有爱国心的国民，惟有自上而下的教育，别无他途。在他的心目中，民权也不能由人民自己从下而上地要求与获得，而应当期待光绪皇帝自上而下地恩赐这种权力。

对于革命与立宪，康有为曾说过：现在“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他并以之为根据，得出了反对革命、光绪皇帝立宪正当化的结论。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如何收拾败局及将使用哪一种概念，康梁与章炳麟对此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康梁把人民无觉悟的状况固定化，他们认为人民自身的本质是愚昧的，是作为被动体而存在的，没有发展自

^① 参阅野村浩一：《“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载《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筑摩书房1964年版。

己的能力。因此，人民只能接受自上而下的教育与救济，不会能动地推动历史发展。在康梁的心目中，能够接受教育与救济的有知识的人又往往与现实世界中的权力象征天子粘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康梁认为现实世界中是一个双层结构，上层是天子和能够接受教育与救济的有知识与智慧的人，下层是广大众多无知识的愚昧的芸芸众生。与梁启超把近代西方作为榜样相同，康有为也把近代西方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收入了他的大同思想。他把现实的历史发展作为大同思想中先出现的一个发展阶段，他除了用天道时宜论来解释外，不能作出任何其他理论解释。

对于康梁，章炳麟把他的批判矛头指向了二人所共有的认识结构上。虽然章炳麟承认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与社稷，是招致西方侵略的原因，承认“公理未明，旧俗俱在”的现状。但是他认为：“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蕃野蛮者哉？”^①“公理之未，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②“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③他从人民的革命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民能在其自身运动的发展中得到发展。在人民内部存在的“生民之良知本能”的民族主义，是使人民行动起来的主观条件。^④他批评康有为因为主观“成见”而随意限定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民在斗争中，觉悟会一步步提高。他常常引用李自成、义和团、广西会党的历史经验作为例子，期待将来革命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解释的理论与变革的理论是鲜明对立的，“拨乱反正”不仅涉及“天命”之有无，而且还涉及“人力”之难易的问题。章炳麟的批判，最大特征是击中了康有为思想的本质。在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新中国，研究者们对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加褒扬，称赞

①②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③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④ 参见江口札郎：《帝国主义与民族》，东京大学学术丛书第3辑第175页。

章炳麟“对康有为的批判，是当时革命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①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他们都把光绪皇帝所谓的“圣明”和主观上的善意，推崇到了历史的绝对的地步。这一点也成为章炳麟批判的证据，章炳麟从500万满族人统治4亿汉族人这样一个事实出发，恰当地安排光绪皇帝的位置，分析出光绪皇帝不仅不欲变法，而且也不能变法。章炳麟与康梁之间观点的对立，展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问题上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

章炳麟不仅安排了光绪皇帝与人民对立的位置，注意到他在革命过程中与“合意”的人民进行区别。另外，章炳麟认为还应该说到“兼恃一人才略”的英雄华盛顿、拿破仑等人。这种对不同人的不同看法的主题，实质上是在区别彻底的改良与将要开展革命这样两条道路。但是，章炳麟没有具体地叙述革命实现的方法，也就是没有深入地叙述“合意”的人民与“恃才略”的英雄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一议论比以后他在《民报》上发表的众多论文更显得明快。

从对康梁的批判态度上看，章炳麟主要是从实现的可能性来考虑问题的。至少在议论方面他认为康梁也是汉民族中的一分子，认为他们能够参加排满革命，所以没有把他们视为敌人，只是作为朋友来批判。可以说章炳麟提出的这场以打倒满族统治汉族的“保生命，不保权位”的革命，与梁启超所说的对光绪皇帝的忠爱之念并无根本上的矛盾。对于康有为联络孙中山，创设保国会，密约唐才常的自立军等事，章炳麟认为康有为是素志革命的，只不过因为他“瞑瞶于富贵利禄”而反对革命。

根据他那幅度很宽的革命观，章炳麟把自己的敌人限制为清政府。只要反清，不问党派路线，他一律支持。他对斗争与不斗争的态度是严格的，但对使用什么方法斗争却又是宽容的。他心

^① 王维诚：《章太炎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目中的革命，是想在没有外国人干涉的南方数省创立政府，施行新政。与《牖书·播种第二十五》中的设想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章炳麟的革命思想在革命派中是极独特的，尤其与孙文的路线有着许多本质不同之处。

一个不同之处，表现为体制问题。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革命是“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这场革命与以前的野蛮革命不同，是一场“复我天赋之权利”的革命，这场革命以美国独立、法兰西革命为榜样，准备建立“文明政体”的文明革命。孙文在《三民主义与革命前途》一文中也提出要打倒“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要“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把“民权”与“民族”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包括“专制—→近代国民国家”和“异民族统治—→光复汉民族”这样两个内容，即把体制与民族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但是，对于章炳麟来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同族改制”的“革命”，而是“驱逐异族”的“光复”，是从灭亡中复活。与英国、法国的革命相比，更类似于意大利、希腊的中兴。他常常从主体方面考虑问题，而对文明、野蛮、专制、立宪等体制问题，则基本上没有显露出兴致。关于制度，象在《民报》时期议论的那样，他反倒否定“近代国民国家”。这一点可以说是章炳麟革命思想的一大特色。

1903年，因章炳麟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写的《革命军》中有对清政府“大逆不道”的言词，遭到上海租界当局的逮捕与审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苏报》案件。在这场官司中，章被判监禁3年，邹被判监禁2年，二人都被关在租界的西牢里。结果邹容瘐死狱中，章炳麟期满后被释。这一事件对章炳麟思想的影响，可以做如下推测：

第一，章从写《慰丹传》开始，便与吴稚晖发生争端。这场论争围绕邹容的死争得很激烈。双方彼此攻讦，使章产生凄凉绝望之感。章炳麟认为最初列入逮捕名单的吴稚晖之所以幸免，是

因为他向查办革命党的江苏侯补道俞明震出卖了章、邹二人。对这件事，尽管他没有任何证据，但仍深信不疑。章、吴二人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使人莫辨其明。当时，章、吴二人均属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教育会。以前因为学潮，学生自主成立了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曾予以支持。以后当学生反对中国教育会时，章主张制裁学生，而吴却偏袒学生。吴本人似乎热衷于策动各种各样的政治暗潮，结党营私。当时他可能使用十分过激的言词，迎合了学生激烈的破坏情绪。而这种性格与作法恰为章所厌恶。吴以后在巴黎出版的杂志《新世纪》上继续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根据吴以后的回忆，当时的两江总督、候补道等人在思想上也是同情新党的。他们让自己的子弟留学日本，并与爱国学社的成员周旋，暗中形成了一条开明官僚与革命家之间的回路。因为这种关系，俞明震秘密传唤吴稚晖，在谈笑中让吴看了对他们的通缉文书，劝他到海外避祸，吴爽快地答应了。在掌权者与革命者彼此分离、互相对立的时代，在最高权力者与最下层的人民之间看来是不存在中间阶层的。于是作为开明的士大夫与读书人中间，俞与吴却有在谈笑中达成交易的“共同市场”，这真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作为“中毒”于革命的人，章炳麟更是憎恨这种现象。以其所有的洁癖来衡量，就会发现这一“共同市场”就是权力与革命互相渗透的结合部。把自己与革命家割裂开的就是这一结合部。在以后的《民报》时期，他执拗地坚持反对“借权”的主题，可以说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第二，对于章炳麟的说法，吴稚晖给予了回击。他责备章炳麟在被抓后，还致书狱外的邹容，百般劝说他自首，是“落水求侣”的行为。对吴的说法，章说：“仆既入狱，非有慰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慰丹亦以大义来赴”，如果邹容不来，则“狱不欲决，则仆与苏报馆中三子，将永系于捕署之中”。^①吴把章的回答和章对21

^① 章炳麟：《与吴稚晖谈苏报案书》，《辛亥革命》（一）第399页。

岁便瘐死狱中的邹容的悲伤，都叱为巧妙的手法，讽称章是一位高明的心理战术家。在吴的文章中，读者自己可以找到他对章的心理分析，可惜我对之没有兴趣。相反，我从章的所作所为感到他与邹一起投狱，一起面对死亡，有着共同的命运；感到他想在已死的邹容与活着的自己之间用一条亲密的链条连结起来；感到了他的炽热感情。我们可以看出在章的头脑中的确存在着一种乐观的信念：革命无法避免流血，血决不会白流。流血将促使人民起来反抗，最终导致光复。以后他屡屡书写文章，弘扬为革命牺牲的先烈的事迹。而且，他的文章使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到，他所颂扬的英雄似乎不是别人而是读者自己。从而在悲愤之中和牺牲的革命家融为一体。象这样的感受，估计在《苏报》案以后，从他的文章中才可以获得。

《苏报》案是在英国人持有治外法权的会审公廨中进行的。原告清政府与被告6名汉族平民，在法庭上进行了资格对等的斗争。这一案件有人称之为“惊天动地的大案”。没有任何权力的章炳麟以“吾辈数人则汉种千万万人之代表”^①的气概，堂堂正正地在法庭受审。被判3年监禁的章炳麟，在狱中受到白人的侮辱，受到狱卒，尤其是印度狱卒的殴打，经受了邹容瘐死狱中的不幸。但是他认为“忧愁无益”，面上没有一丝忧容。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出现在上海河南路工部局门前。在狱中熟读了《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佛学著作，可能是得力于佛学经典，他显得比以前更粗壮了。蔡元培等10余人鼓掌欢迎他解脱了囹圄之灾。

吴稚晖的叛变、邹容的瘐死、3年西牢的狱中艰苦生活，章炳麟都一一忍受了。他的革命家的觉悟越来越坚定。为了在理论上支持他的抵抗思想，他向佛学经典寻求支持，思索更深入了。当天晚上，他便踏上旅途，出发到革命派的中心东京去。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78页。

三、《民报》时期

到达革命派中心地东京的章炳麟，马上加入了前一年成立的同盟会，并从第6期起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一直编到第24期《民报》被封闭为止。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行动大概是他整个一生中与中国革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期。读过章炳麟在《民报》上刊登的60余篇论文、演说记录等，可以得知他试图统一把握如何做革命家和如何干革命的问题，也就是把握人与主义及路线的问题。这些文章是他的革命思想的理论花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方面深层的哲学问题。下面，我们根据内容分三部分来叙述。这种按内容的区分，大体上也与时间的顺序相吻合。

1. 革命道德与众生我

在章炳麟出狱担任《民报》主编的半年里，他以革命家的道德为主题，在《民报》上连续发表了《演说录》、《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民报纪念会演说》等文章。估计这个问题是刚投身东京革命运动的章炳麟所最关心的问题。这些文章是他自变法运动以来政治活动的体验和三年狱中思索的总结。他把这些东西作为问题提交给了革命运动。

最初，章炳麟关心的并不是客观方面的革命的主义、思想（包括政治、法律、战术）的内容。他关心主观方面的内容，关心喻为载物之船的人与心术。他认为革命家的心术应该具有能够克服一切障碍、坚持革命的精神。用他的话说，就是所谓“百折不回，孤行己意”，^①甚至象患有“神经病”一样。同时，他又强调：这种神经病不是由于富贵利禄，也不是由于艰难困苦引起来的。他强调这种所谓的“神经病”，是为了规定自己作为一个

^① 章炳麟：《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革命家的任务，在机能上应该是革命的提倡者，而不是革命的实行者。他还提倡革命家要使自己成为这种“神经病”的模范，要用这种神经病来传染4万万中国人民。他对提倡的内容如何并无什么要求，只以人类革命应该如何作为臧否的标准，这也反映了他的革命观。在这一时期，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唐才常自立军等一切改革活动的再三失败之后，他开始寻找改革失败的根源，认为这是由于运动的干部本身人类道德腐败导致失败的。应该注意到，他这时已潜在地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即要造就出一批新的革命家，这些革命家的道德完全不同于以前改革运动干部的道德。章炳麟希望用这些革命家断绝这一革命运动与腐败传统的关系。为培养民族主义感情和使全民族团结，他贡献了两个方法：“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①其中“用国粹激动种姓”的办法是指通过宣扬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使人民了解中国的长处，珍爱汉民族的历史，以此反对那种一味宣传西方先进、中国落后、中国必然要灭亡的自暴自弃的欧化主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排满依旧是摆在面前的课题。况且西方的侵略使中国灭亡的危机成了人们注目的敏感点。他之所以“用宗教发起信心”，是为了否定基督教和孔教，尤其是孔子有与贵族竞争之心，不想与平民联合打倒贵族政体，反而想方设法要为政为相，要成为帝师王佐。一句话，孔子还未能摆脱人对富贵利禄的追求。发起信心使用的宗教，章炳麟认为只有使用佛教的“华严之行，法相之理”，发展前述之“大独”，使革命家具有牺牲自己与自身、普度众生的菩萨道德。从这里出发，宗教成了章炳麟革命道德的理论基础。详细内容，容待后述。

章炳麟认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②因此，他规定革命道德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③还要具

^① 章炳麟：《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②③} 章炳麟：《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备顾炎武提出的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德。对于革命的牺牲，章炳麟认为“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①他痛感富贵利禄思想纠缠着一切革命运动和所有的人，这种思想象霉菌最后能够残害人的全身一样，使革命有被断送之虞。因此，他强调每一位革命者在内心都要自觉地“断烦恼”。章炳麟认为自汉、唐、宋、明以来，与旧党对立的新党无不“渴慕利禄”、“借交养名”、“醉心权利”、“竞名死利”。^②这些新党的议论虽然新颖，但行迹齷齪与旧党无异。新进士与旧进士之争，也不过是在同样基础上权与利之争罢了。他对自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开始至康有为而隆盛的新党，批评得最为尖刻，完全否定了变法派。对于中国当时新产生的知识分子阶层——学生，章炳麟认为他们不过是变形的新党，挖苦说：“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③按章炳麟的划分，学生的品格在新党之下，甚至无节操可言。在章炳麟的心目中，学生或年轻人是不能有所期待的。

按照章炳麟的说法，什么人能够担当起革命的重任呢？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章炳麟按职业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进行了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试着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他把社会上的人按职业分为16种，农人、工人为首，差除官、雇译人最末。他认为一个人随着知识的增多，他的道德也就越益低下，因为“齐民”离权力远，没有得到富贵利禄的可能性。由此他得出了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等6个无地位的“齐民”是革命党的组成者的结论。他还认为，如果“齐民”的地位上升成为“良民”，那么他的道德便丧失了。章炳麟认为排在艺士之后第七位的是通人，也就是读书人，这些人往往是革命的提倡者。当他们具备要改变自身地位的欲望与道德之后，就必然担负

① 同上页注②。

② 章炳麟：《箴新党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③ 章炳麟：《箴新党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起提倡革命的职责。至于那些与体制相对抗的会党、盐梟，他们一旦发迹，便“残贼同类”，归顺朝廷。因此有“以会党制会党，盐梟制盐梟者，逆胡之长策”的说法，^①可见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核心。

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因为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即追求富贵利禄思想已经与自己断绝了关系，所以，他们不追求任何个人的利益，“悍然独往，祈求全生民之生命”。他们只顾救济人民，象菩萨那样存在于世。由革命家组成的革命党，自然不是“新党”一流，绝不追求个人乃至党派的利益。这些革命家是不受君臣关系束缚的隐士、逸民的后继者。从战国时代到唐代，“隐伦遁世之材”们用老庄、玄言、佛教对抗“贪冒之风”、“浮夸之俗”。^②多亏他们，才使中国“乔民”的道德免于沦丧。但是到宋代，理学兴盛，强调君臣主义，隐士与逸民的生存基础被剥夺，最后导致消灭。时至近世，功利之说流行，人们热衷利禄，许多人把宪政当成了发迹的手段，连革命党内部也有许多人身受其害。因此，兴民德惟有靠佛法。否则的话，大讲革命并身体力行的革命家，将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人民误认为这些革命家是个些拒绝现行体制的“方外之士”。他这些话说得真是意味深长。

章炳麟认为“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且说日新，智慧增长，而主张竞争者，流入害为正法论，主张功利者，流入顺利外道论。恶慧既深，道德日败”，^③所以当该用宗教增进道德。可是“崇拜天神，既近卑鄙；归依净土，亦非丈夫幹志之事”，^④“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汙俗”。^⑤这样，他顺着—

① 章炳麟：《革命道德说》。

② 章炳麟：《答梦庵》，《民报》第二十一号。

③ 章炳麟：《人无我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④ 同上。

⑤ 同上。

条宗教思路，连续在《民报》上发表了《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等文章。这些文章与有关革命家道德的文章同时写出，可以说是那些关于革命道德文章的理论基础。

他在《建立宗教论》中，根据佛学唯识（法相）宗的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圆成实自性，试着建立一种宗教，批判其他宗教的教理，以增进道德。根据唯识的教义，章炳麟进一步阐述说：世界的根本是阿赖耶识（即第八识）。阿赖耶识包藏万有，“一切见相，皆属此识枝条”。^①阿赖耶识转生了前七识，即区分了第七识末那识，和眼、耳、鼻、舌、身等五识的虚妄，把世界展开。人们所看见的身体所感受到的外部实际存在的世界，都是以识来互相区分的。他所说的“唯识无境”，就是说识之外是没有实际境界存在的。由这个因缘而显现的诸法，被章炳麟称为是依他起自性。他还进一步把由第六识（意识）的作用而产生的对诸法误认的实我、实法，称之为遍计所执自性。但是，他并不把第七识末那识看作是遍计所执自性的识体，认为在具有生灭差别的依他起自性中存在着远离遍计所执自性的圆成实自性。圆成实自性就是依他起自性所依的“常住不生灭”、“无相平等”同类的实性本体，也是由阿赖耶识“还灭”而成的。

在《演说录》中，章炳麟将法相之理概括为“万法惟心，一切有形色相，无形的法坐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他把因为识的变化而产生的幻规定为前提，然后规定以幻为实在的是遍计所执自性，把幻附依于真而了解幻的规定为依他起自性，幻所依的真为圆成实自性。

章炳麟立真有的圆成实在性，破妄有的遍计所执自性，进而解释了西方的哲学与宗教。但是对“介乎有与非有之间”的依他起自性，他都认为“识之殊非易易”。^②因此，对于一神教、泛神论和宇宙崇拜等等，他认为统统不过是人心制造出来的概念，

① 章炳麟：《人无我论》。

② 章炳麟：《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是识而生成的幻相外界，并把这种幻相外界崇拜为依他起和不知道的实在。到头来，不过是把遍计所执为圆成实罢了。进行了这一通批判后，章炳麟决定建立以自识为宗的宗教。

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章炳麟提出“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圆成实就是“太极无象”。以进入圆成实为目的，而直接进入又不可能，只有“随顺”进入假有的依他，依靠它再进入圆成实的境界。就是所谓“今所归敬者，在圆成实自性，非依他起自性。若其随顺而得入也，则惟以依他为方便”。^①章炳麟还说：“一切生物，遍在迷中，非因迷而求真，则真无可求之路。”^②通向“真”的媒介“迷”，方便地说就是“依他”。章炳麟还进一步把阿赖耶识的“我”看作是末那识的“我执”，而且还把这种“我执”与属于“分别我执”的意识的“我识”进行了区分。

在《人无我论》中，章炳麟举自杀者为例，说：“夫自杀者，或以感受痛苦，迫不欲生，而其所以趋死者，亦谓欲解我之痛苦耳”，所以使形体（身体）丧生。因此，“自杀者之居心，必不以形体为我，而别有所谓我者”。^③在这里，他所谓的“我”就是具有阿赖耶识的“我”。这个“我”，章炳麟认为是“不待邪执而后得之”，而是“常人所共喻者”。而且他还说“人莫不有我见”，也就是说阿赖耶识这个词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是阿赖耶识的“我”却是分别存在于每一个人。人生在世上，身体的存在，并不真正是“我”的存在。“若执此形体为‘我’”，那就是受到“依他起”的“我”的干扰。有关“自己”是自己根源的自意识，如后所述，是因为受到他人压迫时，希望通过抵抗而自存的表现。这时，“依他起”的“我”虽是假有的、迷妄的，但它是进入圆成实境界的通路。当进入圆成实境界之后，一切迷妄都被消灭，这个“依他起”的“我”也就灭亡了。因此，

^{①②} 章炳麟：《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③ 章炳麟：《人无我论》。

章炳麟所说的“我”一方面去消灭迷妄，另一方面也消灭了自己，具有否定的主体性。进一步推论，章炳麟认为“逮其证得圆成，则依他亦自除遣”。^①当“必依他起之我相，断灭无余，而圆成实自性赫然显现”。^②

章炳麟的以自识为宗，随顺“依他起”的“我”的宗教，是不崇拜、服从任何人，主张自主平等，“依自不依他”的宗教。基督教信奉上帝，认为他创造并统辖着人类。章炳麟把自己的宗教置于基督教的对立面，在《无神论》一文中，他批判基督教说：“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尝试着树立众生平等的观念，尝试着驳倒有神论。^③《演说录》中的一段话极端地表现了他对佛教、基督教的看法：“不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在这里，他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进一步引伸出心与众生无差别。他在《建立宗教论》中阐发说：“一切众生，同此真如，同此阿赖耶识，是故此识非局自体，普遍众生，惟一不二。若执着自体为言，则惟识之教，既与神我不异，以众生同此阿赖耶识，故立大誓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不限劫数，尽于未来。”

在《人无我论》中，章炳麟说到世俗所说的灵魂。他认为“灵魂乃个人所独有”，而阿赖耶识“非局限一人”。因此，灵魂与阿赖耶识不是一回事。^④这个“执”是普遍存在于“众生”的阿赖耶识的“我执”，是“依他起”的“我执”，不是自他对立的“我”，而是“无所谓他，我惟是我”，是“充足律中之

① 章炳麟：《建立宗教论》。

② 章炳麟：《人无我论》。

③ 另外，章炳麟于1907年3月在《民报》第三号上发表《社会通论商兑》一文，叙述了排教运动中政府、士大夫和人民的动机，他说：“人民之排教也，以其籍权而侮民。”这种“洋教”压迫人民的认识，也可视为他批判基督教的一个动机。

④ 章炳麟在《人无我论》中还说：“阿赖耶识亦名为研来藏。特以清静杂染之分，异其名相。”这显示出向如来藏思想倾斜的倾向。

我”。^①这个以度脱众生为目标的“我”，在佛教中就是菩萨的愿望。由此，章炳麟引出“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的“勇猛无畏”的菩萨行。^②这是积极的道德，是华严之行。诚如后述，章炳麟认为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是“众生之苦”，“度脱众生”的“菩萨行”就应该为把斗争彻底消灭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社会活动，他认为就是排满革命。

这种“度脱众生”的“菩萨行”，是通过每一个人“依自不依他”的“觉”实现的。问题在于抵抗压迫的个体的自意识，还是返回到主体上来了。这就是章炳麟思想的最大思想史意义。原来七零八散的个体，对加在自身上的压迫，只是因为愤怒而自己进行抵抗。当自意识内部众生表现出来时，就成了“菩萨行”。在这里，便被章炳麟看作是革命了。因此，革命是使被压迫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产生抵抗意志，革命家在其中只不过是作为榜样或先知先觉而存在着的。对于革命家来说，人民并不是应该给予救济的受动的对象，而应该是唤起自主觉悟的对象。但是，革命家还残留有辅助性质的人民的代办者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容待后述。1910年，章炳麟发表了《齐物论释》，他的“齐物”思想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完全对立。出现了“不齐而齐”、“齐共不齐”这样公式化的对立。这篇文章的出现，使思想史上出现一个转折。以前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圣人、君主是抵抗压迫的主体，人民只是被当作有生命的动物。这时，人民被看作抵抗压迫的主体。章炳麟的“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宗教，是以前他的“群必以独而成”的“大独”概念的理论发展，是他的革命者必须是“神经病”的理论基础。他把革命家看作反对体制的孤立的隐士、逸民的后继者的理由，由此便可以得到理解。

“大独必群”是“依自不依他”的“觉”的“度脱众生”的行为，是为了消除社会对立而进行的行动过程。这就是“随顺”

① 章炳麟：《建立宗教论》。

② 章炳麟：《演说录》。

依他起的“我”，达到圆成实境界的过程。在现实中消除压迫的过程，就是个体自主的实现过程。当然，如果压迫不存在了，那么抵抗的自意识也就不存在了。

以“度脱众生”为愿的“菩萨行”，为什么要进行旨在消除社会对立的社会活动？而且把排满革命当作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这对于章炳麟来说，是个毋庸证明的大前提，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说起来，评判宗教的孰高孰劣，“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①被选择的标准本身就在宗教之外。排满革命本身已被定为事物的主体，根据问题中某主体的某种要求而选择宗教，那么先于宗教信仰的考虑，当然是摆在面前的应用问题——排满革命。也就是所谓以排满革命为的，以宗教为矢。作为矢，不仅限于法相、华严，连庄子的《齐物论》也在被选择之列。章炳麟的宗教论，与其说是要促使读者产生和增加进行革命的觉悟，毋宁说其宗教论本身就是一个革命行动。在章炳麟这里，甚至于连菩萨也成了革命家。

章炳麟的理论，基本上都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但是通过佛教进行排满革命，把菩萨打扮成革命家的情况，也是他的理论中一个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侧面。排满革命在章炳麟心目中，不以任何现实利益为目的，不属于目的合理的范围，革命行为的本身是为了民族自主性的光复，民族的自主又从属于个体的自主。而民族作为实体，它从属于个体则是偶然的。现在所谓压迫，一般是指民族之间的压迫现象。对于个体的抵抗，我们姑且视之为民族的抵抗现象。因此，也可以说是个体自主的目的。个体自主是消灭自己的对立面，也可以说是自我消灭的目的。章炳麟并不是从阶级、民族这一总体角度看人类的本质的，他只看到了个体的自意识及在自意识中所表现的无边际的众生。他所看到的是具有否定的性质。所以产生了把排满革命作为普度众生的一个阶段的观点。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行动上彻头彻尾的革命家进行着排满革

^① 章炳麟：《建立宗教论》。

命，可主导行动的理念却是菩萨的普度众生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实际上，除了挺身于排满革命之外，其他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原因就在于在革命运动内部，又纯化革命运动、提高革命性，从主体方面产生批判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已经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是民族压迫的元凶。从这一种观点来看，排满革命也可以被视为一个阶段。这种行为与理念的双重结构，可以看作是章炳麟在戊戌变法时期行动上参与变法运动，思想动机上却对“生民”生“哀”这样一个双重结构的发展。

章炳麟真如概念的无限定性和“所依”关系而来的真如与迷妄世界的相即性，是对个别存在的直接肯定。无限定性和相即性是无限地走向自我消灭的事物，而个别存在则是没有超越自己、比自己更高的对立者。以无边无际的众生为内容而七零八散独自存在的觉悟，就是所谓“自他一体”，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参加的中国革命。章炳麟用这种基本思想结构来比较高高在上的人格神的关系，比较抛弃人本身的自然性而与神同一化的个人内部的无限的关系，比较造成自他对立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各种关系，比较主张财产自由和人格自由的基督教及西方近代思想原理，并根据中国这一具体情况，对这些关系与原理进行了批判，进而引伸出新的觉悟。尽管近代西方规划了具有强烈压迫与统治中国色彩的“东方原理”，恰巧也从被压迫被统治的中国方面显露出抵抗的原理。章炳麟的哲学思想就显示了这样一个与中国革命相攸关的重要问题。

2. 无生主义和民族主义

章炳麟在《复仇是非论》中说：“如余所念，虽无政府主义犹非最为高尚也。高尚者，在并人类众生而尽绝之，则思想之轮廓在是矣。然举其切近可行者，犹不得不退就民族主义。”^①在这里他贬抑无政府主义而褒扬民族主义。为此，他还提出了无生

^① 章炳麟：《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主义。同样，在《复仇是非论》中，他还说：革命是“恢复人权者”，是“为苍生谋其利益”，而复仇只不过是革命的“方便径涂”。^①他把革命看作是为某种积极目的而采用的手段，把对革命后的世界有具体期待的人权革命论者看作是“污垢”来加以反对。他提倡“以正义反抗之名”，^②变不平等为平等的“复仇”。他认为：“吾党与彼党俱仆，此至洁白者也”，提倡用“颠覆清朝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③这样一种纯粹的心进行革命。

他进一步在《五无论》一文中承认：革命后将“不得不有政府”。但是他反对国家主义，提倡共和政体，因为“共和政体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取之矣”。^④在共和政体的条件下，他说将会出现“爵位废而兼并行，其乱政又无以异于美利坚氏”^⑤的情况。为预防这种情况，章炳麟提出了四条办法，进行“节制”，以减少“祸害”。这四条办法是：“均配土地”、“官立工场”、“限制相续”、“公散议员”。^⑥采取共和政体和实行四条“节制”的办法，在章炳麟看来只不过是初步的暂时的权宜之计，最后还必须“递见”到“五无之制”。

在众多纷纭的革命思潮中，章炳麟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确自己头脑中的民族主义原则，从心术、人的问题出发，发展到讨论主义与思想问题。他把民族主义作为摆在面前的问题，与普度众生这种高远理想放在一起加以讨论，把普度众生的“菩萨行”置于社会活动的世界中游说，这样一来便产生了无生主义。把民族主义规定为无生主义的一个阶段后，章炳麟提倡无生主义的意味便被明确和深化了。

在佛经中有“依惑造业，依业受苦报”的说法。在章炳麟看来，“惑”是“我执”和“法执”。他还把现实世界看作是苦的

① 同上页注①

② 章炳麟：《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③ 同上页注①。

④⑤⑥ 章炳麟：《五无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世界，“苦”的内容是种族间的残酷而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最根本原因是“我见”与“好胜心”。所谓好胜心是“由于执我而起，名我慢心，则纯是恶性矣”。^①结果，末那识、意识的“我执”成了“苦”的根源。

因为种族间的斗争是由政府之类的机关出面组织进行的，所以要先考虑取消政府。不错，政府是在一国与他国政府的对峙与斗争之中存在着的，因此若想一国单方面不要政府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各国同时不要政府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本国不要政府的愿望。又由于“聚落”、人类的存在，而使彼此之间争斗不休，只有达到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地步，一切争斗才告消失。

章炳麟还在《俱进分化论》中讲过从阿米巴进化到生物，从哺乳动物进化到人类，从人类原始野蛮社会进化到社会、国家的形成，最后达到地球统一裁撤军备的大同世界的历史进化过程，承认进化法则在客观地统治着世界。但是，他却认为这一进化过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只不过增大了不幸。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在《俱进分化论》中答道：“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面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道德的“恶”就是“我见”、“好胜心”，就是斗争的根源。因为生物、人类、聚落、政府按进化的比例而增大，那么斗争也就会随之按进化的比例变得更有组织和更残酷、暴虐。政府间的斗争就是这些斗争的顶点。如果达到大同时，也将会更加残酷。关于生计上的苦，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之乐将会按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但社会上也同样存在追求乐的苦和失去乐的苦。

章炳麟说：人类“最初所处之点，惟是兽性。循其所处之点，日进不已，亦惟是扩张兽性。始之兽性，麋鼠、陵鱼若耳；积久而扩张其兽性，乃若豸豸、白虎。兽性则同，而反愈加之

^① 章炳麟：《俱进分化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厉。是则进化之恶，又甚于未进化也”。^①因此，为消灭斗争普度众生，就要改变这一进化过程，只能人为地走向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社会。这就是章炳麟主张的“五无论”。达尔文、斯宾诺莎主张通过进化达到“尽美醇善之区”，而章炳麟主张的“五无论”，恰与达尔文、斯宾诺莎相反。在章炳麟的五无之中，无人类是最重要的。对于“本因”，章炳麟解释为“观无我”和“断交接”。“观无我”尚未见到他作过具体的说明。对“断交接”，章炳麟认为，人是万物的“元恶”，喜好淫、杀之心受无明的熏习，是人之天性，只有用真如来熏习，使心对淫产生厌恶，才能无人类。^②这并不是要从外消灭人类，而是要启发人类的厌世心，自发地“断交接”。通过文字进行生物学上的消灭，那才是异想天开的办法。的确，在实现性方面存在着疑问。在《五无论》中，章炳麟只是一般地叙述世界的苦，对于应该普度众生的主张、五无的具体实现方法，他并没有详细论述。

按章炳麟的思路，可以设想众生的苦是摆在当前政府（民族）间的斗争，它的根源就是“我见”。如果消除了一切民族的“我见”，斗争也就和平地消灭了。如果满洲政府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的不对，破除“我见”，向汉民族返还国土与政权，回归故土满洲，那么满汉斗争将会消灭，理应出现共存的可能。可是，章炳麟又说：“人性之贪狼无厌，背违正义更万亿年而不可变也。是故满洲政府必无让地自归之事，为汉族者亦固知其不可望于满人”，^③应该树立排满民族主义，把压迫反推向满洲政

① 章炳麟：《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② 谭嗣同主张人的天性是善的，恶淫、杀的名教，不过是人为的“习”和“名”。章炳麟的看法恰恰是对谭嗣同的反驳。谭嗣同也把佛教搬来作为他的社会活动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佛教的“佛即众生，无明地真如”，与王船山的“天理即在人欲中，无人欲则天理无从发见”相适合，谭嗣同并据此分别攻击了“恶人欲”与“三纲五伦”。章炳麟的“逮其证得圆成，则依他亦自遣”同样是佛教的信条。在这里可以说把问题移到意识的次元方面去了。

③ 章炳麟：《排精平议》，《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府，最终实现无斗争的满汉平等。章炳麟还提出日本、亚洲的国粹是“侵略人，则以人为舆台豢豕”。^①欧洲和日本人的发愤者对被压迫民族的国粹，当然想除去。而被他人“陵轹”的中国人、印度人为图谋抵抗压迫和自存，必须通过国粹得到民族觉悟，是理所当然的。两者对国粹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有着天壤的差别。不用说，章炳麟主张肯定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章炳麟认为它虽是民族主义，依然是我执，但它不是斗争的根源，他认为：“有形之物，皆自卫而御他，……皆排摈异类，互相贼杀”。^②这就是意识、物质的不可入性。他还说：“今，动物之情异，其自尊贵则喜，不欲受外来势力蹂躏这一点，则是动物之情。”^③由此可见，“我执”不仅人类具有，连动物、无生物也具有。虽说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为了自卫，但它仍是“我执”。章炳麟之所以要肯定这一被压迫民族的“我执”，无他，就因为要利用这种“我执”，把压迫反弹回去，使斗争步入消亡之路。为使斗争步入消亡而进行的斗争，当然是要肯定的。这个被压迫者的“我执”，就是通往圆成实之路的依他起自性的“我”。如果斗争消亡，那么这个“我执”当然也就不应该存在了。排满民族主义与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不同，如果打倒满洲政府，实现满汉平等，排满民族主义则应该消亡。但是，除了满洲政府之外，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我”站立起来进行了抵抗，这样只有当一切压迫都已经消亡，斗争都被消灭之后，这个依他起的“我”也就消亡了。描绘出这一无限消亡过程的文章，就是章炳麟所写的《五无论》。

关于民族主义，章炳麟还说：“人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担当者就是怒于他

① 章炳麟：《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② 章炳麟：《五无论》。

③ 章炳麟：《俱进分化论》。

④ 章炳麟：《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民族的压迫，希望通过抵抗而自存的汉民族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抵抗，在客观上是走向消灭一切斗争的第一步，连菩萨革命家也是这一民族主义中的一员。把有意识的民族主义看作是无生主义的一个阶段，用革命消灭一切斗争的远大理想和志向，——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章炳麟最自觉的战斗的内核。

写到这里，笔者还想再稍微论述一下章炳麟的思想与进化论的关系。

章炳麟曾说：“所谓进者，本由根识迷妄所成，而非实有此进。”^①虽然章炳麟把进化说成是虚幻的，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因此，章炳麟认为它给人类带来苦，所以人们应当抵御进化，寻求普度。在这里，章炳麟把存在的逻辑附加于主体的逻辑之上了。他虽然承认进化是自然规则，但是他认为这一自然规则实际上是“黯者之必能诈愚，勇者之必能陵弱”的自然规则。

“循乎自然规则，则人道将穷。”^②所以，要用人为的规则来对付这种自然规则。他说人死是自然规则，比喻人抵抗进化和求医药抵抗死是一样的。他主张从主体方面，即人为或人道方面完全否定进化，谋求另外的事物出现。他在《俱进分化论》中说：

“勇猛大心之士”早已抛弃了这个进化的世界，去追求“视听言思之外”的世界，“以济众生而度之”。而“无勇猛大心者”，只是“随顺进化，渐令厌弃”。当这个世界进化到极点时，他们不待自己产生厌世之心，便在进化的各潮流中选择了最接近平等的“社会主义”来救济。从这些主张看，章炳麟所主张的是由进化世界之外的菩萨来到世界，施行救出众生的积极的厌世主义。

章炳麟目睹世界上弱肉强食的斗争，在他的思想中，种族间的斗争与国家间的斗争不一样。但是对于因为西方的侵略使中国已经面临灭亡危机的基本认识，却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有共同之处。另外，从介绍进化论进入中国的严复提出的“天然淘汰，优胜劣败”的法则来看，章炳麟的思想可以说是清末思想界中的一

^{①②} 章炳麟：《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个典型。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主张野蛮——小康——大同这样三个发展阶段。这一大同思想明显地具有理论努力，磨去了“天然淘汰，优胜劣败”法则的稜角，并将其纳入了以圣人为顶点的中国思想的体系。大同思想描绘了从个性（私）到共性（公）的扩散过程。这一过程是圣人逐步剥夺“民”的自主性、走向消灭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使“民”的充足欲望更加完全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还是“免苦求乐”的向上发展的过程。因此，从中国与西方斗争的角度看，面向进步是这些过程的最基本的共同点。其中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成了可能。另外，康有为的体系中还包括了地方上来的以谭嗣同为代表的开明乡绅阶层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以及中央拥戴圣人与君主的要求。

然而，章炳麟已经失去了象康有为那样的乐观。他认为进化带来了喜与乐，同时也增多了众生的苦与恶。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个斗争的世界，是个苦的世界。中国因为进化的法则而被置于被压迫被灭亡的地位。因此，抵抗灭亡和谋求自存，就是抵抗进化的法则。对于这种情况，章炳麟没有把圣人、君主的特定势力和谭嗣同的乡绅阶层作为背景，因为他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中国的自发资本主义带给人民的只是压迫和苦的增大。在这点上可以说，章炳麟的思想是建筑在康有为近代化路线失败基础上的。对章炳麟来说，他尚未能在实际中发现解决现状的力量，但是在概念上，他已先树立了抵抗的主体。

在思想史上，从康有为到章炳麟的推移过程，是西方加重对中国压迫和中国内部改革失败、使现实中国更加窘迫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意识中对西方压迫不妥协的对立的“抵抗之核”的产生过程。

章炳麟的理论是无生主义，这一理论完全否定了进化的世界。以之为座标轴，就可以清楚地测定出经济进步所带来的“苦乐并进”和苦的增大，测定出贫富不平等的扩大，测定出西方不

是应该向之学习的先进国家，而是“帝国主义群盗”，①是残酷的压迫者，是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章炳麟的初步的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也就在这里。

在戊戌变法时期，章炳麟已经把西方帝国主义当作中国之敌来看待了。早在《客帝匡谬》一文中，他便把中国革命的两个课题——排满与反对帝国主义统一地把握起来了。以后，无生主义理论又进一步地把排满、反对帝国主义作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环节，说明他的理论可能已具有世界历史潮流的观点。

章炳麟的民族主义是要打倒清朝、恢复国家与主权、建立“中华民国”。他设想“中华民国”的版图基本上与前汉时期相等。但这还不过是最终的结束。对于“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柄，奴虞其人民者”，②例如越南、印度、缅甸、马来等弱小民族，也都在被解放之列。他以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法国殖民统治越南为例，说：“文明愈进者，其蹂躏人道亦愈甚。”③把白人规定为“帝国主义群盗”，④把满洲与中国的关系，与法国和越南、英国和印度、日本和朝鲜的关系等同看待，把汉民族列入被压迫民族一方。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要把威海卫、青岛等租借地和上海等城市中的租界统统收回来，不允许任何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要取得完全的独立。他还意识到中国这样的革命活动自然会招来白人的愤怒，因此要把握住白人是中国人革命敌人的性质。至1908年10月，章炳麟在《民报》上发表《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一文时，已经很出色地把握住了清政府是为外国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服务的警犬的性格。在《答祐民》一文中对《民报》提出的六条主义中的两条进行了解释。关于“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① 章炳麟：《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② 章炳麟：《五无论》。

③ 章炳麟：《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④ 章炳麟：《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他认为是暧昧的，列国政府一定不赞成，这种要求只是求诸于列国中的个人会更好一些。关于“维持世界之真正平和”，他说：不维持世界之伪平和，已是明确的认识，要之是使亚细亚不被欧美人占领，让亚细亚各族恢复故国。在这里，他把西方帝国主义看作是全亚洲、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敌人，把中国的民族革命看作是全亚洲、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按当时革命派整体的理论水平来衡量，章炳麟的思想理论水平远比其他高得多。他能有这样的认识，就在于他的那种无生主义理论，而排满革命是消灭一切压迫和斗争运动的一个阶段，是通向平等的一个阶段。具体地说，关于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斗争的问题，他设想的是以中国、印度的“神圣同盟”为轴，实现两国历史的宗旨——“慈悲平等”，达到红、黑各种族的解放。

在章炳麟的眼里，日本与西方各国为文明国，印度、埃及、土耳其为亡国，介于文明国与亡国之间的是专制的中国。专制的中国经过改革，将上升为文明国。他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对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根本批判，反对那种中国将一事无成地沦落为亡国的悲观看法。

在革命派内部，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真解决》一文中，把义和团事件看成是“排外运动”的顶点，是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满洲人煽动教唆的产物。孙中山呼吁美国人，说大多数中国人是外国人的朋友，中国革命将会增大中外贸易、修建铁路、开发天然资源，这对于欧美不仅不是“黄祸”，而是“黄福”。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显然与章炳麟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1907年3月，孙中山因日本政府的驱逐令，被迫离开了日本。在离日之际，他接受了日本政府数千日元，另从铃木久五郎手中接受了一万日元的馈赠。^①这件事使孙中山受到同盟会员章炳麟、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恒、平山周等人的责难。章炳麟甚至

^① 当时日元与中国铜元的比价基本为1：1。——译者。

提议免去孙的同盟会总理的职务。^①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发表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均已实现，以后只待民生主义实现的想法。^②为此，他准备从日本借款给汉冶萍公司。这件事也因章炳麟等人的激烈反对而搁浅。作为一位现实的政治家，为了谋求革命利益，孙中山连帝国主义的援助也不回避。章炳麟则追求通过革命激发民族内在的觉悟，进而打倒帝国主义。从前述发生的事情来看，孙、章二人因思想观点的不一致，导致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矛盾。归纳起来，他们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战术方面，即革命的政治方面与革命的思想方面（人的觉悟）的对立，也就是革命家与思想家二者不同作用的对立。其次表现在阶级基础方面。孙中山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追求人民的一般的解放。章炳麟不代表特定的阶层，在观念上站在菩萨的立场上反对所谓思想家的存在模式。在实际斗争中章炳麟虽然参与实践孙中山的革命路线，但他又超越了革命的时间与空间的制约，把他的观点置于无限的未来。他不顾是否可能实现，进而毫不顾忌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本质的问题提了出来。因此说章炳麟的批判是从脱离现实的角度出发的空论，但又是现实最尖锐的批判。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特点，章炳麟的言论便避免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与软弱性。章能对帝国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但他这种不具备现实基础的批判，在本质上又是苍白无力的。

可是，我们所看到的章炳麟又不是一个绝对不讲求战术的章炳麟。他在《答祐民》一文中认为，自己所提出的“支那印度相互扶持之论”当时并不可能实行，徒伤白人的感情。他说：“事实虽未可行，主义固可有此。”^③他承认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在《革命军约法问答》一文中，“公是先生”提出意见，认为云南革命军的军法规定杀外国人和焚烧教堂者要

① 邹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册，第201页。

② 参阅孙中山的《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孙中山选集》上卷。

③ 章炳麟：《答祐民》，《民报》第二十二号。

处以死刑是不平等的，应该按汉族处理民间公产的办法处理。章炳麟赞成“公是先生”的观点，但他完全从利害得失的角度和战略战术的立场出发，说“若就社会政治计，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但是种族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满洲而不是白人，暂时不与白人为敌，需要显示宽容。由此看出，章炳麟自己意识到，排满革命是当时唯一有可能实现的路线，而反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空论而已。不过他认为空论也是绝对必要的，尤其反映在中后期的《民报》上，他在该刊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内容的时评，使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在革命派中大放异彩。他这样做的结果使孙中山的路线遭到了批判，使革命受到了动摇基础的批判。

3、齐物论与代议制

在《五无论》中，章炳麟把无政府作为第一阶段，设想了一个走向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收敛性的过程。在《国家论》一文中，他对国家本身的性质、作用与事业分别给予了否定，斥之为虚妄的东西。对受别国压迫的“支那、印度、交趾、朝鲜”等国的爱国、救国与建国，推翻压迫，恢复自身的行为，不得不给予肯定。在《国家论》中，他为了论证国家是虚妄的，明确地树立了“个体为真，团体为幻”^①的原则，进一步推导出“暂得说为实有”的人民、国家、村落、集会等团体组织是假有而不是实有的。很清楚，这一个体主义与“依自不依他”的“我”及“依他起”的“我”的概念是相同的。相对国家是实有的人，在微观上又把他定为假有，这是驳不倒人的。因此，作为人这一个体，最终是不能否定的。把这一个体主义作为原理，章炳麟撰写了《四惑论》，进行深刻阐述。在该文中，他明确了个体自主、自由的概念，作为问题的不是他民族对汉民族的压迫，而是国家、社会对个体的压迫。他把国家、社会的压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目的在于从理论上揭露改良派所说的“近

^① 章炳麟：《国家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代国家”在本质上是压迫齐民（平民）的国家的实质。通过革命建立政府就是要防止出现那样的“近代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四惑论》与他写的批判代议制的最激烈的文章《代议然否论》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

改良派认为，中国成为近代国家是在优胜劣败世界中的唯一生存之路。他们的头脑中的中国近代化，一方面主张从一君万民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奴隶要成为国民，参与平等观念上的共同体——国家制度，也就是所谓“群之统合”；另一方面分解一君万民体制，创造出利己的独立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个之分解”。这两方面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解放的逻辑颇为相似。有关这两方面的关系，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对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的相反相成关系进行了论说。但是他在该文中只是大概地论说了独立、自由、自信、利己、破坏的必要性，将它们安放在另一方的合群、制裁、虚心、爱他、成立的框架中，并过分地压抑之，使人感受到强烈的调合的倾向。缺乏那种以利己的独立的人为原理，破坏一君万民体制，并彻底分解它的资产阶级的战斗性。

章炳麟的批判同样具有两个方面。他以自主、自由对付“群之统合”，以平等对付“个之分解”。在《四惑论》中，他把公理、进化、唯物、自然这四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当作“四惑”来反对。特别是在批判公理时，明确了自主的原理。改良派从人应该对国家、社会尽责的公理出发，批评那些不互相扶助，不对社会尽责，甚至隐遁、自杀的人和事是违背公理。在这里，章炳麟给予了批判。首先，他认为改良派的公理主张把世界作为根本是由迷妄所致，“陵藉”了个人的自主，应该用人的原型观念（阿赖耶识）作为根本的唯识学说破迷妄，保卫自主。其次，对于“人为社会生，非为己生，一切智力膂力，当悉索所有，以贡献于大群”^①的公理强制的论点，章炳麟批判说是人被束缚而

^① 章炳麟：《四惑论》。

服从他人，是西方神教的变型。因为西方神教把人看作是神创造的，人的生与死均不能自主，必须为神尽义务。章炳麟通过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批判，试着对公理的原理进行批判。

在这里所谓的无神论，是指独觉、声闻、数论、老庄……，等等，其中尤以庄子的“齐物论”是其精髓。据此，章炳麟认为人是“生气所流，机械所制”而独生的。造物主不存在，能向人下命令的超越者也不存在，人是自主的。从这种无神论出发，他推导出人不是为世界、社会、国家和他人而生存的，人对它们都没有责任的结论。这种逻辑就形成了对公理的批判。其实，章炳麟的无神论思想早在《菴书·天论第十》中已有所阐述。他引用王充的话“天地合气，人偶自生”和“天地不故生人”来批判造物主思想，主张“万物自生”的无神论。

章炳麟把“齐物论”简洁地要约为“齐物者，非有正处、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万物各从所好”。^①把“无物不然，物无不可”说成是“人心不同，难为齐概”。^②他用“齐物论”的个体主义来攻击主张人对世界、社会、国家、他人负有责任的公理的限制与束缚。

庄子认为给万物一定的基准就会理论是非，产生物论的根源。主张个体追求自己独立思考。认为一切个体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立于既不侵犯他人，也不让他人侵犯的自然立场，即天的立场，同自己主张中的虚妄进行论辨，消灭是非，以齐物论。也就是承认任何立场，而否定任何特定的立场。拒绝一定价值基准的法制，拒绝社会秩序的强制。因此，“齐物论”的世界是一个“人伦相处，以无害为限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彼此并存，是个互不相侵的有散沙自由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本质上个体没有自己的主张。因此，章炳麟所谓齐物的自主，是指当外部强加一定的强制与压迫时，为了抵抗并消灭这种强制与压迫，复归到本来的自由世界，那只能通过

^{①②} 章炳麟：《四惑论》。

媒介显示出来的个体的自主性。这种个体的自主性是否定的抵抗的事物，决不是积极的事物。为抵抗压迫，通向圆成实；与通过媒介依他起的“我”具有同一性格。以个体自主为基础，依他起的“我”与齐物的自主是同一的，后者是为了抑制有害于自主的事物，从法律的角度考虑的。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不相同的。

章炳麟把要求人对社会应该负有贡献的责任这种公理的束缚与强制，看作是对个体自主的压迫与强制。但是，与专制、天理的束缚相比，还是公理的束缚更甚。原因在于天理不过是臣事君、子事亲。^①由于臣可以离君而去，父可以先子而死，所以说这种束缚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而且君、父无道时，臣、子还可以向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之外的社会伸冤。可见在空间上这种束缚也是有限的。与此相反，人应该服从于公理的社会，公理的束缚在时间上是永存的，在空间上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人没有一丝逃避公理压抑的可能性。

据此，章炳麟认为改良派的近代化原理的公理，并不是对传统体制的原理——天理的否定，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倒不如说是天理的继续，而且比天理更加组织化、更有效率。连过去天理统治所不及的“放任自由”的社会最末端也浸透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个体的自主性被完全剥夺之后，便确立了一元统治的体制。

章炳麟的这种看法恰好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相对立。梁启超主张：人虽然不能做人的奴隶，但必须做群的奴隶。^②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主张：个别者的自由完全否定后就换来了欲望完全充足的世界。在章炳麟思想中，所谓齐物的自主是指在“放任自由”社会中的个体。在一元统治体制下，任何自由均被剥夺，被完全束缚起来的这些个体最后只有自觉地抵制和否定这种体制，

^① 夫妻问题在此暂不讨论，因为对男女问题需从更严格的角度来考虑。公理本身就对男女饮食放任无遮持不满态度。

^②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选集》。

别无选择。可以认为，中国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框架结构，改良派的公理是把“国家”与“社会”完全包容，并要贯彻一元统治。而章炳麟的齐物自主则是从“社会”出发对这种一元统治的抵抗。因此，也可以认为这是对传统体制延续的一种抵抗。近代化与传统受到的这种否定，不是由天子，也不是由乡绅阶层发出的，而是由人民发出的，是从社会最底层发出的。尽管这种否定只是反对强制与压迫，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不论怎样，作为自觉的主体对立，仍具有巨大的思想史意义。

章炳麟反对代议制，早从戊戌变法时期便开始了。以后，为清朝立宪作准备，改良派锣鼓喧天地提出了代议制的要求。对于这一举动，章炳麟在《民报》上发表《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与马良书》、《与刘揆一书》、《驳神我宪政说》、《马良请速开国会》等文章，进行了批判。其中他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说：“置大总统则为公，举代议士则戾”，甚至连革命派想直接输入美国共和体制，他也表示反对。为反对代议制，他构思出“谛实之共和”、“奇觚之专制”的总统制。^①他认为这种政体的害处最小。

章炳麟的基本命题是“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②他认为代议制的任务是“纤悉备知，民隐上达”，^③起着为政者与民意之间的导管作用。这种制度在距“封建”时代很近的国家，如欧洲、日本则是可行的，因为诸侯完全掌握领土内的人民，无论征兵还是纳税，人民都不能有所蒙蔽。中国距离“封建”已有2000余年，是个专制、混一、一统的国家，一君的统治不能浸透末端。对于纳税、征兵，人民素有蒙蔽的习惯。如果中国实行宪政，只会招致官吏和豪民的横暴。进而得出代议制在欧洲、日本是顺流，在中国则是逆流的结论。他对比日本、欧洲的封建制度

① 章炳麟：《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② 同上。

③ 章炳麟：《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与代议制，抓住家产官僚制度与一君万民体制的不同，以及一君万民体制这种中国政治形态的特殊性，提出不是这两种政治形态价值高低的争论，而是在中国适用与不适用的问题。

他还说：“代议政体，非能伸民权，而适堙鬱之。盖政府与齐民，才有二阶级耳。横置议士于其间，即分为三。政府诚多一牵掣者，齐民亦多一抑制者。”^①在这里，人权一词并非人民积极获得政治上各种权利的意思，而是所谓不受他人压迫的权力，齐物论的个体自主的权利，具有消极的意义，令人注目。章炳麟所说的不只是适合与不适合问题，而且是反对因君主国中的贵贱不平等与民主国中贫富不平等而提出的代议制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他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自由平等观念作为抵抗的依据，并使之理念化的概念。

在章炳麟的理论中，自由是“名专制，实放任”的自由，强大的国家权力也有其贯彻的限界，也有力量达不到的社会最末端，因而出现自由，即所谓的“苛察不徧行”。他以古人承认子孙复仇的私刑主义原则，也以所谓“恤无告之法”为例，说国家知道自己权力的限界，容许个人自由的存在。^②这种说法正与“东洋的自由=从政治派生出来的自由”的说法相吻合。

在章炳麟的理论世界中，平等是没有贵族黎庶阶级之别的贵贱平等，是不给予富人特权地位的贫富平等。他提出疑问说：为何本来平等的中国，施行代议制以后会不平等呢？他接着回答说：中国的平等并不是自然的平等，而是由法家的“典章制度”强制维持的平等。也就是说潜在的不平等被强制所掩盖。法律上的平等以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为前提。政治上的平等以经济上的不平等为前提。在《演说录》中，他把中国典章制度中的平等看作与社会主义接近，并举均田制、刑名法律、科场选举之例来说明。他还以贵贱平等为例说中国没有阶级。官僚虽压迫人民，但

① 章炳麟：《与马良书》，《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② 请参阅章炳麟的《五朝法律索隐》，《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官僚不是世袭的，所以压迫是有限界的，况且官僚还有抑压土豪横暴，使之不能垄断公事的作用。对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给予了较好的评价。

从以上可知，章炳麟把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把经济上的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作为从属关系来看待。维持平等的典章制度是法家的产物。因此，他对商鞅、诸葛亮等法家与法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颂扬自己虽贵为天子，可把子孙也作为匹夫，置于一君之下，成为与万民相同的被统治者，从而实现平等的秦始皇。因此，章炳麟的平等只是一君之下的万民平等，是消极的。从近代西方的立场来看，只有君主一人的自由，而万民只是奴隶的平等，必须批判。

章炳麟的这种观点，也与谭嗣同的观点完全对立。谭嗣同认为“以天下为君中囊橐中的私产”的元凶就是秦政和荀学，他主张突破“私”的君权，恢复“公”的民权。^①

不用说，章炳麟并不是真正支持君主制，他是支持总统制的。他把中国与印度进行对比，把握住二者之间所具有的相对超越性的侧面。他认为印度的立宪君主永远属于一家所有，人君没有责任，权力是绝对的大。而中国的专制君主不过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他还认为中国虽说只有一个君主，但就连这个君主也制定有不许他恣意胡为的典章制度。因此，章炳麟对典章制度比对执行者法家、法吏更为重视。可以说，章炳麟并不是支持权力者——君主，而是支持、赞赏其反面：一君万民体制的典章制度所维持的平等。他并把这一平等的侧面作为理念加以强调。

他这种认识的目的在于警告和防止出现上豪利用代议制掌握

^① 在《五无论》中，章炳麟提出：“既知人性之恶，彼政府者亦犹人耳，其性宁独不恶耶？检以礼法，而礼法者又恶人所制也。就云礼法非恶，然不可刻木为吏，则把持礼法者，犹是恶人。”因此，“正以性恶之故，不得不废政府”。不用说，章炳麟把典章制度和总统制也都认为是“恶”，应该消灭的。考虑到无政府不能立即实行，作为权宜之计，只好取其恶最少者。

权力并压迫“齐民”，因为土豪在中国一直受到一君制或一君体制下的典章制度的抑制。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他提出总统制作为代议制的替代物，其出发点就在于继承典章制度的理念，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达到维持万民平等的目的。他所说的总统制，是司法与行政分立，各以专门治理。

为什么说施行代议制会给中国带来不平等呢？章炳麟对选举根本不可能施行进行了绵密的论证。论证的中心是说，如果限制选举权，以纳税额确定选举与被选举资格，只能使富民当选。如果实行普遍选举制，“愚陋恒民之所属，日本不在学术方略，而在权力过人”，^①那么“贤良”不会当选，只会是“土豪”当选。他还就议会论证说：“名曰国会，实为姦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②关于议会的立法权，他完全给予否定，说：“凡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③最后，章炳麟得出了代议制“毒黎庶”的结论。

如果看一下历史中的土豪（豪右、富民），那么可以看出他们是改良派的基础，大体上相当于提出“回收利权”、“地方自治”等口号，而政治上正在抬头的乡绅阶层。可以推定：如果以这些豪右、富民为国会议员，让他们掌握权力，实行地方自治，那就会给中国带来分裂和内部的抗争，这显然与民族主义相背。如果拥护富民，又显然与民生主义相悖。从章炳麟提出“汉土诸律，徒有拥护政府，未有拥护贷殖者”^④来看，可以知道他对富民握有权力的美国、日本式的金权政治，抱有戒心，想预防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来的不平等。章炳麟把民权作为“齐民”的权力用来抑制豪右、富民权力的想法，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的警告。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乡绅阶层夺取了主导权，辛

① 章炳麟《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②③ 同上。

④ 章炳麟：《五朝法律索隐》。

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①同时，章炳麟的这种看法，也可以评价为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道路的批判。

在章炳麟的思想中，抑制豪右、富民抬头的办法是实行总统制。他认为法律既不应该是自上而下，也不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由“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②之士制定，确定司法与行政的职权。这就是说立法权不在于上，也不在于下。全国人民从有经验有业绩的方面官、国务官中选举总统。由总统负责行政、司法和外交。司法官由“明司法令者”互选产生。除司法官、行政官外，他还主张设立学官，除政府开办的小学校、陆海军学校之外，其他学校政治独立，隶属于学官。章炳麟使总统、司法官、学官彼此对立，以防止权力集中。当总统或行政官违法时，人民可向司法官提出控诉。司法官违法，人民可向学官提出控诉。在章炳麟设想的这种“进出内部诉讼”的制度中，人民的最终保护者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富于经验的学者。这一制度规定要保证人民对财产的咨问权和否决对外宣战的权力。他认为应该执行“抑官吏伸齐民”的政策，“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

^① 在1906年东京的同盟会本部编纂的《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宣言”中，规定在革命军占领地区，每县设安民局，局中设局长1人，局员10人，顾问10人。局员挑选军人或地方绅士担任，顾问均由地方绅士充当。一律由局长任命。革命派的路线也存在着依存于乡绅阶层的侧面，自然不会提出打倒乡绅。辛亥革命后，刚担任湖南省都督的革命派领导人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因“贵族”、“乡绅”策动而被杀害。湖南省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等改良派掌握了主导权，酿成有名的事件。章炳麟对会党头目焦达峰的事迹表示了强烈的关心，在《制言半月刊》第7、8、9期上连续刊登《征求焦达峰遗事启》收集焦的资料。1936年3月1日在《制言半月刊》第12期上发表了《焦达峰传》，在该文中他并没有把笔锋指向谭延闿等“贵族、搢绅”，而是指向了只取得了浮名而没有实效的“国民党”（革命派）。章炳麟对辛亥革命后革命派的主导权被北洋派和改良派乡绅所篡夺一事并不太考虑。使他最为悲愤的大概是革命派的腐化和陨落，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元年）中，他曾写到：“初，同盟会著籍者不过二千人。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数千。”这些问题。笔者拟留待以后再讨论。

^② 章炳麟：《代议然否论》。

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贰于国也”，^①“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外，^②保证人民一切集会、言论、结社的自由。除以上所说外，章炳麟还主张“耕者有其田”的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手段所有，以及官与工商相分离、限制财产继承、“轻盗贼之罪”、禁止发行纸币等一系列“抑富强振贫弱”的“社会主义”政策。

章炳麟设想的政府，不是抑制“齐民”自主的政府，而是以之为基础，并保证“齐民”自主存在的政府。如前所述，“齐民”的自主是“以无害为其限界”，是不压迫他人的，同时它也拒绝任何压迫与束缚。因此“齐民”被限定于“无害”，那么政府也就不对其加以任何干涉。当豪右、富民利用实力压迫另外的“齐民”时，这就成为有富。政府就应该抑制他们，为“齐民”除害，保证自主。制定规划这一政府、法律的立法者和掌握最终弹劾权的是那些富于学识经验的人。很显然，他们是人民的代理人。能成为这样的人只能是那些先知先觉的菩萨革命家的后继者。当压迫者是外民族时，消除压迫的力量只能是被压迫民族的抵抗。这时，连菩萨、人民也都共同站在抵抗者一边。当压迫者是国内的个人时，如果哀怜压迫，那么自然也哀怜被压迫者的抵抗。因此，事先就要有菩萨组成政府，自上而下地预防压迫的产生。

纵令有这样的政府存在，束缚人民的危险仍是时时存在着的。况且政府存在一事的本身就多少意味着对人民的束缚。因此，在考虑各种各样防止政府权力集中的方法时，章炳麟也同时在考虑着政府的消亡。他曾把生民百姓比喻作百谷，把政府比喻作百谷的肥料——“乾矢鸟粪”。他还说：“吾侪所志，在光复中国而已。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③

关于章炳麟设想的总统制实现的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菩萨

①② 同上页注②。

③ 章炳麟：《官制索隐》，《章太炎全集》第四集。

革命家的存在与否，如何实行等问题，章炳麟都未作具体的说明。因此，也可以把革命政府看作是他为批判代议制而描绘出来的虚像。虽说它只是作为一个幻影出现在现实的历史中，但章炳麟思想所暗示的中国革命所应具有的本质方向，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四、小 结

通过前述，本文对章炳麟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为革命家的生活方式、与革命的独特联系方式，试着进行了考察。章炳麟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压迫之上，具有一种否定的主体性。这一民族主义的主体是汉民族人民，其中核和代理人就是菩萨式的革命家。章炳麟一贯把革命问题当作由什么人进行革命的问题来考虑。因为主体是反对压迫，具有否定性质的事物，所以他就把排满革命看作是具有否定性质的无生主义的一个阶段，无生主义的目标则是要“无世界”。章炳麟的这种革命思想，通过对改良派近代化路线的批判，为中国革命杀出了一条血路，在思想史上提出了具有否定性质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从前述可知，章炳麟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佛教（特别是唯识）思想和庄子的齐物思想。这些是他用来对抗基督教、进化论等西方原理的理论根据。当时，思想界中西方的积极发展原理与中国将灭亡的消极后退原理正在决斗，人们得出“先进的西方、落后的中国”的“绝对真理”的结论，和中国必然灭亡的结论，章炳麟鉴于这种情况，提出了中国要自存，中国“不想被灭亡”的理论化原理。^①他的这种原理纯粹是抵抗的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章炳麟的思想是一根理论化的发条，这根发条逆转了人们头脑中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先进与落后的概念。因此，作为

^① 更正确地说，章炳麟看穿了“近代化”这一流行的唯一的救国之路命题的虚伪与欠缺。

一根发条，是章炳麟使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最后一次机会，得以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章炳麟的反“近代化”的思想，是想通过对旧的构造一点点进行改良之后，再反对“近代化”。它从旧构造中最底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既否定旧的构造，又否定近代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暗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

译自《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81年12月版。

王玉平译

辛亥革命与日本

——以东京商业会议所编《关于支那动乱的调查文件》为中心

饭岛 涉

前 言

关于日本对待辛亥革命的对策，是以“基本上维持清朝，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此扶植乃至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为目的的政治、军事对策作为研究的中心。^①关于日本的经济对策，则是按照上述目的以提供借款问题为研究的中心，但对应付辛亥革命的直接经济影响的对策则研究得并不多。

笔者曾考虑研究从日中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想从与日本的关系入手。但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获得了东京商业会议所（以下简称“东商”）有关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于10月30日决定派遣“清国动乱实况视察员”，^②以及根据外相内田康哉的委托对所属各企业、同业公会、商店就辛亥革命的影响进行调查等文件。尤其已将后者的影响调查结果装订成册，作为《关于支那动乱的调查文件》（以下简称《调查文件》）的

^① 藤井昇三：《孙文研究》，劲草书房，1966年版，第64页。又，最新论著，大畑笃四郎：《辛亥革命和日本的对策》，《日本历史》414，1982年1期。

^② 《东京商业会议所月报·录事》（以下简称《月报》），第4卷，第10期。

一本，保存在东京商工会议所调查部商工图书馆。^①它可以称之为具体展现东商所属各企业、同业公会、商店如何认识辛亥革命的性质，采取何种对策的史料。因此，本文依据《调查文件》和《东京商业会议所月报》(以下简称《月报》)，初步探索了辛亥革命对东商所属企业等有无直接经济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及其对策问题。

本来，为了研究东商等对待辛亥革命的对策，有必要将已经发表的中美、中日间的“商会”关系^②作为背景，可是由于笔者

① 关于东京商工会议所调查部商工图书馆，现在是为东京商工会议所调查研究而设立的图书馆，商界杂志记者多来利用。在战前可能浏览到东京商业会议所、东京商工会议所等收藏的资料。(例如在外国日本人商业会议所关系资料)因为那时有《东京商工会议所和汉图书分类目录》可供使用。再有，该图书馆有珍贵书目录(该馆编成的，汇订卡片)《杂用书类》、《决议录》等最初史料可资查阅。从目录上可知还有《上海总商会本邦视察团来邦颠末》，这是一份颇有兴味的文书，不过，听说该图书馆在整理时丢失了。

② 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实业团来华》，《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所收，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概观东京商业会议所，其设立于1890年(明治23年)，翌年被认可。它是日本近代商工业者机构的嚆矢——东京商法会议所(1878年即明治11年成立)和后来由该机构改编成的东京商工会(1883年即明治16年设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是寺岛宗则根据国内舆论界要求，与英国进行修改条约时，英国公使巴库斯提出“所谓国内舆论，而你们没有商业会议所，怎么会知道舆论界要求呢？”后，寺岛便以此为契机，建立了该机构。可见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和为了达到振兴对外贸易的目的，设置了这个商工业者的形成舆论的机构。由政府支付的援助金确立了该机构的财政基础，以英国型的会员制任意团体为模式，由濑泽荣一、益田孝、福地源一郎、大仓喜八郎等设立东京商法会议所，从事重要经济问题的咨询；调解、调整商工业间的纠纷；加强同国外商工业者的关系；负责发行《商况报告》等业务。但明治政府从主管国家权力出发，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于1881年(明治14年)改通商司为农商务省，停止付给援助金。于1890年(明治23年)又采用德国、法国的议员制的模式，设立东京商业会议所。

其后，1928年(昭和5年)改为东京商工会议所，转向以中小企业为活动中心。1943年(昭和18年)根据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再改编为东京商工经济会。战败后，1946年(昭和21年)重新以会员制任意团体为模式设立东京商工会议所。(以上见《东京商工会议所百年史》及《明治商工史》第132—139页)

据个人管见所及，从研究日本史角度谈到东商的，有以下看法：关于东商等商业会议所的性质，中村政则认为“主要显示了商业资产阶级的阶级集聚度”(中村政则：《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期的国家权力》，见《历史学研究》，1970年增刊号，第93页)。江口圭一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不能截然区别为产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

能力有限，在本文中只得以分析〈调查文件〉为中心，至于正式的研究不得不作为今后的课题了。鉴于日中战争后，东商或各地商业会议所的联合组织——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就朝鲜问题和中國问题积极地向政府进行活动，形成了东商对待辛亥革命对策的背景和承担日本政府决定对外政策的一定的任务，因此对这类史料进行了若干整理。

《调查文件》的编成和调查的原委

先说〈调查文件〉。它是反映辛亥革命对东商所属各企业等的影响的调查原委的文书，但在对东商所属各企业、同业公会、商店的调查结果的报告中增加了《通商汇纂》有关神户商业会议所资料（已发表）的一部分文件。

检阅这部反映辛亥革命对东商所属各企业等影响的调查原委的文书，即可看到这份调查不但出于东商自己的意图，也与设立在上海的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会长、上海邮船分社社长伊东美治郎有关。①因辛亥革命造成贸易不振，而委托外相内田康哉对辛亥革命给日本国内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查，内田外相便托付东商会会长中野武营着手调查，这部文件就是因此而编写的。

级，而是具有各种性质的资产阶级的结合，这是该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在各地进行了阶级的集结，组织了商业会议所”。（江口圭一：〈都市小资产阶级运动史研究〉，未来社1976年出版，第30页）。江口先生的研究是以反对营业税运动为中心，将东商包括在其研究之内。后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东商，如从三井物产那样的大商社到同业结合和个人商店以及纺织会社等的事实，江口先生的看法是有说服力的，但没有研究东商干预对外政策是个疑问。

干预东商政策决定问题（各地商业会议所举办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引者），全国各地都有，都是以中小商业资本家为主体构成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东商政策，除修改营业税、制定工场法等问题外，还有有关地方利害问题（山下直登：〈日中、日俄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财阀的政策意向〉，《历史学研究》450，第12页）。后来研究东商，从关于朝鲜、中国的建议等活动来看，反映干预东商政策是不明确的。至少其活动，限于地方利害范围的问题，未被考虑进去。

① 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的设立，也是日本对辛亥革命对策的一部分。详细情况，另文研究。

辛亥革命和日中贸易

那么,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随着它的发展,给当时的日本带来了哪些直接的经济影响呢?依据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的报告,①可以概观日中贸易中心地区上海的状况。

10月12日,革命军占领汉阳、汉口。由于当地现款需求激增,引起上海的现款行市暴涨,而汉口金融机构的封闭,又使上海短期贷款的利息暴涨。由于这些不安的消息,从6日开始对四明、信成、浙江银行的挤兑,也波及到大清、交通、通商各银行及外国银行。在上海的前几年橡胶恐慌中,信用、资金都脆弱的钱庄几乎破产了。虽然当时许多钱庄拥有雄厚的财力,但由于外国银行收回短期贷款,17日,晋和、敦和钱庄破产,到20日又有十三家钱庄出现停止支付现款的状况。

这样的金融危机对当时的日中贸易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据钟渊纺纱报告称:“商人相互警告停止交易,拒绝领货,以至解除约定,无法控制,输入货物空滞上海市场。尔来自我国输入,已减少至最低限度。”②这个报告指出,经济受到的影响直接引起金融恐慌,造成商业交易呈现停止状态。

东商《月报》12月号将10月日本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交易额与前年10月同期作了比较(见表A),指出大幅度下降的事实;③而与前年比较,贸易总额约减少了194万日元。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当时输出贸易中心的棉纱出口锐减。

这样的态势对东商所属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表B就是根据《调查文件》各类报告整理的各企业受影响的情况。然而,《调查文件》中虽收集了44件报告书,但其中只是就受到影响大的或

① 《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233,1912年1月25日所收:《事变发生后上海金融及商工业状态》,同史料是由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金丸裕一先生提供的。

② 《调查文件》所收钟渊纺织报告,1911年12月26日。该报告由武藤山治提供。

③ 《月报》第4卷,第12号,《对清贸易受到的打击》。

者引人注目的企业整理而成，况且报告是东商会长中野武营受命调查的产物（1911年12月19日），^①因此可以认为，这份报告大致表明了至12月中旬时的情况。

A 日本向中国的出口贸易

	棉纱	棉布	毛巾	火柴	陶器	镜子	锡	酒	糖	烟	铜	煤	计
1910. 10	479	124	3	40	3	1	7	6	79	8	22	43	794
1911. 10	287	116	3	45	3	2	7	7	47	3	28	49	600
增 减	-192	-8	0	5	0	1	0	-1	-32	-5	6	6	-194

〔《月报》第4卷12号，根据《对清贸易受到的打击》制作，单位万元（日元），不满万元（日元）者省略。〕

纵然也有表B未收集的作为企业主体而由于商业交易停止受到若干影响的企业，如大日本人造肥料、糕点同业公会等，但报告中受大影响的企业是长井商店、古河合名会社等12个企业、同业公会和商店。其中引人注目的可以认为是上述因棉纱输出锐减而大受影响的长井商店、前川商店、东京棉纱商组合的情况。

东京棉纱商组合的报告称：清国事变对我商业关系极大，尤其对重要输出品棉纱类影响更甚。因事变具突发性，杜绝输出，伴之退回已输出的货物，至内地市场产品停滞，市价暴跌。事变前，20支棉纱的市价为150日元，有时降至120日元成交，经营者蒙受损失较少。所幸今内地需要略看好，注视清国事变，倘能恢复和平，市价亦会因此稍有回复。……如不幸事变仍继续，估计我制造业将有过半数陷入停产困境，实予我经济界以极大影响。^②

当时，棉纱商有只经营日本国内棉纱流通的和同时兼营出口的两类。参加东京棉纱商组合的商店到底属哪一类并不明确，但

① 《调查文件》所收文书。

② 《调查文件》收《东京棉纱商组合报告》，1911年12月23日。

B 辛亥革命的影响及其程度

名 称	商 品	影响的程度和原因
长井商店	棉织品	贸易停止，12月逐渐恢复。
前川商店	棉纱	贸易停止，棉纱价格下降，12月恢复。
东京棉纱组合	棉纱	棉纱价格下降，逐渐恢复。
化妆品批发商组合	化妆品	影响大，商业交易停止。
美满津商店	体育用品	影响大，同上。
教育品制造合资社	教育用品	
洋伞商同业组合	洋伞	
药品贸易商同业组合	药品	
富士制纸	纸	汉口工场关闭，在上海、天津营业。
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		受原料锡的涨价影响
肥皂制造同业组合	肥皂	原料牛油不足
古河合名会社		商业交易停止，向造币局出口铜的契约被毁弃。
打制器物、磨刀石批发庄	理发推子等	因剪发辫令得利
东京帽子	帽子	有利
钟渊纺织	棉纱	后述
富士瓦斯纺织	棉纱	后述
三井物产	棉纱	后述

（根据〈调查文件〉收所各类报告制成，但未受影响的企业除外。）

无论怎样，由于辛亥革命的直接经济影响，出现了上述的由于金融危机、商业交易停止及对中国棉纱出口的减少，造成日本国内棉纱价格暴跌的状况。

另外，还报告了以下情况：受到商业交易停止和出口减少很大影响的行业有经营洋伞、化妆品、药品、体育用品行业；受进

口原料不足影响的行业有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肥皂制造同业组合；因在中国的工厂被关闭而受到影响的富士制纸^①等行业；以及因辛亥革命的直接经济影响而亏损的事例。

不过，也存在出口额上升的行业。如“因清国发布剪发辫令云云，出现了各输出行业热中于竞相倾销库存积压物资而几乎售罄的好局面”。^②正如报告所说：在发布所谓剪发辫令的文化变革中，使理发推子出口增加；打制器物、磨刀石批发庄和东京帽子（帽子出口）那样的行业，出口大有增加。

按照以上报告，辛亥革命时期各行业由于商业交易停止，出现了出口减少、国内价格下降的状况，以及给东商所属各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

但是，从当时的贸易额、贸易结构来研究，向中国出口棉纱的减少和同时发生的国内棉纱价格的暴跌是最大的问题。也可以将辛亥革命的直接经济影响同大部分问题联系起来看，这就是在“清国动乱爆发后，棉纱及棉布的输出显著衰减，表现为棉纱输出在过去三个月间减少约五成。棉纱输出商都多少蒙受了损失”。关于棉纱的出口，1911年7月至12月的三个月间，与前年的1290万日元（约7万包）相比，减少约五成，合683万日元（4万5千包），可见给予棉纱出口商的影响之大。^③

恰在同期，美国、印度向中国出口的棉纱也在减少。^④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对日本商人的影响较对外国商人大，其缘由不单是所谓贸易额大的影响，而且“在商业关系上，日本商人与西方商人异趣，因而遭到比西方商人更猛烈的打击。西方商人与内地商人有直接关系者甚少，他们无不有买办为依托，担保几份交易，而日本商人多无买办，他们是在当地（上海。——作者）

① 《调查文件》收富士造纸报告。

② 《调查文件》收打制器物、磨刀石批发组合报告。

③ 《月报》第5卷第1号，《棉纱布的输出和动乱》。

④ 《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收：《中国骚乱给美国棉业家的影响》、《支那革命与孟买棉纱停滞》。

同内地华商完成交易，再进一步与清国钱庄交易，为此受到更大的损失”。^①从而指出了日本商人的交易方法加深了经济影响的程度。

到目前为止，研讨的史料反映了辛亥革命对经济的直接影响非常之大。但考虑到汇集棉纱部门的直接经济影响实际上都是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上的，因此，从总体上看它给日中贸易带来的影响仍是轻微的。事实上也是一方面担心革命推移，另一方面又在1911年12月下旬开始逐渐恢复对中国的棉纱出口，同时国内棉纱价格也出现了回升倾向。正如棉纱商自己指出的：“不安之感，渐次消除。此乃日英两国居中调停，呼吁和谈，今业已实现议和。棉纱之价日见回升，使商业状况，几恢复至平时。”^②这样，在开始南北议和会谈的状况中，就将对棉纱部门的影响控制在轻微的范围了，结果形成了1912年1月起至9月中旬的棉纱出口旺盛势头，超过了1910年的趋势。^③

南北议和使辛亥革命引起的经济秩序的混乱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控制，这是限制辛亥革命对经济的影响的重要原因。而且，清军和革命军的大规模战斗也被局限在华中，致使偏于华中的日本棉纱出口激减。但在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国银行采取延期回收短期贷款等措施，^④商业交易也逐渐恢复，革命后反倒出现了棉纱出口增加的势头。

但由于想尽量缩小辛亥革命的直接经济影响，故对于理应直接受到影响的纺织资本也说成是并未受到重大影响。其实，“吾国输出之棉纱，主要供清国中部地区之需，其中向汉口及四川发送

① 《月报》第4卷第11号所收：《事变给上海商业带来的影响》（上海总领事馆南商务官）。

② 《调查文件》收前川商店报告，1911年12月23日。

③ 《月报》第5卷第10号，《棉纱出口的景气》。

④ 《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223，1912年1月25日。

至10月下旬，不断发生钱庄停止支付情况。外国银行经过协商，决定采取延期回收短期贷款措施，加之南京造币局给大清、交通、通商各银行送来银元，致使上海金融恐慌逐渐得到控制。

最多，约占向全清国输入量之2/3。……由于当地人心浮动及金融界恐慌，货物交付停止，加之产生一旦既已交货，而货款难以交纳等诸种障碍，使向清国输出量依然锐减”。^①在钟渊纺织也存在棉纱出口偏于华中的情况。不能否认，上海的金融危机使商业交易停止，造成出口减少。然而就其影响程度而言，该报告指出：

“由于内地谷物丰收及价格保持稳定，需要棉纱增多。故因清国动乱所蒙影响，已趋缓和。幸见清国动乱于今后二、三月内可告解决，恢复和平，吾国纺织业所蒙非显著之影响，可得脱困境。”^②

虽说革命进程难以推测，但预料其影响有可能限制在轻微的范围之内则是纺织资本界共同的想法，这种乐观的推测的根据是以富士瓦斯纺织的报告为象征的。“（对中国棉纱出口。——作者虽未完全停止，但亦仅占平时之七、八成。今因内地粮食丰收，出现需要增加棉纱之势，市价将随之再度提高。”^③

由于国内谷物丰收需要棉纱增加和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适当地维持了一定的出口，这正是认为对纺织资本的经济影响轻微的理由。正如农商务省商务局所指出的：“如前所记，去年我对华贸易，自事变以来，大有减少。但此仅就对华中与华南而言。至于对东北及华北贸易，则比前年反有增加（11月对华北出口减少一成二分除外）。”^④

由于把向上海的出口转向华北，棉纱出口得以维持。纺织资本由于国内需要顺利和将出口对象转向华北、东北，从而能够将辛亥革命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控制在轻微的范围之内。东京棉纱商组合和纺织资本所受影响之差别，我想可能基于是否有无这种对策而形成的吧。

三井物产将当时的情况作了以下的整理：“要之，一时对棉纱

① 《调查文件》收钟渊纺织报告，1911年12月26日。

② 同上。

③ 《调查文件》收富士瓦斯纺织报告，1912年1月8日。

④ 农商务省商务局：《商工汇报》号外，《清国事变给我对华贸易带来的影响》第1页。同史料，参照《调查文件》附件。

之影响，而波及市价，同业深受打击。受打击最甚者，则唯部分棉纱出口商。盖彼等期待乘今年8、9月之好行情，预计来岁1、2、3月乃至4、5、6月进口棉纱，可卖高价。遂决计收购，囤积居奇。引起彼等资金救济问题，关其存亡。即或维持原今市价，亦不免损失十四、五圆。”^①

从《调查文件》可以了解到辛亥革命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是多样的，其中有象棉纱出口商那样受到很大影响的商人，但从日中贸易的整体来看，受影响的程度则是轻微的。随着革命的推移有了很大变化，当时作为日中贸易中心的棉纱出口，因改变了出口地而得以维持，其受影响程度得以控制在轻微的范围之内却是引人注目的。

东京商业会议所和亚洲市场

下面想根据《月报》研究揭示东商本身是如何应付辛亥革命后的局势的。经济影响调查是由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提出的，但东商也独自实行了若干措施。

首先，10月30日在临时总会确认因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实业家访日计划被延期之后，为了研究辛亥革命的实情，决定派遣“清国动乱实况视察员”。^②这一决定是受了自由贸易商业会议所派遣有关辛亥革命的调查员的促动而作出的。^③选出日比谷平左卫门、根津嘉一郎、藤山雷太、杉原荣三郎、岡崎久次郎5人担任视察员，其中杉原则是棉业商的代表。

其次，于12月第18届商业会议所联合会上，设立了以中野武营为委员长的“支那动乱委员会”。^④但是，该委员会如何指导应付辛亥革命的变化，现在还不清楚。在逐步整顿经济的混乱局面

① 《调查文件》收三井物产报告，1912年1月12日。

② 《月报》第5卷，第11号。

③ 同上。

④ 《东京商业会议所月报·录事》第4卷，第10期。

的过程中，派遣视察员如同象征着向中国的“商会”派遣慰问员，^①是考虑到直接经济影响轻微而对中国的贸易正在顺利恢复中作出的决定。然而，这样的对策反映了东商对中国市场深切的关注。内田外相受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委托进行调查，内田又委托东商（据推测神户、大阪的商业会议所也接受了同样的委托，但至今未得到确认），结果东商调查了辛亥革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可以说，这应当是研究东商介入亚洲市场的课题。

例如，东商就由于日中战争造成的经济变化，答复农商务省商工局长的照会，提出了有关战后经营的建议书。^②

又如，对朝鲜问题东商也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它独自执行由商业会议所联合会临时总会（1904年）议决的^③包括关于金融、通商、农业、渔业、航运、矿山等建议和1910年在京城举办商业会议所联合会等的计划。^④

根据《月报》和商业会议所联合会的《商业会议所联合会报告》，将有关朝鲜、中国问题的事项整理成表C。关于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问题，即有：

- a. 金融问题（以振兴贸易为目的的开设银行及改革中国币制的要求）；
- b. 矿山、铁路、航运投资问题；
- c. 谷物禁运问题。

这被认为是当时东商（商业会议所联合会）的悬案。^⑤

再如，同大日本棉纱纺织同业联合会取得联系，为振兴作为出口贸易中心的棉纱出口，以便与印度棉纱竞争，并向政府要求补助金；^⑥根据上海的外国人商业会议所的要求，推动政府扩充

① 《月报》第5卷，第1号。

② 《东京商业会议所百年史》，昭和54年，第70—72页。

③ 《月报》第106号，1904年。

④ 《联合会商业会议所报告》，1911年4月。

⑤ 《月报》第85号，1899年。

⑥ 同上。

港湾设施^①等；这一切令人瞩目。

实际上，根据《辛丑条约》保障这些悬案，作为列强和中国交涉修订通商条约（日本的条约修订于1903年）的重要课题，东商的活动仍然是形成政府制订对中国政策的基础。^②

《月报》还指出了辛亥革命前的权利回收运动，商部开设以来的实业振兴政策的开展，^③ 贸易问题，特别是向中国出口棉纱行市呆滞^④ 与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关系等。

这些事件证实了东商积极地介入了朝鲜、中国市场，应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的委托调查，而内田外相又把调查任务委托给东商，成为其积极介入朝鲜、中国市场的背景。本稿探索的《调查文件》编成的根据，可以断言是的确存在着的。

原载日本《辛亥革命研究》第7期第81—92页

赵宗颜 马洪林 译

（译者附言：本稿日文本，承蒙日本信州大学后藤延子教授复印寄赠，
谨致谢忱。）

① 《月报》第86号，1899年。

② 修改通商条约问题，另文研究。

③ 《月报》第2卷，第12号收：《清国的新形势》。

④ 《月报》第1卷，第3号收：《我棉纱纺织业》。

C 东京商业会议所对亚洲的政策(1)

	东京商业会议所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
1898 (明治年)	<p>8月 农商务省关于清国商工业视察的照会(73)</p> <p>9月 答复农商务省关于矿山、制铁业、铁路问题以及应注意对中国贸易的买办机能。(74)</p> <p>10月 派遣荻原源太郎(东商书记长)视察清国商工业(75)为寻求进口中国米的政策的决议(75)</p> <p>12月 伊藤博文演讲(日清战后经营和对中国的政策)。(77)</p>	<p>5月(第七届)</p> <p>进口中国米(进口廉价的中国米,控制物价,防止工资上涨,加入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的希望(博多)。</p>
1899 (明治32年)	<p>1月 向大藏、外务、农商务大臣建议在中国设置金融机构(目的为扩大贸易)。(78)</p> <p>2月 英国联合商业会议所代表卑雷斯菲德来日(提倡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78)</p> <p>8月 大日本棉纱纺织同业联合会极力要求设华北定期航线(与印度竞争,直接向华北出口棉纱)。(85)</p> <p>9月 在上海外国人商业会议所请求关于吴淞口保护问题(设置河口保护局案)(86)</p>	<p>5月(第八届)</p> <p>要求扩大中国航线和补助金(长崎)、振兴华北贸易(给航运业补助金)的意见(大阪)。</p> <p>向中国派遣技术人员(铁路、矿山)的要求(东京、大阪、京都、横滨)。</p>

续表 1

	东京商业会议所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
1900 (明治33年)	1月 向外务、农商务大臣建议吴淞口保护问题。(89)	
	7月 决定派遣永井将也为商业视察员(东京棉纱合资会社)(95)	
	8月 因义和团事件派遣延期(96)	
1901年(明治34年)		1月(临时) 关于改革废除中国法律制度(厘金问题、禁止粮食出口)的要求(长崎)。
		9月(第十届) 根据《辛丑条约》第十一条修改废除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要求 获得航运业、铁道业、银行业利权的要求。(东京) 扩大航运业、开设日清银行、调查事业(以扩大通商为目的)的要求(大阪)。
1902(明治35年)		4月(临时,第十一届) 关于经营居留地的建议(神户)
		12月(临时)

续表 2

	东京商业会议所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
1903 (明治36年)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 为扩大通商要求开设日清银行 (京都、大阪、神户、名古屋、四日市)。
1904 (明治37年)	5月 临时总会议 (日俄战后经营的设想) 1. 创设东洋银行 2. 改革韩国币制 3. 日本人土地所有权的 安全 (朝鲜) 日本人土地所有权的 确认 (满洲) 4. 警察制度的改良 5. 渔业权的确保 6. 开港、开市 7. 铁道经营建设的日本人主导 8. 航运事业经营的日本人主导 9. 矿山开发、商工业的自由。 10. 调查事业 (以上106)	6月 (第十二届) 要求解禁中国粮食出口 (博多) 5月 (临时) 与东京商业会议所决议相同的决议
1905 (明治38年)		8月 (第十五届) 促进缔结日韩两国关税同盟的决议
1906 (明治39年)		

续表 3

	东京商业会议所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
1907 (明治40年)		
1908 (明治41年)	8月 “极南清的本国通商 (因第二 辰丸事件, 广东、香港排斥日 货情况。)” (1-2)	
	9月 “我国的棉纱纺织业” (纺织业 的景气与萧条及向中国、香港 出口贸易棉纱的减少)。(1-3)	
	10月 美国商业会议所代表团来日 (1-4)	
	12月 中野武营 “对美对清所感” (提出对中国政策的再研究) (1-6)	
1909 (明治42年)	1月 “银币与对清汇兑” (棉纱出 口增加同银价上涨和中国市场 繁荣的分析)(2-1)	
	2月 “排斥日货后的广东商情” (2-2)	
	12月 “清国的新趋势” (“新政” ——商部开设来以对振兴实业 的警戒感) (2-12)	
1910 (明治43年)	4月 清国观光团来日问题 实业观光团的派遣问题(3-4)	
	5月 派遣实业观光团 (3-5-7) “清国的纺织业和本国的棉	

续表 4

	东京商业会议所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
	<p>纱”（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纺织业——包括由外国资本设立的纺织业使发展的棉纱进口减少，预测日本纺织业在粗纺市场竞争中将受到最大影响。） (3—5)</p>	
	9月 通电京城韩人商业会议所（合并问题）（3—9）	
	10月 关于源丰润事件的调查（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贸易，特别是对棉纱出口的影响。） (3—10)	
1911(明治44年)	6月 中野武营“朝鲜视察谈” (4—6)	4月 (临时,在京城召开。)
	7月 准备待招中国实业家委员会成立(4—7)	1. 举办朝鲜劝业博览会
	10月 “清国的内乱”(4—10) 招待实业家延期(4—10) 决定派遣清国动乱实况视察员	2. 撤销粮食出口转口税 3. 减少铁路运费 4. 决议减少关釜联络航运费(4—5)
	11月 “事变波及上海商业”(4—11)	
	12月 “对清贸易的打击” “清国需要棉纱” “对清交易革新之必要” (4—12)	12月 (第十八届) 设立辛亥革命调查委员会
1912(明治45年)	1月 “关于香港的日本杂货的影响”	

续表 5

	东京商业会议所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
	“对清贸易调查” “棉纱布输出与动乱” 对中国实业家的慰问活动 (5—1)	
	6月 “意外的对清贸易” “对清出口的繁荣” 天津商会王贤宾来日 (5—6)	
(大正元年)	10月 “棉纱出口的增加” (5—10)	10月 (第十九届)
	12月 “对中国贸易11个月”(5—12)	申请撤销朝鲜米关税 (京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

括号内的数字：1898—1907年为号数（不是区分年度）

1908年以后如（5—1）为第5卷第1期

苏联史学界

对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略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国外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苏联史学界也不例外，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呈现出波浪起伏状态。

研究概况

早在20—30年代，苏联史学界对中国辛亥革命史以及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活动，已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和浓厚的兴趣。不少著名历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颇为重要的论著，如K. B. 安东诺夫的《孙文主义与中国革命》（莫斯科1931年版）、Г. B. 叶菲莫夫的《为中国独立而斗争的孙中山》（载苏联《历史杂志》1973年第1期）、Г. С. 卡拉-穆尔扎的《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探讨》（载苏联《中国问题》杂志1931年第6—7期），等等。到了6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辛亥革命史再度发生兴趣，辛亥革命成为苏联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热门课题，这一情况持续到80年代，但最近几年呈停滞状态。

苏联学者在研究辛亥革命史方面著述累累，成果斐然可观。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8年，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20种，论文集和资料汇编7种，论文百余篇，并用俄文翻译出版了中文著作《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选集》等革命文献。历史学家Г. B.

叶菲莫夫、С. Л. 齐赫文斯基、Е. А. 别洛夫、Л. Н. 鲍罗赫、Л. П. 杰柳辛、А. М. 格里戈里耶夫、В. Н. 尼基福罗夫、Ю. В. 丘多杰耶夫、А. Г. 克雷莫夫、В. И. 达尼洛夫、И. И. 叶尔马舍夫、Л. В. 西蒙诺夫斯卡娅、Г. Д. 苏哈尔丘克等均有研究辛亥革命诸方面问题的著作。^①

在这些学者中，贡献卓著的首推列宁格勒大学已故教授叶菲莫夫(1906—1980)。他从事辛亥革命史和孙中山专题研究先后达40年之久，1937年即发表第一部著作《为中国独立而斗争的孙中山》，是他的历史副博士学位论文。1974年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一书，是论述“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这一课题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其论点仍不失为当代苏联史学界的基本论点。他逝世后于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摸索前进的道路(1914—1922年)》一书，也是研

① Г. В. 叶菲莫夫：《中国1911年革命》(莫斯科1959年版)、《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列宁格勒1931年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С. Л. 齐赫文斯基：《孙中山外交政策的观点和实践(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略，1880—1925)》(莫斯科1964年版)、《一位中国革命家的遗训。孙中山的生活、斗争及政治观点的演变》(莫斯科1936年版)；С. Л. 齐赫文斯基责任编辑《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1866—1966)》(莫斯科1966年版)、《辛亥革命文献资料集(1911—1913)》(莫斯科1966年版)、《孙中山诞辰120周年论文、回忆录、文献资料汇编》(莫斯科1987年版)、《中国的辛亥革命(论文集)》(莫斯科1962年版)；Л. Н. 鲍罗赫：《中国兴中会》(莫斯科1971年版)、《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科1984年版)；А. М.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帝纲领(1895—1905)》(莫斯科1966年版)；Ю. В. 丘多杰耶夫：《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地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宪运动》(莫斯科1966年版)；Л. В. 西蒙诺夫斯卡娅：《中国的觉醒和辛亥革命》(莫斯科1956年版)；Е. А. 别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莫斯科1958年版)、《1911年的中国武昌起义》(莫斯科1971年版)、《1911年武昌起义的特点》(莫斯科1979年)；В. И. 达尼洛夫：《中国革命同盟会及其在辛亥革命准备过程中的作用》(莫斯科1959年版)；И. Г. 谢宁：《孙中山的社会政治观和哲学观》(莫斯科1956年版)；А. Г. 克雷莫夫：《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1900—1917)》(莫斯科1977年版)；И. И. 叶尔马舍夫：《孙中山》(莫斯科1964年版)；В. Н. 尼基福罗夫：《中国首批革命家》(莫斯科1980年版)；Г. Д. 苏哈尔丘克：《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领袖的社会政治观》(莫斯科1980年版)；А. С. 科斯佳耶娃：《1901—1911年中国的民族运动》(莫斯科1973年版)；Л. П. 杰柳辛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论文集)》(莫斯科1988年版)；В. П. 伊柳舍奇金：《旧中国的秘密会社(论文集)》(莫斯科1970年版)。

究孙中山及其政党的权威性著作。

主要论点

下面，笔者谨就苏联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史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作一简单介绍。

一、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弄清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原因、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的重要问题。苏联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业已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封建君主制度之间的矛盾，辛亥革命是新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旧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冲突的结果。由于新生产力的发展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不十分深刻、尖锐，由于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人民大众眼里，满清王朝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切灾难的代表，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因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集中全力于推翻满清王朝，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但推翻“满清王朝”斗争本身包含有废除整个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的方针。^①

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部分苏联学者突出“民族矛盾”——“满汉矛盾”，认为辛亥革命中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反满因素大于其他社会因素，^②但也并不反对叶菲莫夫等所持的新生产力同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看法。

二、辛亥革命的性质

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中外学者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苏联历史学家的看法与西方历史学家迥然不同，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虽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但推翻满清王朝客观上具有

^① Г.В.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351—353页。

^② С.Л.齐赫文斯基：《辛亥革命中民族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载苏联《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3期。

反帝反封建性质，是不同于中国以往传统型起义的资产阶级革命。^①

但在很长时期里，苏联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性质曾有过是“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争论。著名学者卡拉-穆尔扎否定辛亥革命具有人民性，否认人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中的作为。他认为，“革命尚未深入发展，就结束了(!)。这种革命不是人民革命，群众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没有给革命事件留下痕迹”。^②因此，他称辛亥革命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而叶菲莫夫教授则根据中国革命的主客观特点指出，不能把辛亥革命与1908年上层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相提并论，也没有理由把辛亥革命比作俄国1905年革命。他认为：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是要最坚决地铲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建立共和政体；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力图扫除阻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种种障碍，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辛亥革命把社会各阶级动员起来了，不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农民（民军和新军的基本力量）也起了重要作用，工人阶级早期的政治发动对攻占汉阳、宜昌和上海也具有重大意义。叶菲莫夫坚决反对西方学者关于辛亥革命具有“非资产阶级性”和主观臆断的所谓独特性的看法，认为，“辛亥革命就其性质而言乃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就群众参加各省队伍的程度而论，却又具有民主主义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③

此外，尼基福罗夫等著名学者提出了与上述观点相近的见解，认为，“辛亥革命具有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是“不彻底的资

① Г.В.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525—526页；С.П.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526页。

② 《殖民地附属国近代史》，莫斯科1940年版，第1卷第643页。

③ Г.В.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354—355页。

产阶级革命”。①

三、辛亥革命的动力

辛亥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历史学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认为，在辛亥革命进程中有三股反清力量，即农民和城市劳动群众的自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和地主自由派的君主立宪运动。但主要动力是“农民（民军和新军的基本力量）、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中小城市资产者”。推翻满清王朝首先是劳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的结果，而决不是“自由主义派活动”和“军事行动”的结果，“假如没有他们坚决和全面的援助，要取得推翻满清王朝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叶菲莫夫、别列兹内依等历史学家完全同意齐赫文斯基的上述看法。③

四、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叶菲莫夫、齐赫文斯基等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革命的先决条件即社会经济条件尚不成熟，即便历史现实把资产阶级革命（就其社会内容而言）提上了日程，革命也难以获胜；二是资产阶级本身的柔弱，又不向人民求援，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一再放弃阵地，一再向袁世凯让步，而无产阶级当时还很弱小，还未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三是资产阶级根本无意彻底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口号在同盟会中没有得到一致的拥护，也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响应），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没有提出

① B. H. 尼基福罗夫：《辛亥革命的先驱》，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82年第2期。

② C. H.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525页。

③ H. A. 别列兹内依、Г. B. 叶菲莫夫：《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著作》，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73年第10期。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惧怕独立的人民运动。^①

总的说来，叶菲莫夫和齐赫文斯基的上述见解概括了苏联史学界的看法。

五、辛亥革命的意义

早在1921年1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就已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②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写道：辛亥革命是“亚洲的觉醒”的最光辉体现，它不仅具有中国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对东方各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蒙古）发生了巨大影响。^③

叶菲莫夫认为，辛亥革命是具有革命纲领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其痕迹是不可磨灭的，“其意义不只局限于推翻满清王朝和建立共和国这一主要实际政治成果，它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11—1913年革命是1925—1927年大革命的准备阶段”。^④

叶菲莫夫教授的这一论断在苏联史学界是富有代表性的。不难看出，苏联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六、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叶菲莫夫、齐赫文斯基、涅波姆宁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和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但

① Г.В.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352页；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511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卷第457页。

③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卷第503页。

④ Г.В.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1年版，第346页。

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在19世纪70—90年代，即在英法帝国主义再次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实行“自强”政策后出现的。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在商业高利贷资本和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基础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于19世纪70—90年代开始形成的。^①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相当缓慢且不稳定，就其性质而言，应该说是地方性的，而非全国性的。它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由松散的、互相来往的阶层、集团混杂与凑合起来的，他们以不同的渊源、类型、场所、宗法、礼教以及其他种种特征聚集在一起，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②

齐赫文斯基指出，1905—1908年是中国工业高涨时期，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成长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各种企业和商行的数量猛增，资金明显增厚。1911年革命前夕的资本家，与1898年维新时期相比，已有显著不同，那些与机器工业及运输业（金融和商业资本的现代化的组织与运用形式）有联系的企业家被提到首要地位。^③

中国资产阶级有哪些阶层，其政治态度又如何呢？

齐赫文斯基等学者认为有三个阶层：大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人数并不多，但在政治上是影响最大的集团，是由一些官僚、买办人物组成的。他们往往在官商合办的工、商、运输企业中投资，也涉足于中外合办企业，在“自强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在为自己的企业从国外购进新式设备和从事进出口贸易中必须通过外国银行和外国办事机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这势必使他们在政治

① P. B. 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7—65页；C. И. 齐赫文斯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的思想体系》，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80年第一期。

② O. E. 涅波姆宁：《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资产阶级》，载《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莫斯科1976年版。

③ C. И.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470—472页。

上主张君主立宪。中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他们大多出身于“绅士”即地主中有学识阶层，拥有出租给农民耕种的少量土地。在华东、华南和华中各省，他们既受秘密会党所领导的反满抗清斗争传统的强烈影响，又受19世纪70—90年代各省反洋教民变的影响，有的参加革命运动，有的则参加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华侨资产阶级是政治上最成熟和最积极的阶层。他们在英、法、荷、美等国以及东南亚从事工商业，拥有一定的资产，竭力为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部分华侨往往在接近暮年时返回故里，从事工商业活动。但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满清政府对外的柔弱无力，挫伤了他们发展祖国资本企业的雄心，因而他们在反对满清王朝斗争中最坚决、最积极。例如，1894年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中，华侨占78%。就其社会地位而言，48%是华侨资产阶级，他们在革命起事过程中起着盟主的作用。^①

苏联历史学家强调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帝反封建要求，既没有要求撤走在华的外国军队、收回关税权、取消外国在华的租界以及废除辛丑和约（这是希望外国列强在革命中保持中立、不支持清政府，避免与列强发生冲突），又没有实施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这一口号，但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客观上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

从总体上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但到底是哪个阶层领导的呢？这在苏联学者中有不同意见。

齐赫文斯基等学者认为，“领导辛亥革命的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阶层”。^②

叶菲莫夫和别列兹内依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这未必符合实际，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革命”的这种提法。因为，农民是民军和新军的基本力量，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成了革命的

^① C. И. 齐赫文斯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的思想体系》，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80年第1期；C. И.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470—473页。

^② C. И.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525页。

重要动力。然而，唤起中国农民进行自觉民主斗争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①

七、革命团体

1. 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是苏联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几乎所有苏联学者都认为，同盟会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中国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进步分子的革命组织。但是，它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与广大农民、城市无产者联系不多，与秘密会党、新军的联系只不过是同农民的部分接触。^②

齐赫文斯基等学者指出，同盟会成员的社会成分非常繁杂，既有怀有反满情绪的地主绅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有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乃至具有反满情绪的青年军官。因此，在最重要的纲领和策略问题上往往缺乏统一的认识，比如在建立民国这一重大问题上，有人主张“开明专制”政体，有人主张把权力集中于“英雄统治者手中，实行独裁，或干脆保留君主制”。^③

苏联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各种文件是根据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写成的。在《民报》等刊物的宣传中，“民族主义”被阐明为推翻外族的满清王朝，消除满汉不平权现象，也就是要求建立汉族占决定地位的主权国家，这一条在同盟会内部是一致赞同的；“民权主义”被阐明为要求废除君主制度，建立民国，这反映了革命阵营中最激进的政治派别的要求，但在同盟会内部遭到部分人的反对；“民生主义”是同盟会的社会纲领，它事实上可归结为“平均地权”的要求，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左翼革

^① Г. В. 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352页。

^② Г. В. 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31、71页。

^③ С. П.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398页。

命民主派提出的，在同盟会内部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①

齐赫文斯基强调指出，同盟会纲领的基本点之一是“民族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往往模糊或压制了社会政治性的要求，有时还带有“大汉族沙文主义色彩”。^②

叶菲莫夫教授给予同盟会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同盟会虽事实上未成为联合、协调各种反清组织的中心和整个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者，但在武装推翻清王朝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同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制主张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在关键的1911年前夕对国内政局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有条不紊地准备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权的主要组织。”^③

2. 华兴会

齐赫文斯基等学者认为：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是主要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满革命组织，其成员大多出身于小地主、绅士、官吏、商人和富裕农民家庭。它的纲领包括两个主要要求：一是推翻满清王朝，二是建立共和国。华兴会虽主张公开武装推翻满清、反对外国侵略，但其社会经济纲领非常模糊，鼓吹资产阶级改革。^④

3. 光复会

苏联历史学家对光复会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叶菲莫夫教授认为，光复会是由进步文化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地主代表人物组成的反满革命组织。^⑤齐赫文斯基等学者认为，光复会是由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和绅士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满组织。它的唯一正

① C. П.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397—399页；Г. В. 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10—13页。

② C. П.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399页。

③ Г. В. 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63页。

④ C. П.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381页。

⑤ Г. В. 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8—9页。

式的纲领性要求是：“恢复中国人的主权，驱逐满清王朝。”^①参加光复会的有三个派别：一是以徐锡麟为代表的代表地主利益的反满团体，他们只满足于“驱逐满人”，在改建共和政体和社会经济改革方面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二是以蔡元培和章太炎为首的较大的反满团体，他们极力主张清朝应由中华民国取代；三是以陶成章和刘光汉为首的狭小团体，他们主张以改革社会经济的计划来补充推翻清朝和建立民国的要求，由于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试图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的传统学说结合起来。^②

除同盟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会值得一提。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大都把自立会看作改良派的左翼，而苏联历史学博士尼基福罗夫坚持与众不同的见解，指出，自立会尽管是打着君主立宪旗号的狭隘知识分子绅士组织，但其宗旨是革命的，“按其革命纲领和革命方式而论，自立会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纵然这个组织的纲领比兴中会稳健些，但站在它旗帜下的已不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华侨资产者，而是广大内地知识分子，最后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必然是这些人。1900年夏，一切反满志士翘首以待、寄以重望的不是兴中会，而是自立会。^③

八、人物评价

1. 关于孙中山

在苏联，人物研究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相当活跃的课题，孙中山研究更是热门中的热门。

早在1912年，列宁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中国党派的斗争》等著作，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

① B. H. 尼基福罗夫：《中国首批革命家》，莫斯科1980年版，第134期。

② C. H.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385页。

③ 同上。

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赞扬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①

苏联历史学家的趋同看法是：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前是拥护维新的改良派人士，在1903—1905年间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体系，是摸索前进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的某些理论虽含有空想主义成分，但他还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孙中山不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没有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但他仍然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②

苏联学者A. A.阿鲁道夫指出，孙中山的思想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他对社会进步的构想作了根本性的修改，使“三民主义”的社会内容有所改变并进一步革命化。^③

季塔连科认为，墨子的“兼爱”思想、孔子的“大同”思想、西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美国社会学家亨利·乔治的理论，对孙中山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④

也有个别苏联学者根据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论述把孙中山说成是民粹主义者，但这种观点越来越遭到异议。^⑤

齐赫文斯基院士等认为，孙中山的哲学理论是“知难行易”说。孙中山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二元论：自发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

①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424页。

② Г. В.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357—358页。

③ A. A.阿鲁道夫：《纪念孙中山12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载苏联《远东问题》，1987年第1期。

④ A. A.阿鲁道夫：《纪念孙中山12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载苏联《远东问题》，1987年第1期。

⑤ Г. С.卡拉-穆尔扎：《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探讨》，载苏联《中国问题》杂志，1931年第6—7期。

素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兼而有之。他的观点包含有进步思想。尽管他基本上仍未摆脱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但承认真理的可知性、人类改造世界和社会的能动作用、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行动的积极作用，并对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有一定的批判。①

苏联学者对孙中山的学说——三民主义论述颇多。在20—30年代，他们围绕这个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看法极不一致。有的学者，如达林、勃扎诺夫、安东诺夫、拉狄克等认为，“孙中山的学说是反映劳苦大众对资本主义憎恶情绪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过高估计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及其学说的历史意义；另有学者，如艾森什塔特、罗易等则认为，“孙中山的学说是自由派大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竭力贬低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及其学说的历史意义。②

齐赫文斯基、叶菲莫夫、卡拉—穆尔扎等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孙中山的学说是中国革命最初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是主张“美国式资本主义”而不是“普鲁士式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指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一开始是要求推翻满清王朝，反对满汉不平权（但不主张毫无例外地对全体满族人进行报复），最后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民权主义一开始要求建立民国，后来发展为统一国家。即反对中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结束军阀割据局面；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学说，在三位一体的学说中占主导地位，它在形式上包含两个内容：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是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国家垄断来抗衡外国资本；平均地权就是通过照价收买土地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并不是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也不是要求消灭地主土地所

① C. П.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373—374页。

② F. C. 卡拉—穆尔扎：《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探讨》，载苏联《中国问题》杂志，1931年第6—7期。

有制。①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于1986年10月召开了《纪念孙中山12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苏联学者A. A. 沃洛霍娃建议：“对孙中山思想中传统成分与新成分的关系问题，孙中山的人道主义问题，三民主义的革命化问题，应作进一步研究。”②

2. 关于黄兴

苏联历史学家对黄兴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功勋卓著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他曾多次建议吸收袁世凯入同盟会，极力主张把他拉到自己的党派一边。这一事实从阶级对抗的观点看难以解释，因而在苏联历史学家的论著中对黄兴的思想极少论述，往往避而不谈。③

3. 关于章太炎

苏联学者大都认为：章太炎是地主阶级反满派，反对建立代议制，幻想中国有个好皇帝，主张把全部权力集中于“英雄统治者”手中，或干脆保留君主制度。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具有沙文主义性质，是从民族血仇的观点反对满清，是以纯种族的思想鼓动革命的。④

4. 关于其他人物

苏联历史学家尼基福罗夫对陈天华、邹容和 杨守仁颇有研究。他认为：这三人是始终不渝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虽显示了为祖国牺牲自我的精神，但他们的爱国主义掺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

① C. П.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0年，第396—393页；Г. B. 叶菲莫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中山（1911—1913）——事实与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9—19页；Г. С. 卡拉-穆尔扎：《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探讨》，载苏联《中国问题》杂志，1931年第6—7期。

② A. A. 阿鲁道夫：《纪念孙中山12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载苏联《远东问题》，1987年第1期。

③ E. Ю. 斯塔布洛娃：《谈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前景》，载《中国研究新成果（论文集）》，莫斯科1988年版。

④ C. П. 齐赫文斯基：《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辛亥革命的思想体系》，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80年第1期；A. Г. 克雷莫夫：《中国的社会思想及意识形态斗争（1900—1911）》，莫斯科1972年版，第123页。

和沙文主义。他们通常缺乏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是民族主义的旗手。^①

研究前景

从以上很不全面的简单介绍中不难看出，苏联历史学家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目前，如上所述，他们正面临着很难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困境。历史学副博士E. IO. 斯塔布洛娃毫不隐讳地指出：苏联史学界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许多问题的剖析还不够透彻，因为从一开始起，在苏联便形成了围绕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来描述1911—1913年中国政治史的模式。^②她觉得，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时期（由君主专制转为袁世凯专政，尔后袁世凯在政治上垮台），它是“既为中国的过去所决定，又与中国的未来相关联而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时期”。^③她指出，苏联历史学家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仍有着广阔的天地：首先，对“觉醒时期”直接起过影响的活动家的“生平事迹尚欠深入的研究，对他们的思想探索知之甚少”；其次，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心理几乎未展开研究，然而，中国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人的“行为模式”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④

苏联历史学副博士O. E. 涅波姆宁指出，研究包括辛亥革命时期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最好首先深入研究“中国停滞不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进一步阐明

① B. H. 尼基福罗夫：《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载苏联《历史问题》，1982年第6期。

② E. IO. 斯塔布洛娃：《谈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前景》，载《中国研究新成果（论文集）》，莫斯科1988年版。

③ 同上页注②。

④ E. IO. 斯塔布洛娃：《谈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前景》，载《中国研究新成果（论文集）》，莫斯科1988年版。

⑤ 同上。

辛亥革命的实质，因为，第一，历史学家无须夸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第二，可以更确切地阐明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自身特点。^④

总之，苏联史学界普遍认为，“必须重新研究辛亥革命史。无论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具体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均应作全面深入的探讨，重新分析业已掌握的东西和文献中未曾记载的东西”。^⑤

60年代以来，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长期恶化，苏联历史学家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某些观点难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这势必损害他们的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

笔者深信，在中苏两国关系转入正常化的今天，苏联历史学家必将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观点，重新全面、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史，并推出更富于学术价值的新著。

吴永清

^④ 同上。

英国殖民地档案中 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

一、乙未广州之役史料

署理助理辅政司巴德利先生备忘录^①

1. 1895年10月初，香港警方得到情报，臭名昭著的三合会组织某些成员正在本殖民地招兵买马，准备参加广西省起事。尽管进行过调查，对所说起事，未能发现任何进一步的情况。

2. 10月27日，香港警察部队斯坦顿警官获悉，大约400人在本殖民地被招募为兵勇，准备当晚乘省港定期班轮保安轮赴广州。斯坦顿当即将此情报电话通知警察司，并亲往该轮停泊处调查。他在码头发现大约600名苦力。他们皆来自最贫苦的阶级，因无钱交付赴广州的船费，已被赶下轮船。经盘问，苦力们供述，他们是朱和(音)代沙宜洋行买办替政府招募的兵勇，每月饷银拾元。^②他们要去广西西江上的梧州。前两日每人已得到伙食费伍仙，并答应再发给每人路费壹元。

3. 盘问期间，朱和在两个人陪同下抵达码头。此二人每人皆携带银元一袋，声称他们共携有900元，系沙宜洋行买办杨衢云给予，要发给每名招勇路费壹元。

4. 此时，一队警员奉警察司命令赶来，对轮船和招勇进行搜

^① 此文件系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1896年3月11日致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信函的附件，原载英国殖民地档案C.O.129/271，第441—445页。

^② 朱和，原文为Chu Ho，可能是朱贵全之别名或化名。——译者

查，检查是否带有武器，准备拘捕所有私自携带武器者。搜索结果，一无所获。

5. 保安轮船主被告知，此批意欲登轮的乘客是招勇。但他回答说，只要他们交付船费，他并不计较登船人数。那900元钱已交给该轮买办，待轮船起航后，即分发给所谓招勇。大约400人，包括朱和在内，已登轮前往广州。

6. 当晚10时，斯坦顿警官获悉，沙宜洋行买办在香港同德号购买大批武器，当晚已由保安轮运往广州。经调查证实，确有沙宜洋行职员杨衢云在该商号购买大批武器一事。斯坦顿将此事报告警察司，该司立即电告英国驻广州领事，并通知了九龙海关当局。

7. 次日，斯坦顿警官从一个名叫苏聚（音）者那里获得情报。之前，朱和曾请该人帮助中国政府招募兵勇，条件是每月饷银拾元。苏表示同意，并答应将他本人亦列入名单。直至10月27日下午3时在皇后道184号与朱和会面时，他才知道招勇的真正目的是向广州的满人发起攻击，到时将有3,000名织布工在广州参加行动，另有2,000名同伙从澳门赶来。他当即领到一条红色佩带作为识别标志，还有一个口哨。他还获知，口令是“除暴”和“安良”。另外，一批左轮手枪已由保安轮运走。了解事实真相以后，苏聚拒绝继续参与其事。

8. 一名华人警长当晚亦是保安轮乘客。他返港后报告说：两名苦力向他透露，轮船离开香港以后，朱和告诉他们船上藏有左轮手枪，待轮船抵达广州即行分发，一旦首领下令即加以使用。听到此事后，许多招勇表示，他们是政府招募的兵勇，决不参加执行刚才向他们披露的计划。

9. 该警长及另一名乘客将此事告诉一华人堂倌，要求他向大副报告，但此人拒绝照办。

10. 黎明时分，该警长看见有人从买办舱房取出两把刀交给朱和。

11. 轮船甫抵广州，朱和及其他首领即迅速登岸潜逃。显然，他们发现阴谋完全败露，便抛弃那批苦力遁去。

12. 当时在码头上迎候此船的兵勇人数与平时无异。约50名苦力申诉说，他们是政府招募的兵勇，愿听候指令。他们遂被带去见缉捕管带李家焯。大概直至此时中国当局才知悉该船运送武器之事。如果他们早知此事，定会派遣大批军队登船搜查。这批武器其后在别处起获。

13. 杨衢云将这批左轮手枪装在5个水泥桶内，交经常代客运送货物、行李的广兴源栈，当作美国波特兰水泥航运。10月28日，该栈东主收到广州当局来电，通知他这批水泥桶内藏有武器，已将其在广州的合伙人拘捕，并要求该东主通知香港警察，惩处寄货人。

14. 11月1日，两广总督通过英国领事请求引渡5名被指控为主谋者的人。香港总督以他们是政治犯为由，拒绝考虑此项要求。

15. 参与此事人员的姓名前已提及：

(1) 杨衢云，香港出生，故为英国臣民，系沙宣洋行职员。据报告，他已前往檀香山。

(2) 朱和，曾在香港任轮船合伙人数年。据说，他曾在虎门炮台秦将军部下任小军官，后在梧州听说过此人。

16. 据信为该组织筹集经费的骨干人物是孙文，或称孙逸仙。他生于美国，曾是香港雅丽氏医院学生。10月31日，他从汇丰银行取款300元，然后发现其进入皇后道一所屋宇，可能从后门遁去。从此在本殖民地再未见到他。据说，他已前往檀香山。

署理助理辅政司 巴德利

孙中山致骆克函^①

亲爱的骆克先生：

据某些可靠消息说，由于我试图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

^① 骆克 (J.H. Stewart Lockhart)，又译为骆任廷，任香港政府辅政司。原作为英文，未署明日期，载C.O.129/283，第136页。——译者

救受难同胞，香港政府已宣布将我驱逐出境。我询问过伦敦的英国朋友，情况是否属实。他们认为如此处理并不符合英国法律和惯例。但我在香港的中国朋友对此问题给予肯定答复。请先生告诉我，此事是否属实。果真如此，我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

永远忠实于你的孙逸仙（签名）

于日本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

骆克致孙中山函^①

先生：

顷接未注明日期之来函，兹奉命函复先生如下：本政府不愿容许任何人将英属香港殖民地作为避难所，阴谋策划危害一个友好邻国的行动。鉴于先生参加来函婉转称之为“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的这类行动，如果你对1896年的驱逐令置之不顾，足履本殖民地，定会将你加以逮捕。谨此奉复。

辅政司 骆克（签名）

1897年10月4日于香港辅政司署

二、庚子惠州之役史料

江亚二供词^②

我是西路新安县大埔涌本地人，受雇监视新安乱党活动。闰八月初八（1900年10月1日），我离开香港前往沙鱼涌，与郑士良同行。他是客家人，曾在香港当师爷。他懂得多种语言，到处漫游。他和黄福是首领。我原在山打根。郑士良给在山打根的黄福、黄公喜拍去电报，招他们回来，并要带我同行。他们意在举旗作乱。我是回国人员之一。我刚刚到达即看见了郑士良。我是

① 原载C.O.129/283，第137页。——译者

② 原载C.O.129/301，第516—523页。——译者

三合会成员。我刚到时还看见了杨衢云。他负责军事行动。与我同去沙鱼涌的有黄福、何祥、黄习、郑士良、何寿、吴培，大概有10人。闰八月初六（9月29日）郑士良把400箱炸药、300枝毛瑟枪、40箱子弹装到一条船上。闰八月初七（9月30日），黄公喜等7人被警察拘捕。此事使情况为之一变。因无人照看船只，致使该船失踪。

闰八月初十（10月3日），我们由沙鱼涌抵达马笼头山。那里约有2,000人，其中大约75%是归善、惠州、博罗和海丰（附）的客家人。所用平底船来自南海、番禺、东莞、新安、顺德、香山、新会。黄福任总兵大元帅，何祥任二元帅，黄公喜为左先锋。李跛谭统带归善岩灶背之200人。李波统带中营，有500人。我本人归郑士良和黄福指挥，统带100人。所有在马笼头山集合者，俱为三合会之人。

闰八月十二日（10月5日），队伍开往三州田。当地村民支持我们，大约100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十三日（10月6日）晨，我们抵达沙湾墟。那里大概驻有50名清军，归何长清指挥。战斗中，大约10名勇丁被打死，其余皆受伤。乱党死亡2人。清军所有武器皆被缴获。沙湾民众拒绝帮助任何一方。沙湾之战发生在上午7时。当日我们又前往横冈，并在那里用饭。沙湾与横冈之间的村民未出来帮助我们，我们亦未打扰他们。我们在横冈用过早饭，即动身前往龙江，并在那里过夜。横冈和龙江之间的村民纷纷逃散，但乱党并未干涉他们。当晚，我们一到龙江即与一支大约1,000人的队伍会合。我们的队伍最初大约4,000人，现在增加到5,000人。龙江这1,000人的首领叫陈廷，是归善当地人，曾在台湾当军官。

十四日（10月7日）晨，我们开往佛祖凹新墟。在龙江与我们会合的1,000人即龙江和新墟之间的村民。当晚我们在新墟过夜。十五日（10月8日）晨，我们穿过清军防线，并与之交战。20名勇丁被打死，一些勇丁受伤，15名勇丁被俘，11名被黄福、

郑士良下令斩首。乱党还缴获60枝步枪、6匹马和许多旗帜，他们自己却毫无损失。我们由新墟向平坦(潭)前进。大约三、四百名村民与我们作对，占据了許多隘口。乱党从背后绕过他们，他们只得逃走。乱党焚毁了新墟和平坦(潭)之间的20个小村庄。所有妇女皆逃往山丘地带。没有任何村民被杀害。我们在平坦(潭)停留了两夜。

十七日(10月10日)，我们由平坦(潭)动身前往白芒花，于十九日(10月12日)抵达该地。当地村民赠饼备茶、携带猪肉慰劳我们。乱党皆付钱给他们。乱党未抢劫任何东西。这些村民没有参加我们的队伍，因为当地许多村民早已在马笼头山加入我们的队伍。十九、二十日(10月12、13日)，我们在白芒花停留，二十一日(14日)向三角湖开进。我们穿过清军刘军门、莫善积部下1,500人的防线。大约200名勇丁被打死，200名勇丁淹死在河中。乱党死亡5人。我们缴获大约500枝枪、500箱弹药、17匹马和一些旗帜、铜锣。清军朝20里外的惠州撤去。清军勇丁被俘42人，多金头之子、归善县丞亦被俘，他随即被放。^①18名勇丁被斩首，他们皆是湘勇。未斩首者是惠州人。他们被剪去辫子，充当挑夫。

二十三日(10月15日)我们开往杨花墟，并于次日晚抵达该地。杨发仔在三角湖率300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他是归善上洋墟当地人。三角湖和杨花墟之间的村民为我们提供给养。奉郑士良、黄福和何祥命令，19名勇丁在杨花墟被处死。二十五日(10月17日)，我们动身前往坪冈墟，并于次日晨抵达该地。二十七日(10月19日)，我们到达三多祝。我们焚毁了肖村。该村居民有3,000人，皆与我们作对。该村筑有围墙，乱党强行攻进该村，死亡12人。村民死亡百余人，房屋被烧200间。发生了洗劫之事。乱党拿走该村万余元和许多贵重物品。我与作战的人不在一起，未

^① 与其他中文史料对照，此处说的是归善县丞杜凤梧，他是清军军务会办刘邦盛义子，多金头可能是刘邦盛的绰号。——译者

参加洗劫。我统带的100人是郑士良的保镖。此次还缴获300支旧步枪、四匹马。

二十八日(10月20日)，大约三、四千名清军由广州赶来。战斗于当天上午10时开始，延续两小时，直到中午。乱党初战失利。清军的炮弹使他们招架不住。但他们又重整队伍，一直坚持到下午5时，才被迫撤往三多祝。此次战斗发生在离三多祝二、三里之处。勇丁死亡200人，乱党死亡30人。乱党处于隐蔽之地，清军处于暴露之地，因而清军损失惨重。乱党因缺乏弹药才被迫撤离。他们约计5,000人，拥有步枪，但无大炮。清军既有步枪，又有大炮。此次无人被俘，但有乱党一、二百人携带赃物逃往几个小村庄，试图溜走，被村民抓获处死。乱党被赶回三多祝，引起一片惊慌。许多首领逃走，部众离散。大约3,000名乱党分子撤往七石，数千乱党分子正在那里等候增援三多祝的乱党。听到在三多祝战败的消息后，七石的乱党并未前往救援。七石在海丰县境内。当时大约有8,000名乱党分子聚集在七石、公平和稔山附近。这些地方皆在海丰县境内。二十八日(10月20日)晚，清军撤往白芒花。次日，清军听说乱党撤离后，又向前推进，并开始屠杀三多祝附近的村民。这些村民最初帮助乱党，但当看出何方可能取胜之后，他们即站在强者一边。清军知道这些村民曾协助乱党洗劫肖村，决意惩办他们。一百余名村民被处死，村民们于是对清军进行了抵抗。

我不知道，二十九日(10月21日)晨当我们抵达距三多祝10里的双金墟时，发生了什么事。我与黄福、郑士良和其他一些人同行。我们经过海丰、归善赶到海边。我们在盐州江乘帆船前往香港。黄福、何祥和我同乘一只船，郑士良乘另一只船。我于11月2日到达香港，黄福和其他一些人则继续前往澳门。黄福和其他6人曾被香港警察拘捕，是中国日报社的人延聘律师才使他们获释。乱党打算再组织一支队伍进行活动。孙中山正在澳门。这是郑士良对我所说的，孙中山要杨衢云将返港人员聚集起来。

大约四、五百名乱党分子回到香港。他们大部分在土瓜湾、九龙城、深水埗和油麻地，多半是客家人。杨衢云付钱给他们。我每月20两银子，我的部下每月10元。我那100人已经分散。

八月十五日(9月8日)，三合会众曾试图在本港玩火龙利用此机会进行洗劫。他们察觉当局已有充分准备，便取消此种打算。他们原计划放火焚烧一些屋宇，然后趁乱洗劫。这一想法是郑士良、杨衢云和黄福提出的，黄福负责执行。郑士良和杨衢云告诉我不必担心，如果违法行为是政治性的，香港当局不能处治我们。他们还说，已经聘请了律师，当我们遇到麻烦时，会得到保护。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如果被捕，律师会使我们获释。

以上供词系1900年11月7日向我供述的。

辅政司 骆克(签名)

刘蜀永译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宋庆龄

藤井昇三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从19世纪末经过约30年的革命运动，为了达到对内的民主统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以毕生的精力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战斗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孙中山在其30年的革命运动中，在初期，为了推翻清朝专制制度、团结国内革命力量，发动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而达到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的主要目标，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辛亥革命后，为反对封建军阀势力而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革命；为建设民主的中国而奋斗；进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总结五四运动的宝贵经验，组织了中国国民党，积极进行了国内民主势力的宣传与组织，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下，制定了新的革命路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在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同时，提出了当前两个目标：一是在国内为了使以民众力量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获得成功，提议召开国民会议；二是要求废除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半殖民地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实现国内民主统一不可缺少的前提，而不平等条约也是外国对中国统一的重大障碍。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最好助手

1925年3月，孙中山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中因肝癌不治逝世，上述两个当前目标没能实现。然而，孙中山的理想由国内各民主力量予以继承并加以发展。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则始终一贯地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政治理想，继续贯彻孙中山的主张。

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热心合作者宋嘉树的次女，她在美国留学时关心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回国后，宋庆龄在梅屋庄吉夫妇一心一意的帮助下，于1915年10月在东京与因第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结婚。此后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10年间，宋庆龄在革命运动的最困难时期不仅是孙中山的贤慧的妻子，而且以最理解孙中山的同志、以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多次不顾生命危险的最可信赖的战友身份，与孙中山战斗在一起。在孙中山逝世后长达56年的时期中，尽管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国共内战时期，宋庆龄始终坚持孙中山的建设民主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政治目标，直至1981年5月逝世。

孙中山与宋庆龄是近现代中国激烈革命与战争时期中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少有的志气高尚的革命家、政治家。他们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中山在30年革命运动中几次犯了政治判断的错误，这是不能加以否定的事实。例如，对帝国主义认识不足，等等。但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其理想、主张与行动中始终表现出对祖国与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信念，这一点必须大书特书。这正是中国同时代政治家、思想家以及军人几乎所不具备的。

日本人民对孙中山的援助

援助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日本官员及民间人士很多，他们在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中同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产生了共鸣；而没有私心、不惜一切地给予合作援助的日本人，则为数极少。梅屋庄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就是这少数的、例外的日本人的代表。尤其是梅屋庄吉，他于1895年1月在香港与孙中山第一次相会以后，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对其革命运动，不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诚心诚意地给予积极的援助，这些事直至现在几乎鲜为人知。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

在日本，关于梅屋援助孙中山的事迹，人们最早是从1975年出版的车田让治著的《国父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一个为中国而献身的日本人》一书中得知。1979年此书再版时改名为《孙先生，进行您的革命吧！》（副标题是：“一个为国父孙中山而献身的日本人”）。

梅屋庄吉的孙女小坂主和子女士是日比谷松本楼经理小坂哲郎先生的夫人。小坂家收藏了梅屋的文书和照片等珍贵资料。由于小坂夫妇的好意与帮助，这些资料现已交给梅屋资料研究会整理和编辑。

梅屋援助孙中山的两大功绩

梅屋庄吉在援助孙中山进行革命中值得称颂的第一点是，梅屋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理想，他与夫人一起从精神上对孙中山表示支持；同时还把电影等事业的许多收益用以援助孙中山

进行革命运动。不仅如此，他还从经济上援助孙中山在日本的支持者如宫崎滔天等人。这些事情应该在中日关系史上加以歌颂。

梅屋援助孙中山的第二个功绩是，他为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立了大功。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由于梅屋夫妇的极大努力，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这一来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得到了新的强有力的同伴。

孙中山逝世后仍然致力 于日中友好事业

梅屋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给予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援助。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仍以不同方式继续给予援助。最主要的就是制作了四个孙中山铜像，1929年以后安放在南京、广州等地。此外，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后的第二至第三年，为了早日结束日本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他同蒋介石等人进行了通信联系，以增进同中国政府首脑间的“谅解工作”。这件事反映了晚年的梅屋对日中友好倾注的热情。尽管如此，梅屋这一行动却成了问题，被认为有间谍嫌疑，经历了宪兵队抄家、传唤、拘留等一系列悲惨遭遇。但梅屋在这种无理弹压之后终于获得释放，他为实现日中和平而努力的热情没有因此而削弱。他上书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要求商谈。1934年11月，梅屋应广田外相电召带病赴京，途中在千叶县三门车站月台病倒，不久便逝世了。

隐姓埋名的真正的孙中山事业的资助者

梅屋奉献自己的家产以援助孙中山，并对当时日本政客为私利而奔走表示愤慨。梅屋在援助时总是避免用自己的名字，始终当一名无名的资助者。据说梅屋写下这样一句话：“孙中山是我

的盟友、亡友，现在也是我的老师。”这句话比什么都更加雄辩地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真正友情。

译自《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梅屋庄吉资料研究会1989年版。

齐福霖译

1979—1989年国外出版 辛亥革命史论著书目索引

英 文 部 分 论 文

Zarrow, Peter;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r. essa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88 No. 20 p. 51—61

辛亥革命 扎罗

Mumford, Richard L. Crane Brinton' s Pat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1 Vol. 42 No. 4 p. 707—722

布林顿模式与中国辛亥革命 芒福德

Hsueh, Chün-tu; New aspect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3 Vol. 16 No. 3—4 p. 5—35

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些新问题 薛君度

Tikhvinsky, S.; The Great October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Far Eastern Affairs, 1982 No. 2 p. 11—20

伟大的十月与中国的革命运动（注：从辛亥革命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齐赫文斯基

Elvin, Mark;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Shanghai.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84 No. 29 p. 119—161

辛亥革命在上海 埃尔文

Tikhvinsky, 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80 No. 3 p. 56—66

辛亥革命中民族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齐赫文斯基（注：

译文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

Chan, Jerom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in 1911,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6 No. 19

Chan, Jerome, tr. With an introduction;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in 1911, essays b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at the
Wuhan conference on the 1911 Revolution, Oct. 12—14, 1981. Chi-
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4 Vol. 17 No. 4 p. 3—111

1911年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武汉辛亥革命学
术讨论会文集序言 陈志让

Ho, Hon-wai; A final attempt at financial centralis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85 No. 32
p. 9—56

晚清对财政中央集权的最后尝试 何宏伟

高慕轲 (Michael Gasster) 著，卿斯美译：辛亥革命再探讨，第2560
—2577页。

路康乐 (Edward Rhoads) 著，孙毓棠译：清政府对武昌起义的反应
——最初三周，第2631—2640页。

以上两文均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
局1983年版。

Dirlik, Arif; Vision and revolution; anarchism in Chinese revo-
lutionary thought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986 No. 12 p. 123—165

幻想与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革命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 德立克

Tuan, Pei-lung;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1896—1911,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1985, vol. 10 No. 1 p. 38—56

中国留日学生 (1896—1911) 段培龙

启迹：中国留日学运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第2600—2615页。

任以都 (E-Tu Sun Zen)：辛亥革命时代国内教育界动态，第2641—
2659页。

以上两文均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
书局1983年版。

Yen, Ching-hwang;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79 No. 19 p. 55—89

华侨与辛亥革命 颜清煌

Yen, Ching-hwa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6 p. 397—425

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 颜清煌

Yen, Ching-hwang, Ching Changing imag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1844—1912)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1 Vol. 15 No. 2 p. 261—285

清代华侨形象的演变 (1844—1912) 颜清煌

Rong Tie-sheng,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3 Vol. 16 No. 3—4, p. 159—200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妇女运动 荣铁生

Fung, Edmund S. k.,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army, 1911—1913.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79 No. 19 p. 13—53

辛亥革命与中国陆军 冯兆基

Metallo, Michael V.,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1981 Vol. 62 p. 153—168

长老会传教士与辛亥革命 米塔罗

Shum, K. K., Japan's attitudes towar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80 No. 21 p. 123—151

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 舒姆

Sigel, Louis T., Revolution by diplomac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hanghai Peace Conference of 1911.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79 No. 19 p. 111—143

外交革命, 1911年上海和会的再考察 西格尔

Junji, Banno, The Japanese Army's China policy from 1911. Split or division of labour?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79, No. 19 p. 165—179

1911年以来日军的对华政策, 坂野恂二

Marius B. Jansen,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 载于 Eto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e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nterpretive essays, univ. of Tokyo press, 1984 p. 257—267

辛亥革命与美国的东亚政策 詹逊

Fincher, John, Introducing the actors and environment of China's 1911 Revolutio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79 No. 19 p. 1—12

辛亥革命时期人物及背景介绍 傅因彻

Wong, J. Y., Three visionaries in exile: Yung Wing, K'ang Yu-wei and Sun Yat-sen, 1894—1911,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6 Vol. 20 No. 1 p. 1—31

容闳、康有为和孙中山：三位流亡国外的空想家，1894—1911年
黄宇和

Chan, F. Gilbert,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in transition, Sun Yat-sen and his comrades, 1905—1925, Asian Profile, 1980 Vol. 8 No. 1 p. 11—24

过渡时期的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1905—1925年 陈福霖

Chan, F. Gilbert, An alternative to Kuomintang-Communist Collaboration, Sun Yat-sen and Hong Kong, Jan.—June, 1923, Modern Asian Studies, 1979 Vol. 13 No. 1 p. 127—139

国共合作以外：孙中山与香港 陈福霖

Godley, Michael 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un Yat-s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7 Vol. 18 p. 109—125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与中国的发展 戈德利

Chan, F. Gilbert,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ree new biographies,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1982 Vol. 9 No. 2 p. 319—322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三本新传记 陈福霖

Huang, Chi-lu, Dr. Sun Yat-sen and Hong Kong, Sino-Ameri-

can Relations, 1984 Vol. 10 No. 3 p. 44—47

孙逸仙博士与香港 黄季陆

Gregor, A. James and Chang, Maria Hsia, Essays on Sun Yat-se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Occasional pape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1983 No. 1 p. 1—54

孙中山与台湾经济发展论集 格雷戈尔和张夏玛丽

Rosenthal, Herbert H., Sun Yat-sen and Henry George, a reassessmen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85 Vol. 11 No. 2 p. 37—63

孙中山和亨利·乔治再评价 罗森塔尔

Ng Lun Mgai-Alice, The Hong Kong origins of Dr. Sun Yat-sen's address to Li Hung-Cha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1981 No. 21 p. 168—178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有关香港问题的起源 吴伦霓霞

Chan, F. Gilbert, Sun Yat-sen and Revolutionary Alliances, 1903—1907 and 1922—1925; a comparative study. 见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n Studies, 1979 p. 25—35

孙中山及其两次革命联盟的比较研究 陈福霖

Gregor, A. James and Chang, Maria Hsia, Sun Yat-sen, dependency theory,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84 Vol. 3 No. 4 p. 61—80

孙中山, 从属地理论和台湾经济史 格雷戈尔和张夏玛丽

Mamayeva, N., Sun Yat-sen's political Programme. Far Eastern Affairs, 1986 No. 2 p. 82—95

孙中山的政治纲领 玛玛耶娃

Young, John Dragon, Reform versus revolution; a reappraisal of Sun Yat-sen's early thoughts on national Salvation.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1985 Vol. 16 p. 133—145

改良与革命: 孙中山早期救国思想再评价 扬格

Ng Lun Ngai-Alice;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Hong Kong in the Shaping of Sun Yat-sen's early political thought,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1985 Vol. 16 p. 111—131

香港对孙中山早年政治思想形成的作用 吴伦霓霞

Titarenko, M., Sun Yat-Sen on Social progress, *Far Eastern Affairs*, 1987 No. 3 p. 125—126

孙中山论社会发展 季塔连科

Chan, F. Gilbert; From anti-Manchuism to anti-imperialism, Sun Yat-Sen's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Canada Revei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1980 No. 7 p. 245—258

从反满到反帝：孙中山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解释 陈福霖

Gregor, A. James and Chang Maria Hsia; Marxism, Sun Yat-Sen, and the concept of "imperialism", *Pacific Affairs*, 1982 Vol. 55 No. 1 p. 54—79

马克思主义、孙中山与“帝国主义”概念 格雷戈尔和张夏玛丽

Gregor, A. James and Chang Maria Hsia; Nazionalfascismo and the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of Sun Yat-S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9 Vol. 39 p. 21—38

孙中山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和革命族民主义 格雷戈尔和张夏玛丽

Gregor, A. James and Chang Maria Hsia; Wang Yang-ming and the ideology of Sun Yat-sen, *Review of Politics*, 1980 Vol. 42 No. 3 p. 388—404.

王阳明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 格雷戈尔和张夏玛丽

Sheng, C. L.;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Dr. Sun Yat-sen philosophy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hinese Culture*, 1984 Vol. 25 p. 45—64

孙逸仙博士民生哲学新释 盛（音）

Edmonds, Richard Louis; The legacy of Sun Yat-Sen's railway plans, *The China Quarterly*, 1987 No. 111 p. 421—443

孙中山的铁路计划遗产 埃德蒙兹

Chang Chung-tung; Dr. Sun Yat-sen's principles of livelihood

and American progressivism.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2
Vol. 15 No. 3—4 p. 4—19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美国的进步主义 张仲通

Tikhvinsky, S.: Sun Yat-sen—a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ary democrat and a friend of the Soviet Union. *Far Eastern Affairs*, 1985 No. 3 p. 107—113

孙中山——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者和苏联人民的朋友 齐赫文斯基

Chan, F. Gilber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fro-Asian national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sian Profile*, 1982 Vol. 10 No. 2 p. 209—219

美国革命和亚非民族主义的觉醒，附孙中山和中国经验的专题介绍
陈福霖

From Sun Yat-sen's correspondence. *Historical records. Far Eastern Affairs*, 1987 No. 2 p. 102—103

孙中山通信中的历史档案

史扶邻 (Harold Z. Schiffrin): 近50年来美国的孙中山研究叙录
第662—679页

黄宇和 (Wong, John Y.): 孙中山伦敦蒙难研究述评 第474—500页

陈福霖 (Chan, F. Gilbert): 评述有关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的重要著作
第392—407页

以上三文均载于《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

史扶邻：孙中山之世界政治家角色 第204—211页

李又宁 (Li Yu—lin): 孙中山与清末民元的妇女运动 第250—264页

林迈可：认识孙中山 第380—390页

葛立格：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与乔学治说的关联 第391—409页

以上4篇文章均载于《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1册

Mirovitskaya, R.: Song Qingling, prominent public figure. *Far*

Eastern Affairs, 1986 No. 4 p. 110—113

宋庆龄, 杰出的政府要人 米罗维茨卡娅

Hsueh, Chün-tu, An essay on Huang Hsing, with a commentar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3 Vol. 16 No. 3—4 p. 36—77

论黄兴, 兼评辛亥革命 薛君度

Sun, Warren, Chang Ping-lin and his political thought.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85 No. 32 p. 57—69

章炳麟及其政治思想 孙华伦

Korovyakovsky, P.: Zhang Tai-lei, a trail-blaz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or his 90th anniversary). Far Eastern Affairs, 1988 No. 5 p. 104—111

张太雷, 中国革命的开拓者 科罗维亚科夫斯基

Lin Ming-te, Yuan Shih—k'ai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Bulletin Institute Modern History, Academic Sinica, 1982 No. 11 p. 347—361.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林明特 (音)

Don G. Price, Anti—imperialism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revolutionary thought of Song Jiao-ren, 载于 Eto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 of Tokyo press, 1984 p. 61—83

宋教仁革命思想中的反帝与人民抵抗 普莱斯

Casster, Michael, Recent stud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by historia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4 Vol. 12 No. 2 p. 30—4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近况 加斯特

The conference to commemorate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note and comments. Pacific Affairs, 1982 Vol. 55 No. 3 p. 472—476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 记录和评论 拉瑞

Arunov, V.,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nce on 120th anniversary of sun Yat-Sen's birth. Far Eastern Affairs, 1987 No. 2

p.142--145

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阿鲁诺夫

Laingen, Penne; Letters of an American teacher in China, 1910—1913. Manuscripts, 1987 Vol. 39 No. 3 p. 189—202

一位在华美国教师的书信集, 1910—1913年 兰根

Fairbank, John K. and Liu Kwang-ching,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Part 2.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0 754p.

Rev. by Rowe, William T.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 93 p. 167—168

剑桥中国史, 卷11, 晚清, 第二部分 费正清和刘广京合编 书评者 罗

Scalapino, Robert A and Yu, George T.; 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 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1850—1920.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ess, 1985 814p.

Rev. by Smith, Richard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7 Vol. 46 No. 1 p. 131—132

Rev. by Eastma, Lloyd 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7 Vol. 92 No. 1 p. 191—192

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 向传统秩序的不断挑战, 1850—1920年, 施乐伯和于之乔 书评者 史密斯 易劳逸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ambridge Univ. Pr., 1984 237p.

Rev. by Harrison, James P.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6 Vol. 20 No. 1 p. 105—106

中国历史的发现: 美国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科恩 书评者: 哈里森

Chan, F. Jerome; The role of Chinese bourgeoisie in 1911, part 3; essays b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at the Wuhan conference on the 1911 Revolution, 12—14 Oct., 1981, New York. 95p.

Rev. by Henriot, Christia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7 No. 110

p.316—317

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武汉辛亥革命讨论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论文集（之三） 陈志让 书评者 亨里厄德

Fogel, Joshua A., ed. & tr., Recent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special issu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18 No. 1—2, New York: M. E. Sharpe 1984 235 p.

Rev. by Johnson, Chalmers, The China Quarterly, 1986 No. 106 p. 361

新近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动向，《中国史研究》第18卷第1—2期专刊 福格尔译 书评者 约翰逊

Hsueh, Chun-tu,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6 234p.

Rev. by Young, John D. The China Quarterly, 1988 No. 116 p. 839—840

辛亥革命新论 薛君度 书评者 扬

Lewis, Charlton M.,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 1979

Esherick, Joseph W.,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ess, 1976 314p.

Rev. by Edward Rhoads, Two cheers for 1911, Modern China, 1979 Vol. 5 No. 1 p. 127—136

中国革命的序幕 刘易斯

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湘鄂 周锡瑞

书评者：爱德华

Chang 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the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Univ. of Calif. Pr., 1987 223p.

Rev. by Grieder, Jerome B.,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8 Vol. 47 No. 3 p. 584—585

Rev. by Rankin, Mary Backu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8, Vol. 93 No. 4 p. 1100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和意义, 1890—1911年 张灏
书评者 格雷德 兰金

Schoppa, R. Keith: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82 280p.

Rev. by Rankin, Mary Backus, The Amer. Hist. Rev., 1983 Vol. 88 No. 3 p. 733

Rev. by Fincher, John,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 56 No. 1 p. 125—127

Rev. by Rawski, Evelyn 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 42 No. 4 p. 940—941

Rev. by Rowe, William T.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3 Vol. 17 p. 195—197

Rev. by Cotton, James, Asian Affairs, 1983 Vol. 14 Part 1 p. 98—100

中国社会名流和政治变迁, 20世纪初的浙江省 斯各珀 书评者
兰金 傅因彻 罗斯基 罗 科顿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 Pr., 1986 427p.

Rev. by Mann, Susa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7 No. 112 p. 664—665

Rev. by Young, Ernest P.,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7 Vol. 46 No. 4 p. 912—913

浙江省社会显要人物的行动主义和政治转变, 1865—1911年 兰金
书评者 曼 扬

Fincher, John H.: Chinese democracy: the self-government in loc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1905—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 1981 276p.

Rev. by Cohen, Paul 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 42 No. 2 p. 386—387

Rev. by Bastid, Marianne, Pacific Affairs, 1983—1984 Vol. 56

No.4 p.726—727

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 傅因彻 书评者 恩吉 巴斯蒂

McDonald, Angus W.,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1911—1927.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 1978 369p.

Rev. by Gillin, Donald 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0 Vol. 85 No. 3 p. 690—693

Rev. by Jenner, W. J. F.: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 Studies, 1980 Vol. 43 part. 3 p. 623—624

Rev. by Shaffer, Lynda: Pacific Affairs, 1980 Vol. 53 No. 3 p. 534—536

农村革命的城市渊源：1911—1927年间湖南省的名流与民众 (小) 麦克唐纳 书评者 吉林 詹纳谢弗

Lee, En-han: Chinese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1904—1911, a study of the Chinese railway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Singapore Univ. Pr., 1977 316p.

Rev. by Ocko, Jonathan 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9 Vol. 38 No. 2 p. 334—336

Godley, Michael R.: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1981 222p.

Rev. by Harriet, Zurndorfe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2 part 2 p. 225—226

南洋的人力资本：华侨企业与中国的现代化，1893—1911年 戈德利 书评者 哈里雅特

Hunt, Michael H.: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 1983 416p.

Rev. by Schaller, Michae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4 Vol. 89 No. 1 p. 232—233

Rev. by Leung, Edwin Pak-Wah, The China Quarterly, 1984 No.

98 p.367—367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 享特 书评者
沙勒 梁伯华（音）

Chong, Key-ray: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 the role of private citizens in diplomacy. Lanham: Univ. of America Pr. 1984 308p.

Rev. by Leung Edwin Pak-wah,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6 Vol. 56 No. 2 p. 328—329

美国人和中国的改良与革命，1898—1922年，平民在外交上的作用
钟凯瑞（音）书评者 梁伯华（音）

Reed, James: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1983 258p.

Rev. by Taylor, Sandr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4 Vol. 53 No. 3 p. 413

传教士思想与美国的东亚政策，1911—1915年 里德 书评者 泰勒
Chesneaux Jean and others: 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 Sussex Harvester Pr. 1977 372p.

Rev. by Eastman, Lloyd E. The China Quarterly, 1979 No. 77 p. 147—149

Rev. by Rankin, Mark Backu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9 Vol. 38 No. 2 p. 331—332

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 谢诺 书评者 易劳逸 兰金

Barlow, Jeffrey G.: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 1979 93 p.

Rev. by Laffey, Ella S. Pacific Affairs, Vol. 54 No. 3 p. 517—519

孙中山与法国人，1900—1908年 巴洛 书评者 拉菲

Schiffria, Harold Z.: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1980 290p.

Rev. by Gregor, A. Jam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1 No. 4 p. 820—822

孙中山：难以驾驭的革命者 史扶邻 书评者 格雷戈尔

Anschel, Eugene; Homer Lea,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

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ing, 1984 269p.

Rev. by Chong Key-ra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6 Vol. 55 No. 2 p. 329—330

Rev. by Schiffrin, Harold Z., Pacific Affairs, 1986 Vol. 59 No. 2 p. 300—302

李何默,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安塞尔 书评者 钟凯瑞 (音) 史扶邻

Gregor, A. James and others: Ideology and developme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 1982, 107p.

Rev. by Lin, Ching—yuan,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 56 No. 2 p. 330—332

意识形态与发展, 孙中山与台湾经济史 格雷戈尔等 书评者 林清园
Kindermann, Gottfried—karl; Sun Yat-sen; founder and symbol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Nation-building. Munich, Gunter Olzog Verlag, 1982 Vol. 1 332p.

Rev. by Wilbur, C. Mart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 96 p. 737—738

Rev. by Chan, F. Gilber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Vol. 44 No. 1 p. 174—176

Rev. by Duncanson, , Dennis, Asian Affairs, 1984 Vol. 15 Part 3 p. 331—332

孙中山: 中国革命建国的创始人和象征 金德曼 书评者 韦慕庭
陈福霖 邓肯森

Wong, J. Y.: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Hong Kong: Oxford Univ. Press, 1986 330p.

Wong, J. Y.: Sun Yat-Sen, his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Sydney: Wild Peony Pty Ltd.

Rev. by Wilbur C. Mart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8 No. 114 p. 290—291

Rev. by Gordon, Leonard H. 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eies, 1988 Vol. 47 No. 4 p. 875—876

Rev. by Pan Lyn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 of London*, 1988 Vol. 51 Part I p. 166—167

一个英雄形象的缘起：孙中山在伦敦，1896—1897年 黄宇和

孙逸仙，他的国际思想和国际交往 黄宇和

书评者 韦慕庭 戈登 潘林（音）

Tikhvinsky, *The behes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 his life, struggle and the revolution of political views)*. Moscow, 1986 224p.

Rev. by Titarenko, M.: *Fundamental study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revolutionary*. *Far Eastern Affairs*, 1987 No. 2 p. 108—111

中国革命家的遗嘱 孙中山的生活、斗争及政治观点的演变 齐赫文斯基 书评者 季塔连科

Hana, Corinna, *Sun Yat-sen's parteiorgan "Chieh-she" (1919—1920)*. Wiesbaden, 1978 430p.

Rev. by Gregor, A. James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2 Vol. 41 No. 4 p. 811—812

Fung, Edmund S. K.: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London, 1981 349p.

Rev. by Lary, Diana, *Pacific Affairs*, 1981—1982 Vol. 54 No. 4 p. 706—709

中国革命的军事透视，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冯兆基
书评者 拉瑞

著 作

Fairbank, Jhon K. and Liu, Kwang-ch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0 754p.

剑桥中国史（卷11：晚清，1800—1911 第二部分） 费正清和刘广京主编

Sealapino, Robert A. and Yu, George T.: *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 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

der, 1850—1920,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 Press, 1985 814p.

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向传统秩序的不断挑战，1850—1920年 施乐伯和于之乔

Sarao, K. T. 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its causes and origins, Delhi, Eastern Book Linkers, 1985 93p.

辛亥革命及其原因和起源 萨劳

Hsueh, Chun-tu,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6 234p.

辛亥革命新论 薛君度

Chiu, Hungdah and Leng Shao-chuan' eds, China, seventy years after the 1911 Hsin-Hai Revolution, Univ. of Virginia Press, 1985 680p.

辛亥革命七十年后的中国 丘宏达 冷绍佳合编

Fincher, John H., China's 1911 Revolution, Canberra, Croom Helm Ltd. Pub., 1979 237p.

辛亥革命 傅因彻

Fincher, John H., Chinese democracy: 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1905—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276 p.

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1914年 傅因彻
Felsing, Robert Herman, The heritage of Han, the Gelaoui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Sichuan, Univ of Iowa, 1979 316p.

汉人的遗产，哥老会和辛亥革命在四川 费尔欣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366p.

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1913年广东实况 路康乐

Adshead, S. A. M., Province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iceregal government in Sichuan, 1898—1911, London, Curzon Press, 1984 220 p.

帝制末期中国的省与政治，四川督府，1898—1911年 阿谢德

Chan, Joseph Hing-kwok, Mass disturbance and protest move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96—1911, a time-series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Pittsburgh, 1983 812 p.

晚清民众的骚乱和抗议活动, 1796—1911年 陈兴国

Prazniak, Roxann: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 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Univ. of Calif., Davis, 1981 334p.

中国乡村的社团和抗议: 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租和村镇政治 普拉兹尼克

Rankin, N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 Press, 1986 427p.

浙江省社会显要人物的行动和政治转变 兰金

Thompson, Roger Roy: Visions of the future, realities of the day: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Yale Univ. Press, 1985 450p.

未来的幻想, 当前的现实: 辛亥革命前夕的地方行政改革、选举政治与中国革命传统社会 汤普森

Hsu, Cheng-kuang: Foreign interests, state and gentry-merchant class, railway developm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95—1911, Brown, 1984 303p.

外国人的利益, 国家与绅商阶级: 近代中国初期铁路的发展, 1895—1911年 许正光

Godley, Michael R.: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1981 222p.

南洋的人力资本: 华侨企业和中国的现代化 戈德利

Bailey, Pul John: Popular education in China, 1904—1919: new ideas and developments, Canada,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1982.

1904—1911年的民众教育: 新思想和新事物 贝利

Lam, Kay-yin, J.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emergence of republican ideas in modern China, 1895—1911, Hong Kong, 1983 341p.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近代中国共和思想的出现, 1895—1911年
林启彦

Chang 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Univ. of Calif. Press, 1987 223p.

危难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 寻求秩序和意义 张灏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Bangkok, Univ. of Chulalongkorn Press, 1971 1293p.

辛亥革命研究评论

Beahan, Charlotte L.,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Univ. of Columbia Press, 1976 403p.

晚清的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 比汉

Johnsen-Rod, Candace Mauree., The catalyst effect of the Y. W. C. A. 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1901—1927. Florida Atlantic Univ. Press, 1981 115p.

基督教女青年会对中国妇女运动所起的促进作用 约翰逊-罗德

Fung, Edmund S. K., New army, at the tim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Press, 1980p.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 冯兆基

Fung, Edmund S. K.,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London, 1981 349p.

中国革命的军事透视, 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冯兆基

Reed, James,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Harvard Univ. Press, 1983 258p.

传教士思想与美国的东亚政策, 1911—1915年 里德

Heininger, Janet Elaine, The American board in China, the missionarie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1911—1952. Univ of Wisconsin, 1982 254p.

美部会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和态度, 1911—1952年 海宁格

Chong, Key-Kay,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 the role of private citizens in diplomacy. Lanham, Univ. of America Press, 1984 308p.

美国人和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1898—1922年 钟凯瑞 (音)

Hunt, Michael H.: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Univ. of Columbia Press, 1982 480p.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 亨特

Edwards, E. W.: *British diplomacy and finance in China, 1895—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230p.

1895—1914年的英国外交与中国财政 爱德华兹

Tuan, Chang-kuo: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900—1916*. Ann Arbor: Univ. of Princeton Pr., 1983 263p.

俄国与近代中国的形成, 1900—1916年 段昌国

Anschel, Eugene: *Homer Lea,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Special Studies, 1984, 269p.

李何默、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安塞尔

Liu, Yeou-hw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r. Sun Yat-sen's and Montesquieu's theory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Claremont, 1983 159p.

孙中山与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的比较研究 刘耀华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ed.: *"Sun Yat-Sen: Founder and symbol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nation-building*. Munich: Gunter Olzog Verlag, 1982 332p.

孙中山: 中国革命建国的创始人和象征 金德曼

Gregor, A. James: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keley: Univ. of Calif. Press, 1982 107p.

意识形态与发展, 孙中山与台湾经济史

Chao, Nan-Yung: *A Study of Sun Yat-sen propaganda activities and techniq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period (1894—1911)*. North Texas State Univ. Press, 1981 93p.

1894—1911年革命时期孙中山在美国的宣传方法与方法的研究 赵南云

Schiffrin, Harold Z.: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

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80 290p.

孙中山——难以驾驭的革命者 史扶邻

Barlow, Jeffrey, G.: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ess, 1979 93p.

孙中山与法国人, 1900—1908年 巴洛

Wong, J. Y.: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8 330p.

一位英雄形象的缘起: 孙中山在伦敦, 1896—1897年, 黄宇和

Chang, Jung and John Halliday: Mme. Sun Yat-sen, Harmond-
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孙中山夫人 张荣和哈利戴合著

Chan, F Jerom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in 1911,
Part 3; essays b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at the Wuhan confe-
rence on the 1911 Revolution, 12—14 Oct., 1981, New York, 95p.

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武汉辛亥革命讨论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论文集(之三) 陈志让

Eto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nterpretative essays, Univ. of Tokyo Press, 1985 332p.

辛亥革命论文集 卫藤沈吉、史扶邻合编

Hsueh, Chun-tu: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the Chinese Revolu-
tion in 1911. New York, M. E. Sharpe, 1983 240p.

中国人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薛君度

Cohen, Paul: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 Press, 1984
243p.

中国历史的发现: 美国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史学著作 科恩

Fogel, J. A., ed.: Recent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1985 238 p.

新近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福格尔

Fogel, J. A., ed & tr.: Recent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18
No. 1—2, New York, M. E. Sharpe, 1984 235p.

新近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第18卷第1—2期专刊
福格尔编译

樊书华编

(附)

1979年以来
台港有关辛亥革命论著
资料索引

论文、资料

一、总 论

- 辛亥革命史话 黄大受 中外杂志 40卷4期 1986年10月
辛亥起义史话 易笑依 畅流 64卷4期 1981年12月
中共对辛亥革命之评价 吴安家 艺文志 193 1981年10月
就全民革命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前的社会转型 陈同忠 史化 14 1981
年8月
辛亥革命与革命精神 王平 南亚学报 5 1985年11月
谁是辛亥革命的正统 传记文学 39卷4期 1981年10月
辛亥革命开国良知血诚的重视 秦孝仪 近代中国 25 1981年10月

二、辛亥革命的起因

- 中山先生决志倾覆清廷探源 庄政 三民主义学报(师大) 12 1988年
8月
民族主义与辛亥革命 李国祁 近代中国 51 1986年2月
从“排满”到“排皇”的思想结合：试论开国前国民革命的历史意义 陈
永进 近代中国 51 1986年2月
明郑创立洪门对晚近革命的影响 庄政文 国魂 409 1979年12月
同盟会时期之革命活动与洪门 庄政 革命思想 50卷3期 1981年3月
卢梭《民约论》的传来及其对清末政治思想的影响 林启彦 香港 新亚
学术集刊 第2期 1979年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民约论》 林启彦 香港 中国近代史
学会会刊 1 1987年1月

辛亥革命前的世界社及无政府主义思想 洪德先 食货月刊 12卷 2期
1982年5月

导发辛亥革命的客观背景之分析 李炳南 近代中国 67 1988年10月

三、武昌起义前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之序幕——兴中会之创立与首次广州起义 李守孔 革命思想
51卷4期 1981年10月

兴中会广州起义之评价 罗云家 民主宪政 59卷12期 1988年4月

清季革命、立宪、北洋三派政治势力之演变 黄芙蓉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
集刊 15 1983年5月

国民革命倒满时期的组织与策略 林清井 中山学报 1 1980年6月

辛亥革命之前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 吴进安 三民主义学报(师
大) 6 1982年6月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事略及其影响研究 郭明郎 台北 师专学报
14 1987年6月

国父领导的三二九之役 符涤泉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1卷3月 1988年
3月

黄花岗之役阳历日期 王天昌 书和人 591 1988年3期

春雷一声，万汇蕃滋——从三二九之役到武昌起义间革命情势的发展 卓
遵宏 近代中国 75 1990年2月

四、武昌起义

起义前筹划及意外事故——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略述之八 刁抱石 畅
流 64卷5期 1981年10月

武昌起义前之情势分析 邓耀华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13 1981年5月

辛亥武昌起义的三个组织 冯镜 革命想想 65卷5期 1988年11月

伟大的八月十九日——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略述之九 刁抱石 畅流
64卷6期 1981年11月

- 辛亥革命两大公案（《辛亥革命系何人发出第一枪》、《汪精卫与袁世凯阴谋勾结、破坏革命》） 周新 联合月刊 10 1982年5月
- 武昌起义第一枪及其他 吴相湘 艺文志 193 1981年10月
- 光宣大事及两湖革命活动年表：辛亥武昌首义历史进程 上、下 朱介凡 书和人 480—481 1983年11月
- 推定黎元洪为鄂军都督经过 胡祖舜 传记文学 37卷4期 1980年10月
- 胁持黎元洪经过 熊秉坤 传记文学 37卷4期 1980年10月
- 武昌首义与黎元洪决心参加军政府 甘绩熙 传记文学 37卷4期 1980年10月
- 武昌首义之生力军（文学社）（上） 刁抱石 畅流 63卷9期 1981年6月
- 武昌起义之地理史观 邓耀华 湖北文献 61 1981年10月
- 武昌起义轶事 丁基 国魂 419 1980年10月
-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之困境与清帝退位 王寿南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4 1986年3月
-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的回顾与启示 左祖耀 湖北文献 61 1981年10月
- 论武昌首义成功的因素 庄政 湖北文献 61 1981年10月
- 武昌首义五大检讨（上、下）蒋君章 中外杂志 32卷4—5期 1982年10—11月

五、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

- 武昌首义与国父就任临时大总统 蒋君章 东方杂志 15卷4期 1981年10月
- 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之创造 蒋军章 艺文志 193 1981年10月
-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李云汉 中国与日本 248 1981年10月
- 民国建立史的回顾与前瞻 李云汉 文艺复兴 121 1981年4月
- 万众一心，共造民国 梁惠锦 国魂 491 1986年10月
- 民初共和国体的确立 贺凌虚 近代中国 61 1987年10月
- 辛亥革命与民国创建 许朗轩 三军联合月刊 20卷8期 1982年10月
- 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 沈云龙 传记文学 36卷1期 1980年1月
- 从孙中山照片谈辛亥议和 许姬传 大成 133 1984年12月

民国元年之建都论战 林德昌 国魂 458 1984年1月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政党政治 童慧玲 三民主义学报(师大) 3
1979年6月

民国临时大总统孙、袁易位与北京兵变 沈云龙 传记文学 51卷3期
1987年9月

六、革命的性质、特点、成功因素、意义

辛亥革命是甚么革命? 任卓宣 政治评论 39卷9期 1981年10月

张玉法教授谈辛亥革命的本质 陈国祥、林鹤玲 艺文志 193 1981年
10月

论辛亥革命的本质——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是全民革命 叶伯棠 革命思
想 51卷4期 1981年10月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民国史导论之一 唐德刚 传记文学 56卷5期
1990年5月

辛亥革命几个重要特点 曹伯一 中央月刊 13卷12期 1981年10月

石破天惊——辛亥革命成功的认识 李守孔 中国文化月刊 13 1980年
11月

辛亥革命成功——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略述之十 刁抱石 畅流 64卷
7—8期 1981年11—12月

辛亥革命之成功及其挫折 陶希圣 东方杂志 15卷4期 1981年10月

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 严家淦 江苏文献 21 1982年2月

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大因素及其伟大的精神传统 徐复观 湖北文献 62
1982年1月

石破天惊——辛亥革命成功的蠡见 李守孔 湖北文献 61 1981年10月
史学家郭廷以教授谈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 文彬 艺文志 193 1981年
10月

辛亥革命的意义 陆明 民主潮 31卷10期 1981年10月

辛亥革命的社会意义 赖泽涵 中华学报 9卷1期 1982年1月

千锤百炼话辛亥: 访史学家李存孔、蒋永敬谈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王万
里特访 自由青年 72卷4期 1984年10月

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葛庆柱 革命思想 65卷4—5期 1988

年10—11月

七、革命力量构成研究

- 新军与辛亥革命（上、中、下） 刘凤翰 艺文志 217 1983年10月
近代中国 25—27 1981年10月、12月，1982年2月
- 论新军与辛亥革命 刘凤翰 湖北文献 73 1984年10月 近代中国 36
1983年8月
- 新军与辛亥革命 波多野善大著 王震邦译 世界华学季刊 1卷3期
1980年9月
- 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何定栋 湖北文献 57 1980年10月
- 同盟会与川路风潮 朱文原 近代中国 25 1981年10月
- 1911年的铁路风潮：官僚政治的前景 阿瑟·罗林鲍姆（The Railway
Controversy of 1911: The Bureaucratic Perspective, Rosenbaum,
Arthur）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1 1982年7月
- 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 王成圣 中外杂志 34卷6期 1983年12月
- 会党与辛亥革命 张玉法 传记文学 38卷2期 1931年2月
- 辛亥革命与地方势力 胡春惠 东方杂志 15卷4期 1981年10月
- 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与国会 刘永南 艺文志 193 1981年10月
- 辛亥革命时代绅士角色初探 市古宙三著 王震邦译 世界华学季刊 1
卷2期 1980年6月
- 华侨为革命之母 秦孝仪 近代中国20 1980年12月
- 华侨在兴中会革命时期的贡献 蒋有训 大汉学报 1 1980年6月
- 南洋华侨与辛亥革命 蒋永敬 传记文学 39卷2期 1981年8月
- 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反满革命运动的贡献及其与香港的联系 李恩涵
教学与研究 4 1982年6月
- 新加坡华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贡献 赖美惠 近代中国 20 1983年12月
- 租界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稿之十一 陈三井 传记文
学 38卷6期 1981年6月
- 中山先生开国时期对外交涉 朱文原 国魂 424 1981年3月
- 国父在欧美的一段外交（1911—1912） 朱文原 近代中国 72 1989年
8月

八、辛亥革命区域研究

- 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问题 张玉法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13 1981年5月
- 湖北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稿之十三 苏云峰 传记文学 39卷1期1981年7月
- 湖北与辛亥革命 苏云峰 湖北文献 61 1981年10月
- 湖北新军之成立与发展——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略述之七 刁抱石 畅流 64卷4期 1981年10月
- 四川与辛亥革命 周开庆 四川文献 173 1979年12月
- 辛亥四川革命的历史探讨 陈孟坚 中外杂志 42卷4期 1987年10月
- 对辛亥四川保路革命运动之认识 王思诚 四川文献 181 1982年1月
- 湖南地区革命运动的背景(辛亥革命) 柯惠珠 研究生 19 1980年9月
- 辛亥革命前后的长沙 童梅岑遗著 湖南文献 9卷3期 1981年7月
- 长沙革命运动与武昌起义 上、中 刁抱石 艺文志 217—218 1983年10—11月
- 河南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区域研究 1—7(续完) 李守孔 中原文献 15卷10—12期 16卷2—4期、6期 1983年10—12月 1984年2—4月、6月
- 辛亥起义说汴梁 段剑岷 近代中国 25 1981年10月
- 辛亥前后京畿的革命活动 林能士 传记文学 39卷3期 1981年9月
- 辛亥张家口革命事略 南琴轩 察哈尔文献 6 1980年2月
- 辛亥江苏光复之经过 眭云章 江苏文献 22 1982年5月
- 辛亥南京光复 眭云章 江苏文献 23 1982年8月
-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 陈三井 台北文献 63/64 1983年6月
- 辛亥上海光复经过 眭云章 江苏文献 24 1982年11月
- 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期间闽浙两省之议会政治 李国祁 历史学报(师大) 9 1981年5月
- 辛亥革命前后的东三省 赵中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1 1982年7月
- 自辛亥革命至九一八事变之东北局势(一九一一—一九三一年) 金铄 历史

学报(成大) 8 1981年9月

清末民初山西的社会与政治变迁 梁双莲 大陆杂志 71卷4期 1985年10月

参加辛亥关中起义记 孙震 陕西文献 47 1981年10月

一椿被疏漏的辛亥革命史迹——西昌张耀堂之役 何敏 自由谈 32卷10期 1981年10月

记辛亥革命定远光复之役及抗日老英雄方绍丹 孙以苍 艺文志 181 1980年10月

辛亥革命运动与香港 蒋永敬 建设 30卷6期 1981年11月 香港珠海学报 第13期 1982年

香港与辛亥革命之关系及革命史迹 余伟雄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12 1980年5月

辛亥革命运动与香港 蒋永敬 革命思想 51卷4期 1981年10月

香港同盟会与清季革命运动 周佳荣 香港珠海学报 第13期 1982年

孙逸仙博士策进革命运动与香港的关系及香港所保存的革命史迹 余伟 香港珠海学报 第13期 1982年

香港与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对1895—1912年四家香港英文报纸的分析研究(Hong Kong and China's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eports of Four Hong Kong English Newspapers, 1895—1912) 林敏森 1987年

辛亥革命鼓舞了台胞抗日运动——访连震东先生谈辛亥革命与台湾 林章松 中央月刊 13卷12期 1981年10月

孙逸仙博士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李云汉 香港珠海学报 第13期 1982年

日本与辛亥革命 M.詹塞斯著 安嘉芳译 世界华学季刊 2卷3期 1981年9月

日本对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的态度 K.K.沙姆著 安嘉芳译 世界华学季刊 1卷3期 1980年9月

辛亥革命与日本之因应 大畑笃四郎著 吴文星译 近代中国 36 1983年8月

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干涉 林明德 传记文学 38卷5期 1981年5月
论汉口、惠州两役与日本 彭泽周 大陆杂志 77卷4期 1988年10月

- 辛亥革命东京杂忆 谢扶雅 传记文学 39卷2期 1981年8月
- 辛亥革命对东南亚的影响 周佳荣 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 1 1987年1月
- 欧洲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王曾才 文史哲学报 30 1981年12月
- 英国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 邓勤臣 近代中国 36 1983年8月
- 美国对辛亥革命之态度与政策(1911—1913) 王纲领 史学汇刊 11 1981年12月 世界华学季刊 3卷2期 1982年6月 自由青年 71卷3期 1984年3月 72卷4期 1984年10月
- 美国与辛亥革命：理想与现实外交政策的制定 李本京 近代中国 36 1983年8月
- 美国与孙逸仙博士 1911—1922年 汪康龄〔音〕(Wang Kang-ling America and Dr. Sun Yat-sen, 1911—1922)
- 美国人与中国的改良和革命(1898—1922)：民间人士在外交中的作用 钟凯瑞〔音〕(Key-ray Zho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 The Role of Private citizens in Diplomacy Liew K.S.)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4 1985年6月

九、传记、人物研究合传

- 中华民国七十年届满百龄先烈先进事略(宋教仁等十六位) 近代中国 22 1981年4月
- 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届满百龄先烈先进事略(林觉民、林文、彭楚藩、樊钟秀、蔡济民、叶楚伦等) 近代中国 51 1986年2月
- 论孙黄之离合(上、下) 大陆杂志 71卷2—3期 1985年8—9月
- 国父与郑藻如关系初探 吴相湘 传记文学 37卷1期 1980年7月
- 细说“四大寇”(孙文、陈少白、尤列、杨鹤龄) 关国焯 传记文学 43卷5期 1983年11月
- 兴中会香港入会诸志士之研究 吕士朋 香港 珠海学报 第13期 1982年
- 喻培伦、章太炎、张大千 王东伟 大成 137 1985年4月
- 辛亥革命事迹杂谈——孙武与先君次生 李志新 湖北文献 58 1981年

1月

孙武与先君次生——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稿之十二 李志新 传记文学 38卷6期 1981年6月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三志士（朱山、朱国琛、阎一士）蜀侠四川文献 179
1981年7月

七十二烈士记详 闵湘帆 中外杂志 29卷3期 1981年3月

陈英士、李平书与上海光复——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稿之四 沈云龙
传记文学 37卷6期 1980年12月

罗福星及台湾志士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稿之八 陈三井
传记文学 38卷4期 1981年4月 海外学人 106 1981年5月

台湾志士与辛亥革命 陈三井 台湾文献 33卷1期 1982年3月

张謇、程德全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稿之五 沈云龙
传记文学 38卷1期 1981年1月

辛亥志士林文与赵生 孙子和 艺文志 194 1981年11月

分 传

（按传主姓氏笔划排）

三 画

民国前于右任及其所办三报与革命的关系 吴素瑜 史苑 33 1980年5月

马君武追随国父革命纪略 邵铭煌 近代中国 17 1980年6月

四 画

方声洞慷慨起义始末纪：纪念三二九黄花岗之役 艺文志 210 1983年
3月

辛亥革命先进方君瑛女士 李又宁 传记文学 38卷5期 1981年5月

怀念王亮志（王宠惠） 王之珍 传记文学 38卷1期 1981年1月

王宠惠传 郑彦棻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王宠惠传略 谢瀛洲原著 祝秀侠校订 中外杂志 34卷5期 1983年
11月

革命先进尤列生平与志业考述 庄政 复兴岗学报 33 1985年6月

革命元勋尤少纨（1—3） 冯忠效 广东文献 11卷1—3期 1981年

3月、6月、9月

身可死，党不可负的邓铿烈士 心园 今日中国 96 1979年4月

五 画

革命童子冯自由先生（一） 江汉 今日中国 104 1979年12月

革命斗士冯自由 郑彦棻 中外杂志 35卷1期 1984年1月

追怀史坚如烈士 王绍通 广东文献 10卷4期 1980年12月

六 画

留学生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记刘道一烈士 刘本炎 湖南文献 8卷3期 1980年7月

刘道一传 湖南文献 8卷3期 1980年7月

孙中山先生开国记 陈世昌 南台工专学报 1 1979年12月

孙中山先生与中国革命运动 于之乔 施乐伯著 陈立文译 近代中国 69 1989年2月

孙逸仙传记——中国的伟大斗士（一一九完）阿伦尔夫和斯特雷合著

汪锡铎译 广东文献 9卷4期，10卷2—4期，11卷1—4期 1979年12月 1981年12月

孙中山先生与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 黄昆章 香港 抖擞 53 1983年

国父在香港历史遗迹巡礼 关国焯 传记文学 45卷5期 1984年11月

革命理论家兼实行家：朱执信 朱文原 国魂 448 1983年3月

虎门遗恨——朱执信传（谢霜天著） 李新民 近代中国 16 1980年4月

革命圣人朱执信先生——朱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 郑彦棻 近代中国 22 1981年4月

朱执信传 吴敬基 国史馆馆刊 1989年12月

革命圣人朱执信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 郑彦棻 广东文献 11卷3期 1981年9月

革命圣人朱执信 郑彦棻 中外杂志 30卷1期 1981年7月

有革命圣人之誉的朱执信先生 新动力 33卷1期 1981年1月

朱家骅与辛亥革命 孙斌 国魂 434 1982年1月

伍廷芳传 王开节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伍廷芳先生事略 王绍通 广东文献 13卷3期 1983年9月

七 画

我国民主宪政先驱宋教仁烈士 刘本炎 湖南文献 9卷1期 1981年

1月

宋教仁与民主宪政 宋兰仪 近代中国 22 1981年4月

宋耀如勤赞革命大业 谢燕鸣 广东文献 18卷4期 1988年12月

革命先进杨鹤龄传略 庄政 书和人 489 1984年3月

英雄成败大凄凉——为人淡忘的革命先烈杨衢云 杨兴安 香港 明报月

刊 25卷6期 1990年6月

长沙起义前陈天华的革命思想 郭凤明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陈天华回头狮吼 徐詠平 湖南文献 8卷2期 1980年4月

陈天华事略 冯自由 湖南文献 8卷2期 1980年4月

陈天华的政治思想(上、下) 里井彦七郎著 吴文星译 近代中国 24

—25 1981年8月、10月

不喜作官的陈少白先生 江汉 今日中国 103 1979年11月

革命才士陈少白其人其事 庄政 幼狮月刊 63卷3期 1986年3月

陈少白的革命思想与事业 颜慧文 近代中国 24 1981年8月

陈纪怀先生与宁波辛亥革命 宋晞著 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1)

——国民革命史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台北 1984年6月

智勇双全的陈英士先烈 袁建禄 浙江月刊 15卷10期 1983年10月

张振武(1877—1912) 关志昌 传记文学 44卷1期 1984年1月

张继与辛亥革命 陈哲三 逢甲学报 16 1983年11月

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与南北议和 李守孔 东海学报 21 1980年6月

革命首义第一个伟人吴禄贞大将军传略 刘韻石 湖北文献 72 1984年

7月

吴禄贞传两篇 张相文、钱基博 传记文学 37卷3期 1980年9月

吴禄贞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的一幕政治暗斗 沈云

龙 传记文学 37卷3期 1980年9月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朱田慧 近代中国 25 1981年10月

邹鲁先生的家世、青少年时代及其革命思想的萌芽 陈哲三著 逢甲学报

15 1982年11月

八 画

- 林森与辛亥革命 高纯淑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12 1980年5月
林森与辛亥革命 林湘 传记文学 41卷3期 1982年9月
辛亥革命对雾峰林家的影响 徐鳌润 国魂 433 1981年12月
居正与武昌革命 郭芳美 中华学报 6卷2期 1979年7月
居正高风亮节 张国柱 中外杂志 37卷4期 1985年4月
罗福星烈士的大智大仁大勇：纪念先祖父百岁冥诞 罗秋昭 近代中国
47 1985年6月
罗福星与中国革命 陈三井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14卷10期 1981年10月
国魂 424 1980年3月
革命新娘卓国华 严友梅 近代中国 18 1980年8月
革命先烈卓国华女士生平事略 黄瑞南 自由青年 64卷2期 1980年
8月
革命女杰卓国华 郑彦棻 中外杂志 28卷3期 1980年9月
卓国华女士事略 广东文献 10卷3期 1980年9月
敬悼“革命新娘”——卓三如（卓国华） 林华平 广东文献 10卷3期
1980年9月

九 画

- 辛亥革命秘辛——赵尔丰玩火自焚 王成圣 中外杂志 45卷5期 1989
年5月
胡汉民书生报国 卢伟林 中外杂志 44卷4期 1988年10月
胡汉民传 王宏志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胡汉民先生的勋业 卢伟林 广东文献 18卷1期 1988年3月
不匱室主胡汉民先生 江汉 今日中国 109—112 1980年5—8月
辛亥武昌政府首任外交部长：我的外祖父胡瑛 杜一 中外杂志 30卷5
期 1981年11月
鉴湖女侠秋瑾年表（上、下） 林逸 书和人 447—448 1982年8月
鉴湖女侠——秋瑾 文逸欣 华文世界 12 1981年1月
秋瑾的革命事功 朱文原 国魂 440 1982年7月

十 画

- 袁世凯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影响之研究 江玉凤 树德学报 8 1983年6月
- 从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谈起 E. P. 扬讲 朱开芳译 历史学报(师大) 8 1980年5月
- 美国驻华代办看武昌起义时的袁世凯 关沁恒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2 1987年10月
-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林朋德 (Yuan Shih-kai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Lin Ming-t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1 1982年7月
- 唐继尧传 何志浩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先兄耿丹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纪实 耿心 湖北文献 56 1980年7月
- 辛亥革命功臣徐绍桢脱险趣事 徐家阜 香港明报月刊 24卷9期 1989年9月

十一 画

- 章炳麟在辛亥革命前后之政治立场 钱秀琴 史苑 45 1987年7月
- 章炳麟与革命风潮(1900—1905) 汪荣祖 (Chang Ping-lin and the Rising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00—1905 Young-tsu Wong)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2 1983年6月
- 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思想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梅布尔·李 (Mabel Lee, Chang Ping-lin's Concept on Self and Society; Question of Constancy and Continuity after 1911 Revolution.) 中华民国初期历史讨论会论文集 1984年4月出版 第593页
- 章太炎宣扬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 贺凌虚 近代中国 75 1990年2月
- 章太炎先生研究论著索引初编(一) 章念驰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8 1989年9月
- 武昌起义与黄克强 中国宪政 23卷9期 1988年9月
- 黄克强先生的出生入死精神 狄介先 湖南文献 16卷3期 1988年7月
中国宪政 23卷10期 1988年10月
-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沈云龙 传记文学 37卷5期 1980年11月

- 开国元勋黄克强 黄中 国魂 434 1982年1月
- 雷雨湘江起卧龙——开国人豪黄克强先生生平二三事 秦孝仪 湖南文献
10卷1期 1982年1月
- 黄兴与武昌首义 李云汉 革命思想 52卷1期 1982年1月
- 黄兴与武昌首义 李云汉 湖南文献 11卷1期 1983年1月
- 先烈黄兴二三事 李鸣 生力 16卷185—186期 1983年9月
- 首义元老黄镇中公传略 黄农 湖北文献 54 1980年1月

十二画

- 谢持先生的革命志业 蒋永敬 近代中国 71 1989年6月
- 彭家珍传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蒋翊武传 姚跨鲤 湖南文献 8卷4期 1980年10月
- 蒋翊武(1885—1913) 关国焯 传记文学 44卷1期 1984年1月

十四画

- 革命先进、开国宿将——谭人凤(上、下) 孙子和 国魂 422—423
1981年1—2月 44卷1期 1984年1月
- 谭廷闿与辛亥革命 刘鹏佛 近代中国 23 1981年6月 湖南文献 10
卷2期 1982年4月
-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陶英惠 传记文学 38卷3期 1981年3月
- 革命学人蔡元培 黄中 国魂 424 1981年3月
- 蔡元培先生传略 陈三井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 邓嗣禹 传记文学 39卷3期 1981年
9月
- 蔡松坡先生的生平与功业 召曰安 近代中国 26 1981年12月
- 蔡松坡(锷)先生的高风亮节 赵佛重 湖南文献 13卷2期 1985年
4月
- 云南起义的蔡松坡将军 刁抱石 湖南文献 10卷2期 1982年4月
- 蔡松坡与云南起义的真相——云南起义,再造共和七十年纪念 周庆余
湖南文献 9卷3期 1981年7月

十五画

- 辛亥武昌新军首义与黎元洪 沈云龙 传记文学 37卷4期 1980年10月
湖北文献 61 1981年10月
黎元洪与辛亥革命 雍叔 湖北文献 61 1981年10月

十、史料书评及其他

- 辛亥双十专辑 国魂 431 1981年10月
中国同盟会史料选辑 近代中国 25 1981年10月
孙大总统民元颁布政令年表 近代中国 21 1981年2月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辛亥革命开国影集 近代中国 21
1981年2月
国父民元开国规模史料选辑 近代中国 21 1981年2月
辛亥革命日本档案选辑 洪桂己 国史馆馆刊 1 1987年1月
关于〈惠州之役记事〉的商榷——检讨中日两国史料的差异 彭泽周
大陆杂志 77卷6期 1988年12月
辛亥广州之役日本外务省档案 洪桂己 国史馆馆刊 7 1989年12月
日本前海军省所保存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 陈鹏仁 近代中国 63 1988
年2月
辛亥那一年 蔡元培 传记文学 38卷3期 1981年7月
辛亥武昌起义后蔡元培致吴敬恒函 蔡元培 传记文学 38卷3期 1981
年3月
扑朔迷离探行踪：院藏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料简介之一 冯明珠 故宫
文物月刊 3卷3期 1985年6月
五烈士事迹实证——院藏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料简介之二 冯明珠 著
故宫文物月刊 3卷4期 1985年7月
国父亲自领导的十次起义——院藏中华民国开国史料简介之三 冯明珠 著
故宫文物月刊 3卷5期 1985年8月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院藏中华民国开国史料简介之四 冯明珠 著
故宫文物月刊 3卷6期 1985年9月
武昌起义：院藏中华民国开国史料简介之五 冯明珠 著 故宫文物月刊 3

- 卷 7 期 1985年10月
- 电宗档与各省光复：院藏中华民国开国史料简介之六 冯明珠著 故宫文物月刊 3卷 8期 1985年11月
- 辛亥革命史料中的自传、回忆录及日记 蒋永敬 传记文学 41卷 3期 1982年 9月
- 《武昌起义的前导——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传》书后〔朱介凡〕 尹雪曼 近代中国 36 1983年 8月
- 香港《中国日报》的革命宣传 陈三井 香港 珠海学报 第13期 1982年 评述《兴中会革命史要》 庄政 近代中国 17 1980年 6月
- 《黄克强先生致国父书》读后 何广棧 书目季刊 14卷 1期 1980年 6月
- 《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浩气英风——史坚如传》〔吴东权著〕读后 杨万运 近代中国 35 1983年 6月
- 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 陆玉昆、陆玉良 近代中国 72 1989年 8月
- 三民主义研究学术化与国际化之示范起步：陈〔孟坚〕著《民报与辛亥革命》评介 曾虚白 近代中国 51 1986年 2月
- 汪精卫勾结袁世凯的一段史实——辛亥革命一位北方领袖著述之析介 周新 传记文学 40卷 6期 1982年 6月
- 《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序 秦孝仪 近代中国 53 1986年 6月
- 有关宋教仁的史料及研究成果简介 吴志铿 近代中国 22 1981年 4月

十一、动态

- “辛亥革命研讨会”记略 苏云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2 1983年
- 辛亥革命研讨会简报：1961—1982年的两个重大问题（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 李金强 1987年 近代中国论文集 第1期（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s o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Two Important Issues 1961—1982, by Lee Kam-keu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1987. Modern China Papers No. 1）

- 参加辛亥革命讨论会的始末 陈忠栋 近代中国 28 1982年4月
- 王宠惠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 胡有瑞等 近代中国 20
1980年12月
- 《与国同寿话辛亥》座谈 秦孝仪等 中央月刊 13卷12期 1981年10月
- 辛亥川路风潮——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略述之五 刁抱石 畅流 64
卷2期 1981年9月
- 革命团体大联合——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略述之六 刁抱石 畅流 66
卷3期 1981年9月
- 以辛亥革命的军用钞票来庆祝建国七十年 丁张弓良 近代中国 25
1981年10月
- 《华侨为革命之母》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 黄肇珩等 近代中国 20
1980年12月
- 为历史作见证，为革命传薪火——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联谊座谈会纪实
严定暹 中央月刊 13卷 11期 1981年9月
- 开国艰难我适先——访龚浩先生谈辛亥武昌首义 余思宙 中央月刊 13
卷12期 1981年10月
- 辛亥革命与沪浙光复——访何应钦将军谈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反制中共
统战之道 孙亦文 中央月刊 13卷12期 1981年10月
- 历史工作者必须忠于历史的真确性——在“辛亥革命与民国创建”学术讨
论会后发表谈话 秦孝仪 近代中国 28 1982年4月
- 辛亥革命与香港的学术讨论 韦业 中国评论 573 1981年10月
- 简介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 小岛淑男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2 1986
年2月
- 简记横滨“三民主义与中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研讨会” 陈三井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1 1982年7月
- 出席芝加哥“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的回忆与感慨 李云汉 近代中国
34 1983年4月
- 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八十周年谈同盟会在国民革命历史上的地位、纪念抗
战胜利四十周年谈八年抗战的回顾与启示 中央党史委员会研究委
员、研究员、副研究员座谈会纪实 胡有瑞、马西屏整理 近代中国
48 1985年8月
- “蔡元培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 胡有瑞整理 近代中国

书 目

一、论 著

- 辛亥革命的研究 上、下册 李金强著 台北 1989年6月版
- 辛亥革命始末记(二册) 勃海寺臣辑 台北 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85年重印
- 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 李炳南著 台北 正中书局 1988年版 240页
- 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 郑宪著 陈孟坚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5年8月 396页
- 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 朱法源著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 1985年6月 416页
- 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 陈孟坚 台北 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助出版委员会 1986年 636页
- 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 周佳荣著 香港 昭明出版社 1979年10月 106页
- 辛亥武昌首义史话 刁抱石著 台湾 畅流半月刊社 1981年12月 198页
- 武昌革命史 曹庆云著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1年12月 3册
- 辛亥革命画史 江汉出版社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9年重印 1册
- 湖北革命知之录 张义痴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9年重印 1册
-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 章裕昆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9年重印 1册
- 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 林能士 台北 正中书局 1981年版
-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美) 周锡瑞著 杨慎之译 台北 华世出版社 1986年 395页
- 国民革命与台湾(秦孝仪主编) 陈三井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0年10月 253页
- 孙中山先生革命与香港 李进轩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9年出版 126页
- 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 颜清煌撰 李恩涵译 1982年5月 465页
- 近代中国之革命与日本 彭泽周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9年10月 367页
-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朱文原撰 台北 正中书局 1980年 201页
- 辛亥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洪德先 台湾 1984年

中华民国春秋 上、下册 陈鉴波著 台北 三民书局 1989年增订第四版

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篇 革命开国 (一)、(二) 教育部主编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85年4月 2册

中华民国建国史纲 贺允宜等著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4年3月 436页

中华民国建国史话 王静芝著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4年5月 322页

国民革命战史 第一部 建立民国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1年10月 3卷(606页)

二、传 记

合 传

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传记 上、下册 沈刚伯等编著 台北 正中书局 1981年6月 第7版

革命先烈传记(1—12册) 章君毅、钟雷等著 台北 金兰出版社 1985年3月

“青少年最佳课外读物”：

1. 陆皓东 章君毅著 247页
2. 史坚如 章君毅著 214页
3. 邹容 钟雷著 158页
4. 吴 樾 南 郭著 166页
5. 徐锡麟 彭 歌著 133页
6. 秋 瑾 张漱菡著 142页
7. 林觉民 高 阳著 121页
8. 喻培伦 司马中原著 185页
9. 温生才 魏希文著 170页
10. 彭家珍 章君毅著 150页
11. 陈其美 章君毅著 198页
12. 黄 兴 章君毅著 211页

革命先烈先贤别传 上、中、下版 杜英穆著 台北 名望出版社 1985

年2月 3册

武昌起义的前导——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传 朱介丸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12月 144页

梁启超、辜鸿铭、章炳麟 杜穆英著 台北 名望出版社 1988年版 208页

凛烈万古——彭家珍、杨禹昌、张先培、黄文萌合传 宣建人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2年10月 114页

路血——范传甲、倪映世、熊成基三烈士传 胡秀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2年2月 220页

霹雳行——温生才、林冠慈、陈敬岳、钟明光合传 邓文来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3年5月 194页

双杰传——方声洞、林觉民合传 乐茵军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79年8月 118页

分 传

刚毅木讷的学者革命家——丁惟汾传 杨仲揆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3年10月 240页

丁惟汾传记资料（一） 朱传誉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79年11月

三 画

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 刘延涛编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7年8月 286页

半哭半笑楼主——于右任传 张健著 台湾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0年12月 108页

于右任传记资料（1—8集）朱传誉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81年1月 8册

四 画

民国第一位法学家——王宠惠 段彩华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1月 294页

王宠惠与近代中国 余伟雄著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7年7月 318页

王宠惠传记资料(1—3) 朱传誉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79年11月 3册

五 画

太一诗魂——宁调元传 杨震夷著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5年2月 220页

浩气英风——史坚如传 吴东权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3年4月 220页

六 画

孙中山先生与辛亥革命(上、中、下) 黄季陆等著 台北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1981年12月

孙逸仙先生传 上、下册 吴相湘著 台湾 远东图书公司 1982年11月初版 1984年3月再版 2册 1783页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六册) 罗刚著 台北 正中书局 1988年版 5200页

国父孙中山先生传 正中书局编审委员会编 台北 正中书局 1980年9月 153页

国父孙中山先生传 傅启学编著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3年1月 第4版 600页

国父传 刘中和著 台北 益群书店 1986年3月 266页

国父革命宣传志略(上、下) 汤承业著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9年11月 918页

国父生平与志业 庄政著 台北 中央日报出版部 1982年5月 452页

国父七访美檀考述 项定荣著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2年3月 288页

国父在日本 陈鹏仁著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8年8月

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 庄政撰 台北 正中书局 1981年 264

国父革命运动史要及其思想之演进 蒋永敬著 台北 正中书局 1979年10月 170页

孙中山与华盛顿 马起华著 台湾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2年1月 242页

虎门遗恨——朱执信传 谢霜天著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79年5月 154页

七 画

- 宋教仁传 吴相湘著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年9月 301页
- 三湘渔父——宋教仁传 方祖桑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0年9月 512页
- 汪精卫传 王美真编 台湾 国际文化 1988年版
- 书生仗剑起西陲——杨庶堪传 廖汀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1983年11月 218页
- 李烈钧传记资料(1—2) 朱传誉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79年11月 1985年1月 2册
- 政学系与李根源 存莘学社编辑集 周康燮主编 香港 大东图书公司 1980年10月 1册
- 武昌首义一少年——邵百昌将军传 姜龙昭著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5年10月 166页
- 作狮子吼——陈天华传 罗宗涛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2月 108页
- 民国陈夔石先生少白年谱 陈德芸述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0年7月 38页
- 是天民之先觉者——陈少白传 黄雍廉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3年10月 218页
- 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 民国外史 邵元冲、许金诚等编著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7年3月
- 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 徐詠平撰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0年5月 579页
- 毁家忧国一奇人——张人杰传 张素贞著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编辑、出版 1981年5月 96页
- 北方之强——张继传 徐文珊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6月 150页
- 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 吴东权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5月 178页
- 九边处处蹄痕——吴禄贞传 胡玉衡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10月 130页

- 霹雳手段——吴懋传 林适存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1年12月 128页
- 青年之神——邹容传 翟君石著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 出版 1988年 222页
- 邹容与中国革命（1855—1925） 许继峰撰 台北 正中书局 1981年 201页
- 愈经霜雪愈精神——邹鲁传 戴书训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3年10月 160页

八 画

- 侠骨忠魂——郑士良传 王怡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3年5月 200页
- 表率群伦的林子超先生——林森传 朱西宁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6月 392页
- 林森传记资料（1—2） 朱传誉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79年11月 1985年11月再版 2册
- 菩萨心肠的革命家——居正传 赵玉明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2年1月 186页
- 居正传记资料（1—2） 朱传誉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79年11月 出版 2册
- 罗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 覃怡辉著 台北 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 1981年9月 84页
- 大湖英烈——罗福星传 罗秋昭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5年8月再版 266页

九 画

- 一腔热血千行泪——赵声 杨宗莹著 台北 近代中国杂志社 1980年12月 84页
-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 蒋永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5年9月
- 胡汉民传记资料（1—7） 朱传誉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影印 1979年11月 7册
- 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传 周素珊著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79年

5月 110页

十 画

鬼神泣壮烈——徐锡麟 高岱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2年2月 240页

十一 画

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黄兴传 白慈飘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0年5月 190页

民国黄克强先生兴年谱 杨愷龄撰编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1年4月 155页

十四 画

党军师祿——廖仲愷传 朱星鹤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1983年4月 228页

谭祖安先生年谱 台北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 1979年1月 77页

谭延闿传记资料(1—5) 朱传营主编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85年5册

蔡元培 华欣文化事业中心编辑、出版 台北 1979年3月 304页

一代人师蔡元培 黄肇珩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2年3月 222页

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 周佳荣著 香港 波文书局 1980年9月 118页

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上、中、下) 孙常炜编著 台北 国史馆 1985年6月—1987年6月 3册

风云长护——蔡松坡传 魏伟琦著 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辑、出版 台北 1982年5月 134页

蔡松坡传 彭本乐著 台湾 国际文化 1988年 416页

民国蔡松坡先生年谱 林逸著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7年10月 245页

三、文集、资料汇编等

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 中研院近代史所编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年

6月 415页

目录: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 蒋永敬	1
辛亥革命后浙江民主政治的推动及转变 李国祁	23
辛亥前后的地方分权主义 胡春惠	45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 陈三井	71
辛亥革命在福州 李金强	87
辛亥革命时期港澳的宣传 余伟雄	125
论新军与辛亥革命 刘凤翰	147
再论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张朋园	187
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李云汉	201
中部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王聿均	231
革命前十余年间女学的倡导 吕士朋	251
辛亥革命与知识妇女 戚世皓	267
河南与辛亥革命 李守孔	293
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王纲领	333
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变迁 赖泽涵	357
辛亥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张玉法	377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7)、(18) 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 上、下册 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主编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年7月

目录:

上册

一、从思想史角度看辛亥革命	余英时
二、辛亥革命的意义	张朋园
三、辛亥革命之序幕——兴中会之创立与首次广州起义	李守孔
四、兴中会时期革命言论之演进	蒋永敬
五、香港《中国日报》的革命宣传	陈三井
六、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宣传	张玉法
七、庚子至辛亥期间(1900—1911)革命思想的分析	李云汉
八、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	蒋永敬
九、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	蒋永敬

十、光绪戊戌前后革命保皇两派之关系	李守孔
十一、辛亥革命时期领袖群的进取与保守	张朋园
十二、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	王德昭
十三、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	鲍家麟
十四、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1905—1912)	林维红
十五、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李云汉
十六、中部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王聿均
十七、光复会与辛亥革命	张玉法
十八、清季留日陆军学生与辛亥革命	李守孔
十九、同盟会时代湖北新军之革命活动	李守孔
二十、新军与辛亥革命	刘凤翰
二一、海内外会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	邓嗣禹
二二、南洋华侨与辛亥革命	蒋永敬
二三、清季武昌学界的革命运动	苏云峰
二四、辛亥革命运动与香港	蒋永敬

下 册

二五、各省諮议局联合会与辛亥革命	李守孔
二六、辛亥前后的地方分权主义	胡春惠
二七、辛亥革命时期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	林能士
二八、租界与中国革命	陈三井
二九、外人与辛亥革命	张玉法
三十、欧洲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王曾才
三一、英国与辛亥革命	王曾才
三二、美国对辛亥革命之态度与政策	王纲领
三三、辛亥革命与日本西园寺内阁	彭泽周
三四、法国与辛亥革命	陈三井
三五、俄国与辛亥革命	郭恒钰
三六、中国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	胡春惠
三七、蔡元培与清季革命	陶英惠
三八、段祺瑞与辛亥革命	李守孔

三九、伍廷芳与辛亥革命	张存武
四十、蒋中正先生与辛亥革命	李云汉
四一、国父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	黄季陆
四二、铁路国有问题与辛亥革命	全汉升
四三、川路风潮——武昌起义前的一把革命火炬	刘岱
四四、蒲殿俊与川路风潮	张朋园
四五、辛亥武昌起义后欧美党人的活动	陈哲三
四六、朱芾煌与辛亥南北议和	蒋永敬
四七、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问题	张玉法
四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清帝退位之交涉	李守孔
四九、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	吴相湘

中国现代史论集 第三集 辛亥革命 张玉法主编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年7月 461页

目录:

《中国现代史论集》总序.....张玉法

第三辑 例言

概论

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	梁敬铎
辛亥革命的本质	莱特女士
从社会系统论分析辛亥革命	金耀基
辛亥革命时期领袖群的进取与保守	张朋园

革命领导

评介史扶邻著《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张朋园
评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	陈福霖
宋教仁的革命人格	朱法源

革命团体

张若《清季的革命团体》评介	蒋永敬
评《中国革命的基石(1905—1912)——同盟会小史》	张玉法
评介玛莉·伦钦著《早期的中国革命党人》	梁惠锦
共进会——一个晚清的革命团体	冯兆基

革命经费

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	郑宪
--------------	----

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蒋永敬

社会参与

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王德昭

评介高著《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范毅军

辛亥革命与缅甸华侨……………陈儒性

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活动……………冯兆基

洪门及其反满活动……………张玉法

张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闵斗基

国际关系

辛亥革命期间列强对华外交之研究……………陈 骥

外人与辛亥革命……………张玉法

索引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 第1集 辛亥革命史 本书编委会编 台北

1981年10月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稿 沈云龙著 台北 传记文学社 1981年

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究会论文集 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台湾 1986年

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论集 (一) 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 (二) 中华民国开国史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台北 1985年12月 共4册

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 沈云龙著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年9月

478页

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续集 沈云龙著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8年10月

645页

辛亥革命资料汇集(1—5) 在莘学社编 香港 大东图书公司 1980年10月

5集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上、下) 国史馆史料处编辑、出版 台北

1981年8月

先烈先进图象文物集珍 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编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4年2月 393页

先烈先进文物大展图录 文海出版社 1984年11月出版 305页

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 秦孝仪主编 台北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主编、

出版 1984年11月 1018页
中华民国史事日誌 (第1册) 郭廷以著 中研院近代史所 1979年7
月出版

郭兴仁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是一种公开发行的不定期学术性刊物，反映国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学术成果、研究动态等，每年大致出版两辑，每辑25—30万字。服务对象是国内史学工作者和关心中国近代史的广大读者。所刊载的论文多具新观点、新见解，或国内少见的新资料，尤其着重刊载与国内学者观点不同的论文译文，供史学工作者比较研究。

本刊欢迎有关中国近代（1840—1949）历史的下列稿件：

1. 专论译文；
2. 专著摘译或节译；
3. 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回忆录译稿；
4.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或述评；
5. 国外有关著作的书评或介绍；
6. 其他。

本刊并欢迎推荐值得译介的有关文章。一经采纳，当赠本刊为谢。

译稿要求译文准确，人名、地名、官职、机构名称等，务请查核清楚，引用中文资料应使用资料原文；数字、日期、标写方法，以《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注释一律采用同页脚注。

译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即发函通知；一经发表，即按规定致酬；如不采用，妥为退稿。

无论译稿或撰写稿，均请使用有格稿纸，书写工整，译文中所附原文请用印刷体书写。

来稿请写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所便。

来稿来信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勿寄个人。

第 18 卷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八辑

(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如筠

责任校对：丁如筠

封面设计：王 鹿

版式设计：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八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处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71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册

ISBN 7-5004-0884-6/K·107 定价：5.30元